

# 俄罗斯研究

汪道涵 题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 目 录

### 思想与文化

- 3 刘文飞 / 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思想史意义
- 29 龙瑜宸 / 以赛亚·伯林与俄罗斯文化
- 50 季明举 / 想象的共同体：斯拉夫派的民族主义文化意识建构
- 80 赵爱国 / 俄罗斯语言学传统中的方法论特质

### 宗教与社会

- 111 徐凤林 / 当代俄罗斯东正教社会服务简析
- 125 翁泽仁 / 当代俄罗斯东正教媒体的传播状况探析

### 欧亚经济

- 146 徐坡岭、刘畅 / 俄罗斯经济增长中的技术效率与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非径向超效率 DEA 模型
- 169 伊万·沙拉法诺夫、任群罗 / 中国企业在哈萨克斯坦投资环境评价及风险研究——基于 69 家中资企业调查研究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冯绍雷

副 主 编：陈大维（常务）

杨 成

刘 军

本期执编：贝文力、万青松

本期编务：阎德学

封面设计：王 洪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电话：021-62233816；62238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6 年 8 月 28 日

#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16 年第 4 期 (双月刊)

## Оглавление

### *Лю Вэньфэй*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Владимира Соловьёва ..... (3)

### *Лун Юйчэн*

Исайя Берлин и рус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 (29)

### *Ли Минцзю*

Воображаемые сообщества: национ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конструкция культурного сознания славянофильства ..... (50)

### *Чжао Айго*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методолог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й традиции ..... (80)

### *Сюй Фэнлинь*

Краткий анализ социального служе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 (111)

### *Вэн Цзэжэнь*

Анализ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ы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православных СМИ ..... (125)

### *Сюй Болин, Лю Чан*

Анализ технической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и и факторов, влияющих н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рост России-На основе super-v-SBM DEA ..... (146)

### *И.Сарафанов, Жэнь Цюньло*

Оценка и анализ рисков инвестиционной среды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для китайских предприятий—На основ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69 китайских инвестиционных предприятий ..... (169)

#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16年第4期(双月刊)

## Contents

### *Liu Wenfei*

Significance of Vladimir Solovyov for Russian Intellectual History····· (3)

### *Long Yucheng*

Isaiah Berlin and Russian Culture····· (29)

### *Ji Mingju*

Imagined Community: Slavophilistic Nationalistic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50)

### *Zhao Aiguo*

Qualities of Methodology in Russian Linguistics Tradition ····· (80)

### *Xu Fenglin*

A Brief Analysis on Social Services of Contemporary Russian Orthodox Church·····(111)

### *Weng Zeren*

On the Propagation of Contemporary Russian Orthodox Media····· (125)

### *Xu Poling, Liu Chang*

Analysis on Technical Efficiency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in Russian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the Non-radial Super-efficient DEA Model ····· (146)

### *Ivan Sarafanov, Ren Qunluo*

On Evaluation of Investment Environment and Risks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Kazakhstan: Researches Based on 69 Chinese Enterprises····· (169)

**思想与文化****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思想史意义**

刘文飞\*

**【内容提要】**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被誉为“俄国现代哲学之父”。这位逝于20世纪初的俄国哲学家却构成俄国思想史的重要分水岭之一，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20世纪思想家。他在俄国思想史上的意义持久而又深远：首先，他创建了独具特色的万物统一哲学，为俄国现代哲学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其次，他率先提出并思考关于俄国历史命运和发展道路的“第三条路径”；最后，他试图融哲学、神学、科学乃至艺术为一体的创作追求和表达方式也具有深远的本体论和方法论意义。索洛维约夫思想体系的确立，标志着俄国知识分子理性精神的成熟、俄罗斯民族现代意识的觉醒以及俄国独特的“帝国规模”思维传统的形成。

**【关键词】**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 万物统一哲学 俄国思想史

**【中图分类号】**D751.2;D093/097**【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6)04-0003(26)

1900年7月31日（新历8月13日），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索洛维约夫（Владимир Сергеевич Соловьёв）病逝于莫斯科郊外的乌兹科耶庄园（今莫斯科工会大街123a号），年仅47岁。这位逝于20世纪初的俄国哲学家，其思想却构成了俄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分水岭之一，他因此成为

\* 刘文飞，首都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北京斯拉夫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副会长。

一位真正意义上的 20 世纪思想家；他生命的最后一站乌兹科耶（Узкое）在俄语中意为“狭窄庄园”，而他的精神遗产却穿越时空，在俄国产生了持续而又广泛的影响。



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 1853 年 1 月 16 日（新历 28 日）生于莫斯科一户真正的书香门第，其父是俄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索洛维约夫（Серг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оловьёв, 1820–1879），29 卷本的史学巨著《俄国通史》（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ён）的作者，1871–1877 年间的莫斯科大学校长；其母出身大贵族，是俄罗斯和乌克兰著名哲学家斯科沃洛达（Григорий Саввич Сковорода, 1722–1794）的后裔。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哥哥弗谢沃洛德（Всеволод）和妹妹波里克谢娜（Поликсена）均为作家，著名的象征派诗人小谢尔盖·索洛维约夫（Серг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оловьёв-младший, 1885–1942）是他侄子。

在莫斯科读完中学后，16 岁的索洛维约夫进入莫斯科大学数理系学习，两年后转入文史系。他很早便表现出对哲学和宗教问题的浓厚兴趣：“我自幼年起迷恋宗教问题，我在 14–18 年间经历了多个阶段的理论否定和实践否定”。<sup>①</sup>他在大学苦读诗书，热衷哲学和历史，同时也迷恋占卜和招魂术等“玄学”。索洛维约夫 1873 年大学毕业后留校，在哲学教研室工作，同年迁居谢尔吉镇，在圣谢尔吉修道院的神学院听课一年。1874 年，索洛维约夫完成题为《西方哲学的危机（驳实证主义者）》（Кризис западн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против позитивистов)）的硕士论文，对西方的实证主义哲学提出质疑，指出了西方哲学中唯理论和经验论这两种认识论所具有的片面性。答辩于 1874 年 11 月 24 日在彼得堡大学举行，索洛维约夫完成答辩后获哲学副教授职称，继续在莫斯科大学授课。1875 年 6 月，索洛维约夫前往英国，在大英博物馆研究印度哲学、诺斯替哲学和中世纪哲学，其间突然在内

---

<sup>①</sup> Под ред. П.А.Николаева, Рус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Библ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М., Просвещение, 1990. т.2. С.244.

心听闻“索菲娅<sup>①</sup>的神秘召唤”，于1875年10月16日启程前往埃及，于夜宿沙漠时得见索菲娅显容。1876年回国后，索洛维约夫在莫斯科大学执教逻辑学与古代哲学史课程，此时与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希特罗沃(Софья Петровна Хитрово, 1848-1910, 出嫁前姓巴赫梅杰娃<Бахметева>)相识，他与后者的恋情持续很久，却未成眷属。索菲娅·希特罗沃是诗人、外交官希特罗沃的夫人，彼得堡沙龙的女主人，她年长索洛维约夫五岁，在结识索洛维约夫时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索洛维约夫将她视为智慧女神索菲娅的人间化身，视为能赋予他创作灵感的缪斯，终生钟情于她，矢志不渝。

由于厌倦莫斯科大学教授间的勾心斗角，索洛维约夫于1877年辞去教职，前往彼得堡，任国民教育部学术委员会委员，同时在彼得堡大学和高等女子学院做讲座。他的系列讲座《神人类讲座》(Чтения о Богочеловечестве)受到广泛欢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都曾是他的听众。索洛维约夫在彼得堡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密切交往，两人曾结伴前往奥普塔修道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夫人在她的回忆录中忆及他们两人交往的温馨场面。<sup>②</sup>在彼得堡期间，索洛维约夫的世界观逐渐形成，他展开积极的政论写作和哲学著述，他的两部重要哲学著作均写于这一时期，即《完整知识的哲学本原》(Философические начала цельного знания, 1877)和《抽象原理批判》(Критика отвлеченных начал, 1880)，他藉此建立起他的“万物统一”(всеединство)哲学体系。1880年4月6日，他以《抽象原理批判》作为博士论文在彼得堡大学完成答辩。1881年3月28日，他在公开演讲中呼吁宽恕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的刺客，引起当局不满，之后被迫离开大学和国民教育部，年仅28岁的他宣布“退休”，从此便开始了所谓的“流浪生活”时期(период «бродячей жизни»)。索洛维约夫始终没有家庭，没有居所，大多居住在友人处，或旅行国外。但是在这一时期，他关于社会、政治和宗教的思考甚多，成果甚丰，学术影响也甚大，最终提出他的“神权政治乌托邦”

---

① София, 又译“索菲亚”，因这一形象源自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在索洛维约夫处又被视为“永恒温柔”之化身，故在此处译为更具阴性色彩的“索菲娅”，藉此亦可有别于作为地名的“索菲亚”。

② 参见《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回忆录》，倪亮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46-247页、第325页等处。

（те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утопия）理想。他相继推出的重要著作有：《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次演讲》（Три речи в память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1881-1883），《生活的精神基础》（Дуновные основы жизни, 1882-1884），《大争论与基督教政治》（Великий спор и христиан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1883），《俄国的民族问题》（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в России, 1883-1891），《神权政治的历史和未来》（История и будущность теократии, 1885-1887），《俄国与欧洲》（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а, 1888），《俄罗斯理念》（Русская идея, 1888），《俄国与普世教会》（Россия и Вселенская церковь, 1889）等。

1891年，他应邀主编著名的《布罗克豪斯—埃夫隆百科全书》的哲学部分，撰写词条130多篇，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他“重返哲学”。同年，他爱上又一位名为“索菲娅”的女性，即索菲娅·米哈伊洛夫娜·马尔蒂诺娃（Софья Михайловна Мартынова, 1858-1908，她的公公就是在决斗中杀死莱蒙托夫的军官马尔蒂诺夫），为后者写下一组情诗，据索洛维约夫称，他在马尔蒂诺娃的脸上最后一次看到智慧女神索菲娅的神采。在生命的最后十年，索洛维约夫对“神权政治的未来”颇为失望，转而关注哲学、伦理学和美学，写出大量著作，如《自然之美》（Красота в природе, 1889）、《艺术的普遍意义》（Общий смысл искусства, 1890）、《爱的意义》（Смысл любви, 1892-1894）、《善的证明》（Оправдание добра, 1894-1897）、《理论哲学》（Теоритиче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1897-1899）和《关于战争、进步和世界历史终结的三次谈话》（Три разговора о войне, прогрессе и конце всемирной истории, 1899-1900）等，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思想遗产。1898年，索洛维约夫再度前往埃及，或许是为了重温当年目睹索菲娅显容时的感受。回国后他写下长诗《三次相会》（Три свидания, 1898），此诗的副标题“莫斯科—伦敦—埃及, 1862-1875-1876”交代了他在不同地点（莫斯科的教堂、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和埃及的沙漠）、不同时间与索菲娅女神的三次神秘相会。

索洛维约夫一直过着“流浪”生活，并长期斋戒，这影响到他的身体健康。他还喜欢无节制地使用松节油，认为松节油的气味能驱除一切病魔，他称之为“索洛维约夫香水”（Bouquet Solovieff）。但松节油有毒，对肾脏

尤其有害，故马科夫斯基（Сергей Маковский）在《白银时代的帕耳那索斯山上》（На Парнасе Серебряного века）一书中断言：“这种‘驱魔松脂’让他送了命，他用松节油慢慢地毒死了自己。”<sup>①</sup> 1900年夏，索洛维约夫来到莫斯科，将其翻译的柏拉图著作送交出版社。7月15日，他感觉身体不适，便让人送他至友人特鲁别茨科依家的庄园乌兹科耶。两周后，索洛维约夫去世，死因是动脉粥样硬化、肝硬化和尿毒症共同导致的机体衰竭。

索洛维约夫的一生是短暂的，但他在俄国思想史上的意义却持久而又深远。在我们看来，他的影响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他被公认为俄国现代哲学的奠基人，他创建的万物统一哲学为俄国现代哲学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其次，他率先提出并思考了关于俄国历史命运和发展道路的“第三条路径”；最后，是他试图融哲学、神学和文学为一体的创作追求和创作方式也具有深刻的本体论和方法论意义。

## 二

“索洛维约夫是俄罗斯第一位职业哲学家，也是第一个建立了完整哲学体系的俄罗斯哲学家。”<sup>②</sup> 因此，他如今被誉为“俄国现代哲学之父”。索洛维约夫哲学的核心命题，就是他的“万物统一论”。不到五旬即离世的索洛维约夫，其创作活动持续了30年，这30年又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即19世纪的70、80和90年代。第一个十年主要是对西方哲学的抽象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质疑，第二个十年主要是对其神权政治乌托邦学说的构建，在最后一个十年，索洛维约夫则返回哲学，将注意力放在了历史哲学、道德哲学、美学等理论哲学领域。然而，若将索洛维约夫的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可以发现其中贯穿的主题就是“万物统一论”。索洛维约夫不同时期的思考，似乎都在从不同角度、不同范畴对这一主题进行添加和阐释。索洛维约夫提出的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哲学概念，如“索菲娅”（София）、“永恒温柔”（Вечная женственность）、“神人类”（богочеловечество）、

---

<sup>①</sup> Маковский С.К.. На Парнасе Серебряного века. М., XXI век-Согласие, 2000. С.560.

<sup>②</sup> 徐凤林：《索洛维约夫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页。



“完整知识”（цельное знание）、“有机逻辑”（органическая логика）和“神权政治”（теократия）等，均与“万物统一论”有着程度不等的直接关联。

索菲娅是索洛维约夫宗教哲学的核心命题之一。“索菲娅”一词在希腊语中有“母性”、“知识”和“智慧”等意，因此它又有“智慧女神”（Премудрость）之称，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和中世纪的哲学中，索菲娅被理解为智慧的特殊显现或具象的智慧，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关于实质的知识”，荷马称之为“关于创造的理性能力”。西方文字中“哲学”（философия/philosophy）一词的词根就是“索菲娅”（-софия/-sophy），“哲学”的意思也就是“爱智慧”。索菲娅以“工师”的身份出现在《圣经》中，被当作神的创造意志：“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工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sup>①</sup>在拜占庭和古代罗斯，索菲娅作为“神的智慧”（Премудрость Божия）的观念得到发展，俄国东正教中根深蒂固的圣母崇拜也是这一发展的体现和结果之一。索洛维约夫对这一概念和形象进行再创造，赋予其新的内涵，使其成为一个哲学概念和思想史术语。索洛维约夫将索菲娅视为“神的身体”（тело Божие）和“世界的灵魂”（душа мира），视为神的绝对统一中与逻各斯并列的另一构成：“索菲娅是神的身体，是充盈着神的统一原则的神的物质。在自身之中实现了这种统一或具有这种统一的基督，作为一个既是普遍化的又是个性化的神的完整统一有机体，它既是逻各斯也是索菲娅。”<sup>②</sup>“如果在神的存在物里，在基督里，第一个或产生的统一就是神自身，是作为积极力量或逻各斯的上帝，如果在这个统一里我们拥有的基督是神的存在物自身，那么第二个，被产生的统一就是人类的原则，是理想的或正常的人，我们给它一个神秘的名字——索菲娅。”<sup>③</sup>在索洛维约夫一生的不同时期，他对索菲娅的理解有所不同，实际上，他的索菲娅概念是相当模糊和庞杂的。据洛谢夫（А. Лосев）归纳，索洛维约夫关于

① 《新旧约全书》，中国基督教会印发，1989年，南京，第605页。

② Соловьев В.С. Сочинения. М., Раритет, 1994. С.110.

③ 索洛维约夫：《神人类讲座》，张百春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118页。

索菲娅概念的阐释竟有十种之多，从绝对的神的存在到理想的人类，从神秘的宗教象征到具体的诗歌形象。<sup>①</sup> 但无论如何，将索菲娅理解为神的人性构成、人性显现或人性存在，即“永恒温柔”，将索菲娅视为物质和观念的合成，是物质化的观念，或观念化的物质，是神的世界和自然世界之间的中介，这应该是索洛维约夫一个始终不渝的命题。更为重要的是，索洛维约夫还强调了这一形象的俄罗斯民族属性。他在《俄国与普世教会》一文中写道：“我们祖先的宗教艺术把‘智慧’同圣母和耶稣基督紧紧联系在一起，同时又与这两者有显著区别，把它描绘成一个特殊的神的形象。对于我们祖先来说，它是隐藏于低级尘世的可见事物背后的神圣本质，是复活的人类的光辉灿烂的灵魂，是大地的天使和保护神，是神的未来和最终的体现。”“这样，除了把‘智慧’看作是个别的神或人——圣母和圣子而外，俄罗斯民族还喜欢把‘智慧’理解为神和普世教会的社会体现。”<sup>②</sup> 在索洛维约夫之后，谢·布尔加科夫（С. Булгаков）、弗洛连斯基（П. Флоренский）、别尔嘉耶夫（Н. Бердяев）、别雷（А. Белый）等人继续不断挖掘、丰富这一概念，使其成为俄国宗教哲学、乃至整个俄国文化的象征符号之一，从而构建起所谓的“索菲娅学”（софиология/sophiology，又译“智慧学”）。

关于神人、神人类和神权政治的学说，是索洛维约夫思想中的又一重要构成。索洛维约夫的哲学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宗教哲学，是一种新的基督教意识。其学说的独特之处，就在于调和人与神之间的对立，谋求人和神的统一。索洛维约夫认为人是具有神性的，因为他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被创造出来的特殊造物。在这里，索洛维约夫显然受到了欧洲那种始自古希腊罗马文明、经文艺复兴时期再至浪漫主义时代的“人的崇拜”之影响，但他在这一传统中注入了宗教因素，从而形成了他新的基督教人道主义。就这一方面而言，索洛维约夫似乎在将世俗的人的学说神学化。另一方面，他认为神也是具有人性的，这一点的最好证明，即作为神的化身的耶稣基督，作为精神的人，他身上既有神的特性，也有人的特性，是神和人的结合，亦即神人

---

<sup>①</sup> 参见张百春：“索洛维约夫：俄罗斯哲学传统的奠基人”，索洛维约夫：《神人类讲座》，张百春译，第20页。

<sup>②</sup> 转引自徐凤林：《索洛维约夫哲学》，第221页。

(богочеловек)。从这一方面来看，索洛维约夫似乎又在将神学世俗化。正因为如此，他的神人学说在当时遭到许多教会人士的拒绝，甚至至今仍被官方教会视为异端邪说。在《神人类讲座》中，索洛维约夫更将人类作为一个由神创造出来的、并且包含着神性原则的有机体。他在第二讲的结尾说道：“旧有的传统宗教形式的出发点是对上帝的信仰，但它未能将这一信仰贯彻到底。当今的非宗教文明的出发点是对人的信仰，但它是不彻底的，也未能将这一信仰贯彻到底。被彻底贯彻、最终实现的这两种信仰，即对上帝的信仰和对人的信仰，将在统一完整、充盈无缺的神人类真理中走向一致。”<sup>①</sup>这种实现了精神复兴的人类，就是神人类（богочеловечество）。索洛维约夫将神人类的学说运用于人类历史，于是发现，在基督降生之前，人类历史的具体走向就是使人获得神性；而在基督降生之后，历史进程的朝向则是神人类化；索洛维约夫将神人类学说运用于人类社会，则得出了神权政治的乌托邦模式。他认为神权政治时代将是人类社会在多神教时代和基督教时代之后的第三个阶段，亦为最后一个阶段、理想的阶段；在神权政治社会，神权、政权和先知权力构成“三种力量”，形成一种保障社会稳定、促进人类进步的平衡体系，教会、国家和地方自治会在道德、政治和经济领域各司其职，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博爱、和平和正义。需要指出的是，晚年的索洛维约夫已逐渐意识到其神权政治说的乌托邦色彩。他虽然从未公开推翻此说，但他在《关于战争、进步和世界历史终结的三次谈话》等文中所流露出的深重的末世论情绪，则无疑构成了对他雄心勃勃的神权政治蓝图的某种解构。

如何才能实现人的神圣化和神的人性化，并最终实现神权政治的理想社会呢？索洛维约夫因此提出了有机逻辑和完整知识的概念。索洛维约夫将存在划分为两类，即“存在”（бытие）和“实在”（сущее，又有“自在者”<sup>②</sup>、“存在物”<sup>③</sup>等译法），前者是通常意义上的存在，后者在索洛维约夫那里则意味着某种精神实质和意志主体，即“存在之力量”（сила бытия），

---

① Соловьев В.С. Сочинения. С.33-34.

② 徐凤林：《索洛维约夫哲学》，第152页；徐凤林：《俄罗斯宗教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8页。

③ 洛斯基：《俄国哲学史》，贾泽林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2页。

若将“实在”称为“显现”（*являющееся*），存在就是“现象”（*явление*），两者间的关系即神与世界的关系、实质与现象的关系，而在两者间起连接作用的就是“有机逻辑”。“真正的逻辑承认我们的认识的各个因素都不是独立的（正如机体的各个部分都不是独立的一样），承认我们的所有认识领域都是相对的；该逻辑把绝对始原视为真正的中心，我们认识的周边地区因而能连成一片，其各个部分和因素能够得到统一和精神联系，整个认识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机体，因此这样的逻辑理所当然地被称为有机逻辑。”<sup>①</sup> 借助此种逻辑，各种知识、各个领域产生关联，从而构成一种完整知识。“完整知识”的概念最早系由斯拉夫派思想家伊万·基列耶夫斯基（И. Киреевский）提出，索洛维约夫对这一概念作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在索洛维约夫看来，有史以来的传统哲学均为“抽象原理”，均是各自为政的，而“完整知识”则是“真正的哲学”（*истинная философия*），是人的认知和人类知识的集大成者。索洛维约夫提出的“完整知识”，至少包含着这样几层意思：首先，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完整知识是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等认知方式的统一；其次，从知识领域的角度看，它是哲学、科学和神学的统一；最后，从认知结果的角度看，它应该是感性、理性和经验的统一，是真善美的统一。索洛维约夫还将完整知识称作“自由的神智学”（*свободная теософия*）。

“神智学”一词在词源学意义上是与“哲学”相关联的，均以“索菲娅”为词根，如果说“哲学”意为“爱智慧”，那么“神智学”则意为“智慧之圣化”，换言之，如果说哲学是对智慧的热爱，那么神智学就是对智慧的信仰。索洛维约夫为“神智学”加上“自由的”之定语，就是为了淡化其神学意义，并进而添加上理性成分和科学精神。索洛维约夫将“自由神智学”与“完整知识”相提并论，最终在《完整知识的哲学本原》一书中如此概括他的“完整知识”：“自由的神智学是神学、哲学和经验科学的有机综合，只有这样的综合，才能囊括知识的完整真理，舍此，则科学、哲学和神学只能是知识的个别部分或方面，即被割下来的知识器官，因此和真正的完整真理毫无共同之处。很清楚，从未知的综合的任何一个成分出发，都可以求得这种综合。

---

<sup>①</sup> 索洛维约夫：“完整知识的哲学本原”，参见索洛维约夫：《西方哲学的危机》，李树柏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45页。

因为真正的科学不能没有哲学和神学，同样，真正的哲学也不能没有神学和实证科学，真正的神学也不能没有哲学和科学，所以，这些因素中的每一个臻于完满的因素，都必须获得综合的性质，变成完整的知识。”<sup>①</sup>

就这样，以索菲娅说为核心构成，以神人类说和神权政治乌托邦为理想目的，以有机逻辑和完整知识为手段和形式，索洛维约夫最终构建起了他的万物统一哲学体系。一部俄国《哲学百科全书》中的“万物统一”（Всеединство）词条这样写道：“一个哲学范畴（或理念和原则），它表达世界万物存在的有机统一，世界存在各构成部分的相互渗透和各自独立，尽管各有本质属性和个性，但它们彼此之间以及它们与整体之间仍具有同一性。……‘万物统一’作为弗·谢·索洛维约夫学说中的核心概念之一被提出，索洛维约夫的学说为万物统一哲学这一独特的俄国思想流派奠定了开端。”<sup>②</sup>索洛维约夫的万物统一，既指存在意义上神和人的统一，也指哲学、宗教、科学和艺术等不同学科的统一；既指认识论意义上感性和理性的统一，也指人、自然和信仰等不同范畴的统一；既是独具特色的哲学体系，也是具有实践意义的认知方式。万物统一不是指一种自然状态，与天人合一之类的说法有所不同，它指一种理想状态、终极目标和最高原则，在索洛维约夫看来，人类的目的，人类存在的最高意义，就是“肯定的万物统一理想”（идея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го всеединства，“肯定的”又有“积极的”、“正面的”等译法）之实现。将世间万物视为一个相互关联、和谐共生的有机体，这一观念由来已久，在东方的神话和宗教、在古希腊罗马的哲学中均可闻其先声。索洛维约夫在创建这一学说时，显然也对谢林的“同一哲学”、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斯拉夫派的“完整知识”等有所借鉴，但索洛维约夫的贡献在于，他将这一学说作为其学说总的核心，从不同的角度和范畴对其进行论证和阐释，以毕生的精力将其打造成一个哲学体系。而这一哲学体系的建立，则标志着俄国哲学的系统化、现代化之实现，标志着具有本土特色的俄国哲学学派之形成。在津科夫斯基（В. Зеньковский）的《俄国哲学史》（История

---

① 索洛维约夫：“完整知识的哲学本原”，参见索洛维约夫：《西方哲学的危机》，第195页。

② Под ред. М.А.Маслина, Рус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 Алгоритм, 2007. С.106.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的下卷中,作者用开头两章、约占全书 1/7 的篇幅论述索洛维约夫,并将始自索洛维约夫的俄国哲学发展阶段称为“创建体系的时期”<sup>①</sup>。更有索洛维约夫文集的一位序者断言,由于包括索洛维约夫在内的一批俄国哲学家的活动,“俄国哲学复兴”(русский философский ренессанс)得以实现,“世界哲学的中心自 19 世纪 70 年代起转移到了俄国”。<sup>②</sup>

### 三

如前所述,作为索洛维约夫万物统一哲学体系核心构成之一的完整知识说,源自 19 世纪中期形成的斯拉夫派,由此不难看出索洛维约夫的思想与斯拉夫派观点之间的密切关联。索洛维约夫思想的形成期,大致与俄国思想史中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激烈对峙时期同时,也就是说,索洛维约夫的生活和创作始终处于两派争论的思想史语境之中,他必然会与这两大思想派别产生联系。但是,与他那个时代的大多数思想家不同,索洛维约夫的思想立场却很难被简单地划归两大阵营的任何一方。有人认为索洛维约夫的思想历程是一个由斯拉夫派转变为西方派的过程,这一归纳显然过于简单。诚然,索洛维约夫思想和学术活动起步于对西方哲学传统的批判,即他的《西方哲学的危机》。在恰达耶夫(П. Чаадаев)1836 年发表的《哲学书简》(Философические письма)引发俄国知识界和思想界的分野之后,索洛维约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疑更亲近斯拉夫派,他从斯拉夫派的主要思想家霍米亚科夫(А. Хомяков)、伊万·基列耶夫斯基等人那里继承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但是,在斯拉夫派理论家达尼列夫斯基(Н. Данилевский)的《俄国和欧洲》(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а)一书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之后,索洛维约夫却针锋相对地亮出了他关于俄罗斯民族特性和俄罗斯国家命运的理解和思考,逐渐与斯拉夫派拉开了距离。

---

① 参见津科夫斯基:《俄国哲学史》,张冰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下卷,第1-76页。

② Гультга А.В. Русский философский ренессанс и творческая судьба Владимира Соловьёва. см. В.С.Соловьёв. Сочинения. С.5.

达尼列夫斯基的《俄国与欧洲》于1869年起在杂志上连载，1871年出版单行本。作为一位曾任植物园园长的科学家，达尼列夫斯基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与动植物等生物体的生命过程相似，即由诞生至兴盛再到衰亡，世界历史的能动主体并非整个人类，而是文化历史类型。他由此提出了他的“文化历史类型理论”（теория культур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типов）。达尼列夫斯基归纳出包括埃及、中国、亚述、印度、伊朗、犹太、希腊、罗马、阿拉伯、欧洲等在内的十余个“类型”，并认为各个类型均有其兴衰荣枯期。达尼列夫斯基认为，自19世纪中期起，最后一个文化历史类型，即欧洲类型，开始衰落，取而代之的将是以俄国为中心的东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因为，保证文化历史类型健康发展的基础有四个，即经济、艺术、宗教和道德，以往的文化类型大多是单基础的，只有欧洲类型是双基础的，即对经济和艺术的并重，而俄罗斯国家和民族的独特属性，即它的专制政体、村社精神、东正教信仰和道德意识，使俄国注定要成为欧洲文明的拯救者，以俄国为中心建立起的斯拉夫世界，将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四基础文化历史类型”（четырёхосновный культур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тип），这便是俄国的历史使命之所在。联系到此书的副标题，即《斯拉夫世界与日耳曼—罗曼世界的文化和政治关系考》（Взгляд на культурные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лавянского мира к германо-романскому），便不难看出，此书的目的就在于将俄国与西欧并列，并进而论证俄国较之于西欧的优越，至少是论证俄国较之于欧洲具有更为深厚的文化潜力和更为深远的历史使命。此书面世并未立即引起反响，但在作者去世后的19世纪80年代，此书却激起很大反响，被视为泛斯拉夫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斯特拉霍夫（Н. Страхов）称之为“斯拉夫派的准则或法典”（катехизис или кодекс славянофильства）<sup>①</sup>。索洛维约夫读了此书后却不以为然，他同样以《俄国和欧洲》（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а）为题撰写了一篇政论，公开抨击达尼列夫斯基的观点。索洛维约夫认为，达尼列夫斯基的文化历史类型试图否定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有机性，试图以某一类型的孤立发展取代世界历史的普遍性，而将俄罗斯民族和斯拉夫民族视为完全不同于西欧的最完善的文化历史类型，更是一种狭隘的

---

① Под ред. М.А.Маслина, Рус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472.

民族主义立场。索洛维约夫认为，各种文化、各种文明之间的关系，并非相互隔绝的不同种类之间的并列关系，而是同一整体的各个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任何一个文化历史类型均始终处于与其他类型的相互作用之中，因此某一类型的特殊优势和精选地位便无从谈起。索洛维约夫相信，“真理的太阳”会像“实在的太阳”一样，毫无差别地照耀着所有民族。包括斯特拉霍夫等人的在内的许多斯拉夫派出面反驳索洛维约夫，哲学史家们大多认为，索洛维约夫与斯拉夫派的蜜月期就此终止。

但令人颇为诧异的是，索洛维约夫在此前后就俄罗斯民族的特殊属性和特别使命等问题发表的许多看法，与达尼列夫斯基在《俄国和欧洲》一书中提出的观点有诸多相似之处。在《完整知识的哲学本原》（1877）的开头，索洛维约夫这样写道：任何哲学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即存在的目的问题，无论单个的人还是整个人类，都面临这一终极目的。接下来，索洛维约夫便将这一存在的目的问题摆到了俄罗斯民族的面前。他认为，俄罗斯民族的存在目的，即成为“神的潜力的体现者”，是除东方力量、西方力量之外的“第三种力量”（третья сила），即斯拉夫力量的主要代表。“能够赋予人类发展以绝对内容的第三种力量，只能是崇高的神的世界的天启，而这种力量借以显现的那些人，那个民族，必定是人类和超人类现实之间的中介者，是这种超人类现实的自由和自觉的工具。这样的民族不应有任何特殊的有限使命，它的使命不是研究人类存在的形式和因素，而只能是传递活的灵魂，通过把人类和整个神圣的本原结合起来的途径，使支离破碎半死不活的人类凝聚成一个整体。这样的民族不需要任何特殊的优点，无须任何特殊的力量和外在的天赋，因为它的行动并非出自自身，也不是在实现自我。只要求这个民族——第三种神的潜力的体现者——摆脱一切局限性和片面性，超越狭隘的特殊利益；要求它别一门心思在生活 and 活动的某个个别低级领域确认自己；要求它心平气和地对待这整个生命及其细小的利益，对崇高的世界的肯定的现实要充分信赖，对该世界要抱着听其自然的态度。这些特性无疑专属斯拉夫民族性格，尤其是俄罗斯民族的民族性格。”<sup>①</sup> 在索洛维约夫看来，

---

<sup>①</sup> 索洛维约夫：“完整知识的哲学本原”，参见索洛维约夫：《西方哲学的危机》，第188-189页。



先后左右人类历史发展的两种力量，即“穆斯林文明”和“西方文明”已日薄西山，而以俄国为主导的第三种力量则是一种肩负使命的拯救力量，俄国介乎于东西方之间的“中间位置”不仅使她可以缓冲、调和东西方两种文明的冲突，更可以使她获得一种对两种文明进行综合并进而形成新的综合的可能性，这便是俄罗斯民族的弥赛亚使命。由此，他为俄国确立了一个新的“道德位置”，让它实现在精神上拉近、调和东西方文明的伟大使命。如果说，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是俄国西方派的思想宣言，意在论证俄国走西欧发展道路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达尼列夫斯基的《俄国与欧洲》是斯拉夫派学说的理论基础，旨在论证俄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和优越性；那么，索洛维约夫在其一系列著作中所提出的方案，则显然是为了调和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之间的思想对峙，并在综合东西方文化和文明的基础上发现俄国和俄罗斯民族存在的意义。索洛维约夫的立场究竟是西方派还是斯拉夫派，这个问题似乎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同意这样的说法，即“他在任何时期都既非斯拉夫论者，也非西方论者”，<sup>①</sup>或者说，他始终都既是斯拉夫派又是西方派，是一位试图调和、糅合两派主张的思想家。在斯拉夫派和西方派激烈争论的19世纪中后期，索洛维约夫是为数不多的超越两派营垒的大思想家，这不仅是他对东西方文化所持的独特看法而言的，更是因为他率先对俄罗斯民族和文化的独特属性作出了归纳和界定，为俄罗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第三条路径”指明了方向。甚至可以说，索洛维约夫在当时俄国社会语境中所作的思考和表达，使得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两者间的对立有所消解，使得欧亚主义学说的萌芽在思想史的层面得以确立，俄国的“第三条路径”由此成为斯拉夫化和西化之外的又一选项。

索洛维约夫面对东西方宗教亦即东正教和天主教的态度，也同样体现出某种矛盾性、双重性，或曰兼容性。索洛维约夫在家里的12个孩子中排行第四，他因为早产身体虚弱，出生两月后才去东正教堂接受洗礼。索洛维约夫的爷爷是神甫，受虔诚信教的家庭氛围影响，索洛维约夫自幼充满宗教情感。但13岁时，索洛维约夫却经历了一场“宗教危机”。他在自传中写道：“我不仅开始冷淡我先前一向热衷的教堂礼拜，甚至真的着手破坏圣像，把

---

<sup>①</sup> 徐凤林：《索洛维约夫哲学》，第261页。

我房间里的几幅圣像扔进了窗外的泔水坑。”<sup>①</sup> 大学毕业前后，他转而认真面对宗教问题，前往神学院旁听一年。与斯拉夫派接近的那段时间，也是索洛维约夫东正教信仰体现得最为显明的时期，如同他对西方哲学所持的批评态度，他认为以天主教为代表的西方宗教是反基督传统的体现者。19世纪80年代，为实现自己的神权政治主张，索洛维约夫主张东方和西方教会的重新联合，他转而接近天主教，亲往萨格勒布会见天主教主教施特罗斯迈尔，并在萨格勒布和巴黎先后出版《神权政治的历史和未来》、《俄国与普世教会》等书，将神权政治的使命完全寄托于西方天主教，并称俄国东正教会为“僵死的教会”（мертвая церковь），<sup>②</sup> 这使得俄国内外的人士普遍认为，索洛维约夫的宗教信仰已由东正教转向天主教，还有传闻说，他曾在天主教堂重新受洗。在索洛维约夫与东正教会关系最为紧张的时期，他的作品甚至被认为是亵渎正教的。他的《俄国和普世教会》一书出版后，索洛维约夫更被禁止在俄国发表任何与宗教相关的文字。然而，洛斯基在《俄国哲学史》（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中写到索洛维约夫的时候，却花费不少篇幅来“证明索洛维约夫是一个笃信东正教的人”。比如，1886年，索洛维约夫自萨格勒布回国后曾致信大司祭安东尼，称“我回到俄国时要比离开它时更为信奉东正教了”；再比如，索洛维约夫临终时坚持让一位东正教神甫为他举行圣餐仪式。在肯定索洛维约夫“从生到死都是一个东正教徒”的同时，洛斯基也言及，索洛维约夫提出的神权政治乌托邦理想，是“迈出了既得不到东正教教会也得不到天主教教会首肯的一步”。<sup>③</sup>如果说，索洛维约夫在东正教和天主教之间的确有过左右摇摆和举棋不定，或者，如果说，索洛维约夫究竟是一位天主教徒还是东正教徒，这尚为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那么，其原委其实倒不难理解，即索洛维约夫试图在东方和西方两种基督教之间谋求平衡，寻找关联，并最终实现两者的结合；而他的普世教会和神权政治的理想，说到底，其实也是试图为俄国和俄国教会谋得更大的施展空间和更高的精神地位。

---

① Соловьёв В.С., Сочинения, 1994. С.8.

② Соловьёв В.С. 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вух томах. М., Мысль, 1988. т.1. С.16.

③ 洛斯基：《俄国哲学史》，贾泽林等译，第109-110页。

索洛维约夫的“三种力量说”提出之日，正是俄土战争激烈进行之时。当时的俄国社会弥漫着浓烈的爱国主义、甚或民族主义情绪。索洛维约夫认为，俄罗斯民族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这一看法的提出与当时俄国的社会语境或许不无关系。他当时曾以《三种力量》（Три силы）为题做过一次公开演讲。但是，“关于俄罗斯在世界历史中的存在意义问题”，却始终是索洛维约夫思考的中心问题之一，而索洛维约夫的思考路径，就是俄国在基督教世界的地位、价值和意义。在1888年用法文在法国发表的《俄罗斯理念》一文中，索洛维约夫认为，俄罗斯民族的存在意义，就在于其肩负的宗教使命。从俄国的历史看，弗拉基米尔大公接受基督教，俄罗斯人主动邀约瓦兰人入主罗斯，均体现出了其宽宏大量的民族天性；从俄罗斯人的生活态度看，他们淡泊物质利益，注重静观和内省，是真正的“基督教民族”；从国家体制看，以集体向心力为基础的专制制度则为东西方教会的统一和普世教会的建立奠定了社会基础。因此，“俄罗斯理念、俄罗斯的历史义务要求我们承认我们与普世的基督大家庭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要求把我们所有的民族天赋，我们帝国的所有能力，都用在对社会三位一体的彻底实现上……在人间恢复神的三位一体的真正形象，这就是俄罗斯的理念。这个理念自身没有任何片面的和分裂的东西，它只是基督教理念的新侧面，要实现这个民族使命，我们不需要反对其他民族，而应该与它们一起，为了它们，俄罗斯理念是正确的，其伟大证明就在这里”。<sup>①</sup> 斯拉夫派通常将虔诚的宗教感视为俄罗斯民族最突出的精神属性之一，即所谓“聚合性”（соборность），东正教在俄罗斯民族和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强大作用因而得到强调，“东正教、专制政体和人民性”的三位一体学说在提出之后始终影响深远。索洛维约夫却认为，在俄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中，教会其实始终处在国家的控制之下，即政权大于神权，俄国教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其实呈逐渐下降的趋势，而俄国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后起的俄国在不断扩张的过程中所遭遇的强大对抗，以及俄国为捍卫国家的完整和统一所必须付出的巨大代价，这一切都在不断地强化俄国的国家性，国家性因此取代宗教性成为俄罗斯社会和历史中的最重要因

---

<sup>①</sup> 索洛维约夫：“俄罗斯理念”，索洛维约夫：《神人类讲座》，张百春译，第206页。

素。一方面，是俄国国家政权的强大和东正教会的相对附属地位，另一方面，是西方教会的强大影响力和西方社会中人的信仰对神的信仰构成的威胁，这使得索洛维约夫意识到，理想的社会模式，就应该是由俄国君主制与天主教教皇的联盟形式，即“自由的神权政体”。

“力求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现实做出彻底的认识和形而上学学说的具体性，这些乃是俄国哲学思想的特殊特征。这些特征又为索洛维约夫的哲学体系所特有。”<sup>①</sup> 将俄国和欧洲的关系置于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进程之中，从形而上学的角度考察俄罗斯的命运，强调俄罗斯民族的神性特质及其因此而具有的包容性和合成性，索洛维约夫因此论证了俄罗斯国家和民族的存在意义。索洛维约夫的这一观点，既是俄罗斯民族传统的弥赛亚意识在新的历史阶段的再度显现，反过来，它在特殊的历史阶段又空前地确立、强化了俄罗斯民族的弥赛亚意识。应该说，这是在哲学层面、思想史层面关于俄罗斯民族特殊使命的最早表述之一。从人类存在终极意义的角度来探讨俄罗斯民族的特殊属性和精神潜力，并进而对俄罗斯国家的命运和俄罗斯民族的使命作出归纳和界定，索洛维约夫的这一举动，既是他作为俄罗斯民族的精神先知发出的殷切召唤和热烈希冀，同时也是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标志之一，是俄罗斯思想欲获得自我确立和释放的具有转折意义的举动之一。索洛维约夫对俄罗斯民族特殊使命、俄罗斯国家特殊道路的探索，他试图在东西方文化间谋求平衡并进而为俄罗斯文化谋得独立存在意义的尝试，对后世的俄国思想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别尔嘉耶夫的俄国文化的“东西方构成说”（Восток-Запад），20世纪20年代的“路标转换派”（Сменовеховство），尼古拉·特鲁别茨科依（Н. Трубецкой）、萨维茨基（П. Савицкий）等人提出的“欧亚论”（Евразийство），以及列夫·古米廖夫（Лев Гумилев）的“新欧亚论”（Неоевразийство），乃至利哈乔夫（Д. Лихачев）的俄国文化的“斯堪的纳斯拉夫”结构（Скандославия）等，或许均从索洛维约夫的这一思想文化立场汲取了资源和启迪。

---

<sup>①</sup> 洛斯基：《俄国哲学史》，贾泽林等译，第120页。

## 四

索洛维约夫思想的最大特征，或许就是其综合性。徐凤林指出：“思想家索洛维约夫区别于同时代哲学家的显著特点是实现了广泛的综合，在这种综合中创造出了一种别具一格的哲学学说。”<sup>①</sup>“综合”（синтез）是索洛维约夫作品中出现频率极高的一个词汇，他的哲学被人称为“综合哲学”（философия синтеза），他也自称他的学术理想就是实现“大综合”（Великий синтез），津科夫斯基在其《俄国哲学史》（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中还注意到索洛维约夫使用的另一术语，即“有机体结合”（сизигия，又译“生动的结合”<sup>②</sup>）。索洛维约夫喜欢在他的诸多重要概念前添加定语，如“自由的神智学”（свободная теократия）、“有机的逻辑”（органическая логика）、“绝对的实在”（абсолютное сущее）、“肯定的万物统一”（положительное всеединство）等等，这样的表达方式是一种确定和限定，更是某种内在的综合企图之外在显现。谢尔盖·布尔加科夫曾说：“索洛维约夫的体系是哲学史上所曾奏响的音色最为饱满的一组和弦”。<sup>③</sup>

“音色最为饱满的和弦”（самый полнозвучный аккорд），这既是就索洛维约夫哲学体系的来源和内涵而言的，亦指其结构和表达方式。津科夫斯基在其《俄国哲学史》中对这组“和弦”的构成细针密缕，从中分辨出六大旋律，即：1）19世纪60年代俄国社会“对于进步的信仰”；2）索洛维约夫本人用哲学“改造”基督教神学的强烈愿望；3）斯拉夫派的“完整知识”理念；4）对历史的非凡敏锐的感受（津科夫斯基就此感慨：“索洛维约夫是历史学家的儿子这一点绝非偶然。”<sup>④</sup>）；5）神人类概念；6）作为其哲学灵感来源之一的索菲娅理念。津科夫斯基总结道：“索洛维约夫的体

---

① 徐凤林：《索洛维约夫哲学》，第19页。

② 索洛维约夫：《爱拯救个性》，方珊、何强、王利刚选编，董友、杨朗译，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5年，第62页。

③ 转引自津科夫斯基：《俄国哲学史》，张冰译，下卷，第15页。译文有改动。

④ 同上，第17页。

系的确是对其种种理念加以有机综合的一次尝试。”<sup>①</sup> 接下来，这位哲学史家又对索洛维约夫所受影响来源进行梳理，列出长长一串名单：外来的影响有斯宾诺莎（索洛维约夫称之为他的“哲学初恋”）、康德、费希特、叔本华、哈特曼、谢林、黑格尔，还有卡巴拉学说和神秘主义；俄国本土的影响则为斯拉夫派（尤其是霍米亚科夫和基列耶夫斯基）、恰达耶夫、费奥多罗夫（Н. Фёдоров）、尤尔凯维奇（П. Юркевич）和库德里亚夫采夫（В. Кудрявцев）等。洛斯基在他的《俄国哲学史》中则写道：“索洛维约夫哲学主要是在以下一些学说的影响下形成的，这些学说有：他老师尤尔凯维奇教授（莫斯科大学）的基督教柏拉图主义，谢林在他的《神话和启示哲学》中所阐发的有关绝对物与世界的联系的学说，以及他的有关自然界朝创造绝对机体方向发展的自然哲学学说。索洛维约夫对完整知识的具体原则和条件的研究，无疑是与斯拉夫主义者基列耶夫斯基和霍米亚科夫的思想相联系的。”<sup>②</sup> 徐凤林在梳理索洛维约夫万物统一论的哲学史源头时也写道：“从古希腊开始，哲学思维就在探求多样性世界的统一本原，或认识存在的共同的形而上学原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柏拉图的‘理念世界’、普罗提诺的‘太一’、斯宾诺莎的‘实体—神’、神秘主义者的‘世界灵魂’、谢林的‘同一哲学’等等，都是‘万物统一’思想的不同表达。”<sup>③</sup> 可以说，索洛维约夫的哲学体系，本身就是俄国和世界相关理论和学说的集大成者。

索洛维约夫一生的思想探索过程也是充满起伏和变化的。洛谢夫为索洛维约夫的一套文集撰写了题为《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创作道路》（Творческий путь Владимира Соловьёва）的序言，他在这篇序言的结尾写道：“弗·索洛维约夫的哲学发展经历了这样一条道路，即始自心平气和的理论思考，经历躁动不安的教会和政治探索，再经浪漫的自然主义乌托邦及其对进步的信念和之后的完全失望，直至关于整个文明即将谢幕和死亡的惊人预言。”<sup>④</sup> 这些“多变”，既体现了索洛维约夫思想探索过程之艰难和深

---

① 津科夫斯基：《俄国哲学史》，张冰译，下卷，第19页。

② 洛斯基：《俄国哲学史》，贾泽林等译，第158-159页。

③ 徐凤林：《俄罗斯宗教哲学》，第111页。

④ Лосев А.Ф. Творческий путь Владимира Соловьёва, см. В.С.Соловьёв, 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вух томах. т.1. С.32.

刻，同时也是其思想的多元构成之表露。他的思考涵盖哲学、神学、史学、美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文艺学等多个领域，他同时用哲学著作、政论、对话、诗歌等不同体裁进行创作，他的关注对象既有现实问题也有宇宙意识，既有教会合并运动也有上帝的绝对存在，既有“爱的意义”也有“自然之美”，他的思想内涵和表达方式均体现出罕见的综合性。索洛维约夫用哲学的手段来解决神学和美学问题，反过来，他又为哲学和艺术注入了宗教内涵，他的终极关怀和综合思维是目的也是手段，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像索洛维约夫哲学这样的哲学体系有很大的优点。即使这些理论并没有最终解决宇宙之谜，但它们起码明白而简单地指出：人类理性拥有成功解决把有关世界的高级方面和低级方面的诸学说结合为一个统一整体这样问题的方法和手段。”<sup>①</sup>徐凤林曾用一段热情洋溢的排比句式来归纳索洛维约夫及其思想的特色：“除了索洛维约夫之外，似乎没有哪一位哲学家提到了绝对者的身体或永恒的身体；没有哪一位基督徒能说出，人之所以高于无形体的天神是因为人有肉体、有身躯，能够为自己和为他人而斗争，拥有选择的自由；没有哪一位宗教哲学家或非宗教哲学家能够教导说，神性不仅在个体，也在社会结构；没有哪一位神秘主义者相信社会政治进步是必然的和受神性制约的；也没有哪一位当时的哲学家因对自由资本主义的进步观如此失望以至于以末世论来结束自己的体系；没有哪一位神秘主义哲学家能够如此明确地认识到，观念不能离开事物而存在，无论它有多么高尚，哪怕它是上帝本身；没有哪一位社会政治思想家能够把自己的社会思想追溯到古代俄罗斯民族的‘智慧’象征；在20世纪世界灾难的前夜，没有哪一位思想家、作家、诗人和社会政治活动家能够为当代文明的瓦解和预感到人类的空前分裂而惶恐不安。当然，如果利用历史的显微镜和放大镜，也许可以在某些其他思想家那里找到上述成分，但这并不影响索洛维约夫整个哲学的独有特色。”<sup>②</sup>索洛维约夫思想所具有的这一“独有特色”，既是就其思想的内容构成而言的，无疑也是就其方法论特征而言的。索洛维约夫的哲学体系和它的建构方式，它的思想内涵和它的表达方式，这两者高度契合，即两者均呈现出高

---

① 洛斯基：《俄国哲学史》，贾泽林等译，第135页。

② 徐凤林：《索洛维约夫哲学》，第223页。

度的概括性和综合性。

索洛维约夫的理论建构方式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他十分热衷“三”的组合，比如：他在《善的证明》中将人的道德本性归结为人的三种内在感受，即“羞耻、怜悯和崇敬”（стыд, жалость и благоговение）<sup>①</sup>；他在《爱的意义》中依据索取和奉献在爱中所占的不同比例将爱划分为三种，即“奉献的爱、索取的爱和平等的爱”；他心目中的自由神智学即神学、哲学和科学的有机综合；他将神权政治的理想社会结构设计为教会、国家和社会的三足鼎立；他的伦理学巨著《善的证明》更被认为有着“贯穿全书的三段式”<sup>②</sup>。在《完整知识的哲学本原》一书中，他认为“自在的人之本性呈现出三种基本存在形式，即感觉、思维和能动的意志”（чувство, мышление, деятельная воля）<sup>③</sup>；他将哲学划分为三大类型，即“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эмпиризм, рационализм, мистицизм）；他在此书中还给出这样一份图表<sup>④</sup>：

---

	创造领域	知识领域	实践活动领域
	主观基础：感觉	主观基础：思维	主观基础：意志
	客观原则：美	客观原则：真	客观原则：一般的善
1.绝对层面	神秘	神学	精神社会（教会）
2.形式层面	高雅艺术	抽象哲学	政治社会（国家）
3.物质层面	技术工艺	实证科学	经济社会（自治会）

---

这份图表是索洛维约夫的完整知识的结构图，也是他谋求以三段式、三分法等方式谋求综合的方法论之最为典型的体现之一。此外，我们还发现，索洛维约夫的多部作品均以“三”为题，如《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次演讲》、《三种力量》、《三次相会》和《关于战争、进步和世界历史终结的三次谈话》等，甚至连他的一生创作也能被较为清晰地划分为三个分期。索

---

① Под ред. М.А.Маслина. Рус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520.

② 徐凤林：《索洛维约夫哲学》，第281页。

③ Соловьев В.С., 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вух томах. т.2. С.146.

④ Там же. С.153.



洛维约夫对“三”的热衷，显然是受黑格尔三段论的影响，与基督徒意识中根深蒂固的“三位一体说”恐怕也有关联，但这样一种“正反合”的思维结构和相应的表达，也同样是一种趋向综合的愿望之体现。

索洛维约夫受了多方面的影响，而他的综合哲学自身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多面的、广泛的。作为一位杰出思想家，他的讲座和政论对他所处时代和社会的政治、宗教和文化等领域均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思考和著述也成为他身后俄国哲学、神学和艺术范畴的珍贵文献。索洛维约夫的综合影响，首先就体现在他思想的跨领域、跨时代辐射上。如今回首梳理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俄国白银时代文化运动，我们发现，俄国现代哲学体系的形成和俄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勃兴是其中最重要的两大构成，而我们又无不惊讶地意识到，索洛维约夫竟同时成为这两大文化构成之最为重要的思想源泉。作为万物统一哲学体系的奠基者，索洛维约夫对他同时代和稍后的一大批俄国哲学家，如谢·布尔加科夫、别尔嘉耶夫、特鲁别茨科依兄弟（С. Трубецкой и Е. Трубецкой）、弗洛连斯基、舍斯托夫（Л. Шестов）、弗兰克（С. Франк）、斯捷蓬（Ф. Степун）、洛斯基、洛谢夫等，均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使得俄国宗教哲学（русская религиозная философия）得以自立于世界哲学之林；索洛维约夫的美学和艺术思想，他对艺术的宗教感、神秘性和纯美化的鼓吹，尤其是他对于索菲娅形象的理论建构和具体描绘，向作为俄国白银时代现代主义文学之先声的象征主义诗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源泉。勃洛克（А. Блок）、别雷等象征派大诗人均将索洛维约夫视为精神导师，而索洛维约夫本人包括《三次相会》在内的诗作和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更被视为俄国现代主义文学史中的佳作。在索洛维约夫离世百年之后，随着白银时代的文学和文化价值重新得到发掘和研究，索洛维约夫作为白银时代精神领袖的形象也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来了。

索洛维约夫也是俄国思想的方法论传统的奠基者之一，在他之前，罗蒙诺索夫（М. Ломоносов）、恰达耶夫、赫尔岑（А. Герцен）、别林斯基（В. Белинский）、车尔尼雪夫斯基（Н.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陀思妥耶夫斯基、费奥多罗夫等人已经以他们广博深邃的思考方式，为俄国思想传统奠定了基础。将思想的视野投向整个世界乃至整个宇宙，把针对现实的批判意识与关

于未来的乌托邦理想融为一体，对人的生活进行形而上学的拷问，将人类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当作终极关怀，这便是俄国思想的总体特征。索洛维约夫大学毕业时立下的学术志向，便是“借助基督教学说积极促进世界之改造，将基督教的‘绝对’真理带入人们的意识”。<sup>①</sup>这一思想传统的形成，首先自然与俄国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一方面，世界上最为广袤的国土使其居民更具大空间意识，他们关于自然和宇宙的认识相对而言或许就更具概括性和总体性；另一方面，地处东方和西方文化的接壤处，两种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的碰撞和交融也在片刻不停地强化俄罗斯民族的综合意识。其次，作为欧亚大陆上的后起民族，俄罗斯文化在诞生之初便已面对东方和西欧诸多业已发达的强势文明，一方面，这使得它有十分丰富的成熟文化可供借鉴，有现成的不同传统可资综合；另一方面，后起民族的文化心态也始终在刺激、促使俄罗斯民族的文化人殚精竭虑，发愤图强，以便尽快融入世界的思想大家庭。最后，自公元 988 年接受基督教起，俄罗斯国家和教会一直致力于向其国民灌输“正教”精神和弥赛亚意识，一方面，这种意识理所当然地成为有助于俄罗斯帝国不断扩张的官方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俄国越来越大的疆土以及因为要捍卫这片疆土而产生的不安、焦虑和紧张，也成了俄罗斯民族集体无意识的重要构成之一。这些因素交叉作用，对俄罗斯思维范式和思想传统的形成和流布产生深远影响，而这一范式和传统则是造就“宇宙主义的”、“帝国规模的”思想大家的重要前提之一。在索洛维约夫之后的 20 世纪，俄国又涌现出了齐奥尔科夫斯基（К. Циолковский）、维尔纳茨基（В. Вернадский）、巴赫金（М. Бахтин）、利哈乔夫、洛特曼（Ю. Лотман）、萨哈罗夫（А. Сахаров）和索尔仁尼琴（А. Солженицын）等“索洛维约夫式”的大思想家。

索洛维约夫出现在俄国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时段。索洛维约夫出生在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之家，他那位历史学家父亲终日不懈撰史，每年出版一卷，最终出齐了 29 卷本的《有史以来俄国史》，这一举动即已表明，俄国的学术传统当时已十分深厚，俄罗斯民族的历史意识已经成熟。索洛维

---

<sup>①</sup> Под ред. П.А.Николаева. Рус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Библ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т.2. С.244.

约夫的硕、博士论文分别以《西方哲学的危机（驳实证论者）》和《抽象原理批判》为题，这两个命题的提出本身即已具有重大意义，标志着俄国哲学人和思想界的觉醒，索洛维约夫这位初出茅庐的哲学家身上无疑已经体现出了年轻的俄国哲学的冲击力。索洛维约夫从对西方哲学的批判开始其学术生涯并赢得广泛赞誉，这至少表明：第一，他以及与他同时代的俄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哲学和西方学术传统已有深入细致的了解；第二，他和他们已经具有强烈的学术自信心，甚至已经具有自觉的文化独立意识，力图建立独立的民族学术人格。索洛维约夫从批评西方哲学的抽象主义和唯理论起步，这恰恰表明他和他的哲学汲取了西方哲学所具有的怀疑精神、理性取向和批判传统，他其实是在用西方的哲学方式构建他的“俄国化”或“东方化”的哲学体系；他对西方哲学的质疑出现在西方哲学在俄国广泛传播、开始结出硕果的时候，恰恰表明了俄国自身哲学精神和思想能力的觉醒和成熟；索洛维约夫虽然以质疑、批判西方哲学的唯理论和经验论起家，可他的思考过程和思想结果却是充满理性精神的。“索洛维约夫现象”的出现，实为俄国民族意识觉醒、俄罗斯知识分子智性成熟的标志之一。索洛维约夫哲学和思想最为突出的方法论意义就在于，他试图在西方的分析传统和东方的综合传统之间谋得某种调和，实现客观和主观、理性和感性、物质和精神、抽象与具体、真理和信仰、推理和艺术等等的统一，更确切地说，他注重的是这诸多“两者”之间的关系和连接。就这样，在思维方式和方法论上，索洛维约夫试图为处于东方和西方两种文化传统之间的俄国另辟蹊径，在西方的分析传统和实证方法与东方的综合传统和经验方法之间再寻觅出一条出路，以彰显俄国文化和思想的独特性和自在意义。索洛维约夫既源于俄国特定的历史阶段，又成为该历史阶段的典型显现，他既是俄罗斯民族意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结果，反过来，他的出现也凸显、强化了俄罗斯民族融东西文化属性为一体的文化合成特性。

有人曾将普希金誉为俄国文学和文化中的彼得大帝，因为普希金完成了创建俄罗斯文学语言、奠定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基业；同样，我们也可将索洛维约夫视为哲学和思想领域的普希金，因为索洛维约夫完成了俄国现代哲学的奠基性工作，他的思考及其表达方式，标志着俄国知识分子理性精神的成

熟、俄罗斯民族现代意识的觉醒，以及俄罗斯民族“帝国规模”思维传统的形成。

## 结 语

索洛维约夫的好友叶夫盖尼·特鲁别茨科依（索洛维约夫就是在他哥哥家的庄园去世的）在回忆索洛维约夫的时候深情地写道：“他近视到所有人都能看到的东​​西他却看不到的程度。浓眉下眯缝着的双眼，看近处的东​​西都很困难。然而当他向远处张望时，他却好像能够洞穿外在感觉所感知的事物的外表，并看到某种视界之外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对所有人都是隐蔽着的。他的双眼闪着某种内在之光，并直指精神深处。”<sup>①</sup>我们也可以模仿叶·特鲁别茨科依的句式写道：终身未娶的索洛维约夫，最终迎娶了俄国哲学中的“智慧女神”索菲娅；一直居无定所的索洛维约夫，最终在俄国思想史中觅得一处高悬“万物统一”牌匾的永久居所。

---

**【 Abstract 】** Vladimir Solovyov was hailed as the “father of modern Russian philosophy”. This Russian philosopher, who passed away in 1900, has been one of the important watersheds in Russian intellectual history. Besides, he is a great thinker in the 20th century in the true sense. His significance in Russian intellectual history is both lasting and profound. First, he created the unique philosophy in unity of all things,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Russian philosophy system; secondly, it was he who first proposed and thought about the “third path” of Russian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finally, his pursuits in creation and ways of expression when trying to blend philosophy, theology, science and even arts also has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in ontology and methodology. The establishment of Solovyov's ideology marks the maturity of Russian intellectuals' rational spirits, the awakening of modernity of Russian nation, in addition to Russian unique “imperial scale” thinking traditions.

---

<sup>①</sup> 洛斯基：《俄国哲学史》，贾泽林等译，第 111 页。

**【 Key Words 】** Vladimir Solovyov, Philosophy of Unity of Everything, Russian Intellectual History

**【 Аннотация 】** Владимир Соловьёв считается «отцом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Скончавшийся в первые годы XX века этот русский философ, создавший один из важных водоразделов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философии, является настоящим мыслителем XX века. Его непреходящее значение в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мысли чрезвычайно глубоко: во-первых, он создал уникальную философию всеединства, заложили фундамент дл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илософ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во-вторых, он впервые предложил и задумался о «третьем пути» судьбы истории и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и, наконец, его попытка смешения философии, богословия, науки и даже искусства в качестве одного из способов творческого выражения и стремление обладает глубоким значением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онтологии и методологии. Создание идеологии Соловьёва знаменует зрелость р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духа рус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пробуждение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усской нации и создание уникально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традиции «имперского» мышления.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Владимир Соловьёв, философия всеединства,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мысли

---

(责任编辑 万青松)

## 以赛亚·伯林与俄罗斯文化\*

龙瑜成\*\*

**【内容提要】**20世纪俄罗斯的政治灾难，使得以赛亚·伯林格外强调“消极自由”，但俄罗斯文化对他的思想还有着更为复杂的影响。俄罗斯特殊的智性传统引导他进入了观念史研究领域；而面对多元价值与一元诉求间的冲突，19世纪俄国思想家做出的不同选择为伯林阐释和发挥自己的悲剧性价值多元论提供了最佳例证。他将这些思想家区分为“狐狸”与“刺猬”，并充分移情于以富有现实感的赫尔岑为代表的“狐狸”。然而，对俄国保守派思想家的过度轻视也暴露出他的某种“刺猬性”。

**【关键词】**以赛亚·伯林 俄罗斯 观念史 多元论 自由主义

**【中图分类号】**D751.2;D093/097**【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6)04-0029(21)

在进入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异常丰富而又矛盾重重的思想世界时，其复杂的文化基因向来被视为打开第一道大门的钥匙：这是一位出生于俄国里加、以俄语和德语为母语的犹太后裔，年幼时即逃离故乡，求学英伦，并最终在那里成就了自己在观念史和政治思想领域的非凡声望。而在这一系列的文化印记中，俄罗斯经历最容易让人联想到的，恐怕是革命与专制恐怖带来的负面示范。伯林及其研究者都反复提及他在1917年革命中亲眼目睹一名警察被暴民拖行濒死的一幕。伯林承认这给他带来了

\* 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项目批准号：14NDJC123YB）的阶段性成果。

\*\* 龙瑜成，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一种终生不灭的对肉体施暴的恐怖感”。<sup>①</sup>而成年后的三次访苏经历，则进一步向其展示了对“精神”施暴带来的毁灭性后果。<sup>②</sup>毫无疑问，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些极端体验和自己的侥幸逃离，刺激伯林做出了“消极自由—积极自由”的著名区分，并始终坚持将前者（“免于……的自由”）视为不可稍有退让的底线，而对容易导向一元化的后者（“去做……的自由——去过一种已经规定的生活形式的自由”）抱有极大的警惕。<sup>③</sup>

然而，这些负面记忆绝非伯林与俄罗斯的全部联系。首次与伯林接触的伊朗哲学家拉明·贾汉贝格鲁（R. Jahanbegloo）“很惊讶他对俄国文化有着非常亲密的感觉”；<sup>④</sup>而对于那些更熟悉伯林的人来说，他一直是别林斯基、赫尔岑、舍斯托夫、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等一批俄罗斯思想家、文学家在西方的热心引介者，是“俄国问题尤其是俄国文学和政治评论界的一尊守护神”。<sup>⑤</sup>事实上，在伯林思想与学术理路的形成过程中，俄罗斯文化产生了多重影响。他对俄罗斯知识分子与相关社会、文化现象的丰富阐述，为这些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可贵视角；而反过来，在破解那些困扰学界已久的伯林思想谜团时，这些论述可以提供的线索也远比想象中的要多。

## 一、俄罗斯智性传统与伯林的观念史研究

观念史研究被认为是以赛亚·伯林“最特别的，也许还是最重要的成就”，1930年代，他因受命写作一部马克思传记而进入这一领域，其中不乏偶然成分，但由哲学而入历史的研究路向，此后却贯穿其学术生涯。他的多部作

---

① 拉明·贾汉贝格鲁著：《伯林谈话录》，杨祯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4页。

② 关于伯林1945、1956和1988年三次访苏的详情，及其对苏联政治、文化的批评，可参阅张建华：“以赛亚·伯林视野下的苏联知识分子和苏联文化”，《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3期，第65-89页。

③ 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199-200页。

④ 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第2页。

⑤ 这是乔治·凯南的评语，引自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为以赛亚·伯林《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一书所写的导言（潘永强、刘北成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4页）。

品都被冠以“观念史”的副标题，如《维柯与赫尔德：对观念史的两项研究》（Vico and Herder: Two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1976）、《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Against the Current: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1979）、《扭曲的人性之材：观念史篇章》（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 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1990）、《现实感：观念及其历史研究》（The Sense of Reality: Studies in Ideas and Their History, 1996）等。<sup>①</sup>在这些著述中，伯林凭借渊博学识和罕见的历史想象力，突破现代学科分类的壁垒，对某些中心观念的形成及发挥影响的智性气候进行探查，并致力于再现特定时代与文化中人们关于外部世界与自身的看法。哪怕其政治哲学论说日渐为后辈挑剔和覆盖，伯林在观念史领域的声望也始终未被撼动。

有意思的是，很长一段时间内，观念史研究对于他所在的牛津、甚至整个英国的学术传统而言都是十分陌生的，“在缺乏意气相投的同事和支持性的制度背景的情况下，伯林差不多是单枪匹马地为自己创造了一座思想的收容所”。<sup>②</sup>当人们好奇伯林对观念史的这种兴趣到底来自何处时，最容易被追溯到的，仍然是他在俄罗斯革命中的见闻：在“人生的这个相当早的阶段”，他已开始受到“自由、平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的影响，并意识到政治观点对人类历史与社会生活可能产生的作用。<sup>③</sup>而伯林在回忆中，还提供了另一条重要线索：青年时代的他在伦敦图书馆读到了亚历山大·赫尔岑的著作。他相信，“正是赫尔岑使我爱上了社会思想史和政治思想史。这就是我研究思想史的真正开端”。<sup>④</sup>在《彼岸书》（«С того берега», 1850）、《法意书简》（«Письма из Франции и Италии», 1855）和《往事与随想》（«Былое и думы», 1868）等几部日后最常被伯林引用的作品中，赫尔岑不为任何教条

---

① 罗伯特·诺顿：“以赛亚·伯林的思想史”，刘东、徐向东主编：《以赛亚·伯林与当代中国：自由与多元之间》，陶乐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193页。

② 同上，第194页。

③ 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第9页。伯林在《扭曲的人性之材》的开篇更明确提到，以俄国革命为代表的20世纪“这些波澜壮阔的运动其实都是肇始于人们头脑中的某些观念，亦即人与人之间曾经是、现在是、可能是以及应该是怎样的关系”，他认为人们应该知道，“在领袖们——尤其是那些身后有一大群军队的先知——头脑中某些最高目标的名义下，这些关系是如何被改变的”。以赛亚·伯林：《扭曲的人性之材》，岳秀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5-6页。

④ 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第11-12页。



所役，纵谈社会、道德与美学问题，对同时代俄国与一系列西方流亡地的民风民情进行了生动刻画；尤其是通过对各国政党主张、领袖形象以及动荡前后社会风向的近距离考察，为 1848 年的欧洲革命提供了“尸检”报告。它们无疑为伯林本人的观念史研究提供了绝佳范本。<sup>①</sup>

但除了这些直接触因，在赫尔岑写作背后那个更为深广的俄罗斯智性与知识分子传统，还为伯林的研究提供了深层底色——对于这一传统，离开苏联后一直坚持阅读俄罗斯经典的伯林有着相当完整的认识。其传记的作者约翰·格雷（John Gray）更直言，正是由于浸淫于这一传统，使得伯林的写作取向迥异于英美同行：

伯林曾经说过（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他对英国经验主义的深刻理解和毫无疑义的吸取都是经由英美哲学和康德哲学而形成的。然而，在英美哲学那种专业式的枯燥论述与伯林的著作间有一种深刻的差别，这种差别也许不单纯是伯林独特的写作风格问题，也不仅表现为伯林对与他完全不同的思想家具有一种（通过想象的移情作用）深邃的洞察力，而且还表现在他对理智生活和知识分子的责任的理解上，这些都不是英国式的而是俄国式的。伯林最主要的工作，虽然也体现在他力图寻求一种区别于英国经验论的严密而透彻的标准，但更表现在他对理智的作用（这在英国哲学中是没有得到充分认识的）的理解上，他把理智看作是一个人与整个人类生活的概念相联系的能力，伯林这种观点的根源仍然扎在俄国的传统中。<sup>②</sup>

事实上，在《辉煌的十年》一文中，伯林曾对这一传统的形成历史与独

---

① 甚至，伯林与赫尔岑采用的文体与论述风格都颇为相似：他们都偏好以机动灵活的散文迂回攻击对象论述中的疏漏，对其进行证伪；而自身并不努力建立或证成某一完备的思想体系。这种攻大于守、本人观点隐藏于论述对象之后的风格，正是伯林政治哲学主张备受争议的原因之一。但它却更为贴合复杂的思想史面貌，也能很好地发挥其“价值多元论”这一思想精髓。参见简森·费雷尔：“以赛亚·伯林与随笔政治”，牟潘莎译，《以赛亚·伯林与当代中国》，第 166-176 页；以及艾琳·凯利关于此文的评议，第 188-189 页。

② 约翰·格雷：《伯林》，马俊峰等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9 年，第 6-7 页。

特内涵进行过详细探讨：在他看来，拿破仑战争对于俄罗斯观念史的意义不亚于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它带来了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使得受教育者开始对自己产生认同的这一共同体内部之贫穷与野蛮感到强烈不安。而此时又恰逢浪漫主义运动兴起，其核心观念“人格完整”与“整体献身”对民族心受挫的俄罗斯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他们对知识的渴求，与道德热情、社会责任紧密相联，由此形成的“知识阶层”及其历史后果亦回传西方，被伯林判定为“俄国对世界上的社会变化的最大一项贡献”。<sup>①</sup>如下文将讨论的，伯林并不接受俄罗斯知识分子所信奉的那种“真理的完整性”，但他们对机械主义模式的拒斥，在人格与思想、文字间建立的那种强相关性，却赢得了伯林的共鸣。和俄罗斯知识分子一样，伯林所理解的“观念”不仅是理性层面的认识、判断，更蕴含着人对内部与外部世界的那些或显或隐的态度。而正是在捕捉这些态度时，伯林展现了格雷文中提到的那种“想象的移情”能力，这也被公认为其观念史写作能够如此引人入胜的重要原因。尤其是人们发现，越是那些信念强烈、言辞激烈的“异端分子与魅力型领袖”，他越能“深入内里”，尽显其人格与心态。<sup>②</sup>对于愿为自己所执观念承担一切后果的俄式激情，伯林深感警惕，却也能充分理解和传达其中的诱惑。

关于自己这种移情式的观念史研究，伯林曾经语焉不详地将其描绘为“一种复杂的、含糊不清的、需要借助心理学视野以及丰富想象力的研究工作”。<sup>③</sup>而并非偶然地，《辉煌的十年》对俄罗斯“社会批评”传统的开创者别林斯基的批评方法的引述，恰恰可以对伯林本人的工作加以注解<sup>④</sup>：

---

① 参见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138-177页。

② 钱永祥：“‘我总是活在表层上’——谈思想家伯林”，转引自刘东：“伯林：跨文化的狐狸”，收入《以赛亚·伯林与当代中国》，第136页。

③ 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第25-26页。

④ 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第191-192页。毫无疑问，除了个人天赋外，别林斯基的这种“移情”活动也深受德国浪漫主义的影响。而在研究维柯这位“德国历史学派的先见者”以及赫尔德等德国思想家时，伯林对“移情”说也有着详细说明。如罗伯特·诺顿在《以赛亚·伯林的思想史》一文中详细论证的，伯林的观念史研究与其德国文化基因同样有着深刻的联系（第196-212页）。但将这一方法运用于对作品的解读，并取消生活与创作间的界限，确为别林斯基领衔的俄国“社会批评”的独特发明。

任何时刻，他（别林斯基——引者注）若想传达一项文学经验，都用上生命、他整个人，力图捕捉该项经验的本质。……他自己也说过，要了解一位诗人或思想家，你必须暂时整个进入他的世界、任自己受他看法支配、与他的情绪浑同合一，简言之，体悟其经验、信仰及信念。

如果说，别林斯基“就是这样‘体悟’莎士比亚与普希金、果戈里与乔治·桑、席勒与黑格尔的影响”，那么，伯林也是如此“体悟”/“移情”别林斯基以及在其影响下的俄罗斯进步青年的：

他博读群书而教育不足，激情风烈，既无传统教养的拘束，也没有天生温和的脾气，而且动辄陷入道德的暴怒，胸中如沸，不义或虚伪之事当前，即不顾时地、不顾何人在旁，抗声疾斥。追随他的人采用这种姿态，因为他们是激愤的一群。于是，这腔调成为新真理的传统腔调，凡说新真理，都须以受辱之痛犹新之感，出以怒气腾腾之口。<sup>①</sup>

对于别林斯基从黑格尔式的寂静主义转为激进民主派的思想历程，伯林亦进行了细致追踪。但他更着力挖掘的，始终是这位批评家作为“俄国知识阶层的良心”在道德方面的一贯性。也是从那种宽泛的观念史研究角度出发，伯林认为，由别林斯基引入的炽热的社会批评“腔调”，在俄罗斯文学中再未消散，而且影响深远——因为检查制度的森严，也因为浪漫主义放大了这一文明体固有的象征传统，文学在别林斯基时代已经是俄罗斯知识阶层活动的中心舞台。文学与社会、政治运动紧密缠绕：“在俄国，社会与政治思想家变成诗人与小说家，具有创造力的作家则成为政论家。”<sup>②</sup> 哪怕经历了20世纪的大变革，这一传统也未完全中断。这解释了文学问题为何会在《俄国思想家》(Russian Thinkers, 1978)与《苏联的心灵》(The Soviet Mind, 2003)两部伯林直接以俄罗斯为研究对象的论文集中占据了大量的篇幅。而更有趣的是，伯林也至少部分地继承了这一综合性写作传统，将人的欲望、情绪以

---

① 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第209页。

② 同上，第311页。

及各种隐秘动机与那些更宏大的观念现象勾连起来。其研究者发现，他在观念史方面的成果“便是关于民众生活和思想的措辞优美、具备了一部小说的全部文学品质的研究论文，同时也是对历史上各种观念的批判性的考察报告”。<sup>①</sup>关于这一点，从上文引用的那一小幅别林斯基的“思想肖像”已可感受一二。

## 二、“直击”多元论与一元论的角力

除了将伯林引入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并影响其论说风格外，俄罗斯对于伯林发挥自己的核心思想，即价值多元论，更有着特殊意义。这一贯穿伯林全部著作的观念相信，绝对价值在人类社会是客观存在的，但这些价值却并不必然可以相互通约：“人的目的是多样的，而且从原则上说它们并不是完全相容的，那么，无论在个人生活还是社会生活中，冲突与悲剧的可能性便不可能被完全消除。于是，在各种绝对的要求之间作出选择，便构成人类状况的一个无法逃脱的特征。”<sup>②</sup>在此，伯林试图反驳的，是古老却仍持续产生强大影响的一元论，一种相信所有真正的问题都有且只有一个真正答案的“柏拉图式的理念”。尽管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圈中找到了马基雅维利、维柯、赫尔德等一批否定“和谐大结局”必然存在的同盟者，但惟有19世纪以降的俄罗斯，为伯林提供了一个规模庞大的“角力场”，可以最近距离地观看多元论与一元论的残酷冲突，以及思想者在同一场域中作出的多种选择。关于这一点，伯林作品的重要编辑者之一艾琳·凯利（Aileen Kelly）提供了一个有力证明：

伯林论及道德和政治理论的主要著作与他讨论俄国问题的文章之间的内在关系反映在它们平行的著述年谱中。确立了伯林多元主义精髓的主要几篇文章发表在1949年至1959年之间（继而结成题为《自由四论》的文集）；而在他论述俄国思想家的十篇论文中有九篇首度发表于

---

① 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第3页。

② 以赛亚·伯林：《自由论》，第242页。

1948年至1960年之间（唯一的例外是他晚期对屠格涅夫的研究）。他批判历史目的论思维的长文《历史的必然性》写在1953年，也正是在同一年，他发表了《刺猬与狐狸》，描述了托尔斯泰的怀疑论现实主义与其所追求的普世性解释原则之间的冲突。<sup>①</sup>

事实上，西方世界往往认为俄罗斯知识分子理性能力不足，且多为狂热的一元论者。冷战背景下，这种印象被进一步强化。而伯林在自己的多篇论文与讲演中对此提出异议。在他看来，俄罗斯思想家绝不缺乏怀疑精神与批判能力。他们本身深受专制之苦，敏感于思想的压制，渴望打破偶像；而更重要的是，因为身处欧洲边地，在同时吸收多种竞争性西方思想之余，他们还可凭依“后发”优势对西方发展道路进行考察。这一切反而让俄罗斯知识分子更容易对绝对观念产生警惕。众所皆知，西方工业化进程付出的代价一直与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取向及道德感不符，而欧洲1848年革命的失败，更让他们清楚地看到抽象概念对实情的阉割。他们开始质疑西方模式的普适性，并更多地关注本土的特殊需求与已有资源。<sup>②</sup>但与此同时，伯林也承认，严酷的社会现实、受辱的民族心，或许再加上东正教神学的影响，都要求俄罗斯知识分子尽快找到确定的、绝对的解决之道。多元的选择和一元化诉求的相互牵扯就此成为了19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的智慧与精神的挑战。

而如果说，“自由”、“平等”、“正义”这类同样好的价值之间的冲突在那些政治、社会体制相对更成熟的文明体（如伯林一家逃往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中，更容易以代价相对较小的方式实现必要的调和，那么，在

---

① 艾琳·凯利：“一个没有狂热的革命者”，马克·里拉等主编《以赛亚·伯林的遗产》，刘擎、殷莹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7页。引文中提到的十篇论文包括后来收入《俄国思想家》的八篇，分别为：“俄国与1848”（*Russian and 1848*, 1948），“刺猬与狐狸”（*The Hedgehog and the Fox*, 1953），“辉煌的十年”（*A Remarkable Decade*, 1954年演讲，1955-1956出版），“赫尔岑与巴枯宁论个人自由”（*Herzen and Bakunin on Individual Liberty*, 1955），“俄国民粹主义”（*Russian Populism*, 1960），“托尔斯泰与启蒙”（*Tolstoy and Enlightenment*, 1960年演讲，1961年出版）以及论屠格涅夫思想的“父与子”（*Fathers and Children*, 1970年演讲，1972年出版）。另外两篇是伯林为赫尔岑《彼岸书》和《往事与随想》英译本所作的序言（分别出版于1956年与1968年）。

② 参阅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第1-24页。

选择空间被进一步挤压了的专制俄国，这种平衡、折中似乎很难实现，重大损失更难避免。<sup>①</sup>伯林所强调的价值多元论的潜在悲剧性也因此被大大凸显。最终，绝大多数俄罗斯思想家还是难以直面历史的无解。他们需要相信存在“某种在原则上能够解决这所有问题的理论体系；甚至认为，发现这种体系是一切道德、社会生活和教育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sup>②</sup>在伯林的层层剖析下，他们可以是某些流行思想最有力的批判者，而同时又因为对确定答案的极度渴求，成为另一些抽象思想、理论最不遗余力的鼓吹者：

托尔斯泰谴责所有关于历史或社会的普遍理论所具有的荒谬的简约性，这是被意欲发现某种统一真理的需要所驱使的，这种真理能够抵抗它所遭受的毁灭性攻击。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摧毁了所有体系化思想家的自命不凡，这些思想家寻求确立和规范人类社会的形式。他告诫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背后存在的权威主义，但是他自己对毁灭意志之创造力量的浪漫崇拜蕴含着同等险恶的寓意。一些人将民粹主义者对俄国农民之纯正美德所抱的信念视为乌托邦的幻想而予以摒弃，但其中的许多人继而又接受了主张无产阶级之拯救使命的马克思主义式的幻想。<sup>③</sup>

让这些崇拜、幻想变得更危险的是，同样的思想主张在其原生地西方还需要与其他思想传统竞争，并相互制衡、解毒，而当它们被抽离出这一对话场，并被俄罗斯知识分子视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就更容易被加以功利化和

---

① 艾琳·凯利：“伯林与赫尔岑论自由”，龙瑜成译，《以赛亚·伯林与当代中国》，第231页。

② 以赛亚·伯林：《苏联的心灵》，第125页。

③ 艾琳·凯利：《一个没有狂热的革命者》，第11页。

激进化的解读，奉以独尊地位。<sup>①</sup> 不难发现，在伯林关于 19 世纪俄国思想家的这些解读中，“铁幕”另一端的苏联始终在场。那种让人几乎自愿地摒弃生活经验与道德本能的思想体系操控，确实可被视为这场延续数代的多元选择与一元诉求对抗大剧的最后一幕。<sup>②</sup> 但无论如何，伯林反对将这一幕视为俄罗斯社会与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更不相信这是向所谓历史“顶点”的迈进。相反，他将 19 世纪数位最富批判力的俄国思想家对历史的思考与在苏联官方意识形态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的那种一元论历史图景反复加以比照：

托尔斯泰和马克思一样，清楚看出，历史如果是一门科学，我们必定可能发现并且具陈一套历史准则，持这套准则，与经验观察之资料联合运用，则预测未来即切实可行如地质学或天文学。但是，历史其实不曾达到这等境界，他比马克思及其信徒更明白，而且一本他习惯的独断方式，直言不讳，更补以各种论点，明示这个目标无望达成。他还以一项看法，论定此事，认为这种科学希望如获实现，将会结束我们所谓的人类生命：“我们如果承认人类生命能用理性加以规矩编制，生命的可能性也就毁灭了。”<sup>③</sup>

此二人(黑格尔与马克思——引者注)亦会预测资产阶级在劫难逃，以及死亡、熔岩与新文明。但是，想到脱缰而出的巨大毁灭力量，想到

---

① 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第 148 页。这一西方理论跨界失效现象也为当时的俄国知识分子注意到。如 C.H.布尔加科夫在 1905 年革命后就反思道：“在这棵深深根植于历史的、西方文明枝叶繁茂的大树上，我们仅仅选中了一根树枝。我们并不了解，也不愿去理解所有的树枝。我们充分相信，我们已经为自己嫁接了最为正宗的欧洲文明。然而，欧洲文明不仅拥有纷繁的果实和浓密树枝，而且还拥有滋养大树的根须，在一定程度上它们以自己健康的浆汁保证诸多含毒的果实无害于人。由此，甚至那些具有否定意义的学说，它们在自己的祖国，在其他许多与之对立的思想潮流中，具有完全不同的心理意义和历史意义。与之相比，当它们出现在文明荒漠时，却企图成为俄罗斯教育和文明的唯一基础。”C.H.布尔加科夫：“英雄主义与自我牺牲——关于俄国知识阶层宗教特质的思考”，《路标集》，彭甄、曾予平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30 页。

② 《俄国思想家》一书的编辑者就指出，伯林同一时期在《外交事务》上发表那些讨论苏联问题的文章“与本书所收诸文颇有可以合勘之处”。参见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第 3 页。

③ 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第 37-38 页。

一切纯洁无辜之人、愚妄之徒以及可鄙的平庸无识之辈都大难临头而犹懵然不知可怕命运，黑格尔等人冷嘲热讽、幸灾乐祸之意，溢于言表。赫尔岑想见权力与暴力扬威横行之景，则并不如此拜服迎接；他对人类弱点既无鄙视，也没有虚无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核心性格里那种浪漫的悲观。因为他认为这巨变既非不可避免、亦非光荣之事。……（赫尔岑《法意书简》）“人类由现代科学而解脱贫穷与无法无天的巧取豪夺，却并未自由，反竟不知怎的，被社会吞噬，宁非怪事？要既了解人权的全盘广度与真境，以及所有神圣性质，又不至于摧毁社会，不至于将社会化为原子，是社会问题里最困难的一个。”<sup>①</sup>

不无讽刺的是，这些历史决定论、线性进步论的挑战者在苏联被（有所批判地）视为“先贤”，进入思想圣殿陪祭。他们复杂的洞见也随之被大大简化和歪曲，更遑论引文中那些关于一元论惨剧的预言了。伯林对这些思想的过快遗落深感遗憾。在这位价值多元论者看来，冲突、变化、偶然，既是不可避免的，也为个体在历史中发挥能动性提供了更多缝隙。在渴望思想自由的“密闭恐惧症”和渴求确定之物的“广场恐惧症”这两端之间还有诸多可能。19世纪俄国思想家们虽然饱受多元与一元的角力之苦，却也因此而激发出了惊人的创造力：正是在这个并不多见的思想活跃期里，出现了下文还将继续讨论的那些原创性观念与实践。<sup>②</sup>俄国思想家、文学家对所在共同体的历史可能性提出种种设想，远较被“人为辩证法”控制的“苏联心灵”更具活力。

---

① 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第118-120页。

② 这一思想活跃期同时也是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这些文学作品中展现出的精神深度，尤其是那种异常丰富而跳跃的心理描写，在当时的西方文学界看来是颇为独特的。而在其经典论著中，奥尔巴赫同样将其归因于19世纪的俄国承受着多种生活模式与价值观之间的激烈冲突。参见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吴麟绶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617-618页。



### 三、移情于历史重压下的思想之狐

“狐狸”与“刺猬”是伯林著述中传播甚广的一对区分概念：“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狐狸”型思想家多疑善变，“捕取百种千般经验与对象的实相与本质”，而拒绝将其收束到某个无所不包的一元体系。与之相对的“刺猬”型思想家，则在观念与生活方面强调某个中心识见的存在，“而本此识见或体系，行其理解、思考、感觉”，非此则觉得没有意义。<sup>①</sup>不难理解，经过多元论者伯林的渲染，后来者多竞相以“狐狸”自勉或誉人。

不应忘记的是，伯林最初提出这一区分，就是在那篇讨论托尔斯泰历史观念的长文中。而除了托尔斯泰，他还重点分析了19世纪俄国另外两只感性力量与怀疑精神发达的“巨狐”：屠格涅夫与赫尔岑。三人都与同时代风靡俄国知识界的德国浪漫主义历史观保持着相当距离，意识到历史并无“顶点”，终极方案可能并不存在：除了提出“微积分”论，对各种历史决定论大加讽刺外（《刺猬与狐狸》），托尔斯泰还格外敏感于“知识”与“幸福”之间的不谐。他一方面认为，在俄罗斯唯有农民以直觉把握了朴素真理，另一方面，又不肯放弃启蒙大众之职责，在“谁来教”、“教什么”的问题上苦思不得其解，徘徊于寂静主义与启蒙理想之间（《托尔斯泰与启蒙》）。西化色彩最浓的屠格涅夫其实仍然身处俄罗斯文学中心传统，他的每部长篇小说均触及社会政治焦点问题。但作家既感佩左派面对社会不义的挺身而出，又深深担忧那种以为掀翻一切后新世界即告建成的革命虚无主义。因其观点的暧昧，屠格涅夫一生中屡屡被左、右阵营夹击，对价值间的不可调和可谓有着切实体验（《父与子》）；至于赫尔岑，伯林曾在《自由四论》中引用其“飞鱼”说（“飞鱼”的存在，并不能证明所有“鱼”都想“飞”），挑战传统自由主义假定的那种普遍人性。<sup>②</sup>这位“对自由怀有巨大激情”的俄罗斯文化精英痛苦地承认，对大多数民众而言，重要的与其说是自由，不如说是更好地被管理，相较于选举权，人们可能更愿意选择面包（《赫尔岑

---

① 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第25-26页。

② 以赛亚·伯林：《自由论》，第58页。另外，在《赫尔岑与巴枯宁论个人自由》一文中，伯林也引用了这一比喻，参见《俄国思想家》，第113页。

与巴枯宁论个人自由》)。

不过，面对类似的价值冲突困境，三位俄罗斯思想家的选择却各异，构成了一个小小光谱。而以观点暧昧著称的伯林难得地在这一光谱前明确“站位”，这正有助于厘清围绕其多元论产生的一些常见质疑：不难理解，天性是“狐狸”、却想当“刺猬”的托尔斯泰并未获得伯林的最多认同。如前文所述，这位对同代知识分子多有讽刺嘲弄的大文豪事实上还是融入了19世纪俄国思想的主流。他始终不能放弃对单一、明晰真理的幻想，提出的问题也总是过于笼统。真正耐人寻味的，是伯林在屠格涅夫与赫尔岑之间的选择。初看起来，保持独立观察者形象的自由主义者屠格涅夫应该比革命煽动家、社会主义者赫尔岑更能得到伯林的认同。屠格涅夫甚至可以说是伯林“消极自由”观的绝佳代言人：他始终立于岸边，准确地指出俄罗斯社会的种种乱流，而不肯轻易被左、右任何一派“拉下水”。而伯林也丝毫无意将“避免做太明确社会与政治寄托”的中间派贬为骑墙者。在《父与子》一文中他甚至用大量篇幅指出，在一个观点尖锐对立的社会，“道德敏感、诚实、思想负责之人”要坚持自己的怀疑与批判精神，所需付出的代价并不比一头扎进某个阵营、再无回顾的人少。他提示道，屠格涅夫式困境不仅困扰着1860年代到1917革命的俄罗斯自由主义者，还日益普遍化，“在我们时代已经成为每个阶级里的人的困境”。<sup>①</sup>这其中无疑也包括伯林本人：因为既怀疑传统自由主义的理性主义预设，又坚决批判左派的非理性主义倾向，他同样受到了不同阵营的夹攻。<sup>②</sup>但这并未动摇他对站队的拒斥。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是，1988年，在谈到“左派和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时，伯林认为，1968年的风暴过后，欧洲的左派运动已经陷入低潮，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失败更促使了社会主义信念的日渐崩溃，“整个世界在向右转”。他感慨道：“我真不希望这样。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sup>③</sup>习惯了伯林对苏联政治的批评后，这样的表态多少是让人意外的。其中，当然有自由主义者素来左斜、“与任何打破人类藩篱者亲近”的成分，<sup>④</sup>但它更传达出伯林身

---

① 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第356页。

② 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第135页。

③ 同上，第119页。

④ 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第350页。

上（和屠格涅夫一样的）那种喜欢在多种观念之间穿梭的“狐狸”取向。

然而，伯林对屠格涅夫这位“同盟者”的认同却是有所保留的。原因在于，后者的极端清醒、不轻易情绪化、有时竟近于冷淡：“他喜欢自持于一种中间立场，对于自己缺乏‘信仰意志’（will to believe），甚至几有得意太过之势”，“他把他的艺术与他自己分开；作为一个人，他并不深切望问题的解决”。<sup>①</sup>这种超然态度让屠格涅夫那些直指社会焦点问题的作品仍能保持一种纤细剔透、“圆成周至”的美感，却在客观上导向了思想者对现实的不加干涉。在这一点上，屠格涅夫与看似处于光谱另一端的、晚年一头扎进某种带有不可知论色彩的新宗教的托尔斯泰，其实并无本质区别。而这种超然倾向，恰非伯林所乐见：这位自由主义者加价值多元论者多次声明，消极自由是必要的，却不充分，“否则生活就不值得过了”<sup>②</sup>；而承认我们选择某些善可能意味着对另一些善的损害、甚至放弃，也并不像其批评者所说的那样，必然堕入相对主义的深渊。<sup>③</sup>在这个问题上，被伯林引为强援的，正是最初将其领入观念史研究道路的赫尔岑。

很长一段时间里，赫尔岑在西方知识界以及苏联官方书写中都被匆匆贴上“早期社会主义者”的标签，很少得到更深入的阅读和讨论。而伯林不仅亲自为赫尔岑作品的英译本作序、大力推荐，更在自己的论文中反复展示其作为“一流的欧洲思想家”的超凡魅力。在其观念史写作中，也许只有赫尔岑的作品被如此频繁且大篇幅地引用。作为一只“思想之狐”，赫尔岑同样深知历史没有脚本，人们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找到某种完备方案；但他并不认为这有多么可怕。在《往事与随想》中，他以一贯的辛辣笔调反问道：

当人们知道，他们吃饭和听音乐、恋爱和玩乐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完成上天的使命，不是为了尽快达到无限（发达的）完美境界，难道他们就会停止吃喝，不再恋爱和生育子女、欣赏音乐和女性的美吗？<sup>④</sup>

---

① 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第239页。

② 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第138页。

③ 伯林的辩白及相关评价，参见 Steven Lukes, “Berlin’s Dilemma”,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March 27, 1998, pp. 8-9.

④ 亚历山大·赫尔岑：《往事与随想》，项星耀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下卷，第270页。

而更进一步，赫尔岑指出，恰恰因为历史道路没有被预定，人生和历史才会充满深刻的乐趣，个人才能充分调动自己的意志，选择自己的道路，甚至在无路可行之处，“硬辟出一条来”。<sup>①</sup>也只有放弃对一切抽象原则、普世模式的幻想后，人们才能更具体地应对当下的问题。就赫尔岑本人而言，他珍视个人自由，且坚持自由本身就是目的，不能以他物之名（无论多么高尚）牺牲自由，否则就是活人献祭。但除了承认现阶段“想飞的鱼”在俄国只是极少数外，他的政治实践实际上对伯林“两种自由”的划分作出了一个重要补充，即消极自由往往是需要通过积极自由来争取和保障的，在一个没有基本人权保障的专制社会尤其如此。1857到1867年间，赫尔岑在伦敦（后迁至日内瓦）坚持出版俄语杂志《钟声》，影响甚巨。可以说，他几乎独力为俄罗斯革命舆论宣传打开了一片天地。然而，对于大暴乱可能毁灭文化精英（他本人从属其中的）最珍视的那些价值，这位革命家同样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不管他和他的社会主义朋友作出多少努力，他做不到完全自欺欺人”，这让他不断徘徊于“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之间、怀疑主义和对自己的怀疑主义的怀疑之间”；只是归根结底，他的道德观，他对俄罗斯残酷现实的认识，还是不允许他否认一场大变动的正义性。<sup>②</sup>在这种情况下，赫尔岑能想到的最理想的方案，是一种以俄罗斯村社自治传统为基础，而又充分考虑个性发展的“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亦即希望在几种竞争性价值之间达成一种动态平衡。可惜，即使是这样的折中，“也都因为大众对民粹主义知识分子的宣传的抵触而粉碎”——关于这一点，赫尔岑在被伯林称为“也许是十九世纪关于人类自由的前景最具有指导性和预言性的冷静而动人的文章”——《致老友书》中作出了坦率的回应。<sup>③</sup>

可以说，伯林笔下的赫尔岑比屠格涅夫多一份激情，又比托尔斯泰少一份执念。他全情投入自己的选择，而这并不妨碍他时刻准备根据实情对之加以调整：“牺牲那些自己所憎恶的，这并不困难。关键在于：放弃我们所爱

---

① Alexander Herzen, *From the Other Shore and The Russian People and Socialism*,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56, p. 39.

② 以赛亚·伯林：《扭曲的人性之材》，第247-250页。

③ 此处论述参见艾琳·凯利：《伯林与赫尔岑论自由》，第228页。

的，如果我们相信它不是真的话。”<sup>①</sup>凭借这种同情地把握特定语境中相互影响的多个因素、并进而进行“灵敏的自我调适”的能力（伯林称之为“现实感”<sup>②</sup>），赫尔岑的多元论主张与毫无原则的相对主义划清了界限。不容否认的是，伯林对赫尔岑思想的呈现多少有“六经注我”之嫌，例如，他大大弱化了赫尔岑对理性主义的推崇以及对俄国村社所持的幻想；<sup>③</sup>那些过分移情的刻画有时更像是伯林的热烈自白：他曾声称自己之所以能正视人类悲剧而保持安宁心态，是因为他“总是生活在表层上”，批评者据此批评其“浅薄”，并以此解释其学说的不成体系。<sup>④</sup>但从伯林选择将屡败屡战的赫尔岑（而非更少犯错的屠格涅夫）称为“我的英雄”，足可看出他相信人在森严的历史中终究有一定限度的自由，且真切希望个体利用这种自由对生活进行必要的介入，“没有人的选择就没有人的行动，一切事情都是人做的。”<sup>⑤</sup>他之所以常常表现出对积极自由的警惕，是因为它比消极自由更频繁地被滥用，然而，这并不影响他同时承认积极自由在正常生活中可能“更重要”<sup>⑥</sup>。他所说的“生活在表层”，的确有不试图建构或投身某个完备体系的意思，但这与其说是因为浅薄，莫若说是因为看透了人不可能掌握“深层”的终极奥秘。而生活中最需要勇气和“不浅薄”的，恰恰是在承认价值有限性的前提下，仍相信自己可以过一种连贯而富有道德的生活。虽然赫尔岑的具体实践并未取得成功，甚至充满悲剧性，但越是考察价值间的不可调和以及倒向一元体系后可能带来的惨烈结果，伯林越是倾向于相信，（他笔下的）赫尔岑式的“低调”选择、亦即坚持在“表层”对多个选项进行平衡与叠加，已经是最稳妥可行的了：

---

① Alexander Herzen, *From the Other Shore and The Russian People and Socialism*, p. 53.

② 对“现实感”的解释，参见以赛亚·伯林：《现实感》，潘荣荣、林茂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27页。伯林关于赫尔岑“有着太强的现实感”之说，参见以赛亚·伯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247页；以及《俄国思想家》，第135页。

③ E. Lampert, “Berlin, Isaiah. *Russian Thinkers* (Review)”,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1979, Vol.57, No.2, p.299.

④ 伯林的这一说法见伊格纳蒂夫：《以赛亚·伯林传》，转引自刘东《伯林：跨文化的狐狸》，第138页。

⑤ 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第136页。

⑥ 同上，第37页。

在社会或者政治方面，总会有冲突发生；由于绝对的价值之间必然会有矛盾，这就使得冲突在所难免。然而，我相信，通过促成和保持一种不稳定的平衡状态，这些冲突可以降低到最小；这种不稳定的平衡会不断遭到威胁，也不断需要修复——而这一点，我再重复一遍，恰恰就是文明社会的前提。是合乎道德的行为，否则，我们人类就必定会不知所终了。你是不是要说，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有点太灰暗了？这种做法，不能像那些鼓舞人心的领导人所做的那样，称之为英勇的行为？不过，假如这种看法之中还有一些真理的话，也许就足够了。<sup>①</sup>

#### 四、选择性忽略“刺猬”

和所有二元区分一样，“狐狸”与“刺猬”之分亦容易失之机械、绝对。当伯林频频用此单一模式来分析、解释取向各异的俄罗斯人物和现象时，本身就不免犯一些“刺猬”的错误。<sup>②</sup>最明显的莫过于他笔下的“狐狸”其实都多少有些“刺猬”气——哪怕是最“滑溜”不可捕捉的屠格涅夫，也始终坚持自己的古典美学趣味与政治改良立场，即使因此得罪涅克拉索夫与赫尔岑等一千好友也从未退让。此外，因为是从苏联极权恐怖“回望”历史，这位流亡者对自己认定的“刺猬”也很难像对“狐狸”那样予以足够的同情，在其评价体系中，二者过分偏于两极。

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伯林关于俄罗斯思想家的论著对保守派“刺猬”着墨甚少，与后者在历史中产生的实际影响颇不成比例。在与贾汉贝格鲁的谈话中，他更明确将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典型的）斯拉夫派成员以及索尔仁尼琴等人剔除出“知识阶层”，因为他所理解的知识阶层应持启蒙观点，“追求理智，反对墨守传统，相信科学方法，相信自由批判，相信个人自由”，“简单地说，他们反对反动，反对蒙昧主义，反对基督教会和独裁主义的政

---

<sup>①</sup> 以赛亚·伯林《扭曲的人性之材》，第22-23页。对那些认为伯林“浅薄”的批评的反驳，参见刘东：《伯林：跨文化的狐狸》，第138页。该文也对伯林“观念叠加”的思想路向进行了详细论述（第139-142页）。

<sup>②</sup> George M. Young, Jr., “Isaiah Berlin’s Russian Thinkers”, *The Review of Politics*, 1979, Vol.41, No.4, p.596.

体”。<sup>①</sup>这也让他笔下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史主要呈现为“一出世俗的、自由派的道德剧”，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保守派的选择动机并未进行深入的挖掘。至于对俄罗斯文化至为重要的宗教问题，包括被公认为俄国思想家对世界一大贡献的宗教哲学成就，更是被轻易地放过了。<sup>②</sup>

对论述对象的这种筛选，首先当然与伯林个人的气质及智性倾向有关。在被问及为何从未著文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他很干脆地承认自己“是个无可救药的世俗之人”，陀式的生活哲学无法令其同情。类似的，他也无法接受路标转化派对俄国知识阶层的批评，认为后者哪怕“犯什么错误”，“在本质上也是神志清爽的人”。<sup>③</sup>其次，从伯林具体的论证思路来看，要凸显西方与国内专制双重压力下 19 世纪俄国“善”与“善”，尤其是个人自由与正义社会、目的与手段、精英文化与大众需求之间的不可协调，将那些有自由化倾向的知识分子作为例证，确实要更为“得心应手”。而最后，这样一个“世俗化俄罗斯”也透露出伯林思想体系的两大支柱——价值多元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微妙关系。从对赫尔岑选择的认可，包括对其“飞鱼”一喻的引用，确实可以看到，伯林挑战了理性主义的一元论自由主义。他并不认为可以脱离具体历史语境赋予“自由”以绝对优先地位。后者是且仅是多种竞争性价值中的一种（这正是自由主义者认为伯林实际抽掉了自由主义基石的原因所在）。但与此同时，在《自由四论》中，伯林又曾明确指出多元主义蕴含着“消极的”自由标准，<sup>④</sup>因为“多元论与特定一元论的某种和解，多少设定了后者对其他文化采取了一种宽容自由的态度”，但“当多元主义的宽容超出人性底线，伯林便会用自由概念来约束”。<sup>⑤</sup>在俄国保守派那些“反动”、“蒙昧”的主张中，伯林看到用思想灌输或压制性手段侵害个人选择

---

① 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第 166-170 页。伯林关于“知识阶层”的更多界定，还可参见《苏联的心灵》，第 158 页。

② George M. Young, Jr., “Isaiah Berlin’s Russian Thinkers”, pp. 596-597.

③ 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第 157-158 页。

④ 以赛亚·伯林：《自由论》，第 244 页。

⑤ 参见何恬：“伯林难题及其解答”，《国外社会科学》，2014 年第 4 期，第 155-160 页。文章讨论了国际学界关于伯林“价值多元论能否证成自由主义”问题的三种意见。而本文取第三种、亦即思想史解读视角：不以“刺猬”的标准（一套完备的逻辑体系）去强解这只“狐狸”的思想；强调伯林只是历史地、灵活地从各种思想体系中选择了部分观念进行叠加。

权的巨大风险，“而缺乏选择的自由意味着人性的丧失”。<sup>①</sup>这应该也进一步导致了伯林对这类“刺猬”的不假辞色。

然而，保守派“刺猬”所选择的传统资源未必就只有僵化和压制性的一面。例如，对俄罗斯宗教传统有更多体认的别尔加耶夫反而认为（伯林眼中的“巨狐”）托尔斯泰是“片面”和“直线性”的，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更复杂、更深刻的。他那些疯狂却充满创造力的作品最突出地反映了俄罗斯民族精神结构中“虚无主义”与“启示录主义”的悲剧性冲突与并存。<sup>②</sup>毫无疑问，解读者本人不同的思想立场影响着他们对同一对象的解读，对其进行简单的正误判定是没有意义的。就我们的论题而言，更具启发性的也许是指，可以通过引入别尔加耶夫解读中的那种宗教精神维度来补充伯林给出的托尔斯泰肖像，从而更好地解释作家身上“狐狸性”与“刺猬性”的并存（既是怀疑一切不能被自己理性推导出的答案的虚无主义者，又有着渴望终结与极限的启示录冲动）。这样的补充，或许也能让该肖像更好地融入俄罗斯背景。<sup>③</sup>

此外，很多时候，与伯林笔下那些在西方现代理念与俄罗斯落后现实间挣扎的“狐狸”一样，保守派“刺猬”的选择也极富现实感与悲剧性。在评价当代俄罗斯保守派精神领袖索尔仁尼琴时，伯林就显得过于缺乏同情。他批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位继承者“不是反对权威的，他反对的是特殊的共产主义的权威”；“他是一个俄罗斯的爱国者，酷似一个17世纪的信徒，起来反对彼得大帝及其推行的一切现代化”。<sup>④</sup>然而，就在其最为重视的作品、革命史《红轮》（《Красное Колесо》，1989）中，通过对斯托雷平改革（不无想象性成分）的描写，索尔仁尼琴热情宣扬了自己心目中俄罗斯的最

---

① 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第67页。

② 参见别尔加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耿海英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11页。

③ 例如，牛津学者罗莎蒙德·巴特利特（Rosamund Bartlett）在2010年推出的《托尔斯泰大传——一个俄国人的一生》（*Tolstoy: A Russian Life*）中就引用别尔加耶夫关于俄罗斯人宗教气质的描述，对托尔斯泰个性中那些对立的极端倾向进行了令人信服的解读。参见罗莎蒙德·巴特利特：《托尔斯泰大传》，朱建迅等译，北京：现代出版社，2014年，第77页。

④ 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第169页。



佳道路：一条既主动吸纳现代世界主流价值、又能保存民族传统与经验，从而有效抵御进步风险的“平衡之路”。<sup>①</sup>这可以被视作作家的“理想纲领”。而如果说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索尔仁尼琴表现得远为偏激、强硬，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其“现实感”的发达而非思想上的固步自封——从苏联来到“铁幕”另一端的西方，他不无意外地发现了同样的现代性逻辑；而其晚年所见之新俄罗斯，不仅没有迎来自由派知识分子想象中的世界主义共同体，反而面临着更为严酷的外部挤压与内部分裂。正是在以异见者姿态与这些强势话语（它们也应被归入伯林所说的“权威”之列）进行对抗的过程中，索尔仁尼琴一路逃回了传统，形象也日益保守——这当然与他心目中的理想方案存在距离，但至少是比“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和“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要好的选项。而一旦环境稍有变化，索尔仁尼琴又往往忍不住往平衡点进行微调：其晚年针对东正教提出的种种改革意见，在更正统的信教者眼中不免充满“实用主义”的味道；而在与普京会面时，这位所谓的“国家主义”的支持者强调的却是，“国家的强大对于俄罗斯统一很重要，但国家的强大并不能给我们带来俄罗斯的繁荣。后者需要打开千百万人的嘴，让他们的嘴和他们的手都获得自由，可以安排自己的命运。”<sup>②</sup>这样的保守派其实已经很难被简单地划入“刺猬”阵营，而如果能保持对现实的敏感，对传统不断进行再创造，他们的主张也并不必然会导致伯林所担心的那种一元化灾难。

无论如何，俄罗斯特殊的文化与历史为以赛亚·伯林的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灵感；他也以价值多元主义者加自由主义者的特殊视角展现了一个充满冲突与活力，富有思想和精神深度的俄罗斯世界。而即使是其论述中那些“刺猬”式的不足，也与他“狐狸”的成功描绘一样，证明了这位思想家所倡导的对不同语境中的个体选择进行移情的、历史化理解的重要性。诚如伯林努力向 20 世纪的“劫余者”说明的，人性、人的思想世界与历史一样复杂难测，理想生活只能在不同文明与多种价值的艰难协商中不断接近。

---

①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1914年8月》，何茂正等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3卷，第643-728页。关于斯托雷平“平衡之路”的详细分析，参见龙瑜成：《巨石之下：索尔仁尼琴的反抗性写作》，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29-143页。

② Сараскина Л. И. Александр Солженицын. 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08. С. 874.

---

**【Abstract】** Due to the political catastrophe in Russia in the 20th century, Isaiah Berlin particularly stressed “negative liberty”, but meanwhile, the Russian culture had more complex effects on his thoughts. Russian special intellectual tradition led him into the field of history of concepts; while facing conflicts between pluralistic values and monistic demands, different choices, made by Russian thinkers in the 19th century, provided the best examples for Berlin to interpretate and give play to his own tragic value pluralism. He divided these thinkers into “foxes” and “hedgehogs” and fully empathized with “foxes” represented by Herzen, who cared about reality. Nevertheless, his excessive contempt towards Russian conservative thinkers also suggested his characteristics like “hedgehogs”.

**【 Key Words 】** Isaiah Berlin, Russia, History of Concepts, Pluralism, Liberalism

**【Аннотац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катастрофа XX века в России заставила Исайя Берлин обратить должное внимание на «негативную свободу», однако рус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оказала ещё более слож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его мышление. Особая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ая традиция России привела его в область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стории идей; однако сталкиваясь с конфликтом между многофакторными ценностями и унитарным призывом, разнообразные выборы, сделанные русскими мыслителями XIX века, предоставили Берлину лучший пример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и выражения плюрализма своих собственных трагических ценностей. Этим мыслители он поделил на «лис» и «ежей», и полностью сопереживал Герцену как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ю богатых чувствами реальности «лис». Однако чрезмерное неуважение к русским консервативным мыслителям также разоблачило его некоторые «ежиные» качества.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Исайя Берлин, Россия, история мысли, плюрализм, либерализм

---

(责任编辑 万青松)

## 想象的共同体： 斯拉夫派的民族主义文化意识建构\*

季明举\*\*

---

**【内容提要】**斯拉夫派是俄国19世纪上半叶思想本土化运动中一个醒目的集政治、哲学、宗教学、文艺美学、经济学、历史文化学于一身的重要思想理论派别之一。其民族主义文化意识的建构，以俄国国民性理论，即俄罗斯国民精神生活独特性探讨为基础，包括国家（含家庭）论述、宗教（信仰）论述，以及文化论述等若干部分，其中又以宗教论述为核心。斯拉夫派民族文化意识建构的实质，是对俄罗斯及俄罗斯国民作为生命共同体的民族主义想象。

**【关键词】**斯拉夫派 “国民性”理论 宗教信仰 民族文化意识

**【中图分类号】**D751.2;B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6)04-0050(30)

---

斯拉夫派（Славянофильство）是俄国19世纪（中叶前后）思想本土化运动中一个影响极为深远的，集哲学、美学、历史学、文化学于一身的重要理论派别。其根本特征是精神体验上的生命有机论思想和文化认知上的民族根性意识，其理论优势在于成功地将生命哲学这一西方直觉主义原则与俄罗斯传统宗教精神本质紧密结合起来，发展出了一种主体性的、具有浪漫主义

---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根基主义及其民族文化审美理论”（项目批准号：13BWW032）的阶段性成果。

\*\* 季明举，曲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特质的民族文化批评理论，从而为俄罗斯哲学、文化学、历史学、文艺学、美学带来了认识论新形式。斯拉夫派的俄国**国民性**（народность）理论，即他们反复论述的关于俄罗斯区别于西方（欧洲）的特殊国民性探讨，成为俄国在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回答民族精神和道德危机的基本依据。因此，考察斯拉夫派的俄国国民性论述，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认识和解读俄罗斯传统民族文化精神、俄罗斯思想（理念），以及俄罗斯屡屡发生的历史剧变和文化革新的有效视角。自斯拉夫派诞生之日起，同时代围绕斯拉夫主义的激烈论争，此后近一个半世纪里在历史的变迁中围绕斯拉夫派的各种南辕北辙的观点和误解，使得斯拉夫主义的理论面容变得模糊和飘忽不定。然而，俄罗斯、西方以及中国学界多年来对斯拉夫派持续不断的关注本身，以及俄罗斯社会文化的发展，印证了它历久弥新的理论生命力。斯拉夫派的俄罗斯特殊国民性论述作为一笔丰厚的遗产和文化资源，其魅力成为俄罗斯新时期（21世纪“全球化”时代）在维护文化完整性的基础上“重建民族国家、凝聚和振兴民族精神、抵御‘全球化’带来的文化‘非民族化’之威胁的精神支柱之一”。<sup>①</sup>

## 一、斯拉夫派的“国民性”理论

斯拉夫派的民族主义文化意识建构，以整体国民性理论即国民精神独特性的探讨为基础，包括国家（含家庭）论述、宗教（信仰）论述，以及文化论述等若干部分，其中又以宗教信仰论述为核心。斯拉夫派精神领袖霍米亚科夫在他的《世界历史札记》中给自己定下的一项任务，就是“表述一种与西方普遍人文理论迥然不同的理论”，即建立在非纯粹历史主义事实之上的（区别于黑格尔），符合“任何以人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sup>②</sup>的，由种族、家庭、国家、信仰、语言、文化等诸多元素组成的具体的人类文明类型学。按照霍米亚科夫的观点，人类文明是在统一语言基础上形成的特殊文化有机体，因此不存在普遍意义上的全人类文明之说。迄今为止，全部人类文明范

---

① 林精华：《想象俄罗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序言”，第9页。

② Хомяков А.С.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V. М.,1900. С.7.

畴（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都具有“国民、国家和信仰”<sup>①</sup>这三个基本指向，从而构成了一个有机完整的人类文明类型学系统。其中，人类文明的“种族”性（物性组合）与土地、亲缘、血缘、共同出身及语言等天然要素紧密关联，在文明系统中是最稳定的；文明“国家”，即“人们在自觉使自己的意志和自由屈从于政治利益和经济福利，或安全福祉的基础上结成的联盟”<sup>②</sup>，多少是一种假定性的，处于不断变动与重构之中。换句话说，国家是一种世俗性的，用来保护国民的共同利益、福利与安定生活的协约式工具，不具备永恒性；文明的“信仰”特征在具体的文明系统类型学阐释中最为重要。它包含着能够决定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最高的精神生活。正是信仰构成人内在生命发展的极限。因此，对国民精神生活进行研究的重要性要远远大过对国民物性世界研究的重要性。或者说，真正“国民性”文化认知需要实现从“物性世界”领域转向“精神世界”的领域。霍米亚科夫进而推定，国民精神是种族、土地、国家、信仰、语言等元素的交织体，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聚合体”：其中每一种元素对国民个性形成的影响程度都不一样，而宗教信仰在民族精神生活中占据着核心位置。

另一位斯拉夫派理论家 K·阿克萨科夫进一步用“国民”和国民的精神性论述来补充和完善霍米亚科夫的文明系统类型学说。K·阿克萨科夫认为，把“国民”理解为一个国家内部“建立在共同血亲、出身和语言基础上的群体联盟”，“这一定义是正确的，但是不够充分。这只是亲族、种族，而不是国民的概念”。亲族、种族还仅仅是“国民”的外在风貌即属于自然物性的部分；决定“国民”灵魂的是其内在的生命，或者说精神性。地理环境、人种、气候、风习等诸如此类的事实固然能够对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构成影响，但它们和“国民性”概念没有直接的关系。真正决定“国民性”本质的是国民在信仰中表现出来的完整的内在精神个性<sup>③</sup>。这也就是霍米亚科夫所说的，“历史批评家应当关注的第一个和最主要的对象就是民族信仰。如果从欧洲历史中抽掉了基督教，从亚洲历史中抽掉了佛教，那么，你对欧洲和

---

① Хомяков А.С.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V. М., 1900. С.8.

② Там же. С.8.

③ Эстетические и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воззрения русских славянофилов (1840-1850-е годы).С.81.

亚洲就完全无法理解。这个不争的事实以或大或小的力量在全世界所有时代不断地重复出现，人类文明程度、文明性质和文明起源都取决于信仰的程度、性质和起源。”<sup>①</sup> K·阿克萨科夫进一步阐释“国家”与“国民”之间的关系：“国民”是内在生命主体；“国家”则是强制的外部政治形式。“国家作为外在形式，能将各种不同的因素强力捏合在一起；国民则是生动、完整的统一体，不可能分裂为各种不同的元素。”K·阿克萨科夫的结论是：在极端情况下，“没有信仰的支撑，国民在纯粹的自然性（血亲）意义上有时会生长到兽性的地步；没有土地（地方）的自治，国家在人工意义上则可能会固化到极端抽象的程度。”<sup>②</sup>前者是生命的、天然的自发力量；后者则是机械和冥顽不化的理性专制势力。因此，不同国家的国民在精神个性、信仰、文明程度以及风俗风习上就会呈现出不同的历史文化风貌。

斯拉夫派宣称，要正确地理解“国民性”（国民性格）特点，就必须从民族历史独特性的开端出发，依照人类文明系统类型学立场来进行认识。霍米亚科夫相信，真正认识“国民性”，需要从一个民族的根基和历史的源头着手，国民作为鲜活有机体的“所有现在都能够在古代找到文明的依据”。没有“从新的社会秩序、新的界线、新的种族和信仰向旧的社会秩序、旧的界线、旧的种族和信仰”<sup>③</sup>的回溯性投射，要探寻国民精神的根基是不可能的。而古老的道德风习、神话与传说以及民间创作，作为一个民族的根基性内容存在于国民深刻的记忆里，因此有必要将非理性文化审美元素引入文明的类型学探讨，在“整合性”认知的基础上探寻国民精神的生命个性及其历史演变。霍米亚科夫高度质疑运用逻辑推定和理性分析研究“国民性”特点的可行性，甚至还提出了“认识历史需要诗的态度”<sup>④</sup>的有机论主张，表现出对西方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国民性”理论的拒斥态度。在建构起回溯性历史视野（视角）之后，霍米亚科夫开始具象化俄罗斯“国民精神生活”，将“国民性”的历史原型“家庭”作为“初始形象”来探讨。按照霍米亚科

---

① Хомяков А.С. Сочинения в 2-х томах. Том II .М., 1994. С.237.

② Эстетические и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воззрения русских славянофилов (1840-1850-е годы).С.81

③ Хомяков А.С.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V . М., 1900. С.22-23.

④ Там же. С.71.

夫的观点，“初民像是婴儿，初民的风貌无可争议地证明其来源于父母的类型属性。与此同时，如同婴儿的初民却带有一颗为自己所独有的、思考着的自由灵魂”<sup>①</sup>。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家庭”作为“国民性”的坚实堡垒不是生物自然意义（物性）上的概念，而是人们道德上的精神联姻。重要的是人们精神上的结合。换句话说，正是“家庭”而不是独立的“个体”构成了国民精神生活的基本单位，“家庭”是“国民性”的最基本细胞。霍米亚科夫曾借自己的小说《莫斯科郊外谈话》中主人公的口吻说：“我不相信一个对家庭十分陌生的人会爱上他的国民，而没有对国民的爱就不会有对全人类的爱”<sup>②</sup>。推而广之，霍米亚科夫认为“民族”这一概念的历史具象和“家庭”作为精神联姻的情况大体类似：一个民族的风貌无疑来源于人类存在的非凡完整性，但同时具有自己独有的精神个性和民族心理特点。“民族”的生成与发展是天然有机的，“不是机械的聚集，也不是算术的结果”，“人类大家庭不是某种抽象言辞，而是一项类型学意义上需要各个民族来完成的特殊事业。不然我们就无法理解埃及人何以建造起庄严的金字塔，腓尼基人何以酷爱航海，印度人何以痴迷于虚无哲学，中国人何以将管理作为一门艺术看待”<sup>③</sup>。霍米亚科夫宣称，每一个原始的民族（国民）都具有某种特殊的激情，特殊的激情构成民族精神生活的初始要素。民族的开端决定了其精神风貌，塑造了其广义的心理面孔。过去的生活遗留下的胚胎，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不会自行消亡，而是伴随着民族生活历史的始终。另外，根据民族天性的差异，霍米亚科夫将世界上的现有民族划分为“征服型民族”和“农耕型民族”两个类别。“征服型民族”在心理学意义上“具有情感个性上的傲慢与偏见，既蔑视被战胜的对手，也蔑视与其格格不入的事物”；“农耕型民族”则“不习惯将自我看作高于他人，具有全人类亲如兄弟的观念”<sup>④</sup>。这里霍米亚科夫显然对所谓“农耕型民族”充满了赞美与激赏，认为“农耕型民族”完全没有“那一发展出对外扩张、贵族等级制、妄自尊大以及蔑

---

① Хомяков А.С.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V. М., 1900. С.74.

② Хомяков А.С.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III. М., 1900. С.227.

③ Там же. С.70.

④ Хомяков А.С.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V. М., 1900. С.106.

视其他民族的心灵机制和气质”<sup>①</sup>，而是希望天下一家亲，善于和其他民族和平相处。不过霍米亚科夫认为，“农耕型民族”因为缺乏执着性格和征服欲望，常常会在外部压力面前妥协，会轻易“将自己的自由交出来，换成温顺的屈从”，且不善于进行自我管理和经营。“屈从和妥协往往是农耕民族的根本天性”，这使得“征服型民族”（外来征服者）“易于把他们看作胆怯听话的奴仆而忽视他们的个性”<sup>②</sup>。

在“国民、国家和信仰”这三个基本指向中，斯拉夫派的“国民性”论述特别强调“国民性”的独特民族精神涵义即宗教信仰在“国民性”问题上的核心地位。K·阿克萨科夫说，“信仰不是意见，不是关于人的理论。信仰使人成其为人。它是组成国民精神个性的唯一信念。没有信仰的地方就不会有真正意义的国民”<sup>③</sup>。霍米亚科夫认为，组成民族生活的本质和现象所具有的统一基础，就是精神的力量。用以说明民族生活现象的是认知理性，而用以说明民族生活本质的是信仰。前者是理性认知的范畴，后者则处于“理性思考的彼岸”，“是直接的、活的和绝对的知识”。“直接的、活的和绝对的知识”“应当叫作信仰”<sup>④</sup>。它作为整合式艺术性认知（有机思维），远远地高于通过理性分析途径所获得的知识。“信仰”在这儿是一种广义上的有机论，不仅仅限于宗教信仰方面，而是认知者对实在的直接加入，是与实在相融合的境界，即精神完整性的境界。民族生活、国民个性活生生的存在，不是通过抽象的逻辑理性，而是在信仰中凭借生命直觉来领悟的。在霍米亚科夫看来，“信仰”作为第一认识活动，显然是一种“内在知识”或者“活知识”<sup>⑤</sup>。如果承认民族现实生活是“精神想象”，那么依靠生命意志的内在驱动就可以得到“活知识”或如И·基列耶夫斯基所说的那种“活的，完整的理解”。而“国民性”认知正是建立在对“信仰”这一有机的“活知识”完整的理解基础之上的。因此，在霍米亚科夫的文明类型系统中，“信

---

① Хомяков А.С.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V. М., 1900. С.107.

② Там же. С.108.

③ Эстетические и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воззрения русских славянофилов (1840-1850-е годы). С.84.

④ 徐凤林：《俄罗斯宗教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8页。

⑤ 同上。



信仰”是个动态性的概念。它首先指的是鲜活的“国民的信仰”，“文明的程度、文明的性质即文明的起源都取决于国民信仰的程度、性质和起源”。基督教之所以在不同民族那里呈现出不同形式，就是因为初民的不同个性在后来的基督教认知中打上了不同的精神印记。这里，霍米亚科夫直接地将民间信仰和“官方信仰”对立起来，认为“宗教只有直接透过国民的生活观念，在历史的发展中才可以理解”<sup>①</sup>。“信仰”动态性的发展说明：就像不存在纯粹的国民一样，也不存在纯粹的信仰。“信仰”作为国民精神生活的表达具有一定的假定性和变异性特点。只有运用整合性的认识手段，才有可能对国民生活有机体的“活生生的存在”进行研究。另外，霍米亚科夫还认为“信仰”具有多维性，其“官方”的维度实际上远离了民间的维度，而信仰在其最初意义的表达上“不是别的，正是被信仰所遮蔽的民众舆论”<sup>②</sup>。因此，“信仰”与“国民”二者的相互作用是辩证法的：“上帝的个性多少与膜拜他的国民的个性相互呼应”<sup>③</sup>。不仅是信仰创造着国民形象，同时也是国民创造着他（国民）所需要的信仰内容。信仰既是国民生活历史的有机表达，同时正是丰富多彩的国民生活给了信仰以特殊的精神具象。

## 二、斯拉夫派的“国民性”论述

斯拉夫派之所以推出其“国民性”理论，包括对人类文明类型的划分、文明的根基性原则、“征服型民族”和“农耕型民族”的区分，以及信仰的民族性差异等等的阐释和论述，都是为了实现对俄罗斯及俄罗斯国民精神个性的民族主义建构。霍米亚科夫认为，就俄罗斯精神生活的全部生命潜力和认知特殊性而言，俄罗斯文明无疑是世界文明大家庭（文明系统类型学）中一个显要的、具有广阔复兴前景和发展优势的斯拉夫文化类型。俄罗斯民族的精神生活、历史文化道路及发展方式具有源自斯拉夫古老文化信念的天然性和自我生成性。因此，俄罗斯与西方（欧洲）的根本问题不是别的，正是

---

① Хомяков А.С.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V. М., 1900.С.154.

② Там же. С.199.

③ Там же. С.174.

一个文明类型学问题。霍米亚科夫宣称，斯拉夫人作为“农耕型民族”的心灵个性实质是没有西方式的“民族傲慢”，“俄罗斯人以自己是黑人汉尼拔的子孙为荣，而声言自由平等的美国人却拒绝给予黑人以平等的国籍，甚至拒绝娶德国洗衣工或英国伐木工的女儿为妻。……我们在欧洲大家庭中从来都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sup>①</sup> 他还把构成俄国人精神生活的心理元素归纳为：

(1) 没有对外扩张、贵族等级制、妄自尊大以及蔑视他者的心理机制；(2) 充满着率真、爱和善意，视天下一家亲；(3) 同情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发展的所有形式，易于和异族和平相处甚至接受外族统治<sup>②</sup>。K·阿克萨科夫断言，俄罗斯人“不是政治的国民，他们从来不起来为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利而斗争，他们是以追求内心生活和非尘世生活为己任的国民”。俄罗斯人同时也是“非国家性”的民族，他们“从来不神化政府，也不相信它的完美并要求它完美。……我们的罗斯是神圣罗斯……对国家和政府的兴趣永远是第二位的……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生命信仰的事业、是拯救灵魂的事业”。在K·阿克萨科夫眼里，俄罗斯人脾性温和、敦厚、顺从、敬畏上帝，“信仰是俄罗斯人的全部念头”，在民间（特别是下层民众中间）基于东正教生活的村社生活中，“保存着俄罗斯大地的完美”。他还经常使用“纯朴的国民”这一修饰语来形容俄罗斯人，并且断言，这一斯拉夫“纯朴性”在于俄罗斯人沉迷于宗教事务，“专心地信仰上帝、执着于上帝之爱的纯朴的俄罗斯庄稼人，从来不关心国家和政治权力的纷争”，“贵族打仗，农民种地”是天经地义的古老俄罗斯真理<sup>③</sup>。K·阿克萨科夫以罗斯邀请瓦良格人做大公和1613年选举沙皇的历史事件为例，来说明俄罗斯人的“非政治性”和“非国家性”，他们善良淳朴，敬畏道德，“宁愿把权力让给君主”而专注于自己的内在生活（信仰）。

斯拉夫派十分强调俄罗斯人对东正教的笃信，坚信在普通国民中拥有对纯洁道德灵魂的热烈追求，这是俄罗斯特殊“国民性”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甚至可以说，“纯洁的”东正教信仰在斯拉夫派看来正是俄罗斯人区别于西

① Хомяков А.С.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V. М., 1900. С.107.

② Эстетические и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воззрения русских славянофилов (1840-1850-е годы).С.83.

③ 白晓红：《俄国斯拉夫派》，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45-149页。

方人的根本精神标志。这一观点直接导致此后一个多世纪（沙俄时代和前苏联时期）多数研究者对斯拉夫派“国民性”观点的谨慎态度乃至理论上的误解：学界普遍断言，斯拉夫派至少在形式上是支持 19 世纪 30 年代乌瓦罗夫的“官方国民性”理论的，因此可被归为“贵族保守主义”抑或“反动民族主义、沙文主义”之列<sup>①</sup>。不过学界可能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东正教作为一千多年来生生不息的俄罗斯民族宗教，在俄国曾经长期深入人心，成为俄罗斯人的信仰基础和俄罗斯传统文化精神的一个象征。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广泛传播与推广，实现了以赤诚信仰和内在生命感悟见长的基督教非理性意念与俄罗斯本土多神教的万物有灵意识的有机交汇，对俄罗斯国民性格的养成与塑造具有直接的精神影响。尽管千年来东正教曾经深刻地影响着俄罗斯民族的这一“国民性”建构，但对东正教观念进行扎实的理论综合和体系建构却长期是个空白，一直都没有建立起完整的宗教有机理论。改变这种状况的任务就落在了 19 世纪那些宗教意识浓厚的世俗俄罗斯作家、哲学家和文艺批评家身上。在俄国，对东正教有机理论首先予以透彻诠释的就是И·基列耶夫斯基、霍米亚科夫、К·阿克萨科夫等斯拉夫派理论家。

И·基列耶夫斯基认为，俄罗斯与西方（欧洲）在“国民性”上的根本差异，是它们在基督化过程中所走过的不同道路。西方文明的发展及国民性格的塑形基于罗马帝国的律法传统：罗马人思想的一个共同点，是习惯于依靠逻辑思维和理性分析，逻辑概念的条理性与严谨性远远重于概念的现实性内容。西方基督教（天主教）遵循罗马法的传统，对“神圣律法”（基督戒条）进行了建立在理性认知基础上的形式化改造，使得教会统一归结为主教的外部统一，教会神圣性归结为教皇的无上绝对权威性，教皇成为上帝律法在人间的唯一正确的代言人。从教皇以下至主教、知事、神父直至普通信徒，构成了一个类似世俗封建官僚制度的等级森严的秩序，而赎罪的程度则被解释为信徒向教会外部利益（土地、不动产、金钱财物等）所做功德的多少。西方人的宗教生活把加入教会的形式放在首位，从世俗的外部标准来评价和规范道德行为，强制性的形式理性大于自足自律的精神生活。后来通过“宗教改革”发展出来的新教（抗议宗），宣称《圣经》为信仰的最高原则，不

---

<sup>①</sup> Сарычев А.Н. Проблема народности и критический реализм. М., 1975. С.219.

承认天主教会享有解释基督教义的绝对权威，强调教徒个人因信称义、信徒人人都可为祭司，可直接与上帝心灵相通。这样，在反抗天主教专制统治的同时，却陷入了极端个人主义的泥潭，更多地依靠神学家的逻辑和个体化的经文阐释来对“神圣律法”进行逻辑证明和任意自我推断，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伦理意识的一个标志。西方人的物质主义、商业精神、启蒙理性主义，以及妄自尊大、强权政治、双重标准等等，都与新教伦理有着不解之缘。而俄罗斯因为是在“幼年”接受基督教：不注重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而强调柏拉图灵魂主义的“古代智慧”经过拜占庭教父学的改造之后进入俄罗斯。拜占庭教父学则“致力于走超越理性分析之路，将对上帝存在的逻辑证明改造为具有道德自由的思辨”。拜占庭帝国的过早衰亡，使得希腊正教哲学没有出现西方经院哲学式的繁荣，但其思想遗产保存在了教父学的著作中，并随后转移到了为“第三罗马”的莫斯科。这一与西方不同的基督教传播途径，使得俄罗斯的纯朴心灵没有充分经西方启蒙理性主义的熏陶和规训，从不知晓“作为西欧发展之基础的个人独特性”。其宗教信仰的主要因素，“是内在的生命体验，是对教会作为爱的统一体的全身心融入，是使信仰成为其根本信念和真正的精神生命本身”<sup>①</sup>。

霍米亚科夫认为，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一个主要优势是没有过多迷恋、纠结于世俗的利益，保持了基督教义的纯洁性，不把教会看作信徒的外部性强制联盟，不从世俗外部标准来评价、规范信徒的道德行为，而是使其成员自觉自愿地深入到爱的共同真理之中。换句话说，俄罗斯“国民的东正教”是在建立在“自由与爱”的基础上的“精神有机体”，具有最大程度的包容性和整合性，其中既有集中统一，又有自由意志，是自由性和必然性的和谐统一。在《世界历史札记》中，霍米亚科夫进一步按照人类历史演进过程中的这一自由性与必然性、精神性和物质性互相对抗的原则（“自由与必然构成这样一种神秘本源，人的全部思想都以各种形式集中在这一本源周围”），把对国民性格的塑形起着决定作用的人类全部宗教划分为“库什特”精神类型的宗教（кушинство）和“伊朗”精神类型的宗教（иранство）这两种类

---

<sup>①</sup> 徐凤林：《俄罗斯宗教哲学》，第4-5页。

别<sup>①</sup>。具有“库什特”精神的宗教遵照必然性原则，要求人们无条件地绝对服从外部律条，使人成为他人意志和理念的简单、被动的执行者；相反，遵循自由性原则的“伊朗”精神类型的宗教，诉诸人的内心生活改造，尊重人自由选择善恶的权利（而非接受“福音”和“恩典”后的个体肆意妄为），相信人具有自觉融入教会统一体中的善的共同本源。霍米亚科夫宣称，原初基督教（“纯粹的基督教”）本来是一个遵循“伊朗”精神类型的、不诉诸外部必然性权威、既有统一意志又有自由精神的宗教，但之后天主教经院哲学大量融入亚里士多德逻辑主义和“库什特”必然性统治的因素，进而发展为近代的黑格尔哲学、启蒙理性主义、唯物主义等，从而丧失了基督教本初的精神自由和纯洁性。在教会大分裂之后，天主教和新教在解决自由性和必然性这一二律背反原则的过程中各自走向了理论的极端：前者强调绝对统一的圣教公会，特别是教皇不受节制的外部权威，趋同于外部理性强制式的集体主义，因而丧失了教会精神生活的个性因素，剥夺并吞噬了基督徒的个体精神自由；而后者（新教）在“正确拒绝了教皇权力之后”<sup>②</sup>，却走向了个人自由主义的极端。信徒沉浸于对个体权威的迷信，任意阐释甚至曲解“神的律法”，自我成为孤独、分裂的个体，其原本神圣的“信仰事业”变成了在接受“恩典”后的个人肆意妄为，自由中完全没有教会爱的统一。前者是“同而不知”；后者是“异而不和”。霍米亚科夫认为，天主教和新教虽然在基督信仰形式上存在着差异，但在寻求宗教真理之外的外部权威这一点上是十分相近的：在天主教中，这一外部的权威是封建君主式的教皇；在新教中，这一外部的权威是个人理性。天主教和新教都错误地歪曲了基督教的“纯粹教义”，陷入了功利主义和对世俗权力和利益，即“地上目标”的痴迷。而俄罗斯东正教则保持了基督教的“原始纯洁性”，继承了基督教原初的生命完整性和保障人们“认识绝对真理”的根本力量。因此，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人才具有信仰基督的自由精神世界，与“堕落的西方”相比，依然保持着天然纯朴的“共同性生活”。霍米亚科夫把这一东正教建立在爱、自由与善的根基之上的俄罗斯民族“共同性生活”真理阐述为“聚合性”原则。

---

① Хомякова А. С. 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вух томах. М., Том II. 1994. С. 188.

② 徐凤林：《俄罗斯宗教哲学》，第 27 页。

“聚合性”（соборность）与俄语中的动词“собрать”（采集）、名词“собор”（聚拢）、名词“соборня”（小教堂）为同根词，词根是“брать”意为“拿、取”之意。霍米亚科夫创造“соборность”这一概念，显然是受了表示信徒小型聚会、集会的“соборня”一词的启发，从中引申出一个具有抽象哲学意味的专有名词，以表达他对“统一、神圣和普世主义”的东正教教会会的理解。霍米亚科夫说，“会议、聚合这个词，不仅是指外部表现出来的那种看得见的集会、集合、在某个地点的集合，而是有更普遍的意义，它表达了多样性中的有机统一这样的理想观念”<sup>①</sup>。“聚合性”，指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躯体，是所有基督徒的统一体，不是沙堆式的简单的集合体，而是依靠爱来连接的、有生命的、自由的躯体，其活的本源是“神的互爱的恩典”<sup>②</sup>。在东正教会这个鲜活的“有机躯体”里，耶稣基督为头，而热爱上帝真理、沿着基督指引的道路追寻天国的众信徒为躯干。头和躯干和谐运动，共同在福音中成长，一起构成有机的、血脉相连的“生命共同体”。教会之外没有生命，教会这一信仰的“生命共同体”不仅不会泯灭信徒个性，相反会使得每个人充分享受爱的喜乐与自由，个体生命因上帝的福音和恩典变得更加丰盛。霍米亚科夫说：“教会是天上的父赋予了生命的有机体”<sup>③</sup>，“沙粒的确不能从它们偶坠其中的沙堆中获得新的存在”·“但取自鲜活机体的每一部分，都必是其机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将从该机体中获得新生命；人在教会中，在基督躯体中就是这样的，而爱则是基督躯体的基础”<sup>④</sup>。霍米亚科夫的意思是说，教会里因主耶稣的莅临和众信徒爱的聚集，成了神人的有机体，信徒们自愿聚集，依靠基督神秘的身体，享受教会怀抱里的温暖。基督以自己受难的躯体广为接纳天下的罪人，把他们揽入自己的爱的怀抱，使他们获救并准许他们分享自己生命的完美。因此，霍米亚科夫在《教会唯一》一文中把东正教会看作精神上自由的统一体，不屈从于任何世俗权力，也不受制于任何外部权威的拘束，而仅仅服从建立在热烈生命信仰和纯洁的爱的基础上的“聚合性”原则。其中，“聚合性”原则的第一个属

① Хоружий С. С. После перерыва. Пути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М., 1994. С. 18.

② Там же. С. 20.

③ 张百春著：《当代东正教神学思想》，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第55页。

④ 洛斯基：《俄国哲学史》，贾泽林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3页。

性是自由，第二个属性是有机体，第三个属性是上帝的恩典（福音）。爱与自由是“聚合性”的一个根本属性；有机性是“聚合性”的唯一完美形式；爱则是“聚合性”活的生命本源。一句话，“聚合性”原则是爱的自由统一原则，是聚而不迫，和而不同。信仰使众生得以相聚，爱使众生获得自由。这里，霍米亚科夫推崇非理性的生命体验和“信而立”的东方式思维方式，认为这是俄罗斯人的精神纯洁性未被西方工具理性、物质主义和商业文明所污染的集中表现。为此，他还专门将具有“聚合性”特征的东正教与西方天主教、新教作了严格的理论区分：西方天主教只有强迫的、外在形式的统一而没有个体的自由；西方新教则只有放任的自由而无整体的统一，换言之，天主教是集体僵死的，新教是个人堕落的，二者都失去了共同的爱和信仰。只有东正教尚完整地保存着真纯朴素的有机统一，才享有鲜活生动的精神生命。这是对俄罗斯“国民性”及其精神实质的典型的斯拉夫主义解读。

霍米亚科夫是俄国东正教的崇拜者。按照别尔嘉耶夫的话说是“第一个真正按照东正教方式进行思考的人”、“第一个世俗的神学家”<sup>①</sup>、独特的俄罗斯宗教哲学的奠基人。他所热烈鼓吹的“соборность”原则，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俄罗斯古老传统文化精神的影响。他因此经常又把“聚合性”原则与“村社主义”原则联系起来。村社（община）是俄国古老宗法社会生活和经济组织形式，又名“米尔”（мир）公社，土地、财产归农村公社所有，但由个人来分享和耕种，享受劳动的果实，是一种自由的组合。村社的日常生活由德高望重、体恤下层的长老负责。长老通过召集“地方议会”（земство）所通过的决议来约束村社社员，但不强迫遵守。除此之外，村社还负责与教会一起担负着维护良好道德风习的责任，其内部成员之间关系融洽，性格温顺，信仰虔诚。另外，“村社”这一社会组织形式又与长期作为俄罗斯“国民性”坚实堡垒的宗法式“家庭”极为类似：相比村社，俄罗斯宗法式家庭是比村社更小的社会组织单元，家庭里的大家长就是关爱家庭幸福、享有崇高道德威望的父母或祖父母。他们向上帝承诺严格遵循家训家规，保障家庭成员的经济生活、安全、福祉和权利。家长通过召开内部家庭会议来对重要问题作出决定，约束、管教家庭成员来维持既和顺宽松又井井有条的家庭伦

---

① Бердяев Н.А.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Судьба России. М., ЗАО «Сварог и К», 1997. С.137.

理秩序，其内部成员之间相互平等，互相帮助，共同实现着“家庭团结，事业兴旺”的生活理想。

这里，作为俄国古老宗法社会组织形式的“村社”，以及作为俄罗斯国民最基本社会单位的“家庭”，显然与霍米亚科夫所鼓吹的“聚合性”东正教会具有某种道德生活和交往原则上的一致性。这里需特别指出的是：无论是“村社”还是“家庭”，在霍米亚科夫的俄罗斯“国民性”阐释系统中都不是自然意义（物性）上或社会组织意义上的概念，而是指俄罗斯人在道德基础上的自由精神联盟。这里重要的是，每个具体俄国人之间在精神意义上的有机结合而不是社会群体性的外在的一致性。罗斯古老“村社”式的国民自治原则和“家训”式宗法传统，后来延伸出了俄罗斯民族个体与群体间和谐共处的“村社主义”精神，又被称为俄罗斯国民内心根深蒂固的集体主义意识。就对国民完整性“精神生活”的热烈期待和关注而言，俄罗斯这一由敬畏道德、兄弟挚爱、虔诚敦厚而又古朴温馨的家庭、村社、教会、国家（由小到大）所组成的鲜活有机体，无疑是斯拉夫派心目中的精神乌托邦（牧歌田园）。斯拉夫派知识精英对俄国古老村社主义和“家训”式宗法家庭美德一直抱有诗意般的留恋。他们正是受到俄罗斯“村社”和“家庭”概念中传统社会观念的启悟，并使之与东正教有机整合思想相结合，从而创造出了能够完整阐释俄罗斯特殊“国民性”特点、既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又具有深刻信仰伦理的东正教有机理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斯拉夫派“国民性”问题阐释系统中的“聚合性”原则，以及与此相关的“村社主义”论述、宗法家庭美德思想，都是基于民族“共同性生活”的观念，并没有给西方意义上的独立的“个体”或“个性”留下位置。不论这一独立的“个体”“或”个性“是什么样子的。就国家这一政治概念而言，霍米亚科夫一方面承认沙皇专制制度（самодержавие）是俄罗斯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合理形式，另一方面又拒绝把具体历史人物看作国民的完全代表。“无论是亚历山大、凯撒，还是俄国的彼得或者德意志的弗里德里希皇帝，都不具备完整性。他们不过是在一定历史时期满足了国民的部分共同愿望和需要”<sup>①</sup>；就“村社”精神而言，霍米亚科夫强调的是一种俄罗斯古老社会组织形式的和谐包容性，而不

---

<sup>①</sup> Хомяков А.С.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III. М., 1900. С.270.



是村社社员个人的自我追求；在俄罗斯“家庭”美德的诠释中，霍米亚科夫激赏的是宗法制家庭中子女对父母和长辈的顺从和孝敬，而非家庭成员间的绝对权利平等，以及出自个人欲望的个体性叛逆。个人行为、个人力量、个人愿望抑或个人事业，在俄罗斯家庭生活、村社组织、东正教会以及“专制”国家生活中居于次要的地位。个体的价值只有在“共同生活”中，遵照霍米亚科夫所说的“聚合性”原则才能够体现出来。换句话说，在俄罗斯民族“共同生活”中，不存在西方独立和孤独个体意义上的个人价值或个人设计（算计）。在斯拉夫派学者看来，西方“国民性”新教伦理、启蒙理性、物质主义和资本主义个体精神正在日益走向“市侩式”破产，就是对俄罗斯“国民性”优势的一个最好明证。

基于文化意识建构上的民族主义立场，斯拉夫派的理论家们都普遍相信，与“年轻的俄罗斯”相比，“衰老的欧罗巴”已经耗尽了自己的生命潜能。俄国最具哲学头脑的И·基列耶夫斯基通过对西欧文化和俄罗斯文化基础存在根本差异的分析，得出了“生命的”俄罗斯优于“理论的”西方的独特结论，宣称与俄罗斯人的天性不同，西方人最为擅长的是理性分析、概念的外部联系、三段论、抽象逻辑推定、思维的定律等等，“在他们那里，全部的知识都依赖于思维对象的形式发展，全部的意义都被思想的可表达方面所吞没”，结果“无论是对精神生活的活的、完整的理解，还是对自然活的和无偏见的直觉，都同样地被赶出西方思维的固定范畴之外”<sup>①</sup>。在西方思想史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充满形式概念推理，即“思维的最无关紧要的方面”；基督教经院哲学的大厦首先关注的不是信仰的问题，而是僵化理论体系的分析和建构，抽象理性优先于生命直觉；近代以笛卡尔和培根为代表的启蒙理性主义哲学，“以公正无私的理性力量证明世界上没有任何真理”；康德哲学不过是为确认“对于纯粹理性来说不能存在任何关于最高真理的证明”；费希特神秘理论体系力图通过“三段论”方式，证明“全部外部世界都只不过是虚假的幻象”；谢林的“世界灵魂”不是别的，正是源自新教伦理的那个“为了认识到自己的个体身份而在宇宙中发展的人的自我”；而在老黑格尔那里，依靠大小逻辑思维推断出的“绝对精神”达到了最后的自明

---

① Киреевский И.В.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1. М., 1911. С.195.

性和终极了断<sup>①</sup>。И·基列耶夫斯基由此断言，“腐朽的”西方“已经再也不能按照自己的抽象理性道路发展了，因为它落入抽象片面性的陷阱，再也无法为自己开辟新的道路。而俄罗斯的“东方”在追求真理的时候所关心的，首先是思想者精神内在状态的正确性，为认识完整的真理而寻求理性的内在生命，将超越理性的精神的各个元素“融合为一个活的高级的统一体”<sup>②</sup>。在俄罗斯，“基督的宗教还较为纯洁和神圣”。在这里“尚生存着建设性的知识原理和基督教哲学”，还具有按照宗教的完整性精神进行生命创造的几乎所有可能性。信仰的“神圣真理不能被通常的理性主义想象所领悟，而要求更高的、精神的视力，这种视力不是依靠外部哲学知识而获得，而是依靠存在的内在完整性”，即“活的、完整的理解”<sup>③</sup>。具有虔诚信仰的俄罗斯人在民族天性上具有超凡的“精神视力”。И·基列耶夫斯基 1851 年在给科舍廖夫的一封信中写道：“东正教俄罗斯精神将取代德意志精神而深入到我们的全部信念和活动之中。”<sup>④</sup>

霍米亚科夫与И·基列耶夫斯基在“俄罗斯与西方”这一思想命题上持相同的观点。他认为，在“国民性”精神的建构方面，俄罗斯区别于西欧的是二者信仰上的不同：“俄罗斯的基础是东正教信仰；西欧的基础是天主教信仰。理性主义，这个西方的致命之罪，已经蕴含在天主教中。在天主教的经院哲学中就应有理性主义和必然性统治的因素了，在其中可以找到近代欧洲理性主义、黑格尔哲学和唯物主义的源泉。没有沾染上理性主义之罪的俄罗斯应当告诉西方自由的奥秘。”<sup>⑤</sup>霍米亚科夫根据民族在天性上的类型学差异，将西方（继承罗马帝国衣钵的欧洲各民族）归入“征服型民族”，将东正教的俄罗斯归入“农耕型民族”。他宣称西方“征服型民族”在心理学意义上“具有情感个性上的傲慢与偏见，既蔑视被战胜的对手，也蔑视与其格格不入的事物”；而俄罗斯作为“农耕型民族”则“不习惯将自我看作高于他人，具有全人类亲如兄弟的观念”。这里，霍米亚科夫对作为“农耕型

---

① 徐凤林：《俄罗斯宗教哲学》，第 6 页。

② 徐凤林：《俄罗斯宗教哲学》，第 5 页。

③ Киреевский И.В. Критика и эстетика. М.,1979.С.320.

④ Киреевский И.В.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1. М., 1911. С.253.

⑤ Бердяев Н.А.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Судьба России. М.,2000. С.39.

民族”的俄罗斯极为欣赏，认为俄罗斯在其发展历史上完全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发展出个人扩张、贵族等级制、妄自尊大以及蔑视其他民族的心灵机制和气质”，而是充满真实的爱和善意，视天下一家亲，善于和其他民族和平相处。崇尚“因信而立”的俄罗斯，在天性上与“聚而不和”、纷争不断的西方相比，具有更广阔民族复兴前景和发展优势。不过，霍米亚科夫认为俄罗斯人作为独特“农耕型民族”，因缺乏执着性格和个人征服的欲望，常常导致在外部压力面前妥协和让步，会轻易交出自由以换取温顺的屈从。俄罗斯人不善于进行自我管理。因为忍耐、屈从和妥协往往是农耕民族的天然本性，这使得那些胜利者和外来征服者（比如古罗斯时代被邀请来做大公的瓦良格人、中世纪依靠武力征服罗斯的蒙古人以及近代崇尚殖民扩张和海外拓展的欧洲人）倾向于把俄罗斯人看作奴仆而忽视了他们的精神权利。这一友善却耽于幻想、情绪化、并且不善于自我管理、易于屈从、具有妥协性国民性格，后来被别尔嘉尔夫概括为“俄罗斯的村妇性”和俄罗斯民族个性上的“黑葡萄酒气质”<sup>①</sup>。

K·阿克萨科夫认为，不同国家的国民在精神个性、信仰、文明程度以及风俗习惯上就会呈现出不同的历史风貌。而真正决定一个国家“国民性”的根本元素，是国民在信仰中表现出来的“完整的精神个性”。俄罗斯国民作为俄国历史发展的主体，性格温顺、虔诚，千百年来一直笃信东正教，易于沉溺在自己的内心生活之中。俄罗斯国民的全部念头就是思考诸如“拯救一得救”这样的末日论问题，不太关心来自俗世（外部世界）的那些形而下的日常性时务。K·阿克萨科夫将俄罗斯的“国民性”阐释为“非政治性”和“非国家性”（“权力归国家，舆论归国民”）<sup>②</sup>，认为这一性格特点正是俄罗斯人相对于关注个人物质利益、陷入俗世纷争的“俗气的西方人”而具有的一大精神优势。俄罗斯国民“从来不把胜利的成果归功于自己，而总是将其归结为上帝的意志，他们永远赞美上帝，……以祷告上帝、建筑教堂为荣。……俄罗斯国民以宗教（信仰）精神而非理性精神来感知世界”，西

---

① 《俄罗斯灵魂——别尔嘉耶夫文选》，陆肇明、东方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31页、50页。

② Ранис словянофилы. М., 1910. С.95-96.

方那一“败坏了的理性没有进入它的性格中”，俄罗斯人“渴望体现良知和保持精神自由的共同性生活”，长期保持着信仰的虔诚和道德的敬畏。俄罗斯国民的历史是世界上唯一的“不仅就信仰，而且就自己的生活，至少就自己的生活追求来说，都算是基督的国民的历史”，是一部“普遍忏悔”的历史。读俄罗斯国民的心灵发展历史，“犹如读一本使徒行传”<sup>①</sup>。K·阿克萨科夫 1859 年在《同义词经验：公众与国民》（*Опыт синонимов: Публика-народ*）一文中区分了“公众”（публика）和“国民”（народ）两个同义词概念，宣称只有作为基督教民典范的“纯朴的俄罗斯国民”才有资格被称作“国民”，而西方国家的民众因个人主义、小市民气、商业算计和追名逐利等性格特征，只能被叫做“公众”。西方没有“国民”，只有“公众”——缺乏道德信念、沉溺于个人眼前利益和政治上争权夺利的一些人。俄罗斯就其原初信仰和生命全貌，本来应该没有“公众”，只有温顺、虔诚、紧紧跟随基督脚步的“国民”，但俄罗斯国民的纯洁性在彼得大帝“全盘西化”式的改革（K·阿克萨科夫称之为“模仿的故事”）之后遭到损伤，社会上层出现了一批“俄罗斯的欧洲人”，即西方意义上的“公众”：他们处处模仿西方的时尚、举止、语言和思想，成为失去自我精神灵魂的所谓“俄罗斯的西方人”。只有在俄罗斯下层国民（农民）中间，在基于东正教的村社或宗法家庭生活中，还完整保存着能够对抗西方物质文明的俄罗斯永恒民族道德理想。K·阿克萨科夫在这篇政论文章中针对那些在西方面前顶礼膜拜、亦步亦趋的俄国“公众”（“伪俄罗斯人”）给予尖刻的嘲讽：

“公众抄录那些来自海外的思想与情感，玛祖卡舞和波尔卡舞；国民从本土源泉汲取生命的力量；公众说法语；国民说俄语；公众穿德国服装；国民穿俄国服装；公众追逐巴黎时尚；国民遵循自己的习俗；公众呼呼大睡的时候，国民早就起来干活了；公众醒来用皮鞋敲击着洋地板，国民睡觉后又开始去干活了；公众鄙视国民，国民宽恕公众；公众存在不过百余年，国民久远的历史无法计算；公众是暂时的，国民是永久的；公众里有金子也有污泥，国民中间也有金子和污泥，不过公众是

---

① 白晓红：《俄国斯拉夫派》，第 144-145 页。

污泥镀上一层金，国民是金子外面一层泥……。<sup>①</sup>

在所有的斯拉夫派理论家中，K·阿克萨科夫是最具有政论激情和批判精神的。赫尔岑说他“为了信仰可以毅然走向广场，可以上断头台，只要觉得这么做有必要，他就会变成一个激情燃烧的布道者。”<sup>②</sup>如果说И·基列耶夫斯基、霍米亚科夫等人对西方现代文明大多抱持批评的态度，K·阿克萨科夫则对西方现代文明及其“危害”抱有最为深刻的敌意。他针对西方和俄罗斯“国民性”的所谓“公众”与“国民”的概念区分，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甚至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情绪。在他身上，对西方理性主义的敌视和对俄罗斯传统文化精神的钟情常常交织在一起，并呈现出狂热得近乎病态的特点。他1848年在给友人的信中说：

“西方正在走向瓦解，西方的虚伪开始暴露，很明显，它选择的道路导致了什么样的病症。我很高兴伪善被揭露出来。难道现在俄罗斯还想抱持与西方的联系吗？不——我们社会与西方的一切联系都应当停止……。我们的民族性（国民性）是平静和安宁的可靠保证。我们有另外的道路，我们的罗斯是神圣的罗斯……。您知道，正如我一贯反对西方潮流那样，我现在更加反对它。与西欧分道扬镳——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一切。”<sup>③</sup>

在斯拉夫派的俄罗斯“国民性”论述中，与激情洋溢的K·阿克萨科夫相比，酷爱沙龙辩论的霍米亚科夫反倒显得理性、冷静得多。针对彼得大帝“全盘西化”改革之后俄罗斯国民整体在信仰上出现两极分化的现实，即俄罗斯贵族上层接受了西方文化和哲学，在信仰领域越来越呈现出西方启蒙理性主义的单向度抽象性，而在民间（村社农民）则依然保留着以反正教信仰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并且“发展出一种近乎粗野的物性宗教生活形

---

①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взгляды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славянофилов (1830- 1850 годы). С.164-165.

② Герцен А.И.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ти томах. том 9. М., 1959. С.163.

③ 白晓红：《俄国斯拉夫派》，第144-145页。

式”，从而形成俄罗斯国民精神生活带有“双重性”的两元分化的现象，霍米亚科夫认为，这是由于俄国内部文明程度及精神个性发展的不均匀和不平衡造成的。当下（彼得大帝改革之后），构成俄罗斯“国民性”实质的信仰出现向两个阶层的游移和分化，进而“社会上层走向对思想、知识、理性分析的膜拜；民间则走向了拜物教”<sup>①</sup>，只是俄罗斯社会发展的一个短暂的阶段性现象。“科学拒绝放弃自己的傲慢，它感到自己就是伟大西方的最优秀成果；生命（信仰）也拒绝因此而放弃自己的执着，因为它感到自己是伟大俄罗斯的创造者”<sup>②</sup>，但拥有天然精神包容意识的“俄罗斯国民下层并不排斥科学，如果科学符合它的情感天性”<sup>③</sup>。因为认同普天下亲如一家的俄罗斯“国民性”正是全人类精神的生动体现。霍米亚科夫为俄国当下出现的“两元分化”局面开出的药方是：消除科学的人为性，增加科学的生命元素，使其接近俄罗斯国民的天性。也就是努力恢复俄罗斯现代生活中那一为彼得大帝“全盘西化”改革所扭曲了的本土始基、原初本性以及正教信仰的“纯洁性”。俄罗斯从西方接受的“科学”（西方文明成果）具有某种“殖民主义性质”，但俄罗斯民族的“历史、习惯、记忆、对自己土地的热爱、以及与本土生活的联系，并没有失去作用。这些俄罗斯国民生活的‘遗产’注定会促使我们的文化、艺术、日常生活等方面产生良好变化。因为我们本土的事物并未死去，并非显得那么软弱无力，并非注定不会结下果实”<sup>④</sup>，而实现了本土化文化改造的“科学”正是俄罗斯真正实现现代化的标志。一个消除了“两元对立”的、完整的、只属于俄罗斯人自己的“文明一定会出现在国民生活的具象中”<sup>⑤</sup>。与K·阿克萨科夫的激烈民族主义情绪不同，霍米亚科夫并没有走向“国民崇拜”或对俄罗斯宗法性村社生活的理想化，而是强调在未来俄罗斯本土优秀文明的发展中“国民精神”的巨大作用。他断言，俄罗斯人就其生命信仰天性而言，不仅不会排斥全人类性，还会充分发扬斯

---

① Хомяков А.С.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V.С.214-215.

② Хомяков А.С.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I.С.23.

③ Эстетические и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воззрения русских славянофилов (1840-1850-е годы). С.85-86.

④ Хомяков А.С.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I.С.24.

⑤ Там же. С.27-28.

斯拉夫民族“天下亲如一家”的古老观念，将容纳、接受一切其他兄弟民族的事物并保证其自由、自然地发展。须知个体一旦离开国民，也就意味着脱离全人类。全人类性只有透过具体的“国民性”的棱镜才能为国民所正确认知。因此，“人越是充分地属于本民族，他就越能够为全人类所珍视。”<sup>①</sup>这里霍米亚科夫要表达是：当下“我们（俄罗斯人）不能够完全领会自己，是因为我们视自己的国民‘精神’如敝履，把自我变成了他者。而我们的国民性迄今尚未说出自己的新话语”<sup>②</sup>，不过这一俄国伟大民族复兴时刻的到来是完全可以预期的，“俄罗斯这艘大船注定要远航”（布洛克语）<sup>③</sup>。

### 结语：想象的共同体

斯拉夫派的文明系统类型学理论推翻了在俄国学界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欧洲中心主义文明史观，重新反思了诸如理性、进步、逻辑分析、规律等西方流行的历史文化观念，其中最引人注目还是对俄国国民性的斯拉夫主义式的赞美。按照霍米亚科夫本人的理解，俄国“国民性”实质上是一种建立在团契共生、兄弟团结基础上的有机的“聚合性”。它包括了生活的完整民族性，即体现有机整体的、富有丰富生命力的民族共同生活；道德理想的全人类性，即倾向于视各民族为平等的伙伴和兄弟，追求和谐、圆满，“天下亲如一家”的全人类意识。斯拉夫派这一俄国“国民性”论述，与充满生命意识的俄罗斯传统民族文化认知方式和民族思维方式有着某种密切的精神关系。针对俄罗斯传统民族文化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K·阿科萨克夫曾经夸口说，“俄罗斯人生性豪放，法律原则的狭窄形式怎么能够容得下我们关于真理的联想”<sup>④</sup>。“白银时代”的新宗教哲学家弗兰克，对俄罗斯人的整合性思维方式有过一段精彩的斯拉夫派式论述：

---

① Хомяков А.С.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III. М., 1900. С.227-228.

② Эстетические и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воззрения русских славянофилов (1840-1850-е годы). С.89.

③ 布洛克：《知识分子与革命》，林精华、黄忠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162页。

④ 弗·索罗维约夫等著：《俄罗斯思想》，贾泽林、李树柏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1-92页。

“我们在思考生命及其意义的时候，必然会把生命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我们个人的短暂生命不是偶然的片断，而是与整个的世界生命融为一体，——这种‘自我’和世界二者统一起来应当被看作是一种超越时间的、包容一切的整体，我们所追问的就是关于这个整体：它有无意义和它的意义何在？”<sup>①</sup>

按照弗兰克的理解，俄罗斯文化思维是以生命天性和内在直觉为其内核的，对生命信仰本质的虔诚信奉和有机彻悟，构成了俄罗斯传统文化精神的“民族魂”。在这一文化模式中，思维的抽象性被克服和超越：俄罗斯人不是用刻板的工具理性认识现实，而是转向直觉，以鲜活的直感、意志、信仰去认识真理，即“透过梦想的薄雾直观绝对者”<sup>②</sup>。弗兰克坚信，与西方世界关于生命现象的理性主义外部规律性学说不同，“俄罗斯人有另外一种心理学，它不是从外部，从感性的世界现象来研究，也就是说，心灵体验不是表现为冷静的旁观者，而是进行体验的‘自我’。”这种内在的生命把握，即从内向外的方向研究，体现为心灵深层次的完整“自我”。“存在的完整生命感受，是典型的俄罗斯本体论的实质”<sup>③</sup>。“白银时代”的另一位新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也宣称，“俄罗斯的问题就是统一、完整与和谐的问题”，“俄罗斯思想就潜伏在文艺批评的形式下，俄罗斯的政论批评家们一直大力宣传完整性的世界观，一直把真理和正义结合为一体，一直担任的是生活的教师”<sup>④</sup>。别尔嘉耶夫还认为，“俄罗斯精神结构的生命基础有两种相互对立的因素：自然的、语言的、狄奥尼索斯的力量和虔诚禁欲主义的僧侣的正东教，……而在俄罗斯民族自发势力（стихия）中一直存在着，迄今仍保

---

① 弗兰克：《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徐凤林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168-169页。

② 弗·索罗维约夫等著：《俄罗斯思想》，第91-92页。

③ 弗兰克：《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第17页。

④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的宗教阐释》，邱运华、吴学金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35页。



持着酒神的、狂热的因素”<sup>①</sup>。可见俄罗斯民族文化认知模式的基本特征是生命有机性的，它以宗教（东正教）生命信仰作为其精神支柱，以各种非理性主义观念，诸如认知观念、价值观念、审美观念等为客观实在具象，由此建构出独特的民族伦理形象和直觉思维图式，其主体性思维特征必然呈现为聚向性、整合式生命意识架构，与西方偏重抽象推理的工具理性毫无共同之处。它和现实生活本身一样，“是有有机生命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它使得无意识的创造变成了有意识的创造。”<sup>②</sup>这种独特的民族文化思维图式可称之为主体性认识范型，即霍米亚科夫所说俄罗斯人生命天性中“聚合性”的天然静观态度。

斯拉夫派的俄国“国民性”认识路径与俄罗斯传统民族文化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和历史同构性。按照И·基列耶夫斯基倡导的“活的、完整的理解”，西方的理性分析不能‘完整地’把握事物，只有俄罗斯式的天然生命直觉才能够整合性地反映现实生活，因而民族真正的“国民性”精神个性显示，应当是民族“心灵的思想”而不是“头脑的思想”的有机综合表现。来自“心灵的思想”显然要高出来自“头脑的思想”，比“头脑的思想”在民族文化审美意识上有更大的认知优势，因为精神完整性只有在心灵中才能找到，只有凭借直觉才能够把握。正是基于这一有机“国民性”立场，作为两种不同文化范式的“俄罗斯与欧洲”这一“东西方命题”，才成为斯拉夫派集中关注的核心问题。斯拉夫派学者们普遍相信，基于生命感悟的俄罗斯传统文明和擅长于理性分析的西方现代文明相比，具有建设性的精神优势和心理优势。在当下俄罗斯与欧洲的历史性较量中，如今能和欧洲抗衡的，唯有信仰纯正的俄罗斯民族。在俄罗斯与欧洲这场历史性较量中，胜利最终必定属于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整个东方斯拉夫世界，因为俄罗斯文明属于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富有生命整合前景的“农耕型”斯拉夫文明类型。俄罗斯人紧跟基督，笃信上帝，将终极的生命救赎看得高于世俗的一切，这与陷入政治利益纷争和商业主义的泥潭、处处散发着令人厌恶的“铜臭气”、

---

①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基本问题》，雷永生译，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3页。

② 奥夫相尼科夫：《俄罗斯美学思想史》，张凡琪、陆齐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16页。

精于算计的“小市民气”的西方人形成鲜明的精神对照。一个实现“整合”的俄罗斯（生命）比一个处于“分裂”状态的西方（理论）更具有文明发展的远景。抛开文化民族主义立场，斯拉夫派的这一俄罗斯“国民性”论述，其实充满着他们对本土民族文化生命有机图景的热烈向往和对欧洲大陆理性主义的深刻怀疑。他们所谓“与西方相比俄罗斯占据精神优势”的论断无疑是民族主义的，但却是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而非政治学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因此指责斯拉夫派具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倾向”<sup>①</sup>，至少在理论判断上是不准确的。

斯拉夫派的俄国“国民性”立场强烈反对西方理性分析式的硬性社会阶层区分，认为真正的“国民性”不能仅仅按照欧洲启蒙理性主义角度，机械分割式地把精神性的“国民”整体理解为市民阶级式的“公众”概念，而应该按照“俄罗斯方式”（по-русски）强调“国民性”原初的、历久弥新的“生命共同体”含义。针对彼得大帝改革之后，特别是19世纪中叶前后，俄罗斯与西方处于激烈的文化冲突、交流、相互碰撞状态的现实，斯拉夫派理论家们一致认为，俄罗斯原初纯洁的民族“有机体”在新时期遭到了扭曲和破坏，原本作为统一“国民性”整体的上流社会和下层民众之间出现了巨大的精神分野和阶层分化，俄国成了“泥足巨人”：一个外强中干的庞然大物（欧洲人首先用“泥足巨人”来讽喻叶卡捷琳娜时代的沙皇俄国）。霍米亚科夫清醒地看到，“西化”了的俄国贵族知识上层在精神信仰领域越来越呈现出西方启蒙理性主义“单向度的抽象性”，而尚未受到西方文明浸染的俄国民间（下层国民），则依然保持着“一种近乎粗野的物性宗教生活形式”，进而形成俄罗斯民族精神生活上的“大分化”现象。因此，如何消弭横亘在俄国上层社会和下层民众之间的巨大精神鸿沟，实现知识分子向国民的靠近与回归，就成为19世纪包括斯拉夫派在内的各个理论派别所热烈关注的现实话题。从对这一现实话题的理论探索看，斯拉夫派大概是俄国思想史上最早关注到“知识分子与民众”间的疏离关系，并力图寻找消除这一疏离关系的理论派别。而与斯拉夫派派别相抗衡的西方派（特别是别林斯基的激进西方派）则具有文化价值上清晰的欧洲向度。他们相信通过理性启蒙抑

---

<sup>①</sup> Сарычев А.Н. Проблема народности и критический реализм. М.,1975. С.219.

或剧烈的“外科手术”式革命与社会变革，彻底融入欧洲文明，是俄国走向现代化、消除社会分裂、实现国民精神整体进步的唯一正确途径，除此之外别无他途。斯拉夫派则拥有与西方主义迥然相异的“整合”式文化价值向度。他们不断宣称，弥补俄国朝野、上下层国民之间的巨大精神分野，不能依靠在理性主义中几乎“耗尽了生命潜能的欧洲”，而是要依托历久弥新的俄罗斯民族文化传统，即俄国“国民性”相对于西方“国民性”来说在信仰上所具有的生命“聚合性”特质——未来俄国的所有美好前景都取决于这一近千年来难以割舍、作用正日益彰显的完整精神力量。这里，立足本土文化根基的斯拉夫派显然比全身心生活在欧洲镜像里的西方派有着更大的哲学深度。须知民族精神传统是割不断的，它跟现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过程中，其最扎实的根基就在它的“国民性”精神传统里面。所以，承载着文化积淀的传统绝对不是实现现代化的阻力，而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保持自己思想自信与从容，阔步迈向灿烂未来的最有力精神支撑与保障。在这一点上，斯拉夫派的俄国“国民性”论说具有长远的历史意义。

不过斯拉夫派的“国民性”认知在历史考据学意义上并非就是事实，或者说，这只是霍米亚科夫、И·基列耶夫斯基、К·阿克萨科夫等斯拉夫派理论家们想象中的心理学事实，与俄罗斯民族千年历史文化发展的实际进程并不一致。当代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在其著名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1983）一书中提出了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的观点。根据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分析，一个民族的诞生与发育并不就是天生而来的事实，而是被那些民族精英知识分子们十足地想象出来的“心理事实”，当中关键性要素在于他们作为“想象的主体”是否自认为彼此“具有共同血缘、祖先、历史、文化”，是否通过“想象认同”虚构出一个宗教般的、友爱互助的共同体。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所谓“想象的共同体”理论看，斯拉夫派的俄国“国民性”论述，会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比对话题：И·基列耶夫斯基热烈鼓吹俄罗斯民族作为天然有机体的“完整精神性”（целостность духа），断言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富有终极拯救前景的特殊民族，负有实现全人类兄弟

般团结的弥赛亚使命。霍米亚科夫宣称，俄罗斯文明是基于“纯洁”生命信仰的东正教“聚合性”原则，由统一的斯拉夫种族、家庭、国家、语言、文化等基本元素组成的，具有村社主义精神的特殊的“精神有机体”<sup>①</sup>。这一特殊的“精神有机体”具有最大程度的文化包容性和整合性，是世界文明大家庭中一个显要的、具有广阔复兴前景和发展优势的斯拉夫文明类型。K·阿克萨科夫则大力宣扬“俄罗斯灵魂”是纯洁的、尚未受到西方物质功利主义浸染的“活生生存在”，在天性上追求圆满和谐，精神统一，以四海之内皆兄弟之情和基督教博爱之心使陷入分裂、纷争状态的全人类复合为一。斯拉夫派理论镜像中的俄国“国民性”是一种建立在东正教团契共生基础上的有机“聚合性”。它包括生活的完整性，即体现有机整体的、富有丰富生命力的民族共同生活；道德理想的全人类性，即倾向于视各民族为平等的伙伴和兄弟，追求和谐圆满，“天下亲如一家”的全人类意识（俄罗斯的弥赛亚）。斯拉夫派理论家们笔下的这一美好俄罗斯形象，与其说是对俄罗斯真实状况的规律性和本质性描述，不如说是凭借着共同的民族文化记忆和认同所“想象”出来的精神乌托邦，是一种“理想的实在”，即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的“心理事实”而非历史事实。与斯拉夫派梦幻般的浪漫主义民族“想象”相反，“俄罗斯历史很少有其本性所固有的东西”<sup>②</sup>：许多历史学家相信，罗斯初民不善于经营管理自己，只好邀请来自北方（瑞典）的瓦兰人作自己的统治者（K·阿克萨科夫意外地将其美化为俄罗斯国民专注于内心救赎的“非政治性”和“非国家性”）；“罗斯受洗”所接受的是外来的拜占庭希腊正教，而且受洗的方式是强制性的，滑稽得如同一场闹剧，之后俄罗斯人不过是将多神教教导形式转化为某种基督形式；斯拉夫派学者把17世纪看作是表现俄罗斯“国民性”村社主义精神和“聚合性”本质的时期并希望模仿它，“但这也是历史的幻想，实际上，那是一个骚乱和分裂的世纪，震撼了全部俄罗斯生活的黑暗骚乱时代，它改变了人们的心理，损伤了俄罗斯的力量”<sup>③</sup>，而且还在骚乱中诞生了深刻的社会仇恨以及下层国民对大贵族的

---

① Хомяков А.С. 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вух томах. Том. II. М.,1994. С.16.

②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基本问题》，第3页。

③ 同上，第10页。

极端敌视。穷人代表、“野蛮、叛逆的哥萨克”完全不符合斯拉夫派所鼓吹的俄罗斯国民性格那种温和顺从、虔诚忍耐的精神类型。彼得改革之前的莫斯科公国时期是俄罗斯历史上一个“最不好的、最专制的时期。按其形式来说最能被认作是一个亚洲——鞑靼人（蒙古人）的政权，但是爱好自由的斯拉夫派学者却根据误解将其理想化”<sup>①</sup>；18世纪为斯拉夫派所广泛诟病的彼得“西化”式改革，实际上是将俄罗斯从蒙昧带向文明和现代化的历史必然。俄罗斯不可能在缺乏教育和现代文明的落后状态下继续存在，即便是其独立的生存都会受到威胁。“只有经过这种强烈的自我否定，才能获得俄罗斯的自我意识”<sup>②</sup>。斯拉夫派理论家们一直无法解释的是：恰恰在“彼得对民族精神有机体施暴”<sup>③</sup>的新时期，是俄罗斯近代文化迅速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普希金和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也使得斯拉夫派自身作为俄国社会“文化贵族”的存在成为可能。另外，斯拉夫派的“国民性”理论很少注意俄罗斯民族的漂泊特点以及它的叛逆性、甚至极端残忍的行为。至于说到俄罗斯扩张领土的野蛮历史，霍米亚科夫所谓俄罗斯“农耕型”民族具有“温顺、谦恭的本性”的说法，更是难以自圆其说。即便是他们对欧洲的启蒙理性、资产阶级性的理论批判，以及对所谓“腐烂的、精神上枯竭的西方”的揭露，也含有大量的偏见和臆想成分。斯拉夫派呕心沥血建构起来的“国民性”论述，在很大程度上流于主观想象，经不起真正科学的批评。他们把自己的精神乌托邦与俄罗斯过去的历史混为一谈，离真正的历史科学距离很远。

事实上，斯拉夫派这一整套貌似完备的俄国“国民性”论述，包括俄罗斯精神生活的“聚合性”原则、俄罗斯人作为“农耕民族”文明类型及其特点、俄罗斯作为“有机体”的纯洁性、“完整的精神性”，以及追求全人类兄弟般团结的基督教弥赛亚主义理想等等，都是为了要在理论上推定，相对于一个分化、纷争的欧洲，具有生命整合优势的俄罗斯是宗教的共同体和民族的共同体。一方面，斯拉夫派理论家们的文化民族主义想象如此认真地关

---

①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基本问题》，第5页。

② 同上，第35页。

③ 同上，第73页。

切俄罗斯人乃至全人类的生命、信仰和拯救问题，这正提示了他们与直觉主义想象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霍米亚科夫、И·基列耶夫斯基等人借助对东正教“纯洁信仰”和“聚合性”理念的阐释将人类生物自然性上的宿命转化成生命的永恒连续性，即生命是什么且因何而不朽的精神命题；另一方面，斯拉夫派还自觉地通过世俗的形式（对宗教的世俗阐释）将宿命转化为连续，将偶然转化成意义，通过对古罗斯村社主义、古老“家训”（домострой）式宗法道德传统的热烈鼓吹，把俄罗斯“国民性”构拟为其内部村社成员之间唇齿相依、血脉相连的民族生命共同体。在俄罗斯这个想象的“民族共同体”中，斯拉夫人过着和谐的村社田园生活，彼此之间人人平等，亲如兄弟，并时刻紧跟上帝的脚步，渴望着全人类性的终极生命救赎。这里显而易见的是，斯拉夫派的俄罗斯有机“共同体”想象，在他们自身的心中召唤出一种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和历史使命感。从一开始，这一有机的“民族共同体”的斯拉夫主义想象就排斥西方意义上的个体性，将民族理解为种种个人无可选择的有机事物，与出生地、种族、时代、环境等因素密不可分。其中实现俄罗斯作为“生命共同体”的民族主义想象的最重要媒介就是语言：“语言往往因其起源之不易考证，更容易使这种共同想象产生一种古老而天然的生命传递、无可选择、生来如此的历史宿命感”<sup>①</sup>。霍米亚科夫、И·基列耶夫斯基、К·阿克萨科夫以及遍游俄罗斯田野采风者П·基列耶夫斯基、民俗词典编纂家达里等，在斯拉夫派语言学之所谓“语言内形式”的民族主义历史想象中，真切感受到了一种真正无私的、群体性的、具有生命集体共生性特征的“聚合性”存在。

整体而言，斯拉夫派的有机“国民性”论述，借助于对俄罗斯的历史想象，建构出一个血脉相连、休戚与共的民族天然“有机体”面貌。这一“有机体”面貌纯洁美好：与其说是一种精神类型和文化范式，不如说是一种充满生命感的艺术形象，与其说是大白天的现实，不如说是月夜里缥缈的幻影。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经精辟地指出：“依循着人类学的精神，我主张对民族作如下的界定：它是想象的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

---

<sup>①</sup> [美]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6页。

的 (limited), 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它是想象的, 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 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 和他们相遇, 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 然而, 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sup>①</sup>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还指出, “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 这是“因为尽管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着普遍的不平等和剥削, 民族总是被想象成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最终, 正是这种亲密友爱关系, “在过去两个世纪中, 驱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甘愿为民族这个优美想象去慷慨赴死”<sup>②</sup>, 这说明民族认同感的想象作为国民自然的情感, 可能根深蒂固。其中, 知识分子在建构“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体”过程中扮演着最核心的作用: 一般情况下, 正是民族文化精英知识分子热情地“邀请”民众加入共同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进一步断言: “19世纪是方言化的辞典编撰者、语法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家的黄金时代。这些专业知识分子精力充沛的活动, 是形塑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的关键。”<sup>③</sup>如果比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这一精英知识分子是“民族共同体”想象之主体的论断, 霍米亚科夫等斯拉夫派理论家们正是形塑俄罗斯民族精神品格的关键。在这一极具民族主义想象的“国民性”论述中, 作为俄罗斯文化精神之形象性表达的俄罗斯文学, 成为斯拉夫派进行俄罗斯“民族共同体”想象的最为直接的理论依据。

---

**【 Abstract 】** Slavophilism was one of the dominant schools of social thought in the ideological localization in Russia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t was an amalgam of politics, philosophy, religion, aesthetics, economy and historical culture. Its nationalistic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which is grounded on the organic theory of “narodnost’,” namely, the uniqueness of the spiritual life of Russians, consists of state discourse (including family discourse), religious (belief) discourse, and cultural discourse, with religious discourse as the core. The nationalistic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of

---

① [美]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第5-6页。

② 同上, 第7页。

③ 同上, 第84页。

the Slavophiles is, in essence, the nationalistic imagination of Russia and its people as a life community.

**【Key Words】** Slavophilism; Organic theory of “narodnost”; Religious belief; Nationalistic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Аннотация】** Славянофильство было одной из доминирующих школ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мысли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локализации в России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ека. Это была смесь политики, философии, религии, эстетики,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и, экономики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Национ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конструкция культурного сознания славянофильства основывается на органической теории «народности», а именно, на уникальности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россиян, состоит из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дискурса (в том числе семейного дискурса), религиозного дискурса, и культурного дискурса, причём религиозного дискурса в качестве ядра. Сущность национ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конструкции культурного сознания славянофилов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националистическом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и России и её народа как единого жизненного сообщества.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Славянофильство, теория «народности», религия, национ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конструкция культурного сознания

---

(责任编辑 阎德学)



## 俄罗斯语言学传统中的方法论特质\*

赵爱国\*\*

**【内容提要】**俄罗斯学研究有各种不同的视角，语言哲学即语言学方法论研究应该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研究表明，方法论视角的俄罗斯语言学传统形成于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期间经历了俄罗斯思想史上的两场“革命性变革”——欧洲主义和斯拉夫主义的洗礼，因此，其语言学方法论也体现为包容两种不同哲学思潮的“雅努斯”特质。该特质又在哲学维面上分别展现为“形而上”与“形而下”、“本体论”与“载体论”、“言尽意”与“言不尽意”、“不断完善”与“有限超越”等对立统一的学理形态。

**【关键词】**俄罗斯语言学 欧洲主义 斯拉夫主义 方法论特质 学理形态

**【中图分类号】**D751.2;H35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6)04-0080(31)

国内俄语学界对“俄罗斯学”的理解，通常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即“形而下”，研究范围被严格限定在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外交学等社会学科领域；广义也包括“形而上”，即还广泛涉及哲学、文化学、文学、艺术学、语言学等人文学科。理论上的这种区分，本质上是将对社会形态的认知划分成具有不同价值或功能的知识领域：一个是“用事实来说话”和“以现实为准则”，瞄准的是学术研究的“实用价值”；另一个则是“用事实来思维”和“以准则来思考现实”，注重的是学术研究的“理论

\*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语言学视阈中的俄罗斯百年符号学史研究”（项目批准号：14AYY023）的阶段性成果。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提出的中肯和宝贵意见，文中疏漏之处由作者负责。

\*\* 赵爱国，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俄文系主任，教授。

意义”。两者看上去似乎“彼此有别”或“泾渭分明”<sup>①</sup>，但实质却是“互为依存”和“一脉相通”的。<sup>②</sup> 本文尝试从广义的俄罗斯学视角出发，通过对俄罗斯语言学传统形成过程的梳理和考证，来窥视其语言学方法论对俄罗斯学研究有价值的些许特质<sup>③</sup>，从而为全面把握俄罗斯在“形而上”领域的思想特性和理论走向提供新的论据。

在我们看来，语言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领域的一门基础性学科，它的方法论通常具有理论哲学的性质。20世纪初起世界哲学研究以及20世纪后半叶起世界认知学研究先后发生的两次“语言学转向”便是有力的佐证。正因为如此，语言学方法也被广泛运用到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许多领域，成为解读社会现实、文化传统、历史印记、民族心智、思维特性、行为特征等不可或缺的“利器”。毫无疑问，作为世界语言学研究成果重要组成部分的俄罗斯语言学方法论是一座值得深挖的“富矿”，它的形成、演化和发展，与哲学的走向、文化的传承、思想的进步以及世界语言学范式的嬗变等都有着密切的关联性。

## 一、方法论视角的语言学传统的形成时限

俄罗斯对语言学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起始于公元10世纪基辅罗斯国的建立和基督教的传入。因此，其语言学传统几乎可以追溯到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俄罗斯民族史和国家史之初。如，有研究表明，公元10世纪起，罗斯人就开始从翻译成用基里尔字母书写的俄文的大量古希腊经书和宗教作

---

① 事实上，国内俄语学界对“俄罗斯学”的理解通常是“狭义”视角的，其概念内涵大致等同于“俄罗斯研究”。在多数俄语人的意识里，“俄罗斯研究”的概念并不包括上文所说的“形而上”的内容。

② 与国内俄语学界的认知有所不同的是，真正从事上述“俄罗斯研究”的学术机构及学者，对“俄罗斯学”的理解却往往是“广义”的。如，国内在该研究领域的重点学术期刊《俄罗斯研究》《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等就辟有专栏，刊登有关“形而上”内容的文章。当然，在“形而上”知识领域，有关俄罗斯语言学和文艺学的研究文章仍属鲜见（这或许与学界有《中国俄语教学》《俄罗斯文艺》等专业性杂志有关，或许是相关研究内容确与“俄罗斯研究”的既定对象和任务相差较远）。

③ 此处所说的“语言学方法论”，并非语言学的专有术语，也非指语言学研究中的某方法或理论，而是哲学或语言哲学层面的概念，指由具体方法或理论综合而成的思想范畴。

品中获得有关语法的初级知识，语法学研究也开始从对词类的翻译起步，逐步拓展到对“言辞”(слово)的诠释<sup>①</sup>、术语的注解、“古典修辞术”(риторика)辨析以及词汇对照(13世纪)、正字法编纂(14世纪)、语法汇编(15世纪)、斯拉夫语法编写(16-17世纪)等领域。<sup>②</sup>然而，真正具有科学性质的语言学研究则发端于18世纪中叶，其标志是俄罗斯第一位世界级科学家罗蒙诺索夫(М.В.Ломоносов, 1711-1765)于1757年出版的《俄语语法》(«Россий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一书。<sup>③</sup>该著作的问世，不仅表明语言学在俄罗斯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同时也宣告贴有俄罗斯标签的语言学方法论开始起步。这是因为：在罗蒙诺索夫之前的俄语语法研究，不但具有模仿西方的理论和方法的性质(如，大多把西方语法翻译为俄语，或在语法研究中采用希腊语、拉丁语的范例等)，最为重要的是，学界对语言科学的认识仍处在含混不清的阶段，因此无法将有关语言的知识 and 思想汇聚成系统的方法论，也无法将语言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鉴于此，从方法论视角来界定俄罗斯语言学传统，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从公元988年俄罗斯引入基督教后开始语法研究之进程算起的，而是把具有方法论性质的罗蒙诺索夫的《俄语语法》视为起始点。对此，学界有比较一致的看法。

而俄罗斯语言学传统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大致150年的时间，即从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或者说从罗蒙诺索夫的《俄语语法》起始，一直到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境内形成“三大语言学派”——“哈尔科夫语言学派”(Харьковская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ая школа)、“喀山语言学派”(Казанская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ая школа)和“莫斯科语言学派”(Московская

---

① 在古俄语中，слово一词有多重意思，既表示“言辞”即“逻各斯”(логос)，也表示纪事、训诫、寓言等具体意义。

② 参见 Колесов В.В.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ознания. СПб.: Изд-во С.-Петербург. ун-та, 2003. С.26-98; Булич С.К.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языкознания в России. М.: Книжный дом «ЛИБРИКОМ», 2010. С.149-160.

③ 罗蒙诺索夫的«Россий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一书，以往国内学界大多将其翻译为《俄罗斯语法》，实际上，定名为《俄语语法》更为科学和贴切，理据有二：一是“语法”属语言学术语，而不属社会学术语，因此在“语法”这一术语前冠以某国家名称显然不符合语言学规范，例如我们不能说这是“中国语法”，那是“法国语法”等；二是罗蒙诺索夫所处的时代，“俄语”这一术语并不是用现当代通行的русский язык来表示的，而用的是российский язык，因此，所谓россий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就理应翻译为“俄语语法”。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ая школа)为止。也就是说,尽管这150年的时间在俄罗斯民族历史和思想史的长河中并不算太长,但它却经历了18世纪的“欧洲主义”(европеизм)和19世纪的“斯拉夫主义”(славянофильство)两次重大洗礼,从而在哲学意义上完成了由“拿来主义”向实现民族自觉的重大转变。<sup>①</sup>因此,俄罗斯语言学也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一样,在方法论上无不受到上述两种哲学思潮的深刻影响。研究表明,自18世纪中叶罗蒙诺索夫的《俄语语法》开创语言学研究中的欧洲主义方法论后<sup>②</sup>,随着19世纪斯拉夫主义哲学思潮的兴起,在语言学领域分别出现了两种不同哲学取向的方法论:一种是具有鲜明欧洲主义色彩的普遍唯理语法流派,另一种则是趋向于斯拉夫主义的逻辑语法流派(亦称形式逻辑语法流派),它们虽在学理上有重合之处(如,都以逻辑学为语言学研究的理论基础),但研究视角和方法却有原则性的不同。直到上述“三大学派”的形成,欧洲主义和斯拉夫主义的学术分野才开始逐步走向融合,并在“心理语言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两个方向上生长出具有“雅努斯”(Янус)特质的俄罗斯语言学方法论传统。<sup>③</sup>下面,就让我们来简要审视一下该特质是如何体现在相关理论和学说中的。

## 二、语言学传统中的欧洲主义方法论

“欧洲主义”也称“西欧派”(западничество),其概念是建立在承认欧洲文明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基础之上的。俄罗斯的欧洲主义思潮发端于17世纪末,起因一方面是由于当时西方的科学和艺术经由波兰、基辅向莫斯科公国渗透,另一方面是俄国当时的王子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即后来的彼得大帝)于1696年被派往欧洲多个国家旅行考察。他亲身接触到西欧先进的科学、工艺及思想,为其执政后施行极具欧洲主义色彩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

① 赵爱国:“俄罗斯‘斯拉夫主义’哲学思想的学理内涵”,《俄罗斯研究》,2015年第4期。

② 此处的“欧洲主义方法论”只是一个笼统的称谓,指源自欧洲的语言学传统和方法。

③ 此处借用“雅努斯”这一名称对俄罗斯语言学传统的特质做出概括,意指俄罗斯语言学方法论的学理渊源既有欧洲主义的、也有斯拉夫主义的。尽管“雅努斯”分别朝向两个不同的方向,但却构成一个整体。

但俄罗斯的欧洲主义与西方的欧洲主义在性质上又有所不同，它带有明显的“启蒙主义倾向”，即用先进的西方科学或文明来变革落后的俄罗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彼得大帝才欣然接受了德国著名哲学家莱布尼茨（Г.В.Лейбниц, 1646-1716）的建议，于1724年成立了彼得堡科学院。

### （一）欧洲主义的方法论意义

在我们系统讨论俄罗斯语言学传统中欧洲主义方法论之前，有必要先来简要审视一下欧洲主义本身的方法论意义问题，以对其学理构成和价值取向等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因为正是其本身的方法论决定着俄罗斯语言学传统中的语言学方法本质和诸多特性。

在俄罗斯的欧洲主义思潮中，最为盛行的可谓“沃尔夫主义”（вольфианство），即由德国哲学家沃尔夫（X. Вольф, 1679-1754）提出的唯理主义哲学思想。<sup>①</sup>罗蒙诺索夫对沃尔夫有很高的评价，认为他的学说思想甚至高于亚里士多德（Аристотель, 前384-前322）。归纳起来，沃尔夫的唯理主义哲学思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是所谓的“一切存在之物必有其存在之理由”定律。该定律曾被沃尔夫的老师莱布尼茨所证实：事物之所以能够存在，必定有其充足的理由；而存在之物同时又成为另一事物存在的缘由。这时，该存在之物可称为“本质”（Wessen）（德语“本质”应为 das Wesen）。事物的本质就在于：它用一定的方式使事物获得自己的基本特性，即必要性、永恒性和不变性。如果事物的本质发生某种变化，那就不再是原来的事物，因为“事物除了自身的本质以外，不可能获得保留原事物的另一种本质”。<sup>②</sup>简言之，在沃尔夫看来，存在是事物的本质，而事物的本质又是不容改变的，它具有单义性。

二是对“身外之物”（вещи вне нас）和“身内之物”（вещи в нас）

---

①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沃尔夫被学界公认为欧洲理性主义的杰出代表，他将莱布尼茨（Г.В.Лейбниц, 1646-1716）的哲学思想系统化和普及化，因此也称“莱布尼茨-沃尔夫哲学”。这一哲学理论在康德之前的德国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1725年，沃尔夫被选为彼得堡科学院外籍荣誉院士，其学说思想在俄罗斯影响深远。

② Вольф X. Разумные мысли о Боге, мире и душе человека, а также о всех вещах вообще// Христиан Вольф и философия в России. СПб.: Изд-во Рус. Христиан. гуманит. ин-та, 2001.С.242-244.

的思想做出严格区分。他认为，当人们看见某“身外之物”（如楼房）时，一方面可以将该事物与人自身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能搞清楚这些事物作为意识（即思想）在我们身内的存在，但意识又并不等同于思维。由此，沃尔夫提出，“笛卡尔主义”（картезианство）的追随者们所犯的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把意识看作是能够构成灵魂全部本质的东西，仿佛只要是人们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就不可能在灵魂中出现一样。在沃尔夫看来，更为正确的观点应该是：灵魂的本质决定着思维，意识在为思维提供物质的同时，也要靠思想来攫取我们的“身外之物”——现实世界。由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意识是靠外部的事物来调节的，意识对外部事物而言具有派生性，也就是说，意识离开外部事物是不可能独立存在的。<sup>①</sup>

三是遵循“实验至上”原则仔细研究了“身外之物”之间的各种相互关系。该原则规定，对现实世界（自然界）的认识必须要建立在确凿无疑的实验基础之上，否则都将是不可取的。而实验表明，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构成物，它们不仅同时存在，且有的先于别的事物而存在，而有的则后于别的事物而存在，从而构成了互为依存的关系。由此，自然界“不会发生突变”，自然界中的“一切都是匀称的，始终保持着相同的力量”。那么，自然界的这种“和谐”究竟来自何方呢？对此，沃尔夫认为这种“和谐”或是自然界自身作用的结果，或是源自于外部，但自然界是不具有独立本质的，这是因为：如果说每一个单独的事物都可以在另一个事物中找到自身理据的话，那么世界上的所有事物就都处在相互依存之中。因此，自然界并不具有独立存在的充足理由。<sup>②</sup>

以上便是沃尔夫主义的主要内容。但有一个问题值得深思，那就是：为什么俄罗斯选择的是沃尔夫的唯理主义，而不是像法国等西欧其他国家那样推崇的是笛卡尔（Р. Декарт, 1596-1650）的理性主义呢？我们认为，弄清楚这一问题，对深入揭示俄罗斯语言学传统中的欧洲主义方法论的本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显然，这与东正教在接受西方哲学时的语境不无关系。

---

① Вольф Х. Разумные мысли о Боге, мире и душе человека, а также о всех вещах вообще// Христиан Вольф и философия в России. СПб.: Изд-во Рус. Христиан. гуманит. ин-та, 2001. С.260.

② Там же. С.270-280.

我们知道，笛卡尔主义强调科学的目的在于造福人类，使人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和统治者。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原则，强调不能怀疑以思维为其属性的独立精神实体的存在，并论证了以广延为其属性的独立物质实体的存在。他认为，上述两种实体（精神和物质）都是有限实体。此外，他还企图证明无限实体的存在，即上帝的存在，并把上帝的思想主观化，认为上帝是有限实体的创造者和终极的原因。他提出，信仰的源泉并不是神的启示，而是只有思维能力才能证实的人存在的事实本身。“只因为我存在，才可能有‘完人’（*совершенное существо*）或上帝的思想，进而才能完全明白上帝也存在”。<sup>①</sup>由此可见，在笛卡尔的眼里，上帝是受限于思维主体的，这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并无二致；而作为形而上学哲学观的沃尔夫主义，强调的是“身外之物”与“身内之物”之间的关联和依存关系，注重的是人与上帝之间以及事物存在之“本质”与上帝存在之“本质”之间的化合。正是在这一点上，与东正教所奉行的精神传统相吻合。因为在东正教传统中，人并不是一个自主的存在物，而是本来就存在于神之中的。这就是沃尔夫主义之所以能在18世纪的俄罗斯盛行的根本缘由所在。当然，沃尔夫主义之所以能在俄罗斯大行其道，还与作为沃尔夫弟子的罗蒙诺索夫院士的学术活动有关。<sup>②</sup>他于1746年翻译出版了《沃尔夫实验物理学》（*Вольфианская экспериментальная физика*）一书。此后，俄罗斯又相继翻译出版了沃尔夫的《逻辑学》（*Логика*）（1765）、两卷本的《形而上学基础原理简编》（*Сокращение первых оснований метафизики*）等著作。这些著作大多被用作大学和神学院的教科书，成为俄罗斯影响最广的西方哲学经典。值得一提的是，在沃尔夫主义这块沃土上，还先后生长出了颇具俄罗斯特色的若干哲学流派，如自然哲学、人类学、道德哲学和实践哲学流派等。

上文已经谈到，这一时期俄罗斯的欧洲主义无不具有鲜明的启蒙主义倾向。这里不能不提到著名思想家塔季谢夫（*В.Н.Татищев, 1686-1750*）、拉季谢夫（*А.Н.Радищев, 1749-1802*）为推行欧洲主义所立下的功绩。

---

① 见 Фишер Куно. История нов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Декарт: Его жизнь, сочинение и учение. СПб.: Мифрил, 1994. С.335.

② 作为俄罗斯最伟大的科学家，罗蒙诺索夫曾于1735年留学德国，并师从沃尔夫，因此学界通常把他称作沃尔夫的学生，其许多学说思想也与“沃尔夫主义”一脉相承。

塔季谢夫不仅是彼得大帝推行改革的“心腹”(ближайший сподвижник)和“教导队”(учебная дружина)成员,也是俄罗斯最早接受沃尔夫主义的哲学家。他的主要学说思想大致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科学及科学知识的认识。塔季谢夫认为,科学的主要使命就是“使人认识自己”,或懂得“人是由什么构成的”。<sup>①</sup>为此,他提出科学知识在“质”上具有5种不同的层级,即:(1)“所需的知识”(нужные),如语言学、家政学、医学、劝谕学、法学、逻辑学、神学;(2)“有益的知识”(полезные),如语法学、辩论术、数学、地理学、历史学、博物学或物理学;(3)“雅致的知识”(щегоольские),如诗学、音乐、舞蹈、骑马术、绘画;(4)“令人好奇的或虚幻的知识”(любопытные или тщетные),如占星术、面相术、手相术、炼金术;(5)“有害的知识”(вредительные),如各种法术、巫术、占卜等迷信活动。<sup>②</sup>由此可见,塔季谢夫对科学知识的分类具有鲜明的“人学”思维性质。在他看来,越是与人、人的状态、人的发展接近的科学,就是越有益于人的智力启蒙的科学,其层级和排列也就越靠前。尤其是他把语言学和语法学排在第一层级和第二层级的首要位置,足以说明语言科学在当时的俄罗斯所占据的重要地位,这从一个侧面证明,自18世纪起,也就是俄罗斯结束中世纪之后,语言科学就已经成为俄罗斯学界“人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学科之一。

二是对灵魂与肉体关系的认识。在对灵魂的阐释这一问题上,塔季谢夫更倾向于将人归为肉体的英国哲学家霍布斯(Т.Гоббс, 1588-1679)的观点,认为灵魂只是一种空洞的称谓,因为“灵魂没有像感觉肉体那样具有自身的工具或力量,灵魂和肉体总是相互作用;灵魂有智慧和意志,而人最易受到智慧和意志的控制;人的一切幸福都取决于良好的智慧和意志,而一切不幸又是生成于缺乏智慧和意志”。<sup>③</sup>可以看出,塔季谢夫的上述观点与古希腊哲学流派中的毕达哥拉斯派(пифагористики)、柏拉图派(платоники)、斯多葛派(стоики)的观点有所不同,后者通常认为灵魂和肉体是两种不同的

---

① Татищев В.Н. Разговор двух приятелей о пользе науки и училищах//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Л.: Наука, 1979.С.51-53.

② Там же. С.89-94.

③ Там же. С.53.



事物。这从一个侧面证明，塔季谢夫的观点是与当时俄罗斯的沃尔夫主义思潮完全一致的，即将人的“本质”与上帝的“本质”视为一体，而塔季谢夫则由此将人的灵魂归入肉体，从而充分显现出人的体验高于一切的思想。

三是对智慧与意志的认识。塔季谢夫认为，人的智慧是借助于4种力量起作用的，这就是想象力、记忆力、猜想力和判断力。智慧与意志处在并列的位置，人的幸福与不幸都取决于人的意志，因此，必须要让人的智慧控制住意志，就像骑马时要驾驭马一样。但是，人仅仅靠智慧还不足以读懂“世界之书”（*книги мира*），因为智慧本身仅仅只拥有“意义”（*смысл*），即连动物也能领悟的一般性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讲，就连最愚蠢的人在本性上也被赋予智慧。<sup>①</sup>显然，塔季谢夫对人的智慧与意志关系的界说，是建立在上文“第一点”中所论述的对科学知识的认识基础之上的。

应该说，塔季谢夫对以上三个方面的认识都是崭新的，这些认识不仅代表着当时俄罗斯“欧洲主义”流派的主要哲学思想，同时也开启了俄罗斯启蒙运动的序幕。

拉季谢夫作为俄罗斯启蒙时代的代表人物，他在存在主义伦理学方向上对“人学”研究做出过重要贡献。有关他的“人学”思想，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其于1792年写成的《论人、人的死亡和永生》（*О человеке, о его смертности и бессмертии*）这一长篇哲学论文中。这是反映18世纪俄罗斯欧洲主义思想的经典文章，其主要观点有：

一是“人是智力的生物”的思想。在拉季谢夫的哲学思维中，人首先是拥有智力的生物。他认为，人的智力可分为经验和理智两种，智力使人具有认知力，知觉、记忆、认识、思想、判断等都属于认知力。例如，我们会通过记忆想起知觉的更替，有关体验知觉的信息就叫认识；再如，由事物间各种关系生成的我们的概念的更替，叫作思想。知觉与理智有别，就如认识与思想有别一样。此外，拉季谢夫还认为人对世界的认知和人的经验都具有双重性。认知的双重性是：（1）靠认知力来认识事物产生的变化；（2）认识事物与认知力之间和事物规律之间的联系。前者成为经验，后者成为判断。

---

<sup>①</sup> Татищев В.Н. Разговор двух приятелей о пользе науки и училищах//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Л.: Наука, 1979.С.55-58.

而经验也常常是双重性的：（1）知觉经验，即用感觉来认识事物；（2）理性经验，即理性地认识事物之间的关系，如有关我们理智变化的信息就是理性经验。<sup>①</sup>

二是“精神与世界一体”的思想。说到人，必然会涉及世界与人的思维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拉季谢夫的存在主义伦理学中，世界是统一的，人与其他生物一起构成一体。用他的话来说，物质（世界）或实体是与人的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们看不出一个构成部分与另一个构成部分之间的区别，而看到的总是它们的总和”。<sup>②</sup>他认为，人所接触到的囊括所有存在物（精神和物质）的概念，都是“存在”（бытие）。所有物体都是由最基本的成分或自然元素（土、水、空气、火）构成的。我们不知道这些成分的自然状态，我们所看见的总是它们相互偶合在一起。由此，他得出结论认为，正是这些复杂构成物的统一，才为我们提供了“思维力”，而一切复合体又都可以在思维力中找到自己的“起点”。<sup>③</sup>总之，在拉季谢夫看来，物质与精神不可分，人的思维力和生命特性不仅是由物质造成的，物质的特性也同样是由人的思维力本质造成的，事物的特性即思维力特性，思维力也就是物质的特性。

三是关于“死而复原”的思想。在拉季谢夫的哲学思想中，更多的是对死亡的概念进行的思考。关于死亡是否预示着“彻底毁灭”（полное уничтожение）还是“破灭”（разрушение），他更加倾向于后者，即死而可以复原。他说，“什么是死呢？死不是别的，而是人的状态的自然更替。这种更替不仅与人有关，所有动物、植物和其他生物也是如此。世界上一切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东西都会死亡。死亡的征兆是破灭”。什么是“破灭”呢？在拉季谢夫看来，破灭不是消失，也不是不存在，而是有生命的东西进入到“诞生前的状态”。<sup>④</sup>不难看出，拉季谢夫眼中的生与死，具有“相似性”。他相信，可以从一个人开始生命的状态中得出其死亡的状态，因为存

---

① Радищев А.Н. О человеке, о его смертности и бессмертии// Избр. Филос.соч. М.: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49. С.299.

② Там же. С.314-315.

③ Там же. С.330.

④ Там же. С.345.

在主义意义上的生前和死后状态是完全相同的。这是一种典型的“物质不灭”的唯物观。

以上可以看出，俄罗斯欧洲主义方法论的本质集中体现在理性、人本性、科学性、体验性、物质统一性等诸多方面，其中前两项是西方欧洲主义最为推崇的，而后三项则是俄罗斯欧洲主义所特有的。这再一次证明，俄罗斯欧洲主义不仅具有启蒙主义的性质（即科学性），同时还带有唯物主义的性质（即体验性和物质统一性）。所有这一切，无不为了俄罗斯语言学欧洲主义方法论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思想基础。

## （二）欧洲主义方法论的语言学理论学说

在语言学研究领域，推崇欧洲主义方法论的学者众多，除上文提到的18世纪的罗蒙诺索夫、拉季谢夫外，还有19世纪的著名学者里日斯基（И.С.Рижский，1755-1811）、格列奇（И.Н.Греч，1787-1867）、别林斯基（В.Г.Белинский，1811-1848）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采用西方文艺复兴后兴起的所谓“新欧洲哲学”（новоевропей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中的“唯理论”或“唯理主义”（рационализм）方法，对俄语语法做出理性主义的描写和分析，并在学理取向上展现为普遍唯理语法的性质。

罗蒙诺索夫的《俄语语法》就是按照“唯理论”的基本原理撰写而成的。其最大特点是将自然科学研究中的理性方法运用到对俄语的研究之中。我们知道，作为自然科学家的罗蒙诺索夫曾把自然科学研究的基本特性归纳为“三性”——理性、动态性和结构性（或系统性）。<sup>①</sup>应该说，这不仅是他对自然科学研究基本规律的认识，同时也是其从事包括俄语语法学在内的人文科学研究的基本视角。他所撰写的《俄语语法》就是如此，无不体现出理性、动态性和结构性（系统性）等科学精神。归纳起来，该语法有以下特点：

一是坚持唯理主义语言观，将自然科学研究中的理性法则运用到对俄语的研究之中。例如，他在《俄语语法》的“第一章”、“第一节”中就鲜明地提出语言哲学中最基本的问题——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及相互作用问题。他

---

<sup>①</sup> 参见赵爱国：《当代俄罗斯人类中心论范式语言学理论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6-27页。

认为：人优于其他动物最珍贵的才能是“理性”（разум），而赋予人与其他人交流思想的基础单位是“句子”（речь）。<sup>①</sup>句子的作用很大，它使得人类社会的知识源远流长到现在。如果每个人把通过感觉获得的概念都秘藏在自己的头脑里，那么人类的知识就会十分有限……如果每个人不能向他人解释自己见解的话，那么我们就不仅会失去靠各种不同思想的联合而成就的共同事业，甚至我们还不如生活在森林和荒漠中的野兽。<sup>②</sup>上述话语与西方理性主义的语言观别无二致，其基本思想是：语言是存在于社会中的，语言的基本功能是交际和认知功能，因为人是通过对外部世界的感觉获得概念并把该概念传递给他人的。

二是坚持唯物主义方法，将该方法运用于对实词的界说。<sup>③</sup>他在该著作的第4章第39-41节写道：我们在实词中可以发现两种存在——一种是明显感觉到的事物，另一种是该事物的不同行为；静词是事物的词汇写照，动词是现实行为的写照；用来对属于事物或变化状态进行表义的前置词是分别由静词和动词提供的……连接词对概念进行连接。<sup>④</sup>该段话语也表明，前置词和连接词在词类中也具有反映现实的功能。

三是坚持对语言现象进行动态的系统描写。首先，与其他语法所不同的是，在他的《俄语语法》中所使用的语料大多是鲜活的言语，其中除了书面语以外，还使用了大量的口语和民间口头语言，从而保证了该语法与社会现实之间的有机联系<sup>⑤</sup>。再如，他对词类的句法语义阐释就关注到“语境”（контекст）的作用。他说：概念集以及将概念快速和扼要传递的方法使人难以觉察，就如压缩了自己的话语和删除了一个词组的枯燥重复一样。该方法就是实词中代词、副词和感叹词的方法，它们聚集着若干不同的意义：代

---

① 在18世纪的俄语语法研究中，“句子”这一术语常用речь表示，而在更早的13-17世纪，还曾用слово来表示。

② Ломоносов М.В. Полн.собр.соч. т.7. М.-Л.: АН СССР, 1952. С.394.

③ 罗蒙诺索夫的《俄语语法》把实词分为8类：静词、代词、动词、形动词、副词、前置词、连接词、感叹词等，并把实词分为“主要实词”（静词和动词）和“辅助实词”（其他6类）。这与现代俄语的词类划分不同。

④ Ломоносов М.В. Полн.собр.соч. т.7. М.-Л.: АН СССР, 1952. С.405-406.

⑤ 在罗蒙诺索夫之前的语法学研究中，标准语仅限于书面语的范畴，而《俄语语法》的研究对象则将标准语扩展到所有体裁，包括所有口语体裁的文学作品。

词代替静词，副词描写状态，感叹词是人的简短的精神活动。在他看来，词类的紧缩是通过代词、副词和感叹词的使用来实现的。最后，他对句子的解释依然具有动态性：事物应该首先有自己的存在，然后才有行为，句子Земля тучнеет（土地变得肥沃起来）就是如此。实词或词的合并生成句子，句子通过解释各种概念来表达意思。<sup>①</sup>这表明，罗蒙诺索夫把句子看作是一种“判断”（*рассуждение*），这与现代语言学对句子本质特征的界说几乎一致。

以上不难看出，罗蒙诺索夫的《俄语语法》在俄罗斯语言学传统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所展示的基本方法论是西方唯理主义性质的，但又采用唯物主义的具體方法对俄语语法进行了动态的全面审视。这显然是对唯理论的一种超越，也正是这种超越，在方法上为 19 世纪后半叶欧洲主义与斯拉夫主义方法论的融合做出了示范。

关于拉季谢夫，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提到，他曾在“人学”研究领域对 18 世纪的俄罗斯启蒙运动做出过杰出贡献。其实，他有关语言学的许多观点在学界也颇有影响，这就是他在长篇论文《论人、人的死亡和永生》中所论述的与“人学”有关的唯理主义语言哲学思想。如，他在论述有关人的智力问题时说：思想只是由人的声音表达的事物的符号。我们可以从语言中获得一个有关灵魂的无实体性最强有力的证据，语言是我们思想最好的和唯一的“组织者”（*устроитель*），没有语言，我们与动物就没有任何区别。<sup>②</sup>此外，他还关注到语言的特性和功能。在他看来，人说的语言是最令人惊讶和奇特的，快乐、忧伤和痛苦都可以用声音来表达；声音不仅可以表达我们的一切知觉、情感和思想，还可以激发思想和展示一切知觉的思维能力。<sup>③</sup>可见，在拉季谢夫的语言哲学里，语言不仅可以表达思想，还可以激发出新的思想，或者说语言不仅具有交际功能（建立起人与人的联系）和组织功能（对人进行管理），还具有指导功能（教人摒弃恶习）和认知功能（语言是思想的组织者，是语言结出的果实）。上述思想与 18 世纪德国哲学家赫尔德（И.Г.Гердер, 1744-1803）提出的“语言是人类之本源”的论断十分相近，

---

① Ломоносов М.В. Полн.собр.соч., т.7. М.-Л.: АН СССР, 1952. С.406.

② Радищев А.Н. О человеке, о его смертности и бессмертии//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 т. М.Л.: Изд-ство АН СССР, 1941. Т.2. С.119-121.

③ Там же. С.131.

是完全基于西方理性主义的学理而得出的。

里日斯基作为哈尔科夫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从中学生时代起就受到欧洲主义思潮尤其是沃尔夫主义的熏陶，后来成长为 19 世纪俄罗斯普遍唯理语法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语言学方面的学说思想主要体现在逻辑学、修辞术两个方面，如在 1806 年出版的《语文学科导论》（Введение в круг словесности）一书中<sup>①</sup>，就从唯理主义角度阐发了对“人说的话”（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слово）这一主题的基本认识。他写道：人的话语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语言是人的智力的产物，话语的这一自然过程与我们的思维过程完全吻合。因此，语言起初是由人们最熟知的和最能触动人情感的事物名称组成的，如事物的特性、行为等。现有事物的概念是根据人的认识生成的，并首先受到一般概念或抽象概念属性的制约。关于句法问题，里日斯基认为，句子的句法构造取决于人在自然状态中获得的认识过程，而人的认识则是为数不多的思想构成的。<sup>②</sup>显然，这种以人说的话为核心的语言观，是建立在西方理性主义的学理基础之上的。

格列奇作为俄罗斯普遍唯理语法的杰出代表，他主要是依据德语和法语语法方法论来研究当时的俄语标准语的。他曾坦言，其研究的目的是要“创建一种新的、普世的、西欧语言型的俄语语法”。<sup>③</sup>他把语言理解为一种系统，并将语言研究分为互为补充的两个方面：（1）语言的哲学方面，即把语言作为一个整体或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来研究，以确立“思想表达”（изображение мыслей）和“说话声音”（звуки голоса）之间的关系；（2）语言的历史方面，即研究语言的起源及其形成、发展过程。上述每一个方面又可以从两种不同的视角来研究语法：一是揭示所有语言的普遍规律；二是揭示每一种语言的个别规律。前者为“普遍语法”，后者为“个别语法”，而后者则应该置于“普遍语法的不变规则”领属之下。<sup>④</sup>格列奇的上述思想成为 19 世纪初期俄罗斯普遍唯理语法研究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其中，“语

① 当时的“语文学科”用словесность一词，包括语文学、修辞学、文艺学等内容。

② 参见Булич С.К.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языкознания в России XIII-XIX вв. М.: Книжный дом «ЛИБРОКОМ», 2010. С.527-529.

③ Греч Н.И. Записка о моей жизни. М.-Л.:Academia, 1830. С.256.

④ Греч Н.И. Практическая 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СПб., Тип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воспитателя Дома, 1827. С.53-54.

言的哲学方面”由“思想表达”和“说话声音”两部分构成的思想，较之现代语言学鼻祖索绪尔（Ф.Соссюр，1857-1913）学说中的“所指”和“能指”理论早了近百年；而“语言的哲学方面”和“语言的历史方面”又构成了索绪尔语言学哲学中的“共时”与“历时”的对立。

别林斯基是 19 世纪上半叶俄罗斯著名思想家，西欧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语言学方面的相关思想，集中体现在 1837 年出版的《俄语初级语法基础》（*Основания русск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 для первоначального обучения*）一书中，该书曾被称为俄罗斯语言科学中“最优秀的书籍”。<sup>①</sup>别林斯基的普遍唯理语法思想主要反映在其对俄语语法的基本认识方面，即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出发来考察语言单位，尤其是词。他在该著作的第一部分第一章中就从唯理主义原理出发阐发了对语法基本概念的认识：（1）人是通过词或语言获得思维能力和表达思想的能力的；（2）思维能力即理性，因为思维是行为或“理性行为”（акт разума），而该行为的结果就是判断；（3）思想属于词就如灵魂属于肉体，而词属于思想就如肉体属于灵魂；（4）思维科学称作逻辑学，而词的科学或语言的科学就是语法学；（5）语法学是人的话语的科学，或者说是对人的话语的系统描述；（6）人们不是用一种语言来说话的，因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sup>②</sup>不难看出，别林斯基对语法学做出的上述“论断”，大多是受西方普遍唯理语法流派的影响而得出的，而其中的理性行为、思维能力、词表达概念、句子表达判断等一系列表述，又无不是西方逻辑学基本概念在俄语语法学理论中的具体运用。

综上所述，18 世纪中至 19 世纪初，由于俄罗斯缺乏自身的语言学传承及理论体系，因此其在语法学研究中大多“借用”西方现成的理论和方法，这便是这一时期普遍唯理语法理论之所以能够占据主导地位的主要缘由。普遍唯理语法理论源自欧洲主义传统，其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们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方法，即经院哲学，并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得以发扬光大和最终形成。普遍唯理语法的学理内核是“逻各斯”（логос），即强调语

---

① Аксаков К.С.О грамматике вообще//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В 3 т. Т.2. Ч.1. М.: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критика, 1875. С.5.

② Белинский В.Г. Основания русск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 для первоначального обучения. М.: АН СССР, 1953. С.3-15.

言的普遍规律、理性和绝对精神。该内核又正好与东正教的思想内核高度契合，这就在哲学方法论或意识形态层面上为普遍唯理语法流派的生成提供了理论支撑和肥沃土壤。

### 三、语言学传统中的斯拉夫主义方法论

众所周知，19世纪是俄罗斯“经典哲学”（классиче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繁荣的世纪，其标志是俄罗斯从这个时期起开始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哲学体系，即斯拉夫主义。斯拉夫主义的思想内核是强调俄罗斯历史和文化相对于欧洲的“独特性”（самобытность），反映在语言学领域，该思想内核就展现为斯拉夫主义方法论。<sup>①</sup>

俄罗斯的斯拉夫主义哲学思潮形成于19世纪30年代，确立于50年代，瓦解于70年代。<sup>②</sup> 尽管斯拉夫主义盛行的时间并不长，但却给包括俄罗斯语言学在内的许多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内在动力，并在学理上为语言学传统中的逻辑语法流派的形成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逻辑语法流派的方法论特点是侧重语言的历史性、系统性和自主性研究，强调斯拉夫语尤其是俄语的独特性，反对把语法范畴等同于逻辑范畴，重视通过俄语语言对俄罗斯人的思维规律和特点做出解释。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有布斯拉耶夫（Ф.И.Буслав, 1818-1897）、大阿克萨科夫（К.С.Аксаков, 1817-1860）等。<sup>③</sup>

布斯拉耶夫先后于1844、1858年出版了《本国语言教学论》（О преподавани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языка）、《俄语历史语法初探》（Опыт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两部著作<sup>④</sup>，从形式逻辑的视角并采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对俄语语法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从而成为19世

① 关于斯拉夫主义的思想内核，参见赵爱国：“俄罗斯‘斯拉夫主义’哲学思想的学理内涵”，《俄罗斯研究》，2015年第4期。

② 参见赵爱国：《当代俄罗斯人类中心论范式语言学理论研究》，第38-41页。

③ 此处用“大阿克萨科夫”的称谓，是相对于同为斯拉夫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其胞弟“小阿克萨科夫”（И.С.Аксаков, 1823-1886）而言的，以示区别。

④ 后一部著作在1863年再版时改名为《俄语历史语法》（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成为俄罗斯历史上第一部研究俄语历史语法的专著。



纪中叶俄罗斯逻辑语法流派的杰出代表之一。布斯拉耶夫逻辑语法的特点之一，是重视对本国语言史的研究，因此，“历史主义”（историзм）是贯穿其语法理论的一条主线。正如维诺格拉多夫（В.В.Виноградов，1894/95-1969）所说，理解和评价布斯拉耶夫的句法观，离开历史这一背景是困难的。<sup>①</sup>布斯拉耶夫并不满足于“理论语法”所取得的成就<sup>②</sup>，认为该语法对语言现象的阐释和总结是片面的，因为它只把语言视为一种逻辑，而忽视了完整和多面的民族生活。<sup>③</sup>于是，他尝试结合逻辑学对俄语语法进行历史比较研究。归纳起来，其思想主要包括：（1）语法学不能只局限于“规则”（правила），还要研究语言的“规律”（закон）。他认为，理论语法只规定了书面语和口头语的使用规则，并没有研究语言的规律；而历史语法则将俄语研究与教会斯拉夫语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它不只局限于俄语书面语，因为不对口头语做出详细的判断，就不能对书面语的所有语法现象做出解释；（2）提出历史句法的基本任务和步骤。他认为，历史语法的句法部分首先要从界定语法形式与思维规律的关系入手，即划定逻辑与语法的界限，这一点，普遍唯理语法或理论语法的划界并不准确<sup>④</sup>；（3）反对将句法范畴视作逻辑范畴的直接反映。他认为，语言与思维之间不仅具有平行性和相互作用性，还具有矛盾性，这是由语言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语言形成于远古时期，与整个人类的智力活动紧密相关，但不依赖于某个人或某些人的个体思维；语言除逻辑特性之外，还有“创造性的想象力”（творческая фантазия）。句法研究的任务，一方面是要揭示语言中、语法中和词组形式中的普遍逻辑规律，另一方面还要揭示语言本身所固有的、常常与逻辑规律相矛盾的表达方法的内在独特性——“语言的内部规律”。<sup>⑤</sup>总之，布斯拉耶夫的逻辑语法蕴含着丰富的斯拉夫主义思想：一方面，他反对采用源自西方的普遍唯理主义来研究俄语语法，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将理性主义的逻辑

---

① Виноградов В.В.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их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учений. М.:«Высшая школа», 2005. С.111.

② 此处的“理论语法”即指上文中所说的“普遍唯理语法”。

③ Буслев Ф.И. О преподавани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языка, ч.1-2.М.: Унив. тип.,1844.С.3-8.

④ Буслев Ф.И.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М.: Учпедгиз, 1959. С.565-580.

⑤ Там же. С.263-267.

学方法运用于对俄语历史语法的研究。因此可以认为，该逻辑语法是既借鉴了西方理性主义、又立足于斯拉夫主义原理的产物，或者说，是西方理性主义“俄罗斯化”的结果。

大阿克萨科夫不仅是早期斯拉夫主义的创立者之一，同时还是一位在俄语学界享有较高声望的语文学家。他在语言学方面的著述主要有《语法发凡》（*О грамматике вообще*）（1839）、《俄语语法初探》（*Опыт русск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1860）等。这些著述不仅使他成为俄语逻辑语法的积极倡导者，同时也成为捍卫斯拉夫主义方法论的主将之一。其主要思想为：（1）对俄语特性的独到认识。他认为，相对于教会斯拉夫语以及其他斯拉夫语而言，俄语是一门独立的语言。该语言的特性是时空上的自由性和存在性：自由性是由俄罗斯民族的深刻本质所决定的，因为没有俄罗斯民族精神的自由，就不会有语言与思维的永恒运动；存在性是一个带有自身符号的、意识和理智可以等同于自然存在的特殊世界。语言的这些特性在逻辑上来源于民族语言生存的具体历史环境<sup>①</sup>；（2）注重语言和词的形式功能和作用。他认为，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以及实现民族语言存在和解释语言“精神”的方法，主要是靠词的形式这一基本特征来表示的。如果说语言是一种无意识地赋予民族的理性形式的话，那么词则是人自己创造的<sup>②</sup>；（3）对动词的民族特点做出阐释。在他看来，只有通过动词才能够发掘出俄语的民族独特性。他指出，俄语的动词系统与其他语言的动词系统不同，俄语动词最突出的是行为的性质和程度，这是构成俄语动词系统的完整性和统一性的根源所在。<sup>③</sup>不难看出，大阿克萨科夫的逻辑语法思想，首先强调的是俄语与其他语言的不同，这是斯拉夫主义固有的立场；其次，他格外注重语言形式对思维或思想的作用，认为形式是思维或思想的具体存在或载体；其三，他把动词不仅视为俄语语法的核心，且看作是最能体现民族思维和行为特性的一种词类。上述三点无不充满着斯拉夫主义的哲学原理，从而成为19世纪中叶贴

---

① Аксаков К.С. О грамматике вообще//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В 3 т. Т.2. Ч.1. М.: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критика, 1875. С.6-13.

② Там же.С.327.

③ Аксаков К.С. О русских глаголах//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В 3 т. Т.2. Ч.1. М.: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критика, 1875. С.417.

有俄罗斯民族标签的语言哲学范例。

应该说，逻辑语法流派与普遍唯理语法流派同属语言学研究中的形式主义方向，学理构成较为相似，但学理渊源和学术指向却不尽相同：前者从经验主义出发，捍卫的是语言的个性或特殊性；后者则从理性主义出发，推崇的是语言的共性或普遍性。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的整个世界语言学都是沿着这两种不同的路径向前发展的，俄罗斯也不例外。不同的是，上述经验主义与俄罗斯欧洲主义方法论中的“体验性”在学理上有一定的关联性，它在俄罗斯语言学传统中则集中体现为具有民族自觉性质的斯拉夫主义的色彩。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述斯拉夫主义方法论不仅仅集中体现在逻辑语法的研究方面，在历史比较语法方面也同样不乏代表人物。例如，著名语法学家沃斯托科夫（А.Х.Востоков，1781-1864）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他在1831年出版的《俄语语法》（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一书中，坚持斯拉夫主义立场，坚定地用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研究鲜活的俄语语言。该书所反映的主要思想在下列两点上与普遍唯理语法和逻辑语法有原则的不同：（1）摒弃普遍唯理主义和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探索适合俄语特点的语法学理论体系。我们知道，普遍唯理语法和逻辑语法强调的是语法中的普遍唯理基础和逻辑关系，而沃斯托科夫则认为，句法学的任务是确立言语中词的组合规则。他把用来表达思想的词的组合作“言语”（речь），认为对词的选择产生言语，它包括“高雅语”（书面语）、“平民语”（俗语）和居于上述两者之间的“日常语”（口语）；<sup>①</sup>（2）具体到句子成分的界说上，普遍唯理语法和逻辑语法通常采用的是“三成分”法——主语、谓语和系词<sup>②</sup>，而沃斯托科夫在分析了俄语简单句的结构后却得出结论认为，典型的俄语简单句结构具有双成分性——主语和谓语，主语是所讲的事物，谓语是动词及其所说的有关事物，而系词（辅助动词）*есть*（是）属于谓语范畴。<sup>③</sup>应该说，沃

① 参见 Виноградов В.В.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их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учений. М.:«Высшая школа», 2005. С.85.

② 逻辑语法历来把任何判断都归结为下列一种限定公式：*собака бежит = собака есть бегущая, спит = есть спящая*（狗在跑=狗是跑着的，狗在睡觉=狗是睡觉着的），所以句子由主语、谓语和系词三成分构成。

③ 参见 Виноградов В.В.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их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учений. М.:«Высшая школа», 2005. С.86-88.

斯托科夫对句子成分的划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它突出强调了俄语句法的特殊性，而不是按照西方唯理语法理论提出的“共性”方法生硬地套用在对俄语句子的分析中。

#### 四、“雅努斯”语言学方法论的形成

俄罗斯普遍唯理语法流派和逻辑语法流派作为时代的产物，在接下来的发展中是继续“分道扬镳”，还是“合二为一”——成长为具有“一个身躯”但却有“两副面孔”的“雅努斯”呢？事实证明，俄罗斯在 19 世纪后期的语言学研究中，将语言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走出了一条颇具俄罗斯特色的语言学发展之路：分别在“心理语言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两个方向上，将欧洲主义方法论与斯拉夫主义方法论融合在一起，生成了具有“雅努斯”特质的语言学方法论传统。

在心理语言学方向上，以波捷布尼亚（А.А.Потебня，1835-1891）为代表的哈尔科夫语言学派的形成，标志着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语言学方法论的诞生。

波捷布尼亚在俄罗斯语言学史上占有十分特殊和显赫的地位：他反对在语言研究中照抄照搬 18 世纪遗留下来的西方唯理论和先验论传统，从而开创了俄罗斯语言学史上的心理主义范式。他的理论学说对 20 世纪俄罗斯语言学各学科（尤其是普通语言学、语义学、词汇学、心理语言学等）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引领作用。作为语言学家，他从人类语言和思维的普遍演化视阈来审视俄语及其历史，因此，其理论视角较之其众多的学术前辈更具人文性和民族性。他出版的两部不朽著作，《思维与语言》（Мысль и язык）（1862）和《俄语语法札记》（Из записок по русской грамматике）（1874-1899），包含了下列重要思想：（1）语言是历史现象和言语思维活动。他在对语言与思维、语言与民族、语言学与心理学、感知与统觉、情感语言与思维语言、认识与判断和概念等一系列关系进行详细阐述后，提出语言可以形成思想、语言是产生思想的机制的重要观点。他认为，语言不是表达现成思想而是创造思想的手段，语言不仅是对已形成的世界观的反映，而是正在形成这种世

界观的活动<sup>①</sup>；（2）语言是民族的直接创造物。他指出，民族语言史研究在揭示人类言语形成和演化的普遍规律中具有重要作用，因为民族是人类群体的组织范畴，而语言从来就具有民族形式，因此是民族的直接创造物<sup>②</sup>；（3）言语活动是思维与语言之间的作用所致。他提出，言语活动是语言、说话人的知识以及说话人想要表达的思想之间的相互作用，而语言学的根本任务就是揭示思维与言语之间的这种作用；（4）语法范畴与逻辑范畴不等同。他认为这两个范畴不等同的原因有二：一是语法范畴和语法形式要比逻辑范畴大得多，二是语言与言语之间存有差异，因此只有在语言历史以及言语行为的心理分辨中才能找到对其做出解释的途径<sup>③</sup>；（5）词具有“内部形式”。他把洪堡特（В.Гумбольдт1767-1835）提出的“语言的内部形式”（внутренняя форма языка）思想具体地运用到对词的考察中，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关于“词的内部形式”（внутренняя форма слова）的学说。在他看来，词的内部形式展示着说话人的思想，词所反映的并不是其内容的全部思想，而仅仅是其思想的一种特征。词的内部形式就是该词最近的词源意义，它是从词的形态结构中推断出来的<sup>④</sup>；（6）词具有“近义”和“远义”。他在多卷本《俄语语法札记》中运用心理学方法对词的“近义”（ближайшее значение）和“远义”（дальнейшее значение）进行了详细阐释。“近义”即词的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它构成词发音时的现实思想内容；“远义”既与科学和百科知识相关，也与操不同语言的个体的各种联想有关。<sup>⑤</sup>从上述思想中，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波捷布尼亚为创建具有“雅努斯”特质的语言学方法论传统所做出的奠基性贡献：他既把语言视作思维和认知世界的基本方法，又将语言看作能够形成思想的创造性活动，这显然是西方理性主义（欧洲主义）和俄罗斯经验主义（斯拉夫主义）语言观相结合的产物。这

---

① 参见 Алпатов В.М. История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учений. М.: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1999. С.86.

② Виноградов В.В.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их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учений. М.:«Высшая школа», 2005. С.143.

③ Потехня А.А. Из записок по русской грамматике, Часть 1. М.: Просвещение, 1927. С.142-169.

④ Потехня А.А. Мысль и язык. М.: Харьков, Тип. «Мирный труд», 1913. С.136-142.

⑤ 参见 Алпатов В.М. История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учений. М.: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1999. С.89.

是因为：在西方理性主义学说中，所谓思维或意识，就等同于语言思维或语言意识，但波捷布尼亚显然又不完全赞同这一观点，而是将语言与思维视作既密不可分、又有区别的不同事物。例如，我们仅从《思维与语言》这部著作的名称就能看到语言与思维在其学说中所具有的不同特质；再如，他所强调的语法范畴与逻辑范畴不相等同以及词具有“近义”和“远义”等思想，又将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进行了必要区分。当然，有关“语言是历史现象”、“民族是语言的主要创造者和改革者”以及词的“内部形式”等一系列思想，就完全是斯拉夫主义方法论性质的了。对此，我们可以从洪堡特的“民族心灵”论（дух народа）即“语言世界观”（языковое мировидение）学说中比较清晰地看到其根系所在。在我们看来，也正是基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有机结合，波捷布尼亚才有可能对俄语史和俄语语法做出不同于其前辈的全新解释，才有可能赋予鲜活的言语和民间口头创作在语言学研究中的特殊价值。

在历史比较语言学方向上，以福尔图纳托夫（Ф.Ф.Фортунатов，1848-1914）为代表的莫斯科语言学派和以博杜恩·德·库尔德内（И.А.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е，1845-1929）为代表的喀山语言学派的形成，不仅标志着俄罗斯在语言的形式与功能两大研究领域走在了世界前列，也奠定了俄罗斯语言学方法论传统的完整体系，同时又为俄罗斯语言学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我们知道，19世纪是历史比较主义方法盛行的世纪，俄罗斯也不例外。在该语言学流派中，俄罗斯有数十位知名学者从事不同领域的学术研究，领域涉及斯拉夫语族之间的对比研究、斯拉夫语与俄语的对比研究、俄语与西欧语言的对比研究等。其中，福尔图纳托夫和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理论学说最为著名，他们的学术成就受到世界学界的高度评价。

福尔图纳托夫作为莫斯科语言学派的创始人，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等一系列领域都曾取得创造性成果。其中，最具学术价值的思想有：（1）语言的社会属性思想。他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语言的历史同社会的历史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只有通过历史比较的方法才能对共同印欧语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据此，他把语言的发展分为外部历史和内部历史，认为前者是由语言与社会及操该语言的民族所决定的。社会的分化必然伴随着语言

分化为方言的过程，而语言分化、消亡时，方言又会发展成为独立的语言。正是由于原始社会地域间缺乏联系，才促使方言发展成为独立的语言；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文字和标准语的出现，又促使地方方言联合成统一体。(2) 语言的系统性思想。他把语言看作是一个整体，认为语言与思维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不仅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表达说者思想和感知的工具。<sup>①</sup>这一重要思想客观上为当时学界完整而全面地认识语言学的性质、任务、对象和范围等指明了方向。(3) 形式功能的思想。尽管福尔图纳托夫对俄语语法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词形和词的语法类别以及词组形式、句法形式等方面，但他的语法形式观却是以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为出发点的。例如，他将词分为完整词、部分完整词和非简单词等，同时提出，要研究词的现实意义和形式意义的思想，就必然隐含着对人的思维因素的考量，这就决定了他的语法形式观带有形式功能的性质；再如，他从建立在语法聚合体基础上的形式功能思想出发，不仅区分了语言结构中的现实范畴和形式范畴，还将构形范畴和构词范畴视作有助于实现语言交际功能的语法结构的微系统，从而在根本上使自己的形式语法观具有了历史功能主义新型语言观的性质。<sup>②</sup>从这个意义上讲，福尔图纳托夫的形式功能观，既是对其导师布斯拉耶夫的形式逻辑语法思想的发展，也是对斯拉夫主义一贯秉承的历史主义原则的发展，西方的理性主义和俄罗斯的经验主义在该学说中得到了完美的融合。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是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俄罗斯最伟大的语言学家之一。作为喀山语言学派的创始人，他在语言学的许多领域都曾取得过领先于世界水平的重要成果，如语言与言语的学说、语言研究的静态与动态思想、语言符号系统观以及音位学理论等，因此被誉为现代语言学的先驱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奠基人。但就语言学研究方法而言，其语言观依然没有摆脱历史比较主义的性质，且其本人也有许多著述涉及历史比较研究，因此，将其放在历史比较语言学流派中加以审视是合适的。总体看，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语言学理论学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实现语言学研究的转向，即由历史主义转向鲜活的言语——人的言语活动。在他看来，语言的

---

① 参见赵爱国：《20 世纪俄罗斯语言学遗产：理论、方法及流派》，第 160-162 页。

② 邴友昌：《俄罗斯语言学通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年，第 130 页。

本质在于言语活动和言语功用之中，因此语言学的首要原则就是要研究鲜活的人类语言，只有这样，语言学才能够证明语言的生命及其发展规律。他说，研究现存的能够观察到的鲜活语言，特别有利于对语言生命的诸方面做出解释，这比研究已经不存在的、只能通过书面文献了解的语言更有裨益……只有对鲜活语言有全面了解的语言学家，才能够使自己对已经消亡的语言特点做出推断。<sup>①</sup>这一思想与19世纪下半叶兴起的“青年语法学派”（младограмматизм）的观点十分接近，标志着俄语和斯拉夫语的研究开始由历史主义转向社会现实中的语言。所不同的是，青年语法学派转向鲜活的语言主要是为了确定语言的过去成分及痕迹，而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目的是为了更加科学地认识语言发展的规律和语言与方言之间的相互作用规律。（2）摒弃起始于古希腊罗马的语言学所固有的“词语中心主义”（словоцентризм），开创“语句中心主义”（фразоцентризм）研究的先河。他提出“语感”（языковое чутье）的概念，并在这一概念基础上构建起语句中心主义理论。他认为，现实中不只是词才发出声音，词只是事实上发出声音的寻常部分，而“语句”（высказывание）才是语言学分析的基本单位。<sup>②</sup>尽管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语句中心主义思想并不是以意义为中心的，但却在客观上强调了对语言内容层面（思想性）的展示和研究，同时也开创了语言学史上的语句中心主义范式，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3）强调语言的社会属性和交际性。他认为，只有人类社会才可能有语言，因此，语言学的原理不仅包括个体心理学，还包括社会学。<sup>③</sup>他在研究方言尤其是俚语的变化时，揭示了语言变化的社会成因，那就是“人与人之间交际的连续性”。<sup>④</sup>此外，他在强调语言变化的社会成因时，还提出人对语言有意识的干预这一重要因素。他说，语言既不是封闭的机体，也不是不可侵犯的神像，语言是工具和活动。因此，人不仅有权利以其社会责任来

---

① 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е И.А.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по общему языкознанию т.1. М.: АН СССР, 1963. С.137, 346.

② 参见Алпатов В.М. История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учений. М.: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1999. С.121-122.

③ 参见Щерба Л.В. Языковая система и речев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Л.: Наука, 1974. С.385.

④ 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е И.А.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по общему языкознанию т.1. М.: АН СССР, 1963. С.224.



改善这一工具，以使其符合使用之目的，甚至可以用更好的工具来替代之。语言与人不可分，人应该更加全面地掌握语言，以使其越来越依赖于人的有意识干预<sup>①</sup>。（4）提出音位学理论。这是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对世界语言学发展做出的最主要贡献之一，是他奠定了音位研究的形态化和语义化学说。他把音位理解为能反映某思想实质的心理单位，认为音位是最小的心理学单位，虽然不同人的语音表征可能不相等同，但它是客观存在的。音位属于语音世界的表象，它是由同一声音所获得的表象融合在心灵里所产生的，是语言声音的心理等值物。<sup>②</sup>应该说，尽管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把音位归属于个体心理学的种种界说有一定的片面性（如很难对该单位进行客观描写等），但却鲜明地反映出该理论所秉持的是以语言的功能以及人或人的心理为中心的原则。

以上就是俄罗斯语言学方法论从欧洲主义到斯拉夫主义再到“雅努斯”传统形成的大体脉络。它表明，俄罗斯语言学传统的形成是欧洲主义方法论与斯拉夫主义方法论相结合的产物，或者说是西方理性主义与东方经验主义经过近一个半世纪的纷争、磨合并最终走向融合的结果。<sup>③</sup>

## 五、“雅努斯”语言学方法论的学理形态

我们从上文可以清晰地看到，俄罗斯“雅努斯”语言学方法论的形成，学理上是由欧洲主义与斯拉夫主义“合二为一”的结果。因此，理论上讲，目前我们在许多情形下已经很难从该特质中分辨出哪些是欧洲主义的，哪些又是属于斯拉夫主义的了，因为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混合体”，它的名称就叫“俄罗斯语言学”。但这丝毫不表明，“俄罗斯语言学”就姓“俄”，它在学理上的确具有“雅努斯”的方法论特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对该特质的学理形态或体现形式做出语言学（确切地说是语言哲学）的解答。

① 参见 Алпатов В.М. История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учений. М.: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1999. С.127.

② 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э И.А.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по общему языкознанию т.1. М.: АН СССР, 1963. С.271-272.

③ 此处“东方经验主义”中的“东方”二字，特指“俄罗斯”，因为在斯拉夫主义者看来，俄罗斯相对西方而言就属于“东方”。

在我们看来，审视俄罗斯“雅努斯”特质的语言学方法论，采用辩证的思维即“对立统一”的方法较为合适，因为作为方法论的“雅努斯”，本身就是一个“对立统一体”。研究表明，俄罗斯语言学方法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在学理上构成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一是在看待世界的方式上，它融合了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双重视角。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即“言物关系”，是语言学研究的永恒主题之一，这是因为：语言学作为语言的科学，其根本任务并不是提出一种新的哲学来重新解释世界，而是从语言学的视角提出对语言符号与世界关系的解答。对此，西方理性主义的解答是：依赖语言来揭示理性，依赖理性来认知世界；而俄罗斯语言学方法论是融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为一体的，因此，它对“言物关系”的解答是：世界即具有理性，又具有体验性，即世界可分为“形上”和“形下”两个世界。形上即唯心论，它集中体现为世界具有语言性；形下即唯物论，它集中体现为世界具有生活体验性。唯心论和唯物论的结合，应该就是俄罗斯语言学看待世界的独特方式。对此，我们从 20 世纪俄罗斯语言学的诸多理论学说中清晰地看到了这种方式。如，20 世纪 70-80 年代兴起的语言世界图景理论、语言的世界观念化理论、语言个性理论、语言意识理论等，就是形而上视角的，它们试图用语言学的方法来认知和解释世界；而整个 20 世纪有关俄语史的学说以及形式主义文论、文化符号学理论、言语活动论等，则是形而下视角的，它们的目标是用俄语的现实（历史、文本等）或俄罗斯民族文化和心理，对世界做出唯物主义的解释。

二是在对语言性质的解释方面，它既体现为西方的“本体论”，也表现为东方的“载体论”。语言究竟是意识或思维的“本体”还是“载体”，这是东西方语言哲学的基本分野之一。在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中，语言历来被看作是“实在的反映”和“思想的表达”。<sup>①</sup>例如，柏拉图（Платон，前 428-

---

<sup>①</sup> 如柏拉图就提出过“名称表现事物”的思想，此处的名称就是指语言；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口语是心灵的经验的符号”等，这些都是“语言本体论”的哲学渊源。当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分别是“唯名论”和“唯实论”的积极维护者，两者的学术主张并不完全相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是在反对柏拉图“唯名论”思想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他并没有把词语与事物等同起来，而是认为“心灵的经验”反映着事物。但无论是“唯名论”还是“唯实论”，它们都是语言本体论思想的根系所在。

前 348) 就曾提出“借助于语言来研究事物的真理”的主张, 因为在他看来, 只要人们理解了语言的结构, 便能够理解“实在”的结构。后来, 这一思想从整个中世纪一直延续至近代。19 世纪末, 尤其是 20 世纪初, 哲学实现了“语言学转向”后, “语言本体论”在语言学研究中就真正确立起主导地位。在此背景下, 西方理性主义提出了语言决定思想、语言决定世界观、语言是思维的物化等一系列理论和学说, 其中最为著名的有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学说, 康德(И.Кант, 1724-1804)的“思想构建论”, 维特根斯坦(Л.Витгенштейн, 1889-1951)的“语言图景论”, 萨丕尔(Э.Сепир, 1884-1939)和沃尔夫(Б.Уорф, 1897-1941)的“语言相对论”, 海德格尔(М.Хайдеггер, 1889-1976)的“语言存在论”(即所谓的“词语破碎处, 无物可存在”)等。应该说, 这些理论学说在俄罗斯语言学方法论中占有一定的优势地位。关于这一点, 我们在当代俄罗斯语言学范式——“人类中心论范式”(антропоцентрическая парадигма)的许多理论中都可以看到, 因为该范式的学理内核之一就是凸显“人说的语言”(язык в человеке)。<sup>①</sup>然而, 俄罗斯语言学方法论中还有明显的“载体论”思想, 即将语言视为表达思想的手段, 其最为突出的学说是“语言工具论”(例如, 列宁和斯大林就曾多次强调“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的思想), 以及在强调“人说的语言”的同时注重对“语言中的人”(человек в языке)或“说话的人”(человек говорящий)做出解释。也就是说, 俄罗斯语言学方法论中的语言, 同时还包含着语言的客体和语言的交际主体两个维面, 这是其区别于西方理性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另外, 在当代俄罗斯语言学理论中, 言语交际理论、言语礼节理论、言语策略理论等, 也都是视语言为人类交际之工具的人类中心论学说。<sup>②</sup>从认识论角度看, “本体”与“载体”之争, 其本质是语言与意识孰先孰后的问题: 前者认为是语言铸就了意识活动的形态和功能, 语言决定了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 后者则认为意识先于语言, 意识驱动言语表达。而在俄罗斯语言学方法论中,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则更多地体现为密不可分对立统一体。

---

① 参见赵爱国:《当代俄罗斯人类中心论范式语言学理论研究》, 第 1-9 页。

② 参见赵爱国:《当代俄罗斯人类中心论范式语言学理论研究》, 第 162-213 页。

三是在评价语言的功能上，它既奉行西方的“言尽意”，也看重东方的“言不尽意”。应该说，东西方传统在语言功能问题上的分歧十分明显，集中体现为“不尽意”与“尽意”的争论。西方理性主义一贯倾向于从积极的方面来评价语言的功能，并想方设法地促使语言达成“尽意”之完善程度。如西方近现代的几个著名语言学派——波尔—罗雅尔学派、青年语法学派、伦敦学派、布拉格语言学派、美国描写主义学派等，就是功能主义的积极建构者和推行者，其共同特点是极力从理性视角来证实语言与思维具有“内在于同一性”，即“言意关系”的整体性。显然，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中的“言尽意”思想带有“语言绝对论”色彩，如维特根斯坦的“语言的界限就是思维的界限”、洪堡特的“每一种语言中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等思想，就将语言的功能推向了“极致”。俄罗斯语言学方法论除具有上述特点外，也十分看重对日常生活的“体验性”以及语言的社会属性和文化特性等。以邦达尔科（А.В.Бондарко）为代表的彼得堡“功能语法理论”（теория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为例，该理论最大的特点是采用从意义到形式和从形式到意义的“双向研究”，既从手段到功能——用于理解他人话语，又从功能到手段——用于说者表达思想。这在我们看来，他之所以要采用双向研究的方法，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单向研究具有“言不尽意”的性质。另外，在语义学研究中，俄罗斯学者同样既看重对理性意义的分析，也注重对非理性意义（如伴随意义、修辞意义、联想意义、背景意义、语境意义等）的阐释。这也是俄罗斯语言学方法论的重要特点之一。

四是在解决“言意关系”的方式上，它既采用“不断完善”的方法，也重视“有限超越”的定势。“言意关系”即语言与意识的关系问题，它是语言哲学关注的核心内容之一。对于“言意关系”之间出现的矛盾，俄罗斯语言学方法论所采取的解决方式是东西方传统的对立统一。西方理性主义解决“言意关系”矛盾的基本取向不是“超越”，而是“完善”，即从“语言本体论”出发，采取多种方法来不断完善语言之功能，并以此来协调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关系。“完善”的方法很多：方法之一是语义分析，力求通过语义的辨析或逻辑分析，使语言的表述逐步走向精密化，以此来消除意义和逻辑上的歧义；方法之二是阐释，把交际对象引入语言意义的重构活动之中，通

过不同对象的反复解读（或同一对象的反复解读），使原有文本的意义不断生成新的意义，从而拓展语言的表意功能；方法之三是解构，即与阐释相反，通过拆解语言符号或文本的结构，以消解或颠覆语言系统原有的中心意义。而俄罗斯语言学方法论则在上述理性主义所推崇的“不断完善”的基础上，还追求对语言本身实现“有限超越”。具体体现在：它不是单纯地依仗概念化的词语来表达思想，而是采用多样化的手段使人得到启悟；它不单单满足于对言辞表层意思的理解，而是以此为阶梯，去领悟语言深层的思想意境。在这一方面，具有跨学科性质的“语言文化学”（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中的许多理论（如观念理论、语言逻辑分析理论、定型理论、先例理论等）以及俄罗斯著名符号学家、思想家巴赫金（М.М.Бахтин，1895-1975）提出的“超语言学”（металингвистика）理论学说就是最好例证。<sup>①</sup>这些理论并不像现代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Ф.Соссюр，1857-1913）所提出的那样，“就语言为语言而研究语言”，而是跳出语言符号之外，充分考虑语言外的各种因素（文化因素、社会因素、心理因素、民族心智因素等），并采用不同的方法对语言现象做出语言文化或语言认知的阐释。这无疑又是俄罗斯语言学方法论有别于西方的最为明显的一大特点。

以上可见，所谓俄罗斯语言学方法论的“雅努斯”特质，至少在上述四个方面展现出其特有的学理形态。如果用一句话对该特质做出概括的话，则可以表述为：它在哲学上体现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对立统一”观，学理上展现为“欧洲主义”与“斯拉夫主义”的综合体，构成上显现为“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有机融合。

最后需要强调两点：一是关于该方法论特质对俄罗斯语言学发展的影响和引领问题。我们知道，虽然“雅努斯”方法论特质形成于19世纪末，迄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期间还经历了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思想潮流等方面的重大变革，但就其基本形态而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只是在整个20世纪的语言学发展进程中得到不断的修补和丰满，使其在学理上变得更富有张力，更符合世界发展的趋势，特色也更为鲜明。对此，我们曾对20

---

<sup>①</sup> 巴赫金本人对металингвистика的理解，并不是国内学界普遍认同的“元语言学”的含义，而是“超出本身界限的语言学”的意思。因此，我们采用他本人的界定。

世纪俄罗斯语言学研究的基本特点做过概括,认为它具有“与世界保持同步发展水平”、“学术底蕴深厚”、“语言观独特”、“崇尚人文主义”、“大行功能主义之道”、“整合研究方法”、“研究体系完整”、“超强的学理传承性”八大特色<sup>①</sup>,从而印证了该方法论特质对整个20世纪俄罗斯语言学发展所具有的引领作用。二是该方法论特质对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印证和启迪问题。我们认为,俄罗斯语言学方法论特质的形成过程,与俄罗斯思想传统或社会意识的形成过程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和互动性,且在学理形态上彼此十分相似。因此,梳理和甄别其语言学传统中的方法论特质,将有助于我们在了解和研究俄罗斯思想特质方面“举一反三”,以扩大我们的既定视野,深化我们的理论思维,并对语言学以外的其他学科的研究提供方法论印证。例如,在如何看待当今俄罗斯思想意识形态的特质问题上,我们就很难一维地从欧洲主义或斯拉夫主义或欧亚主义的视角去下结论,而应该综合地、辩证地、全面地去做出相应的评价。这也是我们撰写本论文的主旨所在。

---

**【Abstract】** Among various perspectives in Russian Studies, the language philosophy--linguistic methodology research should be the indispensable one.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Russian linguistics tradition in methodology perspective formed from middle 18<sup>th</sup> century to late 19<sup>th</sup> century, influenced by two revolutionary changes, namely, Europeanism and Slavophile, in Russian thoughts history. Therefore, Janus quality containing two different trends of philosophical thoughts is reflected in Russian linguistics methodology. The quality is also represented as the forms of scientific principles of unity of opposites in philosophical dimension, including Metaphysics and Dialectics, Ontology and Instrumentalism, Full Impressive Speech and Partial Impressive Speech,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and Finite transcendence.

**【Key words】** Russian Linguistics, Europeanism, Slavophile, Qualities of Methodology, Forms of Scientific Principles

**【Аннотация】** Россияведение могут изучать с разных точек зрения,

---

<sup>①</sup> 参见赵爱国:《20世纪俄罗斯语言学遗产:理论、方法及流派》,第11-14页。

одним из их важных подходов являются изучения философии языка, т.е. в подходе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й методологии. Наш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казывают, что российская традиция в лингвистике сформировалась со середины 18-го в. до конца 19-го в., если рассматривать её с подхода вышесказанной методологии.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этих 150 лет Россия претерпела дважды т.н.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е перемены» в идеологиях — крещение европеизма и славянофильства, что предоставило российской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й методологии особые качества — качества «Януса», которые на разных уровнях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развертываются как единство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остей та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как метафизика и диалектика, онтология и инструментализм, полное выражение слова и частичное выражение слова, непрерывное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е и ограниченное превышение ит.д.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российск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 европеизм, славянофильство, 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е качества, формы научных принципов.

---

(责任编辑 阎德学)

## 当代俄罗斯东正教社会服务简析\*

徐凤林\*\*

**【内容提要】**当代俄罗斯东正教会积极开展慈善事业和社会服务工作，这些工作广泛涉及孤寡老人的医疗服务、反酗酒和戒毒、孤儿和残疾儿童救助、反堕胎、反失业、帮助难民和灾民、囚犯和军人的牧养和道德教育等。教会也制定了社会服务工作的官方管理条例，具体规定了四个级别（全教会级、主教区级、管区级、堂区级）的社会服务工作主管人的具体职责。一方面，这些社会服务的组织管理经验值得借鉴，另一方面，如何看待宗教慈善活动的道德本质和社会价值的问题，也值得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俄罗斯东正教 慈善事业 社会服务

**【中图分类号】**D751.2;B976.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6)04-0111(14)

俄罗斯东正教会在当代俄罗斯的政治、文化、教育、道德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领域已得到我国学者的研究。但还有一个方面未得到应有的关注，这就是，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社会服务在近20年来迅速发展，并逐步走向组织化和系统化，已成为当今俄罗斯社会公益和社会慈善事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 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提出的中肯和宝贵意见，文中疏漏之处由作者负责。

\*\* 徐凤林，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及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督宗教积极倡导普遍之爱的精神，具有为邻人服务、为所有人奉献、乃至爱自己敌人的思想。教会号召自己的成员参与基督侍奉世界、献身于世界的使命。听从基督对自己门徒的号召，要成为“世界之盐”和“世界之光”。“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为众人的赎罪而奉献自己的灵魂”（可 10:45）。教会所说的爱的对象不仅是教会成员，而且扩展到不属于教会的人。

在这些教义与神学思想基础上，也是作为一种传教手段，基督宗教形成了深远的社会慈善活动传统。这一传统由于基督宗教不同派系的神学差异，以及各派系所处的不同政治与文化环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多种不同形式。相比之下，当代俄罗斯东正教会在社会工作方面具有其特定优势，第一，东正教是俄罗斯第一大传统宗教，信徒人数占全国人口半数以上；东正教与俄罗斯历史和民族文化有密切关系；第二，俄罗斯东正教会作为一个社会机构，有职业神职人员，有明确的等级制度，这有利于社会服务工作的组织管理；第三，教会有合法地位，是拥有一定资产的法人，这些资产是教会存在和从事社会服务的经济基础；第四，教会有严密的教义和崇拜体系，有利于给被帮助对象提供具体的精神依托与安慰。

追溯历史，由于俄罗斯东正教会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的变革，其慈善事业和社会服务也历经了几次变化。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10 世纪末基辅罗斯接受东正教到 18 世纪彼得改革之前，教会的慈善和救助事业得到国家的信任，成为俄国社会慈善事业的主要力量。在俄罗斯北方领土开发过程中，率先来到荒芜之地的修士或信徒在此建立教堂，后来者便在教堂周围建立居住点，形成堂区（приход）。堂区不仅是一个聚集礼拜的中心，而且具有行政功能，还是一个慈善救助机构：帮助老弱病残者和穷人。有俄国学者把教会堂区的救济活动看作是现代社会慈善形式的本原，指出了救济思想的继承性<sup>①</sup>。修道院成为慈善活动的中心。许多穷人子女只能在教会堂区学校接受教育。教会领地成为国家财政和粮食征集的重要来源。乡村居民

---

<sup>①</sup> См.: <http://bibliofond.ru/view.aspx?id=524467>

在遇到灾难时到附近堂区寻求帮助。第二阶段，18世纪以后，国家开始自己从事慈善活动，推动社会救济的进化。但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社会服务继续存在，仍然具有其现实性。第三阶段，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政权没收了教会财产，取消了教会的法人地位，教会成为无财产的社会组织。政权不允许教会对社会生活的干预。根据1929年4月的《宗教团体法》（第17条），教会禁止从事慈善活动。20世纪80年末期，在改革形势下，教会一再声明希望加入日益活跃的慈善运动，但当时政府的回答是，只限于允许神职人员进入苏联文化基金会和儿童基金会。第四阶段，后苏联时期至今。东正教会的社会服务工作得到了恢复和进一步发展。1993年通过的俄联邦宪法确认了宗教团体与国家分离，但其前提已经是完全承认教会的合法地位和作用。2000年通过的俄罗斯联邦《信仰自由、宗教团体和教会法》允许宗教团体和教会从事慈善活动。

进入21世纪，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社会服务活动出现了繁荣发展的局面，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教会制定了多个有关社会服务方面的官方文件。2000年8月俄罗斯东正教主教会议通过的《俄罗斯东正教的社会观原则》，明确表达了教会对当代社会现实问题的基本立场。随后，在多次主教会议和圣主教公会的决议和文件中，继续发展这一社会学说。具体到社会服务方面，2004年通过了《俄罗斯东正教会关于参加与艾滋病传播的斗争和有关艾滋病毒携带者工作的构想》；2005年通过了《俄罗斯东正教会关于预防吸毒和酗酒的构想》；2008年通过了《俄罗斯东正教会关于人的尊严、自由与权利的学说原则》。特别是主教会议2011年2月4日通过的《俄罗斯东正教会社会工作组织原则》，标志着教会社会服务工作走向进一步系统化和规范化（详见本文第三部分）。

第二，为了积极重建慈善活动以及对其加以协调和使其获得系统的保障，莫斯科牧首区建立了相应的管理机构。最主要的机构是俄罗斯正教会慈善事务与社会服务部。该部对主教区、堂区和修道院的慈善事业具有经常性的指导和帮助，包括物质帮助和咨询帮助。该部还出版《服事》（*Диакония*）月报，分发到各主教区。此外，教会还设立了教会与社会相互关系部、宗教教育和教义推广部、青年事务部、与武装力量和维权机构相互作用部。2009

年1月基里尔牧首上任之后，赋予教会的社会服务工作以特殊意义。他改组了俄罗斯东正教会主教公会内部有关社会服务的机构，从2009年到2010年初，先后组建了防止酗酒教会—社会委员会、监狱服务部、教会孤儿院和教会儿童保障问题委员会。

第三，近年来俄罗斯涌现出许多东正教慈善基金会和协会，如“帮助妇女和儿童慈善基金会”（2005年）、“传统”（Предание）慈善基金会（2009年）、“示道（Одигитрия）慈善基金会”（2013年）等。东正教慈善组织、基金会、协会的活动包括：1）帮助有需要的个人和社会群体（如流浪者、移民等）；2）对慈善性的社会计划给予拨款和组织，其具体方向依据基金会的目的不同而不同，如建立慈善食堂、慈善商店、慈善物品分发点、社会适应中心、慈善医疗站，关照儿童，帮助囚犯等；3）研究本国和外国慈善活动经验，等等。

## 二

当代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社会服务工作在许多领域展开，概括起来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 （一）医疗服务

建立教会医院和诊所，对特殊人群提供医疗服务，这是当今俄罗斯东正教会社会服务的最重要方面。早在1990年末，就在圣彼得堡开设了1917年以后的全国第一家教会慈善医院，叫作彼得堡圣克塞尼亚慈善医院。1997年3月，俄罗斯东正教会与俄罗斯保健部签署了合作协议，旨在扩展教会对病人的牧养，与医疗机构共同制定慈善方案。莫斯科牧首区中心医院领导部门与莫斯科市政府一起在该医院基础上建立了家庭医疗保健科，其职责是保障对病人和老人的看护。目前这样的家庭医疗保健科已经在莫斯科南区开始运行。在医疗由公费转向商业化的条件下，莫斯科牧首区中心医院是少数几家看病和治疗免费的医院之一。通过教会慈善事业部，可以让病人住进阿列克谢耶夫第一精神病院（卡先科医院），该医院在1996年7月建成了一座

小教堂，教堂主持人负责对精神病人的教牧工作。

当前，莫斯科的许多堂区在各领域积极开展社会服务。第一市立医院的季米特里王子堂区，在姐妹会<sup>①</sup>的帮助下建立了家庭巡诊制度。毕业于医学专科学校的慈善姐妹和堂区女平信徒在第一市立医院的各个艰苦部门工作，做家庭巡诊护士和护理员。医院的家庭巡诊部也有许多该堂区的女平信徒，他们上门为病人服务，打扫房间，洗衣服，做饭，购买食物。受过医学教育的人则进行医疗护理——打针，包扎，输液，喂食，个人卫生，病人的局部康复。姐妹会成员不仅承担第一市立医院的勤务、照看病人和进行家庭巡诊，而且到第 12 幼儿园和圣季米特里孤儿院照顾残疾儿童，还有帮助在押的犯人等。

## （二）反酗酒和戒毒

反酗酒也是俄罗斯东正教会长期参与的事业。早在 19 世纪 50 年代，俄罗斯就开始出现第一批堂区戒酒协会。到 20 世纪初，实际上每个主教区都有了戒酒协会。1912 年在莫斯科召开了以宗教道德为基础的反酗酒活动家全国代表大会。这一传统在经历了苏联时期的中断之后，到 20 世纪末又开始恢复。1996 年，俄罗斯东正教会开始实施反酗酒纲领。此纲领按照“家庭戒酒社”的原则进行，即在治疗酗酒的同时培养家庭成员间的同情与互助气氛。现在俄罗斯有 25 个家庭戒酒俱乐部，还有 8 个正在准备成立。在莫斯科市司法部注册了一个“戒酒之路”社会组织，其监督委员会包括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代表。

2008 年 4 月注册成立了弗拉基米尔州反吸毒和酗酒社会组织“自觉”（Осознание）中心，该中心的主要活动内容有三项：驻站康复（可容纳 70 人驻站 6 个月）；康复后规划（6 个月）；帮助安置工作。这期间，在主教区某些教堂举行面对“喝不醉的酒杯”圣母像的弗坐词祈祷仪式，仪式之后，为吸毒和酗酒者及其亲人做有关咨询。该中心还与联邦政府吸毒者复发监督

---

<sup>①</sup> 姐妹会（Сестричество）：东正教会女平信徒自愿成立的组织，通常建立在堂区，经堂长同意，受主教领导。姐妹会基本上是慈善和义工组织，其主要工作是在各类医疗机构从事护理和社会服务。活动费用依靠个人收入或自愿奉献。姐妹会成员叫作“慈善姐妹”，通常身着白色衣帽。俄罗斯的姐妹会不是女修会，不要求发修道誓约。

机构和青年事务局一起，对中学生和大学生进行预防教育，印发宣传画，出版“自觉”报，在弗拉基米尔州和下诺夫哥罗德州发行<sup>①</sup>。

莫尔多维亚自治共和国的萨那克萨尔男修道院有一个戒毒康复中心，常年住着 20 多位戒毒康复者。其治疗康复方法的特点，是把医学的心理治疗与宗教的灵魂牧养结合起来，在日常生活和劳动中帮助戒毒者重新理解生命意义。结果显示，教会康复中心的吸毒患者康复率远远高于专门医疗机构，这显然与灵魂的灵魂牧养有关。但目前许多类似的教会和修道院戒毒康复中心还不在于国家法定范围内，教会希望更多地参与到这一社会服务工作中来<sup>②</sup>。

### （三）儿童救助

在莫斯科东北的梅德维德科沃区建立的拉多涅日的圣谢尔基孤儿学校，有 70 多个来自不良家庭的孩子在这里生活和学习。学校设有小教堂，学生们在这里进行祷告、洗礼和教义手册对话。梅德维德科沃庇护教堂堂长波菲利·吉亚切克尽力参加孤儿和残疾儿童的灵性牧养。孤儿学校的学生在课余时间不仅观看戏剧、马戏，参加夏令营，而且从小学习帮助在附近居住的老年人。教会慈善事务与社会服务部还成立了萨罗夫的圣色拉芬国际慈善中心，其任务是对那些需要社会保护的儿童进行精神教育和职业培训，以及为他们的独立生活创造物质条件。此外，还建立了孤儿和残疾儿童救助协会。

### （四）青年工作

青年问题成为当今俄罗斯的一大社会问题，其中包括堕胎问题。俄罗斯东正教会积极参加反堕胎活动。莫斯科的沃罗涅日的圣米特罗凡堂区组建了“生命”医学教育中心，专门从事关于“堕胎是严重罪孽”的宣传教育。就这一现象和问题，该中心工作人员在 3 年时间里，在中学和职业院校举办了近 800 场讲座，制作了几十个广播节目，7 个电视节目，有 20 多个出版物。其小册子和传单的总印数达到几百万份。与 598 个医疗机构建立联系，定期

---

① <http://social.miloserdie.ru/service/550>

② Моисеева, Елена Николаевна. Система социального служения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в регионе (2010) // <http://cheloveknauka.com/sistema-sotsialnogo-sluzheniya-russkoy-pravoslavnoy-tserkvi-v-regione#ixzz4CMuyjEdD>

给他们发送宣传材料。莫尔多维亚自治共和国的萨兰斯克和莫尔多维亚主教区实行独特的反堕胎措施，即神父与打算堕胎的妇女谈话的机制。莫尔多维亚医院规定，准备堕胎的妇女在手术前一定要会见神父。经过谈话，有些人在手术前一分钟被成功劝阻。这一措施取得了显著效果。医生说，在莫尔多维亚实行这样的谈话措施后，堕胎数量明显减少。

### （五）反失业

失业成为当今时代的标志。这一问题也进入俄罗斯正教会的关注范围。目前，教会慈善部正在与列佛尔托夫的圣彼得保罗教堂一起制定关于创造工作岗位的纲领，计划让失业的女信徒在家从事缝纫工作。此外，教会慈善部下设的妇女慈善组织协调委员会也在致力于解决妇女失业问题。俄罗斯东正教会与国家生活保护部签订了合作协议。

### （六）帮助难民和灾民

俄东正教会关注难民，主要指邻国和俄联邦一些自治共和国（车臣、北奥赛梯、印古什等）的俄族居民。教会慈善部与国家和社会组织合作，给这些组织提供咨询和力所能及的物质帮助，包括衣服、食物、国境文件等。教会还对自然灾害和非常状态的受害者提供慈善帮助，而不论灾民的民族和宗教属性。

### （七）囚犯工作

按照国家法律，监狱关押是惩罚犯罪者的基本方式。但这一方式对犯人的道德改造作用未必显著，甚至收效甚微，许多刑满释放人员重新走上了犯罪道路。东正教会通过监狱布道的方式，力图对犯罪者进行精神改造。东正教神职人员与犯人的交流建立在另外的道德心理基础上，神父把犯人与他的犯罪分开来看，主要不是把犯人看作是有罪过者，而主要看作是恶意志的牺牲品。他们依据人具有上帝形象的观点，认为恶是人的非自然状态，像是一个健康人生了病。1994年在多莫杰多沃教学中心召开了劳改机构和教会代表联席会议，讨论在对犯人进行教育工作中的合作问题。如今已有 60 多家

劳教机构设立了东正教堂或祈祷所。来自监狱犯人的信件表明，这些教堂在对囚犯的精神支持和改造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 （八）在武装力量中的社会服务

今天俄罗斯东正教会已与5个有军事编制人员的部委签订了共同声明，与联邦边境办公室共同确认了合作前景方案。作为合作的发展和补充，与内务部签订了合作协议，其中规定了关于克服精神道德危机和加强法制的一系列措施。教会正在准备与国防部签订同样的协议，其中规定在军人的爱国主义教育 and 精神道德教育问题上的合作，确定实现这些宗教需要的实践步骤。

可见，当前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社会服务已开展得十分广泛，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需要加强管理和规范化的问题。针对这一情况，教会不断研究制定社会工作的组织协调和管理规范。其中最重要的文献是主教会议2011年2月4日通过的《俄罗斯东正教会社会工作组织原则》。

## 三

《俄罗斯东正教会社会工作组织原则》<sup>①</sup>的主要内容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社会服务的对象和神学基础；第二部分，信徒在社会服务组织中的职务身份和活动项目；第三部分，教会社会工作管理体制的四级结构及其具体职责。

文件指出，教会的社会服务不能受某些宗教的、民族的、国家政治的或社会的框架的局限。教会把自己的爱心不仅伸向自己的成员，而且伸向不属于教会的人（路10:31-37）。慈善服务的基础是爱。按照使徒保罗的话说：这“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林前13:4-7）。按照希腊教父神学家格里高利（Григорий Богослов，公元329-389年）的说法，爱的最卓越的部分，是“对穷人的爱，是怜悯和同情。……因为任何服务都

<sup>①</sup> 参见俄罗斯东正教会官网，<http://www.patriarchia.ru/db/text/1401894.html>

不如慈善那样是上帝所喜欢的”（《讲道集》14，论爱穷人）。

文件规定了当今东正教信徒在有组织的社会工作领域可以承担的职务，包括：

（1）社会活动协调人——作为教会机构有工资的在编职员（教士或平信徒）。他们从事服务活动的协调和社会规划的组织工作。主教区协调人有义务向主教汇报工作，管区协调人有义务向监督司祭汇报工作，堂区协调人有义务向教堂主持司祭汇报工作。

（2）教会社会机构（幼儿园，孤儿院，养老院，慈善食堂等）的在编职员。对他们来说，教会社会工作是一种基本的职业活动。对这些职员的牧养是教会社会机构神职人员的责任领域。

（3）慈善姐妹（Сестра милосердия）——姐妹会成员。姐妹会是在神职人员领导下的妇女组织，其成员愿意在这样或那样程度上献身于慈善服务，这一组织通常拥有自己的章程和专门的入会礼。慈善姐妹可以在自己的主要工作（世俗工作或教会工作）时间之外做服务工作，或者在教会社会机构或医疗机构中任职。这一服务通常具有长期固定义务的性质。东正教男信徒也可以参加姐妹会的活动。

（4）志愿者——自由时间无偿参加教会社会活动。志愿者工作通常不需要专业培训，但对某些特定工作需要专业培训。主要是为了使志愿活动的领域最大限度地反映志愿者个人的积累和能力。

（5）捐献者——为教会社会服务提供物质保障的神职人员或平信徒。在捐献基础上建立保障经常性社会活动的物质基础。捐献可多可少，可以经常，也可以一次性。

（6）社会机构（教会的、国家的或其他的）监事会成员——在自己职责基础上为社会机构的工作提供帮助，包括监督被监护人的社会条件。

信徒为从事社会活动，可以为高龄者和残疾人建立养老院，为孤儿和无父母照顾的儿童建立孤儿院，建立慈善食堂，为无家可归者建立收容所，给那些在特殊情况中的受害者或陷入其他困境中的人，包括单身孕妇和单亲母亲建立社会旅馆，建立少年违法者复权中心、出狱者复权中心、吸毒或酒精依赖者复权中心、家庭支持中心、医疗机构（医院、诊断中心、临终关怀中



心)等。

社会活动可以是十分多样的：包括支持、巩固和维护家庭，帮助老人、残疾人、重病人、无家可归者、孤儿和无父母照顾的儿童、囚犯或出狱者、艾滋病毒感染者。

教会社会工作的协调组织部门分为四个级别：

### **(一) 全教会级 (Обще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уровень)**

全教会级协调部门，即主教公会下设的教会慈善事务与社会服务部。其职责包括：1) 制定和协调为各方面需要者提供帮助的全教会纲领；2) 促进教会社会组织在现行法律范围内获得国家订货和帮助；3) 筹备与国家权力机构签订的协议书方案和主教区使用的标准协议书方案；4) 按照社会服务的具体方面筹备系统材料并将其散发到各主教区；5) 组织针对参加教会社会服务的志愿者的定期培训班；6) 与教学委员会一起，为教会宗教学校和普通教育学校制定关于社会工作的组织和实施、以及关于神职人员和平信徒参与帮助紧急状态受害者的教程；7) 与教会宗教教育和教义培训部互动，为东正教普通教育机构和主日学校编写旨在培养同情心和助人愿望的教材；8) 与国外慈善组织包括志愿者组织交流经验，分析和运用其他宗教的经验；9) 通过出版和信息活动、通过组织专题研讨会和确定纪念日等方法吸引人们对教会社会工作的关注；10) 筹集全教会专项资金；11) 与国家机构互动，促进教会社会工作方面的立法的完善。

### **(二) 主教区级 (Епархиальный уровень)**

主教区级别的社会服务工作由主管主教负责。具体工作包括：(1) 协调主教区的全部社会工作；2) 吸引神职人员和平信徒参加慈善事业；3) 解释慈善活动作为一种特定宗教事业的意义；4) 举办关于社会工作组织和培养宗教社会工作者方面的培训班；5) 散发专门教会机构准备或赞同的用于各种服务工作培训的信息资料；6) 在各主教区建立作为热心社会活动的各领域专家(医生，心理学家，教育家等)的平信徒团体；吸引神职人员的夫人参加教会工作；7) 支持教会社会机构参加有关社会工作方面的国家级或

其他级别的竞争和投标，保障教会社会机构与相应的国家和社会组织之间的伙伴关系；8) 促进大众媒体报道全教会的和主教区的社会活动，组织社会广告；9) 依靠教会自身的和引进的资源，包括通过募捐、组织展览会和慈善拍卖，来加强主教区、堂区和修道院社会规划的物质基础；10) 请求主教区主教对积极从事社会工作的人予以奖励；11) 筹备有关与负责社会活动的地区权力机关进行合作与互动的协议书；12) 与地区权力机关和社会组织共同举行吸引广大民众的慈善活动；13) 促进各堂区与国家保健和社会机构建立经常联系，签订相互合作协议；14) 制作主教区各堂区社会工作地图，标明每个堂区设立的医疗机构和社会机构；15) 进行主教区的专项资金筹集；16) 吸引宗教学校学生参加社会工作；17) 指导兄弟会和姐妹会的慈善活动；18) 设立主教区社会部门的服务电话。

### **(三) 管区级 (Благочиннический уровень)**

管区级别的社会工作由在编的管区社会工作者直接负责。他的职责包括1) 建立和实现社会工作领域的堂区间合作；2) 规划、协调和监督堂区社会工作者的活动；3) 与地方政权和自治机关进行联络，以便组织共同活动来关照社会机构和医疗机构，以及解决堂区相关活动的问题；4) 研究和分析堂区工作报告的社会活动部分；5) 起草管区社会工作报告，交监督神父确认和主管主教审查。

### **(四) 堂区级 (Приходский уровень)**

堂区社会工作由在编的堂区社会工作者负责。其主要职责包括：1) 组建愿意和能够承担堂区社会活动的志愿者小组；2) 组织对志愿者的培训；3) 制定和不断更新需要帮助的堂区居民名单，包括孤寡老人、重病人、残疾人、多子女家庭和不完全家庭成员等；堂区社会工作者应当自己认识这些人并组织志愿者帮助他们；4) 堂区之外的社会服务工作；5) 在堂区内外筹集用于堂区社会规划的资金；6) 利用堂区网站、出版物和世俗大众媒体为堂区社会活动提供信息保障；7) 为献身于堂区慈善事业的志愿者提供精神和物质支持；8) 给堂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力所能及地参与社会倡议的机会，在主

日学校实习相应的教育纲领，以此来培养教育儿童和青少年；9) 吸引国家社会机构和医疗机构人员参与堂区社会活动；10) 对社会机构和医疗机构的人员给予精神支持；11) 参与社会机构和医疗机构中实行的各种社会规划和措施；倡导类似的措施；12) 尽力吸引更多的人参与社会和慈善活动，包括在宗教节日和某些国家节日里进行的慈善活动；13) 合理装备教堂，使那些受一定条件局限的人也能够来到教堂，使他们能够完全参加礼拜活动。

当然，目前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社会工作仍然面临诸多问题，首先是经验不足的问题。如何协调东正教组织、其他宗教组织和世俗组织的慈善活动，彼此交流经验，是当前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社会慈善事业发展的迫切问题。因此，教会正在努力加强与其他宗教慈善机构的接触——穆斯林慈善机构、佛教慈善机构，借鉴国外慈善组织的经验。

当今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作为世俗国家的一个宗教组织，它所掌握的资源 and 活动空间有限，因此，上述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教会与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密切合作，共同完成。特别是教会与世俗非商业组织的合作，对教会社会服务活动的发展具有广阔前景。许多非商业组织拥有解决社会问题的丰富资源，如合法吸引资金的机制，专业人才等，但在注册时需要寻找相应的活动场所，教会恰好能够提供自己的资源，把教堂的一部分作为这样的场所。同时，教会本身需要在神品学校和神学院培养社会服务的专业人才<sup>①</sup>。当然，所有这些方面都需要得到国家政策和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

以上对当代俄罗斯东正教会社会服务的考察，如果落实到中国语境，简而言之，具有两点借鉴意义：一是政府如何合理利用基督宗教以及其他宗教的社会慈善资源和潜力，使其成为解决社会问题和增进社会和谐积极力量；二是民政部门和社区工作，在慈善事业和社会救济活动方面，也可以学习和借鉴俄罗斯教会的社会服务经验和组织管理经验。

同时，这些经验也引发我们对一个问题的思考，这就是，我们站在教会和宗教的立场之外，如何看待宗教慈善活动的道德本质和社会价值。我们应当看到，基督宗教从事社会服务和慈善活动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有自己内在

---

<sup>①</sup>[http://scibook.net/mejreligioznye-otnosheniya\\_1018/sotsialnoe-slujenie-russkoy-pravoslavnoy-31542.html](http://scibook.net/mejreligioznye-otnosheniya_1018/sotsialnoe-slujenie-russkoy-pravoslavnoy-31542.html)

的世界观立场和宗教目标的。首先，教会的目标是实现拯救人的使命，只不过教会认为这一目标的实现途径不仅限于直接传道，而且包括做有利于改善周围世界精神道德状况和物质状况的善事。正因为如此，教会才会参与同国家的互动，哪怕国家不具有基督教性质；还有与各种社会团体和个人的互动，即便他们不认同基督教信仰。其次，教会社会活动具有其自私的目的，也就是使人们皈依宗教，但其前提是教会不认为这是虚幻的信仰，而确认这是“真理”，因此慈善活动是要帮助人们认识和接受这一“真理”。这两点都是与我们世俗的观点不同的。许多人认为宗教慈善活动本质上只是一种宗教传教活动，只出于宗教的动机，即为了履行宗教道德和为了信仰者个人的灵魂得救，而不是利他主义的无私奉献。但在客观上，宗教慈善活动对人的精神道德问题和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这种宗教动机与现实效果之间的关系问题，还值得进一步研究和讨论。

---

**【 Abstract 】** At present,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ROC) is actively devoting into the work of charities and social services. These projects covers a wide range, such as the medical service for the elders without family, anti-alcoholism and anti-drugs, child aid for orphans and the disable, anti-abortion, anti-unemployment, helping refugees and victims of natural disasters, and offering spiritual and moral education for prisons and soldiers. Correspondingly, ROC has constituted a set of authoritative regulations to administrate the work of social services, which explicitly set down four directors at different levels with specific responsibilities. It is worth to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in these social services; and on the other side, it as well deserves to further explore the issue on how to assess the moral essence and social value of religious charitable activities.

**【 Key Words 】**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 work of charities , social services

**【 Аннотация 】**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активно занимается благотворитель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ю и социальным

служением. Появляются много православных благотворительных фондов и обществ. Эти милосердные работы широко касаются медицинской службы для больных и престарелых людей, борьбы с алкоголизмом и наркоманией, помощи детям-инвалидам и сиротам, борьбы с абортами и безработицей, работы с беженцами и с жертвами стихийных бедствий, морального воспитания заключенных и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и т. д. Для этого РЦП выработала официальные управленческие принципы. Все эти опыты в социальной работе очень полезны для нас.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как рассматривать моральную сущность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ую ценность религиозной филантропии, вот проблема, которую нам надо глубоко исследовать.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благотворительность, социальное служение

---

(责任编辑 阎德学)

## 当代俄罗斯东正教媒体的传播状况探析

翁泽仁\*

---

**【内容提要】**在现今俄罗斯的媒介市场中，东正教媒体无疑是势头发展最为强劲的宗教媒体。它不仅担负起宣传东正教的责任，还积极显示东正教教会所秉承的价值观和历史使命。需要具体分析东正教媒体在俄罗斯的发展状况、这些媒体产生的作用与影响，以及所出现的问题和困境。

**【关键词】**俄罗斯东正教 东正教媒体 宗教媒体

**【中图分类号】**D751.2; B976.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6)04-0125(21)

---

21世纪的俄罗斯东正教媒体呈现出以下几大特征：媒介形式多样，数量众多，受众分布广泛。其发展无疑与俄罗斯转型的政治和文化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俄罗斯东正教媒体的传播状况似一面镜子，既充分、直观地展示了俄罗斯的宗教文化格局，又凸显了俄罗斯宗教与政权，宗教与国家及民众的关系。

### 一、俄罗斯东正教媒体的传播环境

确切地说，俄罗斯东正教媒体的发展史是一部俄罗斯社会的发展史，它涉及的内容丰厚、领域广阔、时间跨度大。触及了俄罗斯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现象，俄罗斯人民的精神体系及灵魂深处的东正教情怀。俄罗斯的东

---

\* 翁泽仁，贵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正教媒体史是俄罗斯媒介史上独具一格的文化盛宴，体现的是俄罗斯东正教教界人士及俄罗斯民众的精神世界、道德情操和爱国主义情节，迸射出的是东正教自由、强健的精神凝聚力。作为当权者较为有利的政治工具，东正教媒体精彩纷呈的命运始终伴随着国家政权的更迭而跌宕起伏。经历了沙俄时期的欣欣向荣到苏联时期的低落，再到转型时期的俄罗斯的兴盛。也正因此，成就了俄罗斯东正教媒体不平凡的经历和历史积淀。今天俄罗斯的东正教媒体今非昔比，达到其发展的制高点，已成为具有严密组织性和规范性的媒介体系。它成为拥有报刊、广播、电视频道、通讯社、因特网、微博、电子出版物在内的一系列传播媒介。在探究俄罗斯东正教媒体兴起的原因时，可以清晰地判定，传播环境对东正教媒体的发展状态和趋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其中，最为关键的一大因素在于宗教生活在苏联的复苏。关于这一点，俄罗斯的专家卡舍瓦洛夫给予了这样的评价：“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新的国家与教会关系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对宗教和教会的社会兴趣，推动了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复兴。也即是使得人们关注于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并逐渐恢复其活动的传统形式，包括积极发展教会媒体”。<sup>①</sup>

苏联后期，宗教领域逐渐被予以关注，宗教问题开始进入到人们的视野中。宗教与国家、宗教与政府的关系趋向缓和和松动。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宗教再次成为苏联领导人权力角逐的政治工具和利用品。因为，这源于戈尔巴乔夫上台所遭遇的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不景气，而迫不得已进行的政治改革，以及由此所急需的、宗教信徒的支持和援助。戈尔巴乔夫对宗教的认同和支持，深蕴着重要的政治意图。他“并不是希望给予民众真正的信仰自由，而是希望在信徒中争取更多的追随者”。<sup>②</sup>对于这一点，“两份外国报纸：意大利的《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和美国的《华尔街日报》登载了有关美国前总统里根似乎确认‘改革之父’戈尔巴乔夫是依靠上帝生活的材料”。<sup>③</sup>1987 年末到 1988 年初，正教会在苏联的发展有了新的转机。

---

① Фестиваль православных ЗМІ: Церковная журналистика —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о Истины в XX-XXI вв. [www.arhiv.orthodoxy.org.ua/ru/2009/10/28/27406.html](http://www.arhiv.orthodoxy.org.ua/ru/2009/10/28/27406.html)

② Нефед Алексей Игоревич. Церковь в период правления М.С.Горбачёва: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и тысячелетие крещения руси. [nauchforum.ru](http://nauchforum.ru)

③ Горбачев М.С.- Горбачев Михаил Сергеевич –Страница 3 – Православный форум Игнатия Лапкина «Во свете Библии». [www.kistine.my1.ru/forum/66-1215-3](http://www.kistine.my1.ru/forum/66-1215-3)

其表现在于公开地登载对宗教信仰新看法的诸多文章。如，1987年下半年在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世界观公报《共产主义者》上的如下文章：《基督教成为新文明的宗教及思想的催化剂》、《基督教的普及，成为古罗斯封建国家唯一的思想基础，在早期的中世纪时期扮演着进步的角色》。<sup>①</sup>这些文章在苏共中央重要的意识形态刊物上刊发，显示出苏联政府对宗教持有明显的重视态度。特别是对于基督教、东正教的历史作用和影响给予了明确的肯定和认可。“虽然正教会在破坏共产主义准则方面并没有发挥积极的作用，如同罗马天主教在波兰和另一些东欧国家。但是，在苏联末期它显然战胜了逐渐声誉受损的马列主义。”<sup>②</sup>

1988年，成为苏共领导人与东正教领导人合手言和的标志性纪念年。他们进行会晤，公开讨论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与作用。该年6月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了“表彰为罗斯受洗千禧年所做的积极的调解活动”的命令。其中，大牧首彼梅、基辅主教菲拉列特、高尔基大主教尼古拉及德米特洛夫斯基大主教阿列克山特等人，被授予了“劳动红星奖章”；另一些东正教领导人则被授予了“人民友谊勋章”。紧接着，6月5-12日开展罗斯受洗千禧年活动。可以说，该活动成为宗教在俄罗斯复苏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性事件。此次盛会共有89个国家地区主教会议的211个代表团的517人参与。其中，包括安提拉大牧首、保加利亚大牧首、巴黎主教、全美及加拿大主教、塞浦路斯大主教、罗马尼亚大牧首等。君士坦丁堡和厄兰东正教教会的代表未参与。1100名记者报道了该盛会，其中446名为外国记者。同时，在基辅、耶路撒冷和弗拉基米尔等地也举行了庆祝大会。6月18日以后，俄罗斯正教会的所有主教管辖区都举行了罗斯受洗盛会。此次盛会的召开不仅是俄罗斯，也是世界东正教教会的一大喜事。因为，它标示着东正教教会新纪元的开始。

此次千禧年最为重要的大事就是地方主教会议的召开。在此之前，地方主教会议仅开展过三次：1917-1918年，1945及1971年。在1988年的地方

---

① Нефед Алексей Игоревич. Церковь в период правления М.С.Горбачёва: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и тысячелетие крещения руси.nauchforum.ru

②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www.magadancatholic.org



主教会议中，戈尔巴乔夫的“新思想”为正教会提供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机会。如，扩大出版活动、创立针对远离祈祷形式的教义回答和以慈善事业为主的新学校。<sup>①</sup>戈尔巴乔夫别有用心的宗教改革思想迎合了宗教界人士的政治需求。因而，此举立即获得了教界人士的一致响应。在1988年的克里姆林宫会晤时，彼梅积极公开回应了戈尔巴乔夫的这一举措。彼梅谈说，“最尊敬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代表我们教会的主教团、全体教士、修士和在家人，也即是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公民，向您——新政治思想的昭示者和改革的设计师，以及这次所进行的有益的规划表示完全的拥护”。<sup>②</sup>

为保证宗教生活的正常开展，苏联权力机关连续颁布了一系列新的条例：1989年，颁布关于教会拥有私人财产及扩大影响力的新条例；1990年，颁布由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关于宗教自由的新法律。同时期，苏联的几个加盟共和国也围绕着宗教自由问题开始着手制定自身的法令。毫无疑问，在这个契机之下，许多宗教组织得以迅速发展，宗教信仰重新驻足于俄罗斯民众心中。

1990年6月，阿列克谢二世出任全俄与莫斯科大牧首，他令俄罗斯的东正教空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在阿列克谢二世的领导下，无论是用以祷告的教堂还是研修基督教义与精神的学校，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88年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的教区近七千个，到1997年年底近一万八千个，而到了2006年年底有二万七千余个”。<sup>③</sup>从1990-1995年，俄罗斯共开放了八千多座东正教教堂。<sup>④</sup>在这个重要的转型期，正教会紧紧抓住时机开始它新的生命历程。新形势下，为了宣传东正教教义及思想、提升东正教的地位和影响力，加强它的政治资本，发展其传播工具和喉舌便成为正教会的首要任务。与此同时，国家对宗教媒体的监控也有所缓和。实际上，在罗斯受洗千年的前一年，即1987年，莫斯科大牧首管辖的教会出版处就发行了一份报纸—

---

①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советское время(1917-1991). Глава: 19. Тысячелетие Крещения Руси. [www.klikovo.ru/books/94795/49809.html](http://www.klikovo.ru/books/94795/49809.html)

② Там же.

③ Православие.Том1: Возрождение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 Библиотека | Православие.Бу. [http://pravoslavie.by/Page\\_book/vozrozhdenie\\_russkoj\\_pравoslavnoj\\_cerkvi](http://pravoslavie.by/Page_book/vozrozhdenie_russkoj_pравoslavnoj_cerkvi)

④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www.magadancatholic.org/](http://www.magadancatholic.org/)

④ Там же.

—《莫斯科教会信息》。该报在 1987 年问世时并没有严格的发行周期，以俄语、英语、法语、德语和阿拉伯语为主。最初，主要针对苏联境外的读者。此后，发展为月报，并开始为俄罗斯联邦的东正教信仰者服务。其内容广泛，涉及教会与社会问题，包括俄罗斯东正教教会与国家及艺术机构的相互关系，甚至有描述另一些宗教教派在俄罗斯境内外发展状况的信息。这份报纸的出版，显然符合戈尔巴乔夫政府的政治需求和政策变换。因为在 1987 年，“苏联的出版物对于地方读者依然按照原有的程序继续着反宗教的大众化进程。而为西方读者准备的报纸所展现的皆是对宗教肯定的、完全宽容的态度。”<sup>①</sup>该报在 1993 年经历了短暂的停刊，于 1995 年复刊。由此可以看出，东正教教会领导人对社会局势的变化，具有相当的洞察力和敏锐感。当然，这份操控在苏联共产党手中的媒介的政治作用显然要大于自身的信息提供功能。因为，实际上，它与宗教问题委员会发行的杂志《苏联宗教》一样，担负起宣传重责，也即是尽可能发表较多的、关于苏联宗教生活获得良好发展趋势的虚构消息。<sup>②</sup>对于这份报纸的本真意义，有人给予这样的评价：《莫斯科教会信息》是新时期苏联政府围绕着东正教媒介方案所进行的科学实验品。<sup>③</sup>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苏联陆续发行了一系列东正教刊物。当然，绝大多数为“地下印刷品”。也即是为秘密的、非国家官方予以承认的刊物。这些‘地下印刷品’基本上出现在莫斯科、列宁格勒、波罗的海、乌拉尔及另外的一些城市。最为著名的、登载了东正教问题的刊物有：1988 年的《祈祷前的钟声》、《俄罗斯公报》、《宣传》、《选择》、《话语》、《讲道台》、《希望》、《涅瓦教会消息》及《大地》等等。其中，杂志《话语》登载了关于改革、关于教会与国家关系变动的材料。该杂志很大的关注点置于重大事件——“罗斯受洗千年”。1990 年是俄罗斯宗教生活的重要分水岭。因为，随着该年有关宗教信仰法案的出台，一些大型的东正教修道院和教学机构的出版活动得以恢复后，也纷纷开始发行自己的刊物。如，《列宁格勒神学科学院信

---

①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www.magadancatholic.org](http://www.magadancatholic.org)

② Там же.

③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православные журналы. [www.ruspalom.ru/index.php/article/prslv](http://www.ruspalom.ru/index.php/article/prslv)

息》、《特罗伊茨克话语》。最为重要的是，这些刊物力图传承革命前的教会刊物传统。其中，《特罗伊茨克话语》揭示宗教生活和东正教信仰的问题。<sup>①</sup>

随后几年，正教会着手扩大了自身的出版权力和信息权力：1994-1995年，在别尔哥罗德和旧奥斯科尔主教波波夫的带领下形成文件《东正教任务恢复的基础》。其中，《信息任务》成为其中的一个特殊内容；1994年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出版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的任务在于：（1）有关东正教出版事务的分配任务；（2）对出现在委员会的文献的评论与评价。这些文献包括东正教教会活动所必需的礼拜文献、教学方法论性质的文献，以及莫斯科大牧首全教会的官方出版物。<sup>②</sup>为了使更多地区了解东正教文献、书籍的最新情况，1997年5月莫斯科大牧首管辖教会出版委员会（也即是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出版委员会）和“书籍服务”公司共同从事邮发活动，出版《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出版物目录》。该目录的出现，益处颇多。既对教会出版物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又使得人们对正教会出版物的数量、类型、内容和目标受众有了明细的概念。很显然，这些权力的加强为东正教媒介体系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政治资源。

俄罗斯东正教媒体复兴的最大因素在于俄罗斯社会的变动，以及这个变动带给正教会宝贵的机遇。除此之外，还在于俄罗斯东正教教会与俄罗斯境外东正教教会的团结协助。教界人士善于把握时机，因地制宜地发展宣传工具。其意在于推销教会和巩固教会地位。值得一提的是，由俄罗斯东正教媒介的复兴可以领略到东正教与俄罗斯国家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给予了俄罗斯正教会极大的权力与自主性。紧随其后，教会权力可谓触及俄罗斯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或多或少地在发挥着潜在的宗教能量。

## 二、俄罗斯东正教媒体的传播思路

自东正教媒体恢复传统以后，教界人士及媒体从业人员就开始思考该媒

---

① Фестиваль православных ЗМІ: Церковная журналистика —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о Истины в XX-XXI вв. [www.arhiv.orthodoxy.org.ua/ru/2009/10/28/27406.html](http://www.arhiv.orthodoxy.org.ua/ru/2009/10/28/27406.html)

② Там же.

体的定位和方向。写什么、报道什么？怎样写、怎样报道？教会记者和时评家的任务是什么？以及东正教媒体的作用与影响等问题常常成为教会新闻界探讨的核心话题。20世纪中期，随着东正教媒介体系雏形的逐渐形成，对该类媒体的学术讨论也随之开展起来。而这种学术探讨随着东正教媒体良好的发展趋势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吸引众多的人参与。1996年10月10日，在莫斯科东正教圣大牧首公署出版社开设的新学校——教会新闻学院，召开了第一次学术研讨会；2000年，在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历史上第一次召开了东正教刊物国际会议。此次会议涉及了一些重要的议题，如“世俗报纸中的教会议题”、“报纸与网络”、“大众新闻媒介中的教会与国家关系”、“大众新闻媒介中的东正教教育问题”、“危险的纸牌”（教育学中采用通灵术的问题）、“大众新闻媒介中的宗派”、“教会作品生产者的作者权限”等。<sup>①</sup>2004年11月16-18日，在莫斯科召开了东正教大众媒介第一届国际联欢节，主题是“信仰与语言”。联欢节的目的在于，联合东正教记者、草拟东正教新闻媒介发展的计划，以及阐述教会与社会合作的新形式。会议讨论了如下一些内容：“现代东正教新闻：质量的标准和发展的前景”、“宗教新闻媒介、社会和权力：对话和合作的经验”、“纸质媒介：以东正教出版物为例的现代报纸的内容和艺术设计”、“全球化时代各地区东正教在收集和传播信息领域中合作的问题与任务”、“东正教朝圣话题在新闻媒介中的体现”，以及东正教刊物在新闻领域和社会生活中的角色、东正教定期刊物和电子出版物、电视和广播节目的专业问题等。<sup>②</sup>各种类型、大大小小、国际国内的学术讨论议题众多。大家集思广益，为东正教媒体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新的方向。参会者大多来自前苏联国家，除了东正教领导人、教界人士和东正教媒体从业者，还有世俗新闻界人士，以及各大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人员。

除了对东正教进行学理性的研究外，为了维护和保护东正教记者以及对宗教话题进行写作的记者的权益，并团结这类行业人员。俄罗斯于2001年

---

①Итоговый документ конгресса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прессы. [unrel.org/index.php/ro/populyarnoe/navigatsiya/dokumenty-pravoslavnoy-tserkvi/inye-dokumenty/itogovyy-dokument-kongressa-pravoslavnoy-pressy.html](http://unrel.org/index.php/ro/populyarnoe/navigatsiya/dokumenty-pravoslavnoy-tserkvi/inye-dokumenty/itogovyy-dokument-kongressa-pravoslavnoy-pressy.html)

② Первы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естиваль православных СМИ «Вера и слово». 2001-7. [izhiza.ru/2001\\_7/sobytiya2004-2005/veraslovo2.htm](http://izhiza.ru/2001_7/sobytiya2004-2005/veraslovo2.htm)

创建了“宗教新闻基尔德”(即宗教新闻行业协会)。这是俄罗斯唯一的、团结宗教问题专家的、新闻媒介工作人员的职业组织。其活动目的在于:对社会关于宗教传统角色、现代俄罗斯社会政治生活、文化和经济生活中的观念和组织的报道。<sup>①</sup>2003年1月29日,成立了“东正教记者协会”。该协会的是在2003年的“第11届圣诞节朗读会”上,由主教区的媒体人倡导成立的。并且,这个建议得到了阿列克谢二世的祝福。这一系列东正教新闻行会、协会的成立,表明俄罗斯东正教教界人士的职业维权意识强烈。它们有力地保障了俄罗斯东正教媒体人员知情权、报道权、舆论监督权的顺利实施。并且,东正教教会力图使东正教媒体跻身于俄罗斯的新闻界,与普通的媒体享受一样的待遇。

正因为东正教在俄罗斯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在现代生活中的现实意义,决定了其媒介的内容和功能不可能单一和单纯。为解决这个难题,东正教媒介编辑部除了对自己的受众进行问卷调查外,还常常与读者见面,召开圆桌会议,对受众来信进行分析,以及开展热线等活动。围绕着东正教媒介的内容和目的展开的探讨与思考,教界人士一直没有停止过。

东正教媒体应该怎样展现自己的宣传内容?是以报道东正教教义、东正教生活为主而漠视社会问题?还是东正教生活、问题与社会生活、问题并重?东正教媒体是否应涉及政治生活?等等这些问题,至今仍被正教界人士积极和热烈地探讨着。

以下是东正教媒体人员及教界人士对这些问题所作思考的一些摘要。《东正教的圣彼得堡》报纸主编阿列克山德尔·拉科夫指出,“东正教媒体应该遵循上帝的圣训,我们不能逾越这些圣训。”<sup>②</sup>《神圣的罗斯》报纸主编、牧师安德烈·卡里米洛夫认为,“东正教媒介的任务就是逐渐把人们带到教堂,给予他们做礼拜的习惯和笃信宗教生活的基础知识。”<sup>③</sup>坦波夫教区信息出版处主任、牧师维克多尔·里秀宁谈到,“目前大家关心的问题必须要讨

---

① Татьяна Ицкович. «Язык и стиль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православных СМИ: на материале СМИ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ской епархии». Медиаальманах.с.47.

② Влияние православных СМИ в россии ничто. [www.rusline.ru/analitika/2010/06/30/vliyanie\\_pravoslavnyh\\_smi\\_v\\_rossii\\_nichtozhno/](http://www.rusline.ru/analitika/2010/06/30/vliyanie_pravoslavnyh_smi_v_rossii_nichtozhno/)

③ Что волнует православных журналистов. [rusline.ru/monitoring\\_smi/2006/11/14/chto\\_pravoslavnyh\\_zhurnalistov/](http://rusline.ru/monitoring_smi/2006/11/14/chto_pravoslavnyh_zhurnalistov/)

论。因为东正教的重要特征，也即是它最强大的一面，团结和容忍的精神应该归属于东正教媒介……应不应该写一些问题性的题目？要写，但是一定要小心翼翼，为的是不用语言来伤害，而是促使人们对所面临的情况进行思考。当人们要做出生命中的选择时，允许这些人从另外一个方面去看待问题。”<sup>①</sup>

《下罗夫戈罗德教区公报》的主编伊戈力表示，“教会媒介的内部问题不应该在报纸杂志占据很大的篇幅……不应该把教会报纸变成政治论坛。”<sup>②</sup>南萨哈林及库利尔斯克教区传教士部主任维克多的观点是，“东正教大众媒介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写社会关注的问题，但是要以东正教的视角去写。”<sup>③</sup>

实际上，俄罗斯东正教媒体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显然超出了宗教媒体应涉及的范围。对此，《俄罗斯报》主编B.富隆林作了如下的解释：“东正教媒体应参与寻找与社会联系的道路，而教会值得寻找的，不是以执政者为代表，而是以城市和农村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支柱。教会更需要的不仅是与国家的对话，还要与社会对话。因此，需要‘聪明的’议事议程。”<sup>④</sup>体现该新闻理念最为重要的明证是，2014年“乌克兰事件”中俄罗斯东正教媒体、媒体人及教界人士的媒介行为。广播电台“拉多涅日”（Радонеж）是在1991年的复活节经莫斯科和全俄至圣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恩准诞生的。它是现代俄罗斯第一个独立的广播电台（比“回声，莫斯科”电台还早半年成立）。从成立之时起，“拉多涅日”便成了最能对俄罗斯境外发挥作用和最受欢迎的东正教媒体和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的喉舌。”<sup>⑤</sup>“拉多涅日”于2014年4月在其演播室就“乌克兰事件”对俄罗斯联邦总统顾问格拉济耶夫（С.Ю.Глазьев）进行了深度访谈。在该事件日益发酵的过程中，俄罗斯东正教青年杂志《多马》网站（fom.ru）每周都要进行一个“每周日总统选举”的问询活动。问询表由以下四个问题组成：“你们将选择谁为总统？”、“你们信任他吗？”、“最

---

① Что волнует православных журналистов. ruskline.ru/monitoring\_smi/2006/11/14/chto\_pравославnyh\_zhurnalistov/

② Там же.

③ Там же.

④ Либек | V юбилейный фестиваль православных СМИ «Вера и Слово» -Без Формата.Ru-Новости. libeck.bezformata.ru/listnews/festival-pravoslavnyh-smi-vera/7591442/

⑤ 翁泽仁：“俄罗斯东正教媒体的新景观探析”，《贵州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第64页。

近一个月你们是如何改变了对他的态度？”，以及“对总统工作的评价”。从而测试俄罗斯民众对国家元首的态度。俄罗斯东正教网站“拉多涅日”（“Радонеж.Ru”）2014年11月20日登载了一篇题为《我们究竟是“俄罗斯人”还是“俄罗斯人民”？俄罗斯人民会议是如何形成的？》的采访性文章。文章就欧盟欲把俄罗斯从世界共同体中剥离开来的问题采访了一些文化精英和教界人士。2014年11月份是俄罗斯的东正教活动月。在这个活动月中，连续举办了三次全国性的东正教活动，以在国家遭受外来打击时，唤起俄罗斯人民对俄罗斯历史的追忆。2014年10月，东正教教会事务管理局信息部主席B.P.列伊戈伊达在“东正教的罗斯”与塔斯社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东正教的罗斯’展览会成为关于我们国家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新的语言’，甚至可以认为是向前发展的、共同的支撑点……让俄罗斯人民再次恢复已经遗失的、和我们的过去相联系的感情纽带。”<sup>①</sup>修士大司祭吉洪在该新闻发布会上谈道：“展览会呈现给我们的古代历史篇章，让我们清楚地认识今天。今天，我们国家面临的尖锐问题，历史上曾经也出现过。如，一些国家对俄罗斯进行的经济和政治制裁。所有的这些问题在留里克时期发生过，而该王朝统治了俄罗斯七个半世纪，并且成为欧洲最古老的王朝之一。”<sup>②</sup>

诚然，东正教媒体涉足社会问题，乃至关注政治生活的这一特性，既是正教会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同时也招致人们对它的严厉诟病。在俄罗斯社会中不少人认为，正教会超越了其宗教职能，是在运用宗教权威性干预国家生活。对此，俄罗斯东正教媒体人做出了回应。在2012年10月29-31日召开的第五届“信仰与语言”国际联欢节上，就重要的讨论议题“我们如何创建有益的议事议程？”，东正教教会事务管理局信息部主席B.P.列伊戈伊达指出，“几乎每天我们都会对外界的刺激产生反应。人们似乎觉得，我们不应该创建议事日程，而应该只是参与到议事议程中。但我们必须提出自己的议题和缘由。”<sup>③</sup>青年杂志《多马》的工作人员Д·斯拉特科夫认为，“我们教

---

① Анна Ерахтина “Моя история. Рюриковичи” Пресс-конференция в Тасс(+видео)/ Православие.Ru. <http://www.Pravoslavie.ru/jurnal/74755.htm>

② Там же.

③ Либецк | V юбилейный фестиваль православных СМИ «Вера и Слово» -Без Формата.Ru-Новости.

会一直都有敌人。要严厉抨击那些对现代教会生活进行批判、挑刺的人。我们应该有所准备，如果教会开始讨论世界（它有理由这样做），那么就应该聚精会神地进行探讨。如果在每一件事中都问自己：是否基督怎样说，我就怎样做？那么，这就非常正确了。”<sup>①</sup>

就东正教新闻的目的和作用，以及对教会记者、时评家的责任和工作性质，俄罗斯正教会领导有过深思熟虑的思考。2000年，在一份名为《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社会建构理论》的文件中，对东正教媒体的作用进行了这样的描述：“不允许宣传暴力、冤仇、仇恨，以及民族、社会和宗教敌意，甚至为了商业目的罪恶地利用人的本能。对受众拥有巨大力量的大众媒介，应担负起培养人们，特别是少年一代的伟大责任。记者及大众媒介的领导人应该清楚这些责任。”<sup>②</sup>在2000年的东正教刊物国际会议上，教会领导人明确提出，“不能把东正教出版物视为教会内部的、仅指望教会读者的刊物。它们应该对那些徘徊在教堂门边的人予以关注……东正教媒介不应局限于教会生活，以及简单、无解说地对神圣祖先的作品进行翻印。占据东正教媒介基本空间的应为现代神职人员、有着坚定信仰的科学家、文艺活动家和东正教时评家的发言。”<sup>③</sup>实际上，东正教媒体的作用和责任沿袭了正教会自身具有的精神理念。东正教媒体，无论是青年报刊、儿童报刊、妇女报刊，还是全国性的电视频道、电台，尽管侧重面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无一例外地在履行这一宗教精神和使命。最为重要的是，俄罗斯东正教领导不仅积极参与东正教媒体的建设，而且深谙宗教媒介的工作内涵和本质，熟知宗教媒介的作用和影响。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俄罗斯历任东正教领导人几乎都是东正教媒体的积极倡导者和建设者，他们是推动东正教媒体长足发展的一大动因。

除上述基本思考点以外，还有两大问题也是俄罗斯东正教媒体传播思路中的研究重点：一是东正教记者的媒介素养问题（东正教记者包括两部分人

---

① Либецк | V юбилейный фестиваль православных СМИ «Вера и Слово»

② Возможно ли телевидение без соблазнов? [www.pravda.ru/faith/religions/orthodoxy/26-11-2012/1136078-television-0/](http://www.pravda.ru/faith/religions/orthodoxy/26-11-2012/1136078-television-0/)

③ Итоговый документ конгресса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прессы. [unrel.org/index.php/ro/populyarnoe/navigatsiya/dokumenty-pravoslavnoy-tserkvi/inye-dokumenty/itogovyy-dokument-kongressa-pravoslavnoy-pressy.html](http://unrel.org/index.php/ro/populyarnoe/navigatsiya/dokumenty-pravoslavnoy-tserkvi/inye-dokumenty/itogovyy-dokument-kongressa-pravoslavnoy-pressy.html)



员：东正教媒体的记者和世俗媒体从事东正教写作的工作人员)；二是与世俗媒体合作的问题。

在俄罗斯，对东正教记者的媒介素养问题探讨最多的是：东正教记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职业道德素养，他们与教会之间的关系如何，以及如何展现东正教信息。2004年第一届“信仰与语言”国际联欢节，B.P.列伊戈伊达对东正教记者的职业责任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遵循新闻道德标准的共同原则一样，东正教记者不应该容忍与神圣祖先传统相悖的见解；不允许有分裂教会和社会的言说；东正教记者不应该逃避重要的议题。但是，在其讨论中首先应该拥有对教会有利的概念。”<sup>①</sup>关于东正教记者的写作方式和职业权益，东正教新闻界人士持有以下观点：东正教记者可以书写各种各样的广泛话题，包括东正教话题在内。但是，问题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样写。需要的是要有不刻板、不僵硬的观点和思路。这并不仅仅是对布道稿、教会思想的翻印和复制。并且，最为重要的是当教会发生和出现重大事件及问题时，东正教记者不仅要在教会及业界内部进行讨论和分析，还须重视其他人的想法和观点；<sup>②</sup>东正教记者不应该追逐轰动一时的热点新闻，而需遵循道德标准与精神信仰，努力地成为专业化、职业化的行家。<sup>③</sup>除此之外，东正教记者的宗教归属感也是重要的关注点。俄罗斯东正教媒体人及世俗媒体人一致认为，东正教记者应该是东正教徒，因为只有东正教教徒才能够完全正确地把东正教信息和思想进行广泛的传播。<sup>④</sup>而且，还能够用自己的教会经验来帮助人们对教会的认知。实际上，通过对东正教记者问题的探讨可以看出，在俄罗斯，对东正教记者要求甚高，这类记者需拥有双重身份：首先是教徒，其次为记者。要想担任东正教记者必须先成为教徒，教徒身份是成为东正教记者的首要条件。

俄罗斯东正教新闻界普遍达成共识，即与世俗媒体的团结合作必不可少。这个理念如实地反映俄罗斯正教会的纲领性文件中。如，在2000年《俄

① Первы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естиваль православных СМИ «Вера и слово»

② Что волнует православных журналистов. [ruskline.ru/monitoring\\_smi/2006/11/14/chto\\_pравославnyh\\_zhurnalistov/](http://ruskline.ru/monitoring_smi/2006/11/14/chto_pравославnyh_zhurnalistov/)

③ Сметанина М.О. Специфика медиа просвещения: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и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подачи материалов в СМИ.2011.

④ Православные СМИ и общество. [www.eparhia-saratov.ru/Articles/article\\_old\\_3989](http://www.eparhia-saratov.ru/Articles/article_old_3989)

罗斯东正教教会社会建构理论》中就该问题进行了详细的阐释：“教会的启蒙任务、教育任务和社会调解任务促使教会与世俗大众媒介合作，借此把东正教的任务推广至社会的各个阶层……号召任何一个神职人员或平信徒应该关注与世俗媒介的联系，为了实现福音事业和启蒙事业，甚至唤起世俗社会对教会生活和基督文化各个方面的兴趣。为此，必须彰显出贤明、责任感和慎重。这指的是具体的大众媒介对信仰和教会的关系、大众媒介的道德方向、教会神圣祖先与新闻机构相互关系之状况的立场。东正教平信徒可以直接工作于世俗媒介，在其活动中他们成为基督精神思想的传播者和实现者。登载腐蚀人们灵魂文章的记者，如他们归属于正教会，就会依据教规受到惩罚。”<sup>①</sup>在涉及世俗媒体与东正教媒体之间的关系时，阿列克谢二世在 2000 年的第一届东正教刊物国际会议上，表明了态度：“极其重要的是，世俗刊物涉及教会话题确实肤浅，它们感兴趣的主要是教会的混乱。重要的是，为了使东正教刊物不要效仿一些世俗出版物不诚实的手段、为了使东正教刊物不回避尖锐的问题，同时，不恶意中伤、不散布信徒与牧师、信仰与文化、教会与国家之间的纠纷。应该记起，对于新闻，如同人类活动的每一个领域，需要注意上帝所说的话：人所说的一切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句句都要供出来。因为，你自己的语言就证明了你的问题。”<sup>②</sup>不置可否的是，与世俗媒体的交往合作，教会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无论是合作方式还是合作内容，正教会都掌握着制约权和话语权。如，《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社会建构理论》对此有着重要的批示：“如果新闻工作者（这里特指世俗媒体的工作人员）有指责神的名字、亵渎神明的表现，经常有意识地歪曲教堂生活、明显地中伤教会及其服务人员，那么，教会最高权力机关或主教辖区的至圣者能够采取相应的警告，此后在至少一次的约谈仍然无效后，将采取下列措施：第一，停止与相关媒体或新闻工作者的相互关系；第二，号召信徒与该媒体断绝往来；第三，寻求政府权力机构的帮助解决问题；第四，如果新闻工作者是东正教基督徒，那么，对于这些有着罪恶行径的失误者将根据教规予以惩

---

① Возможно ли телевидение без соблазнов? [www.pravda.ru/faith/religions/orthodoxy/26-11-2012/1136078-television-0/](http://www.pravda.ru/faith/religions/orthodoxy/26-11-2012/1136078-television-0/)

② Слово святейшего патриарха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и всея руси Алексия и участникам I конгресса прасловной прессы. <http://www.pravoslavie.ru/sobytia/cpp/patriarh.htm>.

罚。”<sup>①</sup>

通过对正教会与世俗媒体合作状况的介绍和阐释，有两个问题值得进一步地分析和探讨：

首先，既然在俄罗斯东正教媒体中可以书写任意的话题，包括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甚至经济领域都可以涉足，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世俗媒体的权限还低于东正教媒体，那么，东正教媒体与世俗媒体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界限？对此，俄罗斯专家给予了非常合理的解释：创作任务与基本的价值观不同。<sup>②</sup>也就是说，东正教媒体应该有自己的声音、不应该远离宣传，而且要维护自己的布道任务<sup>③</sup>。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东正教媒体区别于世俗媒体的两大基本点。

其次，既然正教会对世俗媒体的东正教记者有着严厉的监控权和惩处权，那么，世俗媒介中的东正教话题范围为何？对此，俄罗斯专家通过对俄罗斯各地区世俗媒体中东正教信息的内容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世俗媒介涉及东正教话题的资料一般分为两个方向：一是东正教自身话题的资料（正教会生活中的大事件，其中包括辛菲罗波尔和克里木教区、克里木圣地、东正教节日和习俗）；二是与东正教交叉的话题。如，参加大事件的僧侣和各种教派、恰逢东正教节日的艺术事件、艺术创作以及与东正教有联系的人。<sup>④</sup>除此之外，世俗媒体中的东正教话题应遵循哪些原则？这个问题涉及世俗媒体的东正教记者的写作守则。《东正教漫谈》的主编B.列别捷夫，在2000年3月8日举行的第一届东正教刊物国际会议上，就该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路：“（1）职业化；（2）与热爱和平的精神相符、联结受众，而非分离受众；（3）对教会生活拥有深厚的知识；（4）不是为了个人的自我表现，而是为了宣扬真理。”<sup>⑤</sup>很显然，这番解释意味着，世俗媒体的东正教记者首先应为专业化的新闻工作者，其次所具备的素养皆应以东正教信仰为核心、团结民众和社

---

① 转引自翁泽仁：“东正教教会与俄罗斯世俗媒体”，《西伯利亚研究》，2013年第5期，第39页。

② Православные СМИ и общество. [www.eparhia-saratov.ru/Articles/article\\_old\\_3989](http://www.eparhia-saratov.ru/Articles/article_old_3989)

③ Там же.

④ Сметанина М.О. Специфика медиа просвещения: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и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подачи материалов в СМИ. 2011.

⑤ Там же.

会，正积极地报道教会生活，以塑造东正教及教会的正面形象。

俄罗斯正教会染指于国家的世俗媒体，以及对世俗媒体的工作人员的惩处是相当严厉的，甚至由对该记者的矛头和指责转向其工作的媒体。正教会的权力之大，在此可见一斑。如果为非东正教教徒，其报道稍有失误的话，更会招致对他的责难。当然，正教会不会无视对教会活动给予好评的异教徒。如，2007年在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举行的“第一届俄罗斯南方东正教媒体联欢节”上，有关东正教话题创作比赛的奖项就颁发给了一位伊斯兰教徒——一部关于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斯塔夫罗波尔主教之调解角色的电影作者。<sup>①</sup>这无疑正是教会开放性和兼容性的一个明证。由此可以看出，东正教不排除任何有利于其发展的人和事，无论宗教和民族背景。同时，严厉对待一切有损教会声誉的人和事。

俄罗斯东正教媒体的传播思路极其深刻地体现了正教界人士对其喉舌、宣传工具的重视程度。他们一直在探索一个与俄罗斯政府和社会平等对话的平台、一条与它们并行的道路，而媒介就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介质。因而，俄罗斯正教界对东正教媒介的建设发展投入了大量的物力、人力和财力。正是这样一种思想促成了东正教媒体的长足发展，也使得东正教新闻成为俄罗斯新闻理论界和业界的一大组成部分。

### 三、俄罗斯东正教媒体存在的问题

现今，俄罗斯东正教媒体发展迅速，传播方式众多，传播范围广。就媒体自身的发展状况而言，它呈现出积极的发展趋势。但是，如果对该类型的媒介接触者和信息接受者进行考察。那么，实际的阅视听率到底如何？该媒体的受众人数如何？俄罗斯民众是如何看待东正教媒体及其内容的？其效果与影响处于什么样的状态？这些问题不仅正教界极其关注，同时也是许多俄罗斯文化精英和社会活动家希望了解的领域。大家需要获得认知的是，作为一种宗教性质的媒体，它在俄罗斯社会中拥有怎样的地位与影响力；它是

---

<sup>①</sup> Александра Кузьминаева. «Свет веры»- фестиваль православных СМИ Юга России. Татьяна День. <http://www.taday.ru/text/75956.html>

否仅为东正教教义、思想及文化传播的一个载体和工具？它的传播力度与广度处于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和程度？毫无疑问，要考察俄罗斯东正教媒体这些令人感兴趣的诸多问题，首先必须了解两个方面的状况：俄罗斯的东正教信仰状况和东正教媒体受众状况。就这两方面问题的探讨，问询资料给予了极大的佐证。以下便是通过对俄罗斯问询资料的分析所获取的情况。

俄罗斯的东正教信仰状况。根据全俄社会舆论信息中心 2010 年 3 月所做的问询资料显示，75%的俄罗斯民众认为自己是东正教教徒，而在 2012 年仅为 41%<sup>①</sup>；2012 年 6 月的资料显示：56%的俄罗斯人信任大主教，62%的相信教会。但是，在认为自己是东正教徒的俄罗斯人中，只有 2%的进行晨祈和晚祈、4%的熟知该信仰的标志。<sup>②</sup>2010 年 12 月，下洛夫戈罗德国立大学的博士生在伏尔加—维茨基科学院的协助下，在俄罗斯的科技中心和东正教的教会中心萨罗夫城做了一个问询调查。目的在于了解城中不同职业的人士怎样看待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的活动，以及东正教信仰在这些人群中的地位。此次问询共采访了 399 人，他们当中有中学老师、联邦核研究所的专家、市政职员及科学知识分子的代表。其中，87.7%的问询者视自己为东正教教徒。其中，仅有 3.2%的认为自己是真正的信仰者，只有 2%的固定地到教堂做礼拜。大约 51.2%的问询者很少对俄罗斯正教会生活感兴趣，而 8.7%的问询者在近一年中参加了主教在萨罗夫开展的活动，16.5%的认为这些活动对自己既重要又有吸引力<sup>③</sup>。很显然，这几组数据揭示出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也即是，虽然俄罗斯政府竭力采用行政干预，试图恢复东正教及其传统，但实际的状况不容乐观：不仅信仰人数少，而且真正的信徒更少。但是，令人奇怪的问题在于，纵使真正信仰、践行东正教的人数不多，但俄罗斯社会对正教会的信任程度却不断攀升。2010 年 1 月，全俄社会舆论信息中心在俄罗斯 44 个联邦主体中的 100 个居民点上采访了 2000 个居民。对于其中的一个问题：“请谈一谈，您对俄罗斯东正教教会信任与否？（从 1997 年 6

---

① Дымова. И.А. Место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журналистики в СМИ: научный диалог и дискуссий.

② Либецк V юбилейный фестиваль православных СМИ «Вера и Слово»

③ Большакова Зоя Григорьевна: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и СМИ на региональном и федеральном уровне. <http://www.mediascope.ru/node/967>.

月8日-2010年1月10日)”。从中可以看出,信任的人数从1997年的54%到2008年的62%及2010年的67%;有时信任、有时不信任的人数依次为:1997和1998年的13%、1999年的15%、2008年的17%及2010年的16%;不信任的人数依次为:1997年的19%、1998年的18%、1999年的14%及2008和2010年的8%<sup>①</sup>。这从中说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及历史问题:东正教在俄罗斯依然拥有相当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东正教媒体受众状况。根据2012年6月非商业调查机构“界”的问询资料显示:在80%的东正教信徒中,只有5%的人接触东正教大众媒介,剩余的皆是从世俗的信息源中获取信息;<sup>②</sup>2010年12月在萨罗夫城所做的社会调查中,47.3%的问询者说,他们通过世俗电视获取正教会活动的信息、16.2%的人通过全俄报纸,而12.9%的收听广播;只有1.1%的阅读东正教报纸、6.9%的人收看东正教电视节目、0.3%的人收听东正教广播、9.3%的人则从东正教网络中寻找教会信息。<sup>③</sup>门户网站“东正教与世界”的受众为一百万。“俄罗斯最成功的光面杂志《多马》的月销售量是三万份……最好的宗教管辖区的出版物月销售量接近一万份,而省级的平均为三千份。”<sup>④</sup>无论是通过对受众的媒介接触行为,还是对出版物销售额的梳理,都足以证明一个事实,即俄罗斯东正教媒体受众的数量不大。

通过俄罗斯对东正教信仰状况和东正教媒介受众两个方面所做的调查,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俄罗斯东正教信仰状况不佳、信徒不多;东正教媒介受众数量较少。这种事与愿违的尴尬境地迫使东正教新闻界对此进行必要的探讨和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东正教媒介受众如此低落?

——媒介内容不丰富。当然,这是从纵向进行比较,也即是从东正教媒体自身的内容来做对比。俄罗斯东正教媒介的数量不少,但依然显现出自身的不足之处,即媒介内容的不丰富。这个特点集中体现在纸质媒介上,特别

---

① Большаякова Зоя Григорьевна.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и СМИ на региональном и федеральном уровне. <http://www.mediascope.ru/node/967>.

② Либецк V юбилейный фестиваль православных СМИ «Вера и Слово» Без Формата.

③ Большаякова Зоя Григорьевна: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и СМИ на региональном и федеральном уровне. <http://www.mediascope.ru/node/967>.

④ Религиозная возрождение России вдохнуло новую жизнь в православные СМИ. [www.gipp.ru/viewer.php?id=26042](http://www.gipp.ru/viewer.php?id=26042)

是一些发行量小和免费发放的报刊。它们的生存空间极小、发展条件差。这些报刊通常具有以下的一些特征：（1）工作人员少；（2）捐助的资金少；（3）内容枯燥。特别是教区刊物大多登载的是关于教区、古老教堂的情况或者是一些杰出神父的传记，以及关于高级僧侣机构的人员任命等内容。其中，每一份教区的出版物都有东正教日历。通常，关注这类刊物的往往是东正教信徒。最为重要的是，许多教会纸质媒介的弊端在于无法提供自己的新闻。其中不少的信息来源几乎是从世俗新闻的新闻链条上复制过来的。<sup>①</sup>

——新闻的相似度大。这较为客观地体现在东正教的官方媒体上。毫无疑问，东正教的官方媒体是正教会的宣传喉舌，体现和代表的是教会领导人的官方行为和意见。这类媒体大多呈现为消息类的报道，以方便俄罗斯社会了解正教会的一些事务性活动及其领导人的工作动态。官方媒体的作用和服务定位，使得这类媒体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一些弊端。很多官方的东正教媒体，无论是纸质和视听媒介，相似度较大。其内容几乎是关于大牧首及其工作，当地高级僧侣的礼拜和访问、新教堂的修建和翻修，以及关于东正教见习班，会议和展览的新闻。<sup>②</sup>

——对东正教新闻的需求不大。对于一个纯东正教信徒不多的国家来说，对东正教新闻的需求量也势必不可能很大。而东正教媒体受众基本上是想了解自己教区的新闻。2002年9月在俄罗斯《生意人报》网站（Коммерсант.ru）登载的一篇《你们需要东正教媒介吗？》的采访性文章中，大多数被访者对东正教媒体的建设不感兴趣。甚至有些人认为宗教媒体没有发展的必要性。俄罗斯体育频道 7ТВ 的总经理 O·阿尔科谢罗夫在采访中这样表达自己的观点：“与上帝的交往应为两人在一起，或是与书籍在一起。据我所知，印刷文献在我们的柜台中非常之多。每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信仰。这是非常私密的事，任何电视都不应进行介入。”<sup>③</sup>实际上，还有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也限制着东正教新闻的需求量：首先，在俄罗斯，除了东正教

---

① Церковная журналистика: правда или польза? Православный журнал «Нескусный сад». [www.nsad.ru/articles/cerkovnaya-zhurnalistika-pravda-ili-polza](http://www.nsad.ru/articles/cerkovnaya-zhurnalistika-pravda-ili-polza)

② Большакова Зоя Григорьевна: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и СМИ на региональном и федеральном уровне. <http://www.mediascope.ru/node/967>

③ Ъ-воасть- Вам нужны православные СМИ? [www.kommersant.ru/doc/308820](http://www.kommersant.ru/doc/308820)

信徒外，还有着大量的佛教徒、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及另一些宗派的教徒。这些教徒对东正教信息不仅不感兴趣，而且还为俄罗斯政府积极支持东正教媒体建设表现出不满；其次，现今社会及现代文明孕育了不少对宗教漠视的人。这类人群对宗教的发展怀有反感，因而对宗教媒体的建设也往往持反对意见。在《你们需要东正教媒介吗？》的采访性文章中，“金属投资”财团董事会主席O·基谢列说，“我看不出创建东正教媒介、犹太教媒介和穆斯林媒介有什么必要。每一个教派能够把自己的思想传递给教徒的只能是布道及书籍。只有这样，宗教教派才会处于前进的状态”<sup>①</sup>。

——受众的媒介素养参差不齐。如同世俗媒介的受众一般，东正教媒介受众的媒介素养也呈现出参差不齐的状况。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在于东正教教会的“软新闻”。经过东正教的信息分析机构“俄罗斯人民战线”多年的观察，东正教读者最重要的兴趣在于非正常的、有矛盾的和出丑的新闻。<sup>②</sup>

由于东正教媒体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及现代文明对宗教的极大冲击和影响，促成了东正教媒介影响力的广度和深度远远未能达到教界人士的期望值。《东正教的圣彼得堡》报纸的主编阿列克山德尔在接受东正教信息分析机构“俄罗斯人民战线”记者采访时，作了总结式的回答：“东正教媒体在俄罗斯几乎没有影响力。”<sup>③</sup>

尽管在俄罗斯的新闻体系中，东正教新闻成其为极其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现实生活和世俗社会中，东正教媒介作为一种宗教媒介和亚媒介，无法能够逾越其发展障碍。虽然该现象不能充分说明宗教生活在俄罗斯的低落，但足以证明现代环境对宗教生活的限制和影响。

## 结 语

通过对俄罗斯东正教媒体传播状况的整体分析和探讨，可以看出，该媒

---

① Ъ-власть- Вам нужны православные СМИ? [www.kommersant.ru/doc/308820](http://www.kommersant.ru/doc/308820)

② Православные читатели. [ruskline.ru/news\\_rl/2013/09/05/pravoslavnyye\\_chitateli/#comments](http://ruskline.ru/news_rl/2013/09/05/pravoslavnyye_chitateli/#comments)

③ Влияние православных СМИ в россии ничто. [www.ruskline.ru/analitika/2010/06/30/vliyanie\\_pravoslavnyh\\_smi\\_v\\_rossii\\_nichtozhno/](http://www.ruskline.ru/analitika/2010/06/30/vliyanie_pravoslavnyh_smi_v_rossii_nichtozhno/)



体的传播环境和传播思路无一不显现出正教会在俄罗斯的重要地位，以及政府对它的支持力度。一方面，俄罗斯政府给予东正教大量的支持与关注，另一方面，正教会本身也在竭力恢复和提升自己的地位和权威性。但俄罗斯民众对正教会及其媒体的评价与舆论，却是众说纷纭：支持、反对或持中性态度的人皆有。由此可以看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尽管俄罗斯政府大力扶持东正教，但在民众中，正教会的地位已今非昔比。其宣传媒介仅成为人们了解东正教文学、艺术及东正教生活的一个平台。教界人士或东正教媒介的社会观点或政治观点也仅表示正教会有发声的权利，并不证明其拥有重要的影响力。但不可否认的是，东正教媒介的存在与发展还是有基础和需求的。正如辛菲罗波尔及克里木都主教拉撒路就东正教报刊的作用所谈到的，“这是我们的生活必需品，因为没有报刊、没有新闻，我们就不可能传递上帝带给人们的话语。神圣的传统通过口耳相传已经几百年了，应该把它传给我们的下几代。重要的是，不仅说，还要写。上帝用他的话语创造了世界，这个真理我们应该世代传扬。笔在此拥有伟大的意义……当人在书写的时候，他的心灵就会参与到这个幸福的事业中，思维也得到锻炼。”<sup>①</sup>

---

**【 Abstract 】** In today's Russian media market, Orthodox media are undoubtedly the most robust religious ones. They not only take responsibility in propagation of the Orthodox Church, but also actively display their values and historic missions. It is necessary to specifically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of Orthodox media in Russia, in addition to their roles and impacts, as well as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 Key Words 】**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Russian Orthodox Media, Religious Media

**【 Аннотация 】** На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рынке средств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в России православные СМИ, несомненно, являются самым надёжным импульсом для развития религиозных СМИ. Они не только берут на себя

---

<sup>①</sup> Сметанина М.О. Специфика медиа просвещения: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и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подачи материалов в СМИ.2011.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за пропаганду Православия, но и также активно отображают ценности и миссию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Необходимо провести конкретный анализ развития, роли и влияния средств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в России, а также их проблем и дилемм.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Русское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православные СМИ, религиозные СМИ

---

(责任编辑 肖辉忠)

## 欧亚经济

## 俄罗斯经济增长中的技术效率与影响因素 分析——基于非径向超效率 DEA 模型\*

徐坡岭 刘畅\*\*

**【内容提要】**俄罗斯经济发展体系的技术效率及影响因素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在规模报酬可变条件下,基于非径向超效率 DEA 模型,求解 1992-2011 年俄罗斯技术效率及其调整方式。依据定量分析结果,从技术创新、经济体制转型及金融危机三个方面对俄罗斯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结果发现:资本投入不足对俄罗斯技术效率的改进存在较大的负面影响;不能忽视能源产业对俄罗斯经济增长中技术效率改进的作用;增加劳动力投入可以带来技术效率的改进。

**【关键词】**俄罗斯 经济增长 技术效率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D751.2;F1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6)04-0146(23)

俄罗斯经济增长在过去 20 多年中呈现出剧烈波动的特征。其中,1990-1996 年,俄罗斯经历了持续的转型性经济衰退。1997 年经济增长趋于稳定,但随后的金融危机使得 1998 年经济增长率降为-5.3%。之后,随着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和国家实施一系列宏观稳定政策,俄罗斯经济增长得以稳

\* 本文为 2014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转型国家与美国的共生与博弈研究”(项目批准号:14JJD810021)的阶段性成果。

\*\* 徐坡岭,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刘畅,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定并逐渐复苏，并实现了从 1999—2008 年的连续增长，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 6.8%。但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又对脆弱的俄罗斯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2009 年经济增长率下降到 -7.9%。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0 年俄罗斯 GDP 增长率为 4%。依据传统的发展模式，俄罗斯经济实现了中速发展。但是自 2013 年起，受国内外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GDP 增长速度由中速变为低速。据俄联邦统计局对外公布，2013 年 GDP 增长率为 1.3%，2014 年仅为 0.6%，2015 年则低至 -3.9%。程伟将俄罗斯陷入的经济困局定义为“经济颓势”<sup>①</sup>，认为这既是发生在宏观经济基本稳定环境下的增长颓势，又是发生在转型拐点上的增长颓势。基于当下国情——恢复性增长已走到尽头，俄罗斯必须以守住来之不易的宏观经济稳定为底线，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利用与技术相关的要素投入拉动经济增长。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在剖析经济增长动力机制时，将所有生产单元的生产活动都假定为有效的，即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等同于技术进步。随着技术进步的内生性（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学者们不再满足于用全要素生产率的测量来解释技术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了进一步探究经济增长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他们开始对既定技术投入下的生产前沿进行估计，从而将技术效率纳入到经济增长的源泉之中。经济增长的实现，一方面可能是基于要素投入的增加，但是这种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并不具有可持续性。因此，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变得至关重要。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来自于三大动力因素：一是技术进步，即新技术的采用、新产品的发明或技术创新的实现；二是技术效率，即对现有技术更充分、更有效的利用，生产经验的累积与管理水平的提高是实现技术效率的主要途径；三是规模效率，即强调组建和管理大企业乃至大国经济的能力的实现。目前，我国学者对俄罗斯技术投入增加及生产率提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及拉动作用的研究大多属于定性分析。如邹秀婷通过对比中俄两国创新型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及进程，从资金、政策及法律扶持三方面提出中俄两国技术效率改进的政策建议<sup>②</sup>。戚文海通

---

① 程伟：“冷静聚焦普京新政下的俄罗斯经济颓势”，《国际经济评论》，2014 年第 6 期。

② 傅晓霞、吴利学：“技术效率、资本深化与地区差异”，《经济研究》，2006 年第 10 期。

通过分析转轨期间制度变迁、技术创新、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强调指出政府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前提是正确界定自身的角色<sup>①</sup>。葛新蓉基于俄罗斯远东地区技术创新发展困境，分析俄罗斯技术效率改进的方向<sup>②</sup>。周静言通过分析俄罗斯的创新投入、创新绩效、创新潜能与发展趋势，强调企业层面存在创新动力不足、激励缺失及活力不够等问题<sup>③</sup>。这些定性分析虽然指出了俄罗斯经济增长中技术投入及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性，但未能量化效率提升在俄罗斯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更不必说对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了。因此，本文将视角聚焦到生产率提高的三大动力机制之一的技术效率上，通过测算近年来俄罗斯的技术效率，使理论分析与现实经济发展状况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本文将利用非径向超效率 DEA 模型对俄罗斯技术效率进行测算。论文结构如下：第一部分介绍转型后俄罗斯经济的发展历程：在转型初期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1999-2008 的十年间，依靠能源经济实现了恢复性经济增长；基于 2008 全球危机的负面影响，俄罗斯再次经历了负增长时期，致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迫在眉睫；2012 年普京“王者归来”，但是并非一帆风顺，目前俄罗斯经济再度陷入危机之中，能否切实建立国家创新发展体系至关重要。第二部分系统地介绍技术效率理论、测算方法，并建立了规模报酬可变的超效率松弛变量模型（Super-v-SBM）。第三部分利用与俄罗斯经济发展体系相关的投入、产出数据，测算技术效率水平及技术效率的改进方式。第四部分将定量分析结果与经济发展现状结合，对影响俄罗斯技术效率的因素进行进一步分析。第五部分总结全文的主要内容及研究发现，并指出文章的扩展方向。

---

① 戚文海：“制度变迁、技术创新、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以体制变迁中的俄罗斯为例”，《国外社会科学》，2010 年第 1 期。

② 葛新蓉：“俄罗斯远东地区创新发展的的问题与路径分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1 年第 6 期。

③ 周静言：“俄罗斯创新能力与政策保障分析”，《经济研究参考》，2014 年第 5 期。

## 一、转型以来俄罗斯经济发展进程

### (一) 转型初期：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

1992年初，俄罗斯基于新自由主义理论，进行了激进的体制转轨与制度变迁，主要表现为政治多元化及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采用“休克疗法”，对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灾难性影响。较为明显的表现是，宏观经济指标严重下降。如表1所示，1992年至1998年，俄罗斯的经济以年均6.77%的速度衰退，其中1992年与1994年经济衰退幅度相对较大。在这一时期，基于现价美元计算，俄罗斯GDP总值占美国的比重由0.0704持续下降为0.0298。随着宏观经济环境的恶化，主要经济部门也经历了严重的衰退，工业、农业及服务业增加值的年增长率大多为负。此外，俄罗斯的科技实力严重下降，持续发生“奔腾式”通货膨胀，社会治安每况愈下，居民生活质量急剧恶化。

表1 转型初期经济衰退的表现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GDP 增长率 (年百分比)	-14.5311	-8.6685	-12.5698	-4.1435	-3.6	1.4	-5.3
占美国 GDP 总额的比重	0.0704	0.0632	0.0541	0.0516	0.0484	0.047	0.0298
工业 增加值 (年增长率)	-21.59	-13.24	-19.86	-4.55	-5.57	0.87	-5.05
农业 增加值 (年增长率)	-9	-4	-12	-8	-5.3	2.5	-18.8
服务等附加值 (年增长率)	-8.43	-19.47	-2.48	-10.12	-0.63	1.61	-3.57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给出的数据

### (二) 普京时期：实现恢复性经济增长

在普京的前两个任期中，他提出了“自由经济”政策与发展方针，强调通过加强中央集权，在政治上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以保证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现。图1汇总了这一时期普京提出的政策措施，以及基于此获

得的经济成就。其实，这一时期俄罗斯之所以能够实现恢复性增长，也与良好的国际市场行情息息相关。1999 年原油每桶 15.9 美元，而 2006 年增长到每桶 65.15 美元，8 年间原油价格一直处于增长之中，实现了四倍多的增长。俄罗斯作为石油资源丰裕型国家，经济增长与原油出口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性，且石油等原材料出口占出口百分比高达 70%。因此，其摆脱经济危机、实现经济增长，与国际原油市场良好的行情密切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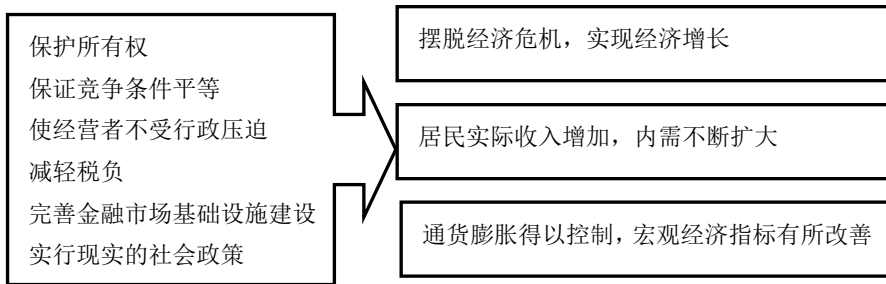


图 1 普京前两任期实施的政策措施与获得的经济成就

### （三）梅普组合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推进经济现代化进程

俄罗斯依靠能源型经济发展模式走出了转型危机，并实现了恢复性经济增长。自 2005 年起，国内生产总值仅次于美中日德法，跃居世界第六，重新冲进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是过分依赖石油资源发展经济，会产生“荷兰病”效应，扭曲经济结构，“挤出”人力资本及物质资本，甚至会因过度寻租而引发制度弱化及腐败。为避免“资源诅咒”，实现弱可持续性发展，彻底扭转严重依赖原材料的畸形经济发展结构势在必行。2008 年 2 月 28 日，普京作了题为《俄罗斯 2020 年发展战略》的报告，正式提出俄罗斯创新发展战略。这一战略要求大幅度提高俄罗斯的科技进步及效率水平，最终希望将俄罗斯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以技术为基础的创新驱动模式。

全球金融危机于 2008 年夏蔓延至俄罗斯，并从金融部门迅速扩散到实体部门，致使正在崛起的俄罗斯经济遭受重创。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俄罗斯的冲击力很大，2009 年经济衰退高达 7.82%，是 G20 国家中 GDP 降幅最

大的国家；且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 2009 年全球竞争力排名榜上由第 51 位下降为第 63 位。究其根源，在于经济发展模式严重原材料化，对外部经济环境高度依赖。面对此情此景，梅德韦杰夫总统指出，“俄罗斯经济过分依赖能源产业的弊端已经完全显现出来了，该模式对于俄罗斯的发展是致命性的，必须加快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梅德韦杰夫于 2009 年发表的《总统咨文》中提出了全面现代化的战略部署，具体包括：第一，实现国有部门现代化；第二，创造符合世界标准的研发与投资环境；第三，对立法及国家治理进行改革，为创新发展营造良好的国内环境；第四，使预算政策能够有效刺激结构性改革；第五，正视国际竞争，它是实现现代化的决定性激励机制；第六，建设斯科尔科沃创新中心，将计算机、核技术、航空航天、医疗及能源效率作为优先发展方向；第七，在莫斯科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第八，最大程度集聚智慧资本。

#### （四）新普京时期：强国梦的实现并非一帆风顺

2012 年 5 月 7 日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给出了俄罗斯“强国梦”的施政纲领，将俄罗斯的长期经济目标设定为：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保证稳定性，提高公民实际收入，实现俄罗斯经济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

但是 2014 年俄罗斯经济增长进入了停滞状态，2015 年则再度陷入衰退的泥潭之中，2016 年经济形势也不容乐观，负增长已是大概率事件。因此，用经济危机定义当前的俄罗斯经济发展状况毫不夸张。新普京时期，俄罗斯再度发生经济危机的原因有两个：石油价格低迷、卢布贬值及西方制裁属于外因，经济结构不健康是内因。由于内因对事物的发展状态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俄罗斯经济结构问题成为此次危机爆发的根源。进口替代战略是俄罗斯此次反危机的主要政策，且在卢布不断贬值的助力下，该项政策的效果已初步显现。但是，基于进口替代的拉美教训及全球化背景下很难大规模地推行产业扶植与进口限制政策，俄罗斯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被看好。

通过介绍俄罗斯在转型初期、普京时期、梅普组合时期、新普京时期的经济发展进程，我们不难发现，俄罗斯的经济增长简直就是“一波三折”。



那么如此崎岖不平的经济增长路径是否是有效率的呢？换句话说，由资本、劳动、自然资源等投入与经济增长产出所构成的决策单元是否处于最优前沿呢？对俄罗斯经济增长中的技术效率进行测算不仅有利于促进资源配置合理有效进行，而且也可为今后进一步研究技术进步对俄罗斯经济增长的作用提供数据支撑。

## 二、理论方法与模型设定

### （一）技术效率的内涵与测算方法

技术效率的定义最初是由法雷尔（M.J.Farrell）在题为《生产效率的测算》<sup>①</sup>一文中给出的，技术效率是指决策单元的投入产出效率，它反映了在给定产出条件下，投入的质量及管理的水平。微观技术效率的大小表明生产者对技术性能的把握和利用能力的高低，宏观技术效率的水平则折射出生产领域中技术更新速度的快慢和技术推广的有效程度<sup>②</sup>。技术效率的概念通常会与生产可能性边界联系在一起。若生产可能性边界代表一个行业在最好的硬件和管理技术下所能达到的最大产出，则技术效率的大小可通过测算特定投入规模下实际产出与最大产出之间的差距得到<sup>③</sup>。

技术效率测算研究已有一段时间了，其中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计算投入产出率<sup>④</sup>。基于法雷尔（M.J.Farrell）给出的技术效率定义可以知道，投入产出率的测算至关重要，但是，利用该方法评价决策单元的技术效率，却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是投入产出率的计算仅适用于单投入单产出的情况，本文致力于测算俄罗斯经济发展体系的技术效率，如此复杂的系统必然存在多维投入。二是投入产出率不能给出决策单元无效的原因，技术问题与规模报酬问题都能引发无效率，而生产函数法是比较投入产出率复杂且被广泛使用的技术

---

① M.J. Farrell, "The measurement of production efficiency", *Journal of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Series A (General), 1957, Vol. 120, No. 3, pp.253-290.

② 孟令杰：“中国农业产出技术效率动态研究”，《农业技术经济》，2000年第5期。

③ 姚洋、章奇：“中国工业企业技术效率分析”，《经济研究》，2001年第10期。

④ H. Hollanders, Celikel-Esser F m, "Measuring innovation efficiency", *INNO Metrics*, 2007 report.

效率测算办法<sup>①</sup>。该方法利用某种固定形式的生产函数表示投入产出之间的关系，并对回归系数进行计算分析。利用该方法计算技术效率需要严格遵循几点假设前提：一是为保证技术效率的准确性，待估体系应符合某种固定生产结构，如线性生产函数、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等。二是在回归分析中，各自变量之间相互独立。关于经济发展体系的技术效率测算不应利用生产函数法，因为该体系难以满足第一点假设前提。若用线性函数描述创新发展体系投入产出间的关系，则将问题过度简化了，若引入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则资源投入无法被纳入其中。其实每一种具体的生产函数都有一定的局限性，若将经济发展体系固定为某种生产函数，则减弱了评价体系的客观性。

与投入产出率及生产函数法相比，生产前沿法具有很大的优势，尤其是在测算经济发展体系的技术效率时。目前，生产前沿法主要包括两大类型，一是参数前沿分析法，二是非参数前沿分析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及对理论完善性的追求，参数前沿分析法已从确定性前沿分析法演变为随机前沿分析法（SFA）。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于1977年由爱格纳（Aigner）、罗威尔（Lovell）、施密特（Schmidt）、穆森（Meeusen），和布罗仪克（Broeck）等学者分别提出。将截面数据用于生产函数中，误差项由两部分组成，分别基于随机影响及技术非效率而产生。该模型被定义为： $Y_i = x_i\beta + (V_i - U_i)$ ， $i=1,2,\dots,N$  其中， $Y_i$  及  $X_i$  分别表示第  $i$  个决策单元的产量及投入量； $\beta$  为未知参数； $V_i$  为随机变量， $V_i$  服从  $N(0, \sigma_v^2)$  独立同分布； $U_i$  为非负随机变量，基于生产函数的技术非效率产生， $U_i$  服从  $|N(0, \sigma_u^2)|$  独立同分布，且  $U_i$  与  $V_i$  相互独立。而非参数前沿分析法主要是指数据包络分析（DEA），基本模型为 CCR 模型和 BCC 模型，基于规模报酬分析、松弛变量的引入及超效率的存在两大基本模型已得到了扩充和完善。SFA 和 DEA 两种方法各有长短，学者们根据各自的偏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应用，目前仍很难界定哪种方法

---

① A. Bonaccorsi, C. Daraio, “Exploring size and agglomeration effects on public research productivity”, *Scientometrics*, 2006, Vol.63, pp.87-120; G. Crespi, P.D'Este, R.Fontana and A.Geuna, “The Impact of Academic Patenting on University Research and its Transfer”, SPRU Working Paper 178, 2008.

更好<sup>①</sup>

对于经济发展体系的效率测算，我们更倾向于使用 DEA 方法，这主要是因为，不存在能够精准描述经济发展体系的生产函数，而 SFA 方法将投入与创新产出间的关系简化为线性关系，这必然使测算结果与现实存在偏差。而 DEA 则首先基于现有数据，利用线性规划法寻找最优生产前沿，然后再通过测算每一决策单元与最优前沿间的距离，给出技术效率水平。

## （二）模型设定

在构建模型之前，首先应明确几个概念。数据包络分析（DEA）主要致力于研究由投入——产出组成的决策单元的有效性。1978 年美国运筹学家查恩斯（A.Charnes）等的提出了第一个 DEA 模型 CCR 模型，1984 年，本克（R.D.Banker）、查恩斯（A.Charnes）、库伯（W.W.Cooper）等学者放宽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提出 BCC 模型。这两种初始 DEA 模型对所评价的系统的输入和输出并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这与客观现实极为不符。基于此，国内外学者斯图茨（J.Stutz）、魏权龄等，对 DEA 模型的输入与输出进行了重新的设定。本文设定的松弛变量模型（SBM）具备以下假设条件：第一，规模报酬可变，这主要是因为，在现实中，由于管制、法律及不完全竞争等原因，产出单位无法实现固定规模报酬下的效率。第二，非径向改进，即对非有效单元不必遵循射线方向同比例进行改进，以使改善程度达到最大化；第三，承认超效率的存在，即当存在多于一个决策单元的技术效率为 1 时，需进一步鉴别这些有效单元的效率大小。之所以选择规模报酬可变条件下的非角度超效率松弛变量模型（Super-V-SBM）来测度技术效率水平，一方面是因为，松弛问题被最大可能地考虑，即在最大的可行域内提升技术效率；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对于改进一定能实现，即一定存在可行性解。<sup>②</sup>

我们的分析是基于学者 Kaoru Tone 于 2001 年提出的 SBM 及 super-SBM

---

① FR. Førsund et al., “A survey of frontier production functions and of their relationship to efficiency measurement”,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80, Vol3, pp.5-25; G.e.Battese, and T.J.Coelli, “A Model for Technical Inefficiency Effects in A Stochastic Production Frontier for Panel Date”, *Empirical Economics*, 1995, Vol 20, pp.325-332.

② Super-BCC-I; Super-BCC-V; Super-SBM-I-V 及 Super-SBM-O-V 均有可能产生无解的情形（即仍存在多个决策单元技术效率为 1）。

模型而展开的。假设需要对  $n$  个决策单元的技术效率进行测算，每个决策单元包括  $m$  种投入及  $s$  种产出，则投入与产出矩阵分别记作  $X = (x_{ij}) \in \mathbb{R}^{m \times n}$ ， $Y = (y_{ij}) \in \mathbb{R}^{s \times n}$ 。生产可能集  $P$  定义为： $P = \{(x, y) | x \geq X\lambda, y \leq Y\lambda\}$ ，其中  $\lambda \geq 0$  表示规模报酬可变。将最优决策单元定义为 DMU  $(x_0, y_0)$ ，且

$$x_0 = X\lambda + s^-$$

$$y_0 = Y\lambda - s^+$$

其中  $s^- \geq 0$ ， $s^+ \geq 0$  是松弛变量，分别表示对投入进行负向调整及对产出进行正向调整。当  $X > 0$ ，且  $\lambda \geq 0$  时， $x_0 \geq s^-$  成立。

基于理性人最优化选择假设，规模报酬可变条件下的非角度松弛变量模型定义为：

$$\rho^* = \min \frac{1 - \frac{1}{m} \sum_{i=1}^m \frac{s_i^-}{x_{i0}}}{1 + \frac{1}{s} \sum_{r=1}^s \frac{s_r^+}{y_{r0}}}$$

$$s.t. x_0 = X\lambda, y_0 = Y\lambda - S^+$$

$$\text{其中, } \lambda \geq 0, s^+ \geq 0, s^- \geq 0$$

在上述公式中，技术效率水平  $\rho$  将介于 0 到 1 之间，且越与 1 接近，则技术效率越高。其中， $\alpha_i = \frac{1}{m} \sum_{i=1}^m \frac{s_i^-}{x_{i0}}$  表示投入变量的无效率水平；

$\beta_r = \frac{1}{s} \sum_{r=1}^s \frac{s_r^+}{y_{r0}}$  表示产出变量的无效率水平。

在实际测算中，会出现多个决策单元的技术效率为 1 的情况，对于这些单元技术效率的对比，则需引入超效率模型。我们首先要改变生产可能集的定义， $P / (x_0, y_0) = \{(\bar{x}, \bar{y}) | \bar{x} \geq \sum_{j=1, j \neq 0}^n \lambda_j x_j, \bar{y} \leq \sum_{j=1, j \neq 0}^n \lambda_j y_j\}$  表示在之前的生产可能集中剔除  $(x_0, y_0)$ 。这意味着之前的最优决策单元将不再是技术有效的，因为这些决策单元存在投入不足或产出过剩，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Super-V-SBM 模型可以定义为：

$$\delta^* = \min \frac{\frac{1}{m} \sum_{i=1}^m \bar{x}_i / x_{i0}}{\frac{1}{s} \sum_{r=1}^s \bar{y}_r / y_{r0}}$$

$$x \geq \sum_{j=1, \neq 0}^n \lambda_j x_j$$

$$s.t. \ y \leq \sum_{j=1, \neq 0}^n \lambda_j y_j$$

$$\bar{x} \geq x_0, \bar{y} \leq y_0, \lambda \geq 0$$

在 Super-V-SBM 模型中，技术效率 $\delta$ 达到 1 的决策单元仍是最优的。当技术效率小于 1 时，存在投入过剩，或产出不足（亦或二者兼而有之）；当技术效率大于 1 时，存在投入不足，或产出过剩（亦或二者兼而有之）。这两种情况都属于技术非有效。

### 三、变量确定、数据选取与模型估计

依据古典经济学家萨伊的生产要素三元论，模型的投入变量将基于 1992-2011 年俄罗斯的资本形成总额（按现价美元计算）、劳动力总数、单位 GDP 能源使用量进行设定。投入 K 表示单位 GDP 资本使用量=资本形成总额/GDP 总量；投入 L 表示单位 GDP 劳动力使用量=劳动力总数/GDP 总量；投入 Energy 表示单位 GDP 能源使用量；产出为 GDP 增长率（如表 2 所示）。基于包络分析无需引入具体生产函数这一优越性，收集的数据可以直接引入 DEA—SOLVER 5.0 软件进行建模分析。

表2 投入—产出汇总表

	(I)K	(I)L	(I)Energy	(O)GDP
1992	156303.297731412	73.560717232	1.28082467	-14.531073774
1993	123300.861563419	76.367897693	1.268561078	-8.668540341
1994	118577.40630719	82.73072831	1.295139642	-12.56975598
1995	120845.429435979	84.665487253	1.307843643	-4.143528406
1996	113443.362742296	85.284033344	1.297046165	-3.6
1997	105596.973703437	81.09337235	1.399919653	1.399999999
1998	50284.516441638	83.970141898	1.371433647	-5.299999999
1999	33369.256176627	83.248753655	1.429701082	6.4
2000	48521.367760015	72.746119765	1.61575783	9.999999999
2001	62574.524464128	66.509489444	1.718004361	5.091984231
2002	59310.697961953	62.206042484	1.87238728	4.743669897
2003	67063.984587801	55.27117537	2.074177233	7.295854331
2004	83805.318014249	50.641348809	2.276845156	7.175949192
2005	90404.526011549	44.288255637	2.603496914	6.376187027
2006	98223.181341915	35.296960718	3.181511053	8.153431973
2007	132099.909572374	32.111379166	3.534843161	8.535080209
2008	147153.014299917	26.63122745	4.180494074	5.247953532
2009	83595.339599375	27.614405212	4.278954044	-7.820885026
2010	117775.484036164	26.063985337	4.169374148	4.503725625
2011	147487.127193668	23.834428897	4.414133596	4.264176565

数据来源：依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数据计算所得。

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测算俄罗斯 1992-2011 年间的技术效率，发现在 20 年间，平均技术效率为 0.935。平均技术效率小于 1 表明，在给定投入条件下，产出并未达到最大值；或在一定产出条件下，存在非有效投入，也就是说，在现有技术水平下资源没有被充分、有效地利用。

表3 俄罗斯技术效率测算结果

时间	SBM 技术效率	S-SBM 技术效率	时间	SBM 技术效率	S-SBM 技术效率
1992	0.993816275	0.993816275	2002	0.998545475	0.998545475
1993	0.997901109	0.997901109	2003	1	1.021865828
1994	0.061306912	0.061306912	2004	1	1.004439104
1995	0.395298899	0.395298899	2005	0.999801465	0.999801465
1996	0.998825785	0.998825785	2006	1	1.08248306
1997	0.399049626	0.399049626	2007	1	1.081424197
1998	0.994176666	0.994176666	2008	0.904702712	0.904702712
1999	1	1.185469423	2009	0.998836855	0.998836855
2000	1	1.501435975	2010	1	1.042460404
2001	0.99952356	0.99952356	2011	1	1.031177529

数据来源：利用 DEA—SOLVER 5.0 软件计算所得

根据表 3 技术效率的测算结果，我们发现，在 20 个观测年中，有 8 个观测年技术效率达到 0.99 以上，在理论上这意味着这些年份的技术效率是相对有效的，无需对投入产出进行大幅调整。但是，1992、1993、1996 及 1998 年处于经济转型危机之中，通常认为给定投入条件下，产出若不能实现最大化，技术效率不会是相对有效的。但是根据技术效率的计算公式可知，当投入变量无效率水平  $\alpha$  及产出变量无效率水平  $\beta$  都接近 0 时，技术效率会接近 1。在这些年份中，之所以会出现  $\alpha$  趋近于零，是因为“大爆炸”式的经济体制转型，破坏了原有的生产链，大部分企业停产、倒闭或重组，致使投入变得非常有限。可见，在转型危机年份中，较低的生产性投入使投入变量无效率水平与零较接近。而产出变量无效率水平趋近于 0，是因为生产链条崩溃后，产出水平相当低，因此所有的产出都会与需求相匹配，不再存在浪费性产出。在普京的前两个任期中，2002 年、2005 年及 2009 年的技术效率都是相对有效的，这与恢复性增长及“自由经济”改革方针的有效实施密不可分。较优的技术效率表明，投入质量及管理水平有提升。自普京执政以

来，俄罗斯的经营者不再受行政压迫，主要表现为：减少国家对经营活动的过多干预，法律的直接效率被充分发挥；法规及文件拥有双重解释的现象被消除；企业登记、鉴定、拟定投资项目等活动的程序被大幅简化。

在 20 个观测年份中，1994 年、1995 年及 1997 年的技术效率都非常低，这是俄罗斯实行快速向市场经济转型带来的负面影响，与转轨过程中的政策失误相关。这三年的技术效率改进方式相同，如表 4 所示，都是通过减少资本投入比例与增加产出水平相配合。这样的调整方式意味着适度放弃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应将更多的注意力转向消费与进出口贸易。

表4 较低技术效率水平的改进方式

	K	L	Energy	GDP
1994	-5.07%	0.00%	0.00%	63.81%
1995	-11.82%	0.00%	0.00%	29.38%
1997	-47.27%	0.00%	0.00%	111.11%

数据来源：利用 DEA—SOLVER 5.0 软件计算所得

2008 年是俄罗斯经济形势较复杂的一年，虽然 GDP 同比增长 5.24%，但是金融危机的冲击导致经济形势开始恶化。该年的技术效率仅为 0.9047，低于 20 年均值水平。调整方式为资本投入减少 3.33%，能源投入减少 1.52%，产出增加 8.75%。之所以要求资本投入与能源投入减少，是因为在金融危机爆发的年份，资本价格与能源价格下降，增加资本投入及能源产业的发展对经济的带动力也会随之下降。

在表 3 中，技术效率大于 1 的年份为 8 年，这表明在俄罗斯经济增长中，投入不足问题较严重。根据包络分析给出的调整方式（如表 5 所示），我们可以看出，劳动力投入不足是产生技术无效率的关键所在，劳动力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口数量少。且 1999 年和 2006 年要求资本投入大幅增加，与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投入不足的现实相一致。之所以要在 1999 年和 2000 年增加能源投入，是因为世纪之交俄罗斯依靠能源产业实现经济恢复性增长的机遇已悄然而至，2000 年原油价格已高达 28.19 美元/桶。



表5 超效率改进方式

	K	L	Energy	GDP
1999	46.65%	0.00%	8.99%	0.00%
2000	0.00%		6.42%	-31.97%
2003	0.00%	6.56%	0.00%	0.00%
2004	0.00%	1.33%	0.00%	0.00%
2006	17.70%	7.05%	0.00%	0.00%
2007	0.00%	9.92%	0.00%	-4.47%
2010	0.00%	12.74%	0.00%	0.00%
2011	0.00%	9.35%	0.00%	0.00%

数据来源：利用 DEA—SOLVER 5.0 软件计算所得

#### 四、俄罗斯技术效率影响因素的进一步剖析

通过定量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 20 个观测年份中，仅有 8 年技术效率与 1 接近，技术效率相对有效。虽说通过调整投入产出比重可以提高技术效率水平，但这是事后诸葛亮，对技术效率的提升及减少波动幅度是治标不治本的。因为每一个观测年份都是矛盾统一体，既有共性又有特性，且特性决定经济年的发展方向。因此，有必要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进一步的剖析。基于相关文献，本文将从技术创新、经济体制转型及金融危机三个方面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 （一）技术创新

1912 年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创新理论，该理论囊括了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创新及组织创新。之后，索洛等新古典经济学家将技术进步引入到经济增长模型中，罗默等新增长理论代表人物将技术创新内生。基于上述经济理论，我们可以将技术创新的实质看作是建立一种新的、效率更高的生产函数。而技术效率则是对生产函数效率水平的测度，故生产函数的效率水平这个“中间人”将技术创新与技术效率紧密相连。技术创新的水平可以用专利申请授权量、科研人员数量、科

研经费投入等数据进行测度，因此这些指标也将成为影响技术效率的关键所在<sup>①</sup>。

表 6 俄罗斯技术创新相关指标

	科技期刊文章发表数量	专利申请 (非居民 与非居民)	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百分比	R&D 研究人员数 (每百万人口)	研发支出 (占 GDP 比例)
1992	817	51344	NA	NA	0.74
1993	19659	32477	NA	NA	0.76
1994	21612	25745	NA	NA	0.84
1995	18603.5	24444	NA	NA	0.85
1996	18553.3	25994	9.66	3788.17	0.97
1997	18133.4	23229	9.34	3595.82	1.04
1998	17165.6	24753	11.97	3334.07	0.95
1999	17145.4	27844	12.33	3374.82	1.00
2000	17180.1	32337	16.06	3450.60	1.05
2001	15657.9	34090	14.03	3460.20	1.18
2002	15847.2	33308	19.15	3380.57	1.25
2003	15147.8	34870	18.97	3364.70	1.29
2004	14921.8	30190	12.92	3309.38	1.15
2005	14424.5	32253	8.43	3227.73	1.07
2006	13561.6	37691	7.77	3231.10	1.07
2007	13953.7	39439	6.87	3265.35	1.12
2008	13970.2	41849	6.47	3140.47	1.04
2009	14057.2	38564	9.22	3077.90	1.25
2010	13500.4	42500	9.06	3078.10	1.13
2011	14150.9	41414	7.97	3120.36	1.09
2012	NA	44211	8.37	3096.11	1.12
2013	NA	44914	10.00	NA	NA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http://data.worldbank.org.cn/>

① 在随机前沿法对技术效率的测算与分解中，上述因素就被纳入到模型之中。

俄罗斯在军事及航空航天领域的技术水平在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在民用工业方面却是技术水平有限、创新前景渺茫的，这必将对俄罗斯技术效率产生负面影响。表 6 展示了俄罗斯技术创新的相关指标。与技术创新的领导者美国、技术创新的追随者中国、技术创新的赶超者日本相比，各项指标都有待提升（依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测算，中美日三国技术创新年均指标如表 7 所示）。

表7 中俄美日1992—2013年技术创新年均状况汇总表

	中国	俄罗斯	美国	日本
研发支出（占 GDP 的比例）	1.22	1.10	2.60	3.16
科技期刊文章	33365.2	15403.125	198294.97	51699.52
专利申请（居民与非居民）	194407	34702	349242	384564
商标申请总数	567879.5	41973.8	246562.2	138206.6
R&D 研究人员（每百万人）	739.55	3311.49	3636.98	5170.80
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百分比）	20.86	11.03	28.30	22.90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数据计算所得。其中，研发支出占 GDP 比重，中俄美为 1996-2012 年均值、日本为 1996-2011 年均值；科技期刊文章，中俄日为 1992-2011 年均值、美国为 1992-2009 年均值；R&D 研究人员（每百万人），中俄为 1996-2012 年均值、美日为 1996-2011 年均值；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百分比），俄罗斯为 1996-2013 年均值。

从上表数据可以看出，俄罗斯技术创新乏力，这不仅会对技术效率的改进与提升产生影响，而且也会对国家的经济安全造成威胁。而技术创新乏力的原因可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概括：一是企业创新积极性不高——进行技术创新研究和开发的企业占全部工业企业的比重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和转型国家，且企业较少使用现代信息技术。之所以会如此不积极，是因为技术创新回报率较低，影响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实现。二是“创新环境”较差——虽然创新活动的基础设施总体上比较发达，拥有技术园区、企业孵化器、技术转移中心等，但是基础设施利用效率不高，主要为俄罗斯公司提供咨询服务；此外，对创新企业的税收、海关和行政管理质量也比较差。三是科研实力下降——科研论文总体数量、科研成果引用率都比较低，且科研支出与论文发

表数量的比比较大，表明科研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四是国民创新意识不强——主要表现为消费者购买创新产品的倾向具有一定的保守性，如曾经较低的国际互联网普及度。五是科技人才短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过程中，俄罗斯对物质资产和制度资产关爱有加，却忽视了人力资产的转化与再升级，致使大量科技人才流失；进入 21 世纪，俄科技人员流失现象大为缓解，但是年龄结构不合理，科技队伍出现了“老龄化”的现象<sup>①</sup>。

## （二）经济体制转型

1992 年俄罗斯以“大爆炸”的形式实现了经济体制转型，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而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是俄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及现实选择。从长远看，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发展，将有利于经济增长，使实际产出更加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由非技术效率状态逐渐转向技术效率前沿。这是因为，经济体制转型的直接目的是建立市场经济制度框架，而根本目的是根除无效率的制度基础、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下面，我们从对外经贸体制改革及宏观体制转型两个角度，简述经济体制转型对技术效率的影响。

对外经贸体制改革是国家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为一国的总体发展服务的。对外经贸体制改革会对一国进出口产品的结构产生影响，一国的经济越是发达，则出口水平越高，且高技术含量产品占出口总量的比例会远远高于初级产品的出口占比。贸易结构的优化必定会对技术效率的提升产生正向影响。苏联解体以后，叶利钦时代俄罗斯的对外贸易战略属于“休克疗法”的组成部分，由之前的完全国家垄断变成了国家放任自由。虽说这符合市场经济原则，但微观经济主体的决策与国家战略无法协调，企业基于利润最大化原则，使出口产品的能源及原材料倾向性和依赖性日益严重。到了普京时代，俄罗斯步入“可控的”市场经济，对外经贸体制处于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多元化阶段，期以独一无二的“石油大国”地位来营造自己的强势，致使对外贸易结构对能源及原材料的依赖性有增无减<sup>②</sup>。由此可见，依据传

<sup>①</sup> 马蔚云：“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及其评估”，《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2 年第 10 期。

<sup>②</sup> 刘军梅：“俄罗斯对外贸易战略演进的理论逻辑与政策选择”，《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 年第 3 期。

统贸易理论，俄罗斯的对外经贸改革很难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提高经济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带动经济发展。因此，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俄罗斯的对外贸易体制改革进入到了为创新型现代化战略服务的全方位开放阶段。从《2020年前俄罗斯对外贸易战略》中我们发现，俄罗斯将更多的注意力转向国际市场上工业产品的更新换代，以期将自身在重工业、军事及航空航天领域雄厚的基础研究实力与高新技术领域相衔接。此外，对外开放政策也由最初的向西方“一边倒”，转变为兼顾东西方，最近又提出了“东移亚太行动”。如此优化对外经济体制，会使需求增加，由需求增加带动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可持续性，且需求效应会改善投入产出的配比，减少技术非效率。

宏观体制转型主要是指与国家经济相关联的财政体制及税收体制的转型，其主要目标是保证国民收入分配及再分配的有效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建立市场经济结构，提高广大居民阶层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实现经济结构改革，缩小地区差异<sup>①</sup>。分析上述转型目标，我们可以发现，基于生产力的发展，优化宏观经济体制必将带来技术效率的改善。对俄罗斯而言，处理好政府间的财政关系，构建积极有效的财政激励机制，解决财政分权化改革带来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软预算约束及地区保护主义等问题已迫在眉睫。而巩固与加强联邦主体财政独立性、增加预算收入、提高支出效果及透明度，是优化财政体制转型的必然选择。税收体制转型对俄罗斯经济体制转型意义重大，因为它既是经济体制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制约着经济体制转型的进程。从税收政策的内容看，俄罗斯的政策调整以减税为主，但同时比较注重结构调整。1999-2001年的大规模税制改革对俄罗斯税收制度的形成具有基础性作用，《俄罗斯联邦税法典》的颁布使俄罗斯进入实质性税制改革阶段。2002年开启的新一轮的税制改革，目前已进入收尾阶段，但是对税制的微调和不断完善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此外，国有企业转型、经济结构调整及私有化进程都是经济体制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都会对一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产生影响，进而影响技术效率的

---

<sup>①</sup> 郭连成、杨宏等：“全球产业结构变动与俄罗斯产业结构调整 and 产业发展”，《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2年第6期。

提升及最优前沿的移动。

### （三）金融危机

通常认为，金融发展对一国的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且实现途径多种多样，如货币金融的发展、通过资本分配及再分配职能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信用创造等等。金融中介作为金融发展的主体，其主要功能如下：一是通过多样化经营实现风险分散，提高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二是进一步有效疏通资金的流通渠道，提高储蓄投资转化率；三是通过金融创新提高储蓄率。可见，金融中介的快速发展，不仅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还能提升技术效率<sup>①</sup>。

虽然金融系统的稳步发展可以减少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并促进储蓄率、长期经济增长率的快速增长以及技术创新的发展<sup>②</sup>，但是，由于金融企业主要经营货币资金，以负债业务为主，故金融体系具有一定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的表现即为金融危机的爆发。金融危机的爆发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因此会削弱一国的技术效率。如之前的定量分析所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际，俄罗斯的技术效率仅为0.9047。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最初仅对俄罗斯的证券市场产生影响，普遍认为俄罗斯能够利用外汇储备及能源出口创汇确保自身安全。但是，雷曼兄弟银行的破产清算引起的国际金融市场恐慌，很快就蔓延到了俄罗斯金融市场，有价证券价格开始大幅缩水，随即卢布大幅贬值，外债成了影响俄罗斯经济安全的潜在因素。此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对俄罗斯的金融部门及实体经济都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还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如购买力下降、失业增加、贫困等。尽管俄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临时性社会救助措施，但在危机面前并没有取得显著成效。基于此，俄罗斯2008年的技术效率水平相对较低，且由于资本和能源价格的大幅下降，技术效率调整方式为缩减资本和能源投入量，因为此时这两种投入的增加已不能换来经济增长的实现。

---

① 徐琼：《区域技术效率论：基于技术效率的区域经济竞争力提升研究》，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

② 周立：“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综述”，《经济学动态》，2003年第9期。

而与之相比较，1998年也是金融危机爆发之年，但是俄罗斯当年的技术效率却处于0.99之上，与最佳技术效率十分接近。为什么同样是金融危机爆发年，2008年与1998年的技术效率差距会如此之大呢，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及传导机制能够很好地解答该问题。

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是“休克疗法”带来的国家财政赤字。为弥补财政赤字，政府不得不利用拆东墙补西墙的方法，借新债还旧债，致使债权价格不断攀升。无奈之中，俄罗斯政府在“8·17联合声明”中宣布停止兑现1999年以前到期的国债，并将其转为3-5年的中期债券，致使持有国债的金融机构陷入困境，国内金融市场开始出现危机。之后危机逐渐由金融层面传导至实体经济，失业和通胀随之而来。由于传导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不是一触即发的，因此1998年技术效率相对有效，有可能与“时滞”有关。但是，2008年俄罗斯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却是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这种更具世界性特征的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更大、持续时间更长。因此，同是金融危机爆发年，但技术效率相差甚远，也就不难理解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虽然也使国际环境变得相对较差，但这最多只能算是俄罗斯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索，而非根本原因。此外，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由于1998年之后国际能源价格一路上涨，卢布贬值有利于提升俄罗斯产品出口竞争力，致使危机爆发之际，能源出口反而成了俄罗斯经济的新增长点。这与定量分析中，1999年、2000年技术效率改进方式都要求增加能源投入量相一致。

## 五、结论

本文首先梳理了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然后对经济发展体系中的技术效率水平进行测算，并给出技术效率改进方案，最后对俄罗斯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研究发现：1992-2011年，俄罗斯技术效率年均水平为0.935，且波动较大。这表明在一定技术效率水平之下，投入没能带来最大产出，对生产率及经济增长均有负面影响。在技术效率最低的三个观测年份中，都要求通过减少资本投入、增加产出水平以改善技术效率，

这间接强调了内需及外资对经济的重要性。在存在技术超效率（技术效率大于1）的观测年份中，劳动力投入的增加成为首要改进方式。基于对俄罗斯技术效率现状及影响因素的分析，我们认为，有效的政策选择可以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然资源对俄罗斯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不容忽视，因此在发展创新型经济过程中，不能盲目地排斥能源出口，可以通过建立能源基金，推动创新发展及技术效率的改进。二是竭尽全力改变人口负增长现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重视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劳动者的工作效率。三是认清金融自由化的双重性，进一步防范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四是将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落到实处，利用创新型经济、绿色经济带动发展。

本文还存在诸多可以扩展之处。如将投入与产出间的时滞性纳入到分析之中；将无效率单元的技术效率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而探究产生无效率的原因；扩大产出与投入维度等。这都将是我們今后的研究方向。

---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give both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about the technical efficiency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of Rus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system. When the returns to scale are variable, based on non-radial super-efficient DEA model, this paper explores Russian technical efficiency and its approaches in adjusting. Based on the result of quantitative analysis, this article examines further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from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technology innovation, economic system transition and financial crisis. As a result, it finds that firstly insufficient capital investment has rather negative impacts on Russian technical efficiency improvement. Secondly, we cannot ignore the role of energy industries on the improvement of technical efficiency for Russian economic growth. Finally, more labor forces in Russia market could bring about improved technical efficiency.

**【Key Words】** Russia, Economic Growth, Technical Efficiency, Influential Factors

**【Аннотация】** Техническая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ь систем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и влияющих на неё факторов является важным вопросом. В условиях переменной отдачи масштаба, на основе super-v-SBM модели DEA, выявлена техническая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ь и способ её корректировки в 1992 - 2011 гг. в России. На основе количественного анализа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их инноваций, реструктуризаци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и финансового кризиса проведён дальнейший анализ влияющих на российскую техническую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ь факторов. Было установлено, что: недостаток капитальных вложений оказывает негативное воздействие на российскую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ую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ь; нельзя игнорировать положительную роль топливно-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на увеличение технической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та в России; увеличение вложений в трудовые ресурсы приводит к повышению технической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и.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Росс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рост, техническая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ь, факторы влияния

---

(责任编辑 姜睿)

## 中国企业在哈萨克斯坦投资环境评价及风险研究——基于69家中资企业调查研究\*

伊万·沙拉法诺夫 任群罗\*\*

**【内容提要】**2015年3月28日,中国官方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并明确新疆为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因此,为了鼓励更多的中国企业向中亚国家“走出去”,需要提高对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投资环境的认识。本文运用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的方法,对在哈萨克斯坦进行实质性投资的69家中国企业进行了访谈调研,分析企业对哈萨克斯坦投资软环境和硬环境的评价,并总结中国企业在哈萨克斯坦面临的主要内部和外部风险所在。

**【关键词】**中资企业 投资环境 哈萨克斯坦 风险评估

**【中图分类号】**2D822.3;F125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6)04-0169(34)

### 引言

关于投资环境与风险评价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新疆周边国家经济安全机制比较和整合研究”(项目批准号:14ZDA088)的阶段性成果、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新疆)与周边国家的能源与贸易互联互通建设战略研究”(项目批准号:13AZD083)的阶段性成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研究生教育创新科研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哈萨克斯坦产业投资环境与中国投资风险规避研究”(项目批准号:XJGRI2015117)的阶段性成果。  
\*\* 伊万·沙拉法诺夫(Ivan Sarafanov),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博士研究生,新疆财经大学中亚经贸研究院研究员;任群罗,新疆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第一阶段：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制造业）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此时，制造业资本溢出效应提升了要素价格，引起了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进行生产。在这种背景下，利特维克（I. A. Litvak），班汀《P. M. Banting》提出“冷热国比较法”，并建立了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sup>①</sup>斯托鲍夫（R. B. Stobaugh）（1969）将投资环境的评价体系分为八个指标，对接受外商投资的国家所提出的投资限制和鼓励政策进行全面分析。<sup>②</sup>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第三次信息技术革命带动了发达国家以知识经济为基础产业结构的转变和升级，进一步加强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到国外的推力。该时期内，施文蒂曼（T. S. Swinteman）通过分析美国陶氏（Dow）化学公司对国外进行投资的历程，提出道氏评价法。<sup>③</sup>经济规划咨询公司（Plan Econ Consulting），《财富》（*Fortune*）和《跨国商业》（*Multinational Business*）杂志分别提出评价区域投资环境的指标体系，它不仅包含投资条件，而且将离全球经济中心的距离、制度改革规模、“民主传统”、改革的步伐和潜力、劳动力素质等因素纳入到评价体系当中。<sup>④</sup>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引起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性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刚独立的国家普遍缺乏资金、设备和技术，这就为西方国家创造了巨大的投资机遇。为此，沃尔特等（W. Bottche, J. Joudanov, H. Walter）根据社会稳定因素、经济转型程度、国民经济发展情况、对外开放程度等，建立了前苏联国家1994至1998年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认为上述的因素能够提供关于投资项目实施的具体时

---

① I. A. Litvak, P. M. Banting,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rrangements”, *Marketing and the New Science of Planning: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 II*, 1968, Vol.03, pp. 460-467.

② R. Stobaugh, “How to analyze foreign investment climate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69, Vol.09/10, pp.100-108.

③ 付晓东、文余源：《投资环境优化与管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49-359，195页。

④ Анисимова Э.В. Количественная и качественная оценка инвестиционного климата// Научный журнал КубГАУ. 2012. №.01. С.1-10.

间、地点和形式等有关信息。<sup>①</sup>《Euromoney》杂志采用经济效率、政治风险程度、负债率、债务清偿能力、信用能力等指标，每年两次对全球各国的投资风险及国家接受外资能力进行评估。俄罗斯《Эксперт РА》评级机构采用投资潜力与投资风险两项评定综合比较法，对俄罗斯各地投资潜力和投资风险项下的子要素赋值，并对其进行排列。<sup>②</sup>

哈萨克斯坦是中国通往中亚等区域的“第一站”，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地位非常重要。截至2015年3月1日，中国在哈企业总数为2933家，其中大中小型实际运营企业为580家。为了提高中国企业在哈萨克斯坦的产业投资效率，为更多的企业“走出去”提供决策参考，需要研究分析中国企业在哈萨克斯坦的投资环境及面临的主要风险。运用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法，2015年6月20日-2016年3月20日，本文作者对位于中国新疆以及位于哈萨克斯坦的阿斯塔纳市、阿拉木图市、卡拉干达州、阿克托别州、阿克莫拉州以及阿拉木图州的中资企业代表进行了座谈会式的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87份，收回有效问卷69份，其中来自中国新疆19份，来自哈萨克斯坦50份。在此次调查研究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企业在哈萨克斯坦面临的主要风险进行了分析和总结。

## 一、实地调研结果分析

### （一）对哈萨克斯坦投资环境的基本认识

独立以来，引进并合理利用外资成为哈萨克斯坦最基本的国策之一。为此，哈萨克斯坦政府将不断优化投资环境的目标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从而使其在24年内累计吸收了2000多亿美元的投资。哈国总统在2015的国情咨文中提出，国家在现在的发展阶段需要尽快制定新的投资政策，即每年吸引的投资额应该不少于100亿美元。但2013年以来，全球经济形势和地缘政治局势的恶化、能源和金属价格低迷等因素降低了哈萨克斯坦对投资的吸

---

<sup>①</sup> W.Bottcher, J.Joudanov, H.Walter, Ein Investitions barometr fur die vormalige UdSSR, Berlin: Vaduz, 1998, pp.45-78.

<sup>②</sup> Эксперт РА Рейтинговое агентство. Рейтинг инвестиционной привлекательности регионов 2015 года. 10.08.2015. <http://raexpert.ru/ratings/regions/2015/>

引力。应当强调，根据 2015 年哈国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投资额下降最多的领域包括石油天然气和矿产业。此外，油价下跌导致的财政收入减少引起了坚戈的大幅贬值，因而降低了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在这种背景下，哈国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专门制定了应对危机的“光明之路”计划。该计划主要目标可以总结为：在经济低迷时期，大兴基础设施建设，保障经济增速，为未来打基础。此外，2016 年 1 月 19 日在哈政府举行的经济政策会议上，谋划了油价下跌至 20 美元的应对措施及方案。该方案表示，若油价下跌至 20 美元的话，即便会对预算个别领域进行重审，但涉及重要社会领域的财政支出和“光明之路”计划的投入并不会减少。该决策在某种程度上确保了外国投资者在未来几年中依然可以保持并扩大对哈国国民经济重点领域的投资规模。此外，为了支持外国投资者，在全国各地建立了“一个窗口”原则的投资者服务中心。可见，在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哈国上下各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保障国民经济各领域稳定发展以及吸引更多外资的政策措施。

## （二）实地调研中发现的主要问题

近几年来，即便哈国政府在优化投资的软、硬环境方面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但调研过程中中方企业反映出的问题也不容忽视。至于投资软环境，大多数中方企业认为，哈萨克斯坦的政府管理部门官僚主义严重、提供支持不够、办事效率较低、国家政策变化多端和不稳定、货币汇率不稳定、官方腐败、存在歧视与不平等对待、劳动力用工成本过高、官员和相关工作人员对业务知识掌握不全、法制不完善、执法不公、政府为企业服务意识差、政策执行和市场监管力度不够、相关的配套服务跟不上、相关政策颁布后事实上不到位、银行对贷款的发放审核过于严格等问题都比较突出。而且，根据在哈进行投资企业的经验来看，之所以目前中资企业在哈很少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是因为哈萨克斯坦的投资软环境质量欠佳。软环境的质量问题不仅制约了更多的外资流入，而且在长期内也使哈萨克斯坦总体投资环境得不到改善。

调研结果显示，在被调查的 69 家企业中，目前只有 25 家企业表示，自开业以来其在哈投资回报率“较好”，其余 44 家企业则表示其回报率“一

般”，并表示投资回报率较低的问题主要是由软环境不完善造成的。在这种背景下，37家企业计划未来在哈维持现有的投资规模（私营企业为主），16家企业计划小规模扩大，8家企业计划大规模扩大（国有企业为主），5家企业计划缩小规模，1家企业计划转移到其他地区（详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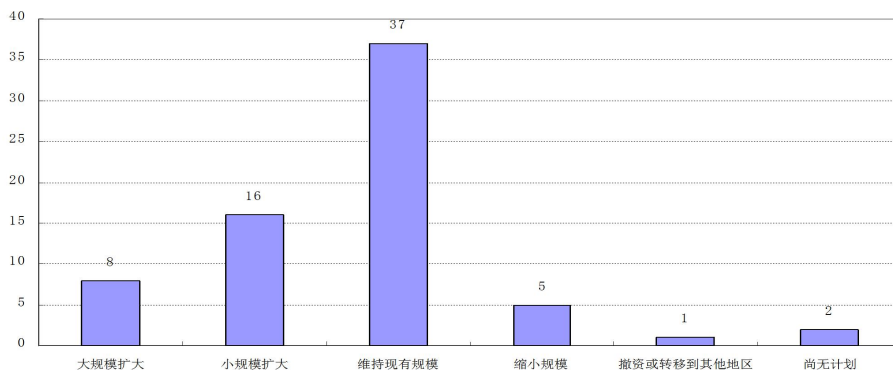


图1 公司未来对哈萨克斯坦投资的计划

注：图中大规模扩大意味着将现有的投资规模增加 $\geq 1$ 倍；小规模扩大意味着将现有的投资规模增加 $< 1$ 倍

资料来源：根据调查数据整理得出

从硬投资环境建设情况来看，大多数中资企业认为，近几年哈国加大了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兴建道路、桥梁等工程，使其有相对大幅度的改善。但同时也反映了一些问题，比如公路质量较低，铁路设施落后，基础设施建设和更新速度超慢，边境运输设施较落后，邮电通信有待改善。然而，即使基础设施落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企业对哈投资的扩大，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给中方企业带来了投资基础设施领域的机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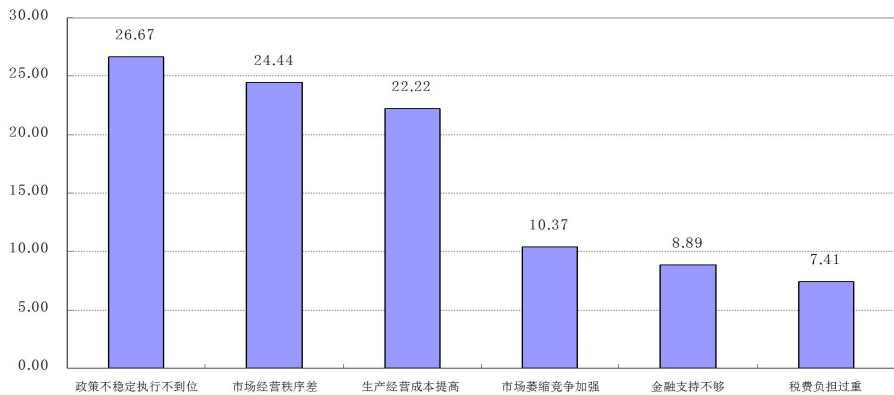


图2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主要问题

注：图中市场经营秩序差是指，中资企业认为哈萨克斯坦市场管理主体的管理行为、市场经营主体的交易行为、市场消费主体的购买行为及市场交换客体的质量欠佳。图中市场萎缩竞争加剧是指，由于最近几年来自其他国家的竞争压力加强，中资企业的产品在市场上所占份额有一定程度的萎缩，即企业对市场的控制能力逐步弱化。

资料来源：根据调查数据整理得出

调研结果显示，目前中国公司在哈萨克斯坦生产经营中遇到的主要问题依次排列，包括政策不稳定且执行不到位（占 26.7%）、市场经营秩序差（占 24.4%）、生产经营成本提高（占 22.2%）、市场萎缩竞争加强（10.4%）、金融支持不够（8.9%）和税费负担过重（7.41%）（详见图 2）。很明显，投资软环境最重要的要素，即政策稳定性及其执行力一直是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主要障碍。因此，可以发现，所有被调查的企业有一个共识：尽管最近几年哈萨克斯坦的投资环境确实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中国企业在哈投资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能否构建起合理、完整的投资软环境。

即便哈萨克斯坦的基础设施基本上能满足投资者的需要，但是在缺乏完善的法制、政策和市场环境以及服务意识的情况下，投资会遇到许多障碍和风险。这是因为投资硬环境是一个相对纯粹的经济概念，侧重反映和体现

在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以及由此所引发的有关经济方面的发展问题。而投资软环境则比较复杂，包括社会、政治、法制、人文等涉及到非经济诸多方面的问题。但是投资硬环境与软环境的关系尤其密切。软环境是硬环境的基本基础，是吸引外资必要的、首要的条件。没有完善的软环境，该国就没有很强的吸引外资能力。但在提升软环境水平同时，又不能忽略硬环境的加强。二者之间关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 二、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本研究采用抽样调查法，对位于中国新疆乌鲁木齐市以及位于哈萨克斯坦的阿斯塔纳市、阿拉木图市、卡拉干达州、阿克托别州、阿克莫拉州以及阿拉木图州的中资企业代表进行了座谈会式的问卷调查。此次作者设计的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企业总体情况、评价哈萨克斯坦投资软环境及投资硬环境三个部分。对各类企业共发放问卷 87 份，收回有效问卷 69 份，其中来自中国新疆 19 份，来自哈萨克斯坦 50 份（其中阿斯塔纳市和阿克莫拉州 6 份；阿拉木图市和阿拉木图州 24 份；卡拉干达州 7 份；阿克托别州 8 份；阿特劳周 5 份）。本部分全部数据均来自于问卷调查的结果。

### （一）中资企业基本情况分析

#### 1、中资企业所从事的行业

本次问卷调查有 1 家企业从事农林牧渔业，8 家企业从事制造业，15 家企业从事建筑安装业，19 家企业从事能源业，2 家企业从事房地产业，7 家企业从事运输、仓储及邮电业，26 家企业从事贸易、金融业，1 家企业从事酒店、餐饮及娱乐业，9 家企业从事社会服务业，其中有 4 家企业从事 3 种行业和两家企业从事 2 种行业的情况。根据参与本次调查问卷的企业情况可知，从事贸易、金融业以及石油能源行业的企业最多，分别占到 29.5%和 21.6%。此外，此次调研涉及的行业领域较多，包括 9 个主要行业。（详见图 3）



## 2、中资企业所有制类别

问卷调查显示,此次调查共有 19 家国有和国资控股企业,占 27.5%; 民营企业共有 50 家,占 72.5%。

## 3、中资企业来哈萨克斯坦投资的方式

问卷调查显示,43 家企业是通过自己考察后选择来哈进行投资的,占 62.3%; 2 家企业系通过当地政府招商引资来哈投资,占 2.9%; 2 家企业是通过他人或企业推荐来哈进行投资,占 2.9%; 16 家企业在已有项目基础上投资新项目,占 23.2%; 另外还有 6 家企业是受同行业或关联行业带动,占 8.7%。可见,目前大部分中国企业是通过自己对当地中亚市场的考察和分析后选择去哈萨克斯坦投资的,其次是在已有项目基础上对新项目进行投资,由当地政府招商引资而来的企业为极少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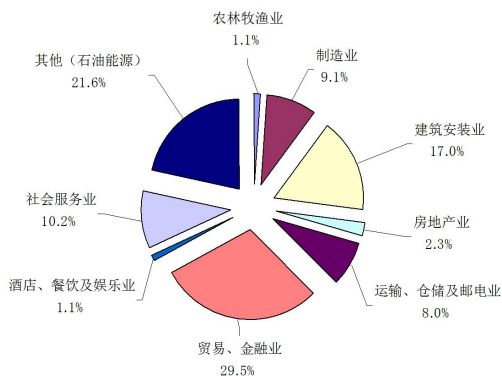


图 3 被调研的中资企业在哈所从事行业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调查数据整理得出

## 4、中资企业到哈萨克斯坦投资的主要动机

问卷调查显示,被调查的 69 家企业赴哈投资的动机,36%属于市场导向型,28%是区位导向型,即首先考虑哈萨克斯坦优越的地理位置条件,

21%属于资源导向型，即为了利用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而进行投资，9%的企业认为哈国投资政策比较优惠，而6%的企业认为当地劳动力充足且工资较低（详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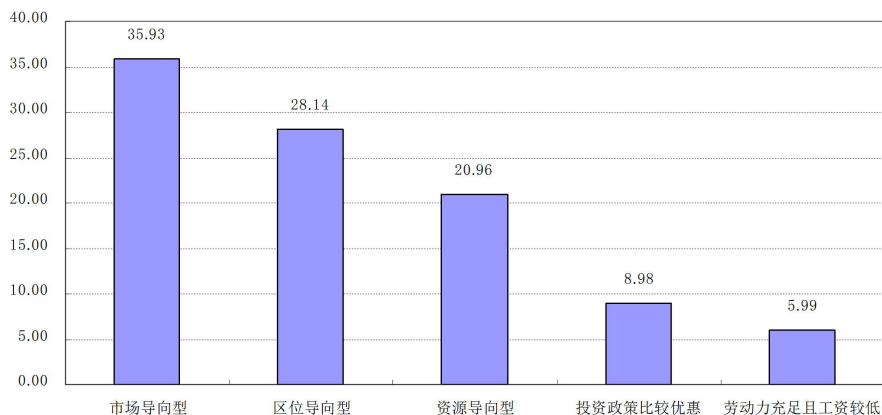


图4 企业到哈萨克斯坦投资的主要动机

资料来源：根据调查数据整理得出

## 5、中资企业投资规模

问卷调查显示，有16家企业的投资总额在100万美元以下，占23.2%；35家企业的投资总额在100万-500万美元之间，占50.7%；35家企业的投资总额在500万-1000万美元之间，占20.3%；4家企业的投资总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占5.8%。

### （二）中资企业对投资软环境满意度分析

#### 1、对哈萨克斯坦投资软环境的总体评价情况

从对哈萨克斯坦投资软环境的总体满意度来看，有2家企业表示满意，有30家企业认为软环境一般，35家企业表示不满意，2家企业表示很不满意（详见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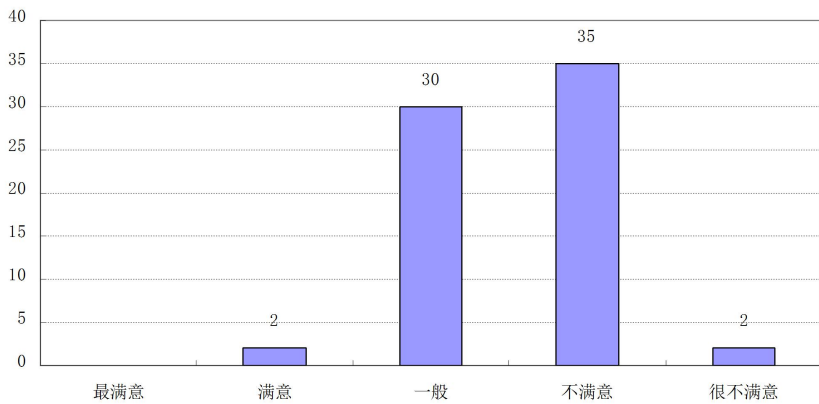


图5 中资企业对哈萨克斯坦的投资软环境满意度

资料来源：根据调查数据整理得出

从哈萨克斯坦的投资软环境的变化趋势评价来看，有 5 家企业认为软环境有很大的改善，41 家企业表示有所改善，21 家企业认为没有改善，有 2 家企业认为软环境最近有所恶化（详见图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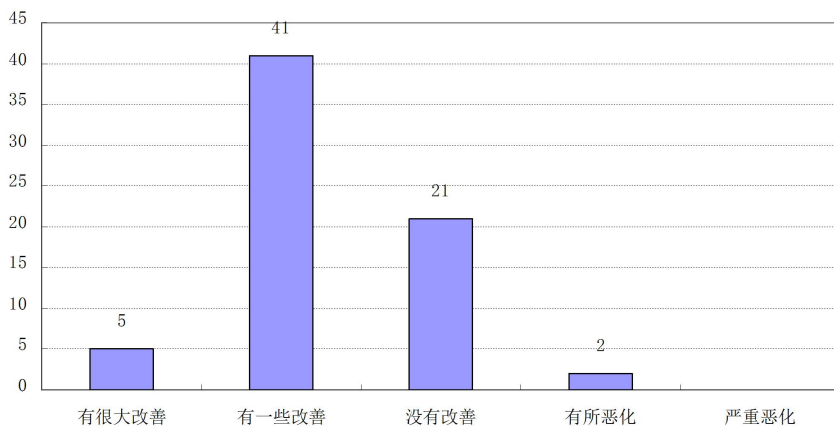


图6 哈萨克斯坦投资硬环境有何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调查数据整理得出

由图 5 和 6 可知，绝大多数中国企业对哈萨克斯坦的投资软环境表示不满意，占 50.1%；认为哈萨克斯坦的投资软环境一般的企业占 43.5%。总体而言，目前中国企业认为，由于政府部门办事效率较低、经济和市场运行难以预测、不稳定、政府干预过多、官员腐败等问题，使哈国的投资软环境长期得不到改善，甚至无法满足投资者的基本要求。

从投资软环境变化趋势来看，绝大多数企业认为哈萨克斯坦投资环境有所改善，占 59.4%。企业认为，近年来哈国投资软环境的改善，主要得益于国家逐步地向外国投资者提供的优惠条件和制度，尤其是在加入俄白哈关税同盟后，支持鼓励本地制造，欢迎国外的实体经济投资，对在当地的企业在税收经营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

## 2、对哈萨克斯坦政务环境的评价情况

对于哈萨克斯坦政务环境的总体评价，有 2 家公司持最满意态度，有 4 家公司持满意态度，有 25 家企业认为“一般”，有 27 家企业持不满意态度，有 14 家企业持最不满意态度（具体各指标详见表 1）。

**表1 对哈萨克斯坦政务环境评价结果（绝对数） 单位：企业个数**

评价项目	最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最不满意
办事效率	0	0	20	45	4
依法行政	0	3	15	44	7
服务意识	0	0	15	42	12
信息公开	0	5	54	8	2
沟通渠道	2	5	45	13	4
廉洁奉公	0	0	3	12	54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对表 1 中的数据进行调整后，可以得出哈萨克斯坦政务环境评价结果的相对数。从表 2 可以看出，对各项政务环境的评价项目持最满意态度的企业不超过 3%，4.35%–7.25%的企业持满意的态度，36.7%左右的企业持一般的态度，39.6%左右的企业表示不满意，而 20%的企业持最不满意的程度。很

明显，目前中资企业对哈萨克斯坦政务环境的评价不太高，绝大多数企业的评价是“不满意”或“一般”。

表2 对哈萨克斯坦政务环境评价结果（相对数） 单位：%

评价项目	最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最不满意
办事效率	0	0	28.99	65.22	5.8
依法行政	0	4.35	21.74	63.77	10.14
服务意识	0	0	21.74	60.87	17.39
信息公开	0	7.25	78.26	11.59	2.9
沟通渠道	2.9	7.25	65.22	18.84	5.8
廉洁奉公	0	0	4.35	17.39	78.26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此外，从表2中六个评价项目来看，令中国企业最不满意的一项是政务环境中的廉洁奉公，占78.36%；对办事效率、依法行政和服务意识等项，中国企业表示不满意的，分别占65.22%、63.77%和60.87%；而对信息公开和沟通渠道等项，企业的评价多为“一般”。

根据实地访谈调研结果可知，企业对政务环境之所以持不满意的态度，因为哈萨克斯坦政府部门效率较低，官僚主义严重，廉洁程度低下；法制不完善，执法不公，政务工作人员专业水平较低；政务执行和监督力度不够。

表3 对哈萨克斯坦政策环境评价结果（绝对数） 单位：企业个数

评价项目	最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最不满意
政策的规范与健全	2	8	43	15	1
政策的透明度	3	3	45	15	3
政策的执行力	0	2	17	45	5
政务公开工作	0	0	46	20	3
复议、仲裁的效果及企业 投诉后的解决效果	0	0	8	12	49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 3、对哈萨克斯坦政策环境的评价情况

从对哈萨克斯坦政策环境的总体评价来看，有 3 家公司持最满意的态度，有 4 家公司持满意的态度，有 32 家企业持一般的态度，有 21 家企业持不满意态度，和 12 家企业持最不满意态度。

由表 4 可知，对政务环境各项评价项目持最满意的态度企业不超过 3.6%，6.28%左右的企业持满意的态度，46.1%左右的企业持一般的态度，31%左右的企业表示不满意，15%企业持最不满意的的态度。很明显，目前中资企业对哈萨克斯坦政策环境的评价一般，绝大多数企业对其持有一般或不满意的的态度。

表4 对哈萨克斯坦政策环境评价结果（相对数） 单位：%

评价项目	最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最不满意
政策的规范与健全	2.9	11.59	62.32	21.74	1.45
政策的透明度	4.35	4.35	65.22	21.74	4.35
政策的执行力	0	2.9	24.64	65.22	7.25
政务公开工作	0	0	66.67	28.99	4.35
复议、仲裁的效果及企业 投诉后的解决效果	0	0	11.59	17.39	71.01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从表 4 中五个评价项目来看，令中国企业最不满意的一项是政策环境中的复议、仲裁的效果及企业投诉后的解决效果，占 71.01%；对政策的执行力，大多数中国企业表示不满意，占 65.22%；而对政策的规范与健全、政策的透明度及政务公开工作，企业持一般态度，分别占 62.32%、65.22%和 66.67%。

### 4、对哈萨克斯坦市场环境的评价情况

对于投资者而言，投资目标国的市场环境是至关重要的、决定性的因素之一。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市场体制不完善、配套制度和政策落后等特点，这些特点对投资的效率和回报可能造成障碍。

对哈萨克斯坦市场环境的总体评价，有 3 家公司持最满意的态度，有 4 家公司持满意的态度，有 28 家企业持一般的态度，有 33 家企业持不满意态度，有 4 家企业持最不满意态度。

**表5 对哈萨克斯坦市场环境评价结果（绝对数） 单位：企业个数**

评价项目	最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最不满意
竞争平等性	0	6	17	44	2
市场信息获取渠道便利、 准确性与代价	3	3	45	14	4
市场监管力度	0	0	44	17	8
工程服务	0	2	15	45	5
管理咨询	0	4	17	46	2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表中关于工程服务评价项目有两家企业没有作答，视为无效

由表 6 可知，对各项市场环境的评价项目持最满意态度的企业不超过 4.35%，5.5%左右的企业持满意的态度，40%左右的企业持一般的态度，48.51%左右的企业表示不满意，6.1%企业持最不满意的的态度。很明显，目前对哈萨克斯坦市场环境持不满意态度的中资企业较多，超过 60%。

**表6 对哈萨克斯坦市场环境评价结果（相对数） 单位：%**

评价项目	最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最不满意
竞争平等性	0	8.7	24.64	63.77	2.9
市场信息获取渠道便利、 准确性与代价	4.35	4.35	65.22	20.29	5.8
市场监管力度	0	0	63.77	24.64	11.59
工程服务	0	2.99	22.39	67.16	7.46
管理咨询	0	5.8	24.64	66.67	2.9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从表 6 中五个评价项目来看，令中国企业不满意的三项是市场环境中的竞争平等性、工程服务和管理咨询项目，分别占 63.77%、67.16%和 66.67%；对市场信息获取渠道便利、准确性与代价和市场监管力度两项指标，中国企业则持一般态度，分别占 65.22%和 63.77%。

#### 5、对哈萨克斯坦金融及社会中介环境的评价情况

金融体系的发展水平以及社会中介环境是进行对外投资的重要支撑条件。投融资活动的顺利进行，主要依赖于金融和中介服务的质量。

对于哈萨克斯坦金融及社会中介环境的总体评价，有 10 家公司持最满意的态度，有 25 家公司持满意的态度，有 33 家企业持一般的态度，有 6 家企业持不满意态度，有 3 家企业持最不满意态度。

**表7 对哈萨克斯坦金融及社会中介环境评价结果（绝对数）单位：企业个数**

评价项目	最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最不满意
银行业务（贷款、结算等）服务的便利性	0	20	42	5	2
筹融资渠道	10	45	6	6	2
中介金融服务	0	17	43	6	3
其他社会中介服务	0	17	42	6	3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表中关于其他社会中介服务评价项目，有一家企业没有作答，视为无效

由表 8 可知，对各项金融及社会中介环境评的评价项目持最满意态度企业超过 14%，36%左右的企业持满意的态度，48.4%左右的企业持一般的态度，对哈国金融及社会中介环境持不满意或者最不满意态度的公司占少数，分别为 8.4%和 3.6%。很明显，目前大多数中国企业对哈萨克斯坦金融及社会中介环境比较满意，满意度超过 70%。



**表8 对哈萨克斯坦金融及社会中介环境的评价结果（相对数） 单位：%**

评价项目	最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最不满意
银行业务（贷款、结算等）服务的便利性	0	28.99	60.87	7.25	2.9
筹融资渠道	14.49	65.22	8.7	8.7	2.9
中介金融服务	0	24.64	62.32	8.7	4.35
其他社会中介服务	0	25	61.76	8.82	4.41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从表8中四个评价项目来看，目前中国企业对哈国筹融资渠道非常满意，满意度接近80%。而对哈国的银行业务（贷款、结算等）服务的便利性、中介金融服务和其他社会中介服务，60%以上的企业持一般态度。

#### 6、对哈萨克斯坦产业配套支撑环境的评价情况

在投资环境中，产业配套支撑是涵盖生产和销售两个环节的重要基础，包括就地生产原材料可获得性、人力资源可获得性及其素质、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以及物流水平。

对于哈萨克斯坦产业配套支撑环境的总体评价，有2家公司持最满意态度，有7家公司持满意态度，有30家企业持一般态度，有28家企业持不满意态度，有4家企业持最不满意态度。

**表9 对哈萨克斯产业配套支撑环境评价结果（绝对数） 单位：企业个数**

评价项目	最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最不满意
原材料获得、质量与价格	0	12	45	8	4
技术研发转化能力	0	5	21	37	6
人力资源的可获得性、素质与价格	2	4	10	49	2
物流配送服务能力	0	6	43	16	4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表中关于人力资源的可获得性、素质与价格评价项目，有两家企业没有作答，视为无效

由表 10 可知，对各项产业配套支撑环境的评价项目，持最满意态度的企业达到 3%，接近 10%的企业持满意态度，43.2%左右的企业则持一般态度。对哈国产业配套支撑环境持不满意或者最不满意态度的企业，分别为 40.4%和 5.8%。很明显，目前大部分中国企业对哈萨克斯坦的产业配套支撑环境满意程度不高。

表10 对哈萨克斯产业配套支撑环境评价结果（相对数） 单位：%

评价项目	最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最不满意
原材料获得、质量与价格	0	17.39	65.22	11.59	5.8
技术研发转化能力	0	7.25	30.43	53.62	8.7
人力资源的可获得性、素质与价格	2.99	5.97	14.93	73.13	2.99
物流配送服务能力	0	8.7	62.32	23.19	5.8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从表 10 中四个评价项目来看，令中国企业不满意的两项分别为技术研发转化能力和人力资源的可获得性、素质与价格，分别占 53.62%和 73.13%。而对于原材料获得、质量与价格和物流配送服务能力则持一般的态度，分别占 65.22%和 62.32%。

#### 7、对哈萨克斯坦各职能部门的办事效率、服务态度和廉洁奉公的评价情况

软环境当中，除了良好的政策、市场、金融和产业之外，各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及服务态度同样十分重要。政府部门的官员们对所从事业务了解的水平、工作态度、对政策的理解程度等因素，构成了投资环境中十分重要的人为因素。

对于哈萨克斯坦各职能部门的办事效率、服务态度和廉洁奉公的总体评价，有 3 家公司持最满意态度，有 9 家公司持满意态度，有 45 家企业持一般态度，有 11 家企业持不满意态度，有 2 家企业持最不满意态度。

表11 对哈萨克斯坦各职能部门办事效率、服务态度和廉洁奉公的评价

单位： 企业个数

评价项目	最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最不满意
国家经济部	0	10	45	10	3
文化和体育部	0	12	52	4	0
投资和发展部	3	50	8	4	2
能源部	0	8	49	9	2
卫生与社会发展部	0	7	57	4	0
外交部	0	8	50	9	2
财政部	0	7	53	5	2
农业部	2	2	61	3	1
司法部	0	3	56	7	2
国家土地资源管理署	0	7	52	7	2
国家自然垄断调节署	0	3	18	43	2
保护竞争（反垄断）署	0	2	13	47	4
建筑与公共住宅事务署	0	12	49	6	2
财政部下属海关监管委员会	0	9	49	8	3
财政部下属税务委员会	0	7	52	6	2
财政部下属国家财产与私有化委员会	0	4	52	5	5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表中对于国家经济部、文化和体育部、能源部、卫生与社会发展部的评价，有六家企业没有作答，视为无效

由表 12 可知，对哈萨克斯坦各职能部门的办事效率、服务态度和廉洁奉公的评价，持最满意态度的企业达到 4%，接近 14%的企业持满意的态度，65.92%的企业则持一般的态度，对哈国各职能部门持不满意或最不满意态度的企业分别为 16.5%和 3.2%。很明显，目前大部分中国企业在接触哈国相关职能部门过程中，认为其办事效率、服务态度以及廉洁奉公水平有待进一步的改善。

表12 对哈萨克斯坦各职能部门办事效率、服务态度和廉洁奉公的评价结果

单位：%

评价项目	最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最不满意
国家经济部	0	14.71	66.18	14.71	4.41
文化和体育部	0	17.65	76.47	5.88	0
投资和发展部	4.48	74.63	11.94	5.97	2.99
能源部	0	11.76	72.06	13.24	2.94
卫生与社会发展部	0	10.29	83.82	5.88	0
外交部	0	11.59	72.46	13.04	2.9
财政部	0	10.45	79.1	7.46	2.99
农业部	2.9	2.9	88.41	4.35	1.45
司法部	0	4.41	82.35	10.29	2.94
国家土地资源管理署	0	10.29	76.47	10.29	2.94
国家自然垄断调节署	0	4.55	27.27	65.15	3.03
保护竞争（反垄断）署	0	3.03	19.7	71.21	6.06
建筑与公共住宅事务署	0	17.39	71.01	8.7	2.9
财政部下属海关监管委员会	0	13.04	71.01	11.59	4.35
财政部下属税务委员会	0	10.45	77.61	8.96	2.99
财政部下属国家财产与私有化委员会	0	6.06	78.79	7.58	7.58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从表12中十六个评价项目来看，令中国企业不满意的两个职能部门分别为：国家自然垄断调节署和保护竞争（反垄断）署，分别占65.15%和71.21%。对国家经济部、文化和体育部、能源部、卫生与社会发展部、外交部、财政部、农业部、司法部、国家土地资源管理署、建筑与公共住宅事务署、财政部下属海关监管委员会、财政部下属税务委员会和财政部下属国家财产与私有化委员会等部门持“一般”态度的企业达到了65%以上。而对投资和发展部持满意的态度企业最多，占74.63%。

根据实地访谈调研结果可知，目前中资企业对哈萨克斯坦政府职能部门最主要的不满意因素，是职能部门大规模的腐败问题。企业代表指出，在

政府职能部门权力很大的情况下，这些部门跟市场关联越密切，就越容易导致寻租行为。政府职能部门除了严重腐败问题之外，还存在办事效率低下、对所从事的业务不熟悉等问题。而且，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其工作方式、态度和效率截然不同，即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区别对待的情况。

### （三）中资企业对投资硬环境满意度分析

#### 1、对哈萨克斯坦基础设施的总体评价情况

从对哈萨克斯坦基础设施的总体满意度来看，有 17 家企业满意，有 44 家企业认为基础设施环境一般，有 7 家企业表示不满意，1 家企业表示很不满意（详见图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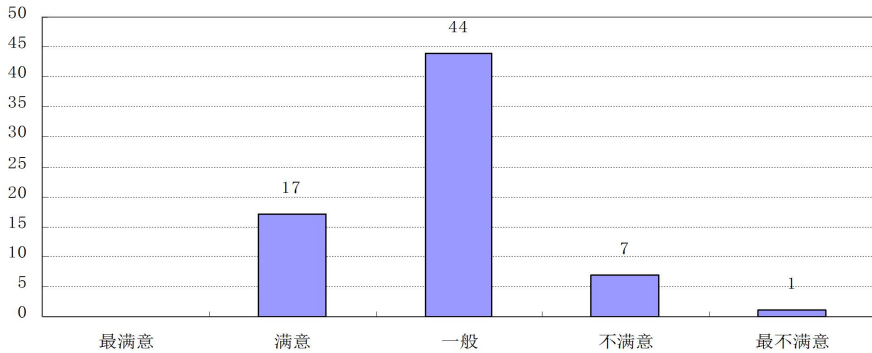


图 7 中资企业对哈萨克斯坦的投资硬环境满意度

资料来源：根据调查数据整理得出的

对于哈萨克斯坦基础设施发展变化趋势的评价，有 18 家企业认为基础设施环境有很大改善，另外有 51 家企业认为有所改善，认为哈国基础设施没有改善、甚至有所恶化或者严重恶化的企业个数为 0（详见图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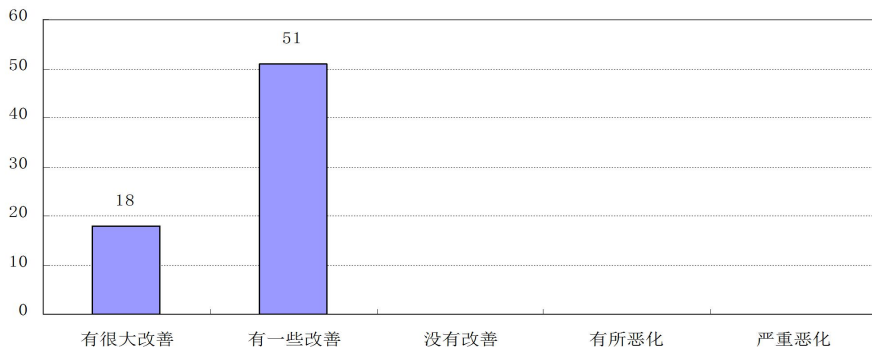


图 8 哈萨克斯坦投资硬环境有何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调查数据整理得出

由图 7 和 8 可知，绝大多数中国企业对哈萨克斯坦投资硬环境持一般的态度，占 63.8%；对哈萨克斯坦的投资软环境持满意态度的企业占 24.6%，不满意的企业占 10.1%，最不满意为 1.4%。总体而言，即便哈萨克斯坦的铁路、公路和航空运输已经有大幅度的改善，但中国企业认为，在信息可获得性、基础设施发展速度等问题上还需要进一步改善。

## 2、对哈萨克斯坦各项基础设施现状的满意程度

基础设施是改善投资环境的重要物质保障，它是一切企业、单位和居民生产经营活动和生活的共同的物质基础，是进一步提高投资环境的保障，既是本地物质生产的重要条件，也是引进外资的重要条件。

对于哈萨克斯坦各项基础设施发展现状的评价，有 14 家公司持最满意态度，有 27 家公司持满意态度，有 26 家企业持一般态度，有 2 家企业持不满意态度，有 1 家企业持最不满意态度。

表13 哈萨克斯坦各项基础设施发展现状的满意程度（绝对数）

单位：企业个数

评价项目	最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最不满意
航空运输	18	44	5	1	0
铁路运输	7	15	42	3	1
公路运输	8	9	45	3	3
邮电通信	8	11	44	4	2
环保设施	6	7	52	4	0
电力供应	20	41	7	1	0
水供应	20	41	7	1	0
油、气供应	21	44	4	0	0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表中有关航空运输、铁路运输和公路运输的评价项目，有一家企业没有作答，视为无效

由表 14 可知，对哈萨克斯坦各项基础设施发展现状的评价，持最满意态度的企业达到 20%，38.6%的企业持满意态度，37.6%的企业持一般态度，持不满意或者最不满意态度的企业分别占 3.5%和 3%。很明显，大多数中资企业认为哈萨克斯坦的基础设施发展水平较好，基本上可以满足经营需要。

表14 哈萨克斯坦各项基础设施发展现状的满意程度（相对数） 单位：%

评价项目	最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最不满意
航空运输	26.47	64.71	7.35	1.47	0
铁路运输	10.29	22.06	61.76	4.41	1.47
公路运输	11.76	13.24	66.18	4.41	4.41
邮电通信	11.59	15.94	63.77	5.8	2.9
环保设施	8.7	10.14	75.36	5.8	0
电力供应	28.99	59.42	10.14	1.45	0
水供应	28.99	59.42	10.14	1.45	0
油、气供应	30.43	63.77	5.8	0	0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从表 14 中八个评价项目来看，没有一个评价指标令中国企业最不满意或者不满意，但对于铁路运输、公路运输、邮电通信和环保设施发展水平，多数企业持一般态度。总体看，目前哈萨克斯坦所具备的基础设施还是能够满足投资者需要的。

### 三、问卷调查反映出的中国企业在哈萨克斯坦投资的主要风险

从问卷调查所反映的中国企业对于投资软环境和硬环境的评价可以看出，绝大部分中国企业在哈萨克斯坦投资、生产或者经营过程中，都遇到较多的问题。可以看出，企业对投资硬环境持较满意的态度，但对投资软环境则基本上持不满意或者一般的态度。这表示，对中国企业而言，哈萨克斯坦的投资环境隐藏着许多不可预测、难以控制的风险。

根据访谈调研和调查问卷结果，笔者认为，中国企业在走进哈萨克斯坦市场时面临的风险，大体可以分为来自外部和内部两种风险。其中外部风险是指公司自身以外的风险因素，主要包括政治风险、法律风险、金融风险、技术风险、市场风险、产业风险、社会文化风险、自然环境风险等企业本身无法预测或无法控制的要素。而企业内部风险则指，企业机制自身原因造成的风险，主要包括战略风险、操作风险、运营风险、财务风险等。因此，在全面总结调查问卷及访谈调研结果的基础上，本文发现并分析目前中国企业在哈萨克斯坦经常面临的外部 and 内部风险。

#### （一）中国企业投资哈萨克斯坦面临的主要外部风险因素

##### 1、政治风险

（1）目前哈萨克斯坦社会当中存在着对“后纳扎尔巴耶夫时期”的担忧和危机感。哈国总统努尔苏丹·阿比舍维奇·纳扎尔巴耶夫，从 1991 年以来一直担任哈萨克斯坦总统，他在 1991 年、1999 年、2005 年、2011 年、2015 年的哈萨克斯坦总统选举中分别获得了 98.8%、81.00%、91.15%、95.55% 和 97.75% 的得票率。可见，即便哈国社会绝对支持现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但是这种“稳态”里面存在着严重的隐患。如果未来哈萨克斯



坦政治方面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得不到保障的话，估计会对国家各个领域带来一定的挑战。

(2) 日益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给哈萨克斯坦带来一定的风险。哈萨克斯坦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处在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自古以来，哈萨克斯坦就是链接欧洲和亚洲的重要交通和文化枢纽。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哈国政府已经制定了非常明确的外交政策，即跟俄罗斯建立长期特殊友好关系，跟中国建立稳定的友好关系，跟中亚其他国家以及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阿塞拜疆等维持均势关系，跟日本、美国和欧洲国家建立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但是苏联解体以来，中亚区域一直是大国争夺之地，无论是美国、俄罗斯或者中国，均在这个区域拥有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而哈萨克斯坦在这个问题上始终保持中立，并坚持选择有利于本国发展的外交政策。比如，哈萨克斯坦既是由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的重要倡导者，同时也是中国倡导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参与者。因此，即便这种情况是一种稳定的因素，但从长期角度来看，哈国是否能够继续坚持这种态度还需拭目以待。

(3) 前苏联国家范围内的“颜色革命”风险较大。哈萨克斯坦是典型的多民族国家，目前在哈居住着 120 多个民族，其中人口最多的两大民族为哈萨克族和俄罗斯族，分别占到 66.01% 和 21.05%。为了保证并弘扬哈萨克斯坦各民族的团结、友谊和平等，1995 年 3 月 1 日政府正式成立“哈萨克斯坦人民大会”（Ассамблея Народа Казахстана）。多民族因素既是哈萨克斯坦极大的优势，同时也是其极大隐患。多民族关系比较特殊，一旦处理不好，就可能会发生类似于 2012 年吉尔吉斯斯坦颜色革命或者 2014 年乌克兰广场运动的事件。因此，即便在短期内哈萨克斯坦多民族因素不会成为很大的不稳定因素，但从长期来看，它有可能在政治方面带来一些困惑。

(4) 国家部门和官员们贪赃受贿行为极其严重。根据透明国际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sup>①</sup>每年公布的报告，按照清廉指数指标，2015 年哈萨克斯坦位于全球第 123 名（2013 年是第 140 名）。政府腐败以及行

---

<sup>①</sup> 透明国际是一个监察贪污腐败的国际非政府组织，该组织制定和每年公布清廉指数，提供一个可供比较的国际贪污状况列表。

贿受贿现象不仅在国有部门，而在私营部门同样也非常常见，均习惯于用钱和关系解决问题。令外国投资者最不满意的一点是，这种现象在招标过程中表现最为明显，中标的企业往往不是靠关系就是靠行贿得到项目。另外，腐败现象已经开始渗入到外资企业内部，许多企业透露，员工之间也存在行贿受贿现象，这种行为给公司经营带来了一些风险。因而，腐败现在不仅是企业面临的外部风险，也已经成为企业不可避免的内部挑战。

## 2、法律和政策风险

(1) 哈萨克斯坦法律法规变化多端，缺乏稳定性。法律是一切之根本，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一切都是空中楼阁。在这方面，哈国税法、劳动法、海关法以及其他的法律和规章制度每年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变化，而且多数外资企业表示，对这种变化进行预测的难度非常大。因而，法律和规章制度的变化多端，已成为来哈投资的企业最主要的外部风险之一。

(2) 海关法和制度变化速度过快。自哈萨克斯坦加入俄白哈关税同盟以来，海关法规定的每年重审制度已成为外国投资者（尤其是从事对外贸易和物流业务的公司）在通关环节上的主要障碍。公司在进出口过程中，会遇到海关部门要求补充文件或信息，因而严重影响公司的办事和进出口效率，并对公司客户造成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此外，企业表示，海关工作态度以及规定还不太符合现代国际标准，大部分手续过分复杂甚至是多余的，关税水平过高。

(3) 哈萨克斯坦法律政策制度不完善，有法不依现象普遍，行政政策作用有限。根据实地访谈调研结果得知，大多数企业对政策环境之所以持有一般或不满意的态度，是因为官员对国家政策了解水平很低、对业务知识掌握不全。国家所实施的政策配套的法律体系不清晰，即在大力引进外资的情况下，国家尚未拥有配套的相关服务体系。政府执法部门里互相推诿、扯皮、乱作为现象较常见。总的来说，国家提出的扶持投资者政策较多，但其执行力较差。国家法律和政策变化多端，致使投资者不太愿意扩大投资规模。

### 3、金融风险

(1) 哈萨克斯坦外汇管制很严格，缺乏灵活性。哈国外汇管制制度属于独联体国家范围内最严格的制度之一，大额资金兑换速度很慢。若公司将资金从国外转账到哈国，或者从哈国转账到国外，需要向国家央行负责部门提供相关的证明（偶尔境内的资金转账也需要这种证明）。所有的大额转账行为必须经过哈萨克斯坦央行的批准才能进行。此外，2016年2月29日哈国央行批准《关于对哈萨克斯坦境内进行外汇现金交易的准则进行补充和修改的决定》。根据决定内容可知，哈国境内的外币兑换点需和授权银行达成外汇交易及提供货币的协议，并且协议需在该决定正式颁布后一个月内完成。此外，境内外币兑换点营业时间不再受哈萨克斯坦证券交易所约束。另外，个人在外币兑换点兑换1百万坚戈以上的货币需出示有效身份证明。很明显，哈萨克斯坦外汇管制将不会放松，反而会进一步严格。毫无疑问，复杂的收发汇手续、过多的政策干预和官僚主义、银行对贷款的发放审核过严等因素，是外国投资者面临的外部风险和障碍。

(2) 坚戈汇率波动频繁，并持续贬值。哈萨克斯坦货币总共经历过四次大规模的贬值，分别在1999年、2009年、2014年和2015年。2014年2月，坚戈兑美元的汇率下降20%（从150坚戈下跌至180坚戈），此次贬值主要受到俄罗斯卢布贬值、美元升值的影响。新的汇率由央行在179—185坚戈范围内进行控制。2015年8月20日在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俄罗斯、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货币大幅贬值的背景下，为了确保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哈萨克斯坦政府开始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尽管当时个别专家认为汇率不会因这个政策发生很大的波动，但是从2015年9月至2015年12月坚戈对美元贬值达到了30%以上，还是给对外贸易行业造成了较大的打击。

### 4、产业和技术风险

(1) 哈萨克斯坦工业基础薄弱，能源行业占主导地位。哈萨克斯坦地广人稀资源丰富，有丰富的石油和矿产资源，而工业基础则比较弱。从一个角度来看，哈萨克斯坦的产业配套支撑发展的速度较慢，有可能给投资者带

来一些问题（如原材料可获得性差等问题），但同时也给投资者提供了开拓新领域的商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全球能源价格大幅下跌、全球经济增速下滑的背景下，哈萨克斯坦财政收入有一定程度的减少，导致国内个别项目被暂停或完全停止，显然这也会缩小可选择的投资领域。

（2）哈萨克斯坦制造业发展水平较低、吸引外资能力有限。作为典型的能源输出国，哈萨克斯坦经济已出现“荷兰病”的征兆，如劳动力从制造业和其他工业部门不断涌入服务业等行业的趋势。<sup>①</sup>此外，该领域绝大部分设备落后，长期没有得到更新。因此，将来能够带动和促进哈萨克斯坦工业化进程、具有生产高附加值产品能力的行业，面临设备老化和人力资源短缺的危机。制造业领域之所以长期没有得到改善，因为从所有制结构来看，80%属于国营企业，剩下的20%才是中小型的私营企业（其中小型占16%，中型占8%）。很显然，在目前发展阶段该行业不具备吸引大量外资的条件。

（3）高水平专业人才可获得性有限，缺乏高技术人才。随着劳动力由制造业转移到其他行业的趋势，哈萨克斯坦逐渐面临人力资本水平下降的局面。来哈投资的企业表示，在制造业、建筑业、设备安装等行业进行投资时，面临当地高技术人才短缺的问题。所以除了技术、设备和管理人员之外，还需要从中国引进本领域的专业人才进行设备安装和生产。然而哈萨克斯坦在这方面还设置了一些障碍，如为各区域每年设定劳动进口配额（该配额逐年下降）。因此，虽然整体上哈国市场上劳动力相对充裕，但是专业知识水平较低，专业人才相对不足。

（4）基础设施发展缓慢，无法满足大规模生产的需要。根据实地访谈调研的结果，我们了解到，苏联解体以来，铁路、干线、枢纽甚至道路基础设施基本上没有更新，导致了位于哈萨克斯坦铁路和公路边境运输设施无法满足大规模的物流需要，其装载和卸载效率依然很低。此外，邮电通信服务的质量因不同的州和市而异。对于航空运输、水供应和油、气供应设施的状况，中资企业多持满意的态度，认为近几年来上述三个领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在航空客运和货运方面有明显的改善趋势。企业表示，近几年政府已经

---

<sup>①</sup> 伊万·沙拉法诺夫、任群罗：“哈萨克斯坦如何应对‘荷兰病’”，《俄罗斯研究》，2015年第2期。

开始重视办厂区域的水、油、气供应等问题的解决。

(5) 物流管理水平较低，成本过高。哈国境内物流企业经常不遵守时间约定，无论境内或者境外货物流通成本价格都比较高。运输成本过高引起了原材料价格水平上涨，因而加重了企业经营的负担，给它造成时间和资金上的损失。

## 5、市场风险

(1) 哈萨克斯坦市场价格形成机制不完善，监管混乱。根据实地访谈调研结果可知，大多数企业对哈萨克斯坦市场环境之所以持不满意或一般的态度，是因为该国价格形成机制过多地受国家干预，即价格并非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形成。鉴于这种情况，哈萨克斯坦政府决定从 2017 年 1 月起，将不再对市场价格采取调控行为。这将为投资者提供更加开放、透明和规范的市场运营环境。这样做的结果，企业家和投资者能够更加容易地参与价格形成过程，但是对于消费者的购买能力来说，也隐含着一定的风险。在价格完全由市场决定的情况下，绝大多数消费品（尤其是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会迅速上升，进而降低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导致企业主销市场的萎缩。政府对市场价格的控制，事实上阻碍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但是目前哈萨克斯坦的市场价格也无法完全脱离政府干预。

(2) 市场竞争环境不平等，保护国内市场意识极强。中小企业表示，生产经营过程中经常遇到个别不正当的竞争因素，如企业和企业之间的虚假宣传、用行政等手段限制商品流通、散布有损于商业和产品信誉的信息等；企业和政府之间，则存在税务局、卫生流行病学侦察局、保护劳工局、消防局、技术情报局、物业部等机构频繁、无理由的检查和过多的干预。显然，这还是归结为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政府过多的干预市场、市场信息可获得性较差、企业市场主题意识弱等问题。哈政府从 2015 年起开始逐步地减少市场干预，比如 2015 年 12 月 4 日哈萨克斯坦国家经济部竞争保护和反垄断调节委员会决定，从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缩小对具有主导市场地位的企业监管名单所涉及的范围。另外，从 2017 年 1 月 1 日起，这种政策和名单将彻底取消。另外，加入由俄罗斯主导的俄白哈关税同盟和欧亚经济

联盟之后，哈萨克斯坦对国内市场的保护意识有所加强，大部分进口产品和原材料的关税增加了 2-3 倍。因此，市场竞争秩序混乱和国内市场保护意识提升，是投资者在哈萨克斯坦市场面临的主要外部风险之一。

## （二）中国企业投资哈萨克斯坦面临的主要内部风险因素

### 1、公司注册风险

近几年来，哈萨克斯坦政府在新公司注册问题上提出许多改革方案，使哈国公民以及刚来的外国投资者能够比较容易地注册新的企业或者业务。哈国公民和外国投资者甚至能够通过互联网办理与注册公司相关的手续。然而，虽然注册的方式确实降低了进入市场的难度，但是外国投资者在此过程中仍然遇到一些问题：

（1）法人和自然人税务登记制度。根据哈萨克斯坦税法典第 562（5）条可知，对所有非居民自然人不存在所得税源泉扣缴，通过利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要素而获取收益，均应该注册成为纳税人。注册之后，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会得到两种收入：红利（股息）和薪水，而对这两种收入都要征税。比如，公司在支付红利或薪水之前应当扣除 10% 的个人所得税。如果非居民自然人打算将公司的某部分利益（比如股份或权益）卖给或转让给另一个自然人或者外国法人的话，则这种交易行为所导致的价值增值同样要被征税。

如果外国自然人打算成立有限责任公司，则应当获得“个人识别号”（ИИН,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ый Идентификационный Номер），即需要完成成为纳税人的手续。虽然该手续是由国家税务局进行的，但自然人个人识别号注册是一个充满官僚主义的过程，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及很多资源。值得强调的是，如果外国企业打算在哈萨克斯坦设立一家具有法人资格的子公司的话，那它可以不遵循上述规则。但是，如果外国企业在哈萨克斯坦境内设立分公司或者代表处的话，则在开始经营之前，税务局会要求这类公司进行注册商务个人识别号手续。

另外，根据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税法典在 2014 年提出的新规定，在 2015 年 1 月 1 日之前，哈国境内所有的外国法人代表（总经理）、外国分公司和代表处的经理、外国自然人，都办理了纳税人注册的手续（包括规定实施之

后新上任的领导)。可见，对于一家外资企业，来哈投资并在当地设立一家子公司、分公司或者代表处，是一个长期和复杂的过程。为了避免由此带来的风险，企业应当充分了解当地公司法、税务法和投资法，以免过多的时间和资源浪费。

(2) 法人或自然人发起人商务签证的制度。根据哈萨克斯坦移民法第 40 (2) 条规定，如果外国自然人来哈萨克斯坦当地收购或者成立一家新的企业，则这种自然人应当持商务签证入境。可是，这种制度的实施因不同的州和城市而异，除了阿斯塔纳市和阿拉木图市，其他的区域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可以允许持旅游签（或其他类型签证）的自然人成立或收购公司。总体而言，中资企业表示，目前哈国所实施的签证政策比较紧，尤其对中国的劳动力进口配额控制得比较严。这显然将会阻碍中国同中亚各国建立互联互通的进程，对走进该国的企业造成一些客观的限制。

(3) 公司利益再分配制度欠佳。根据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民事法第 42 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在其股东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应当重新在税务局办理登记手续。但是，大部分中国企业表示，在有限责任公司法律制度当中忽视了关于现有股东之间利益再分配问题这一项，但这个问题不是一直存在。

2013 年前，在有限责任公司法律变化之前，公司应当在下列情况发生之后重新注册：（1）公司名称变更；（2）公司注册资本减少；（3）公司股东发生变化。此外，根据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律》第 26 条和第 5 条规定，公司在下列情况发生之后应当通知注册机构：（1）公司注册资本增加；（2）法定地址变更。2013 年之前，至于其他的各种情况，比如现有参与者之间进行利益再分配、股东名称或者地址变更等问题，均称之为“批准设立公司文件的变更和/或者补充”。而 2013 年以后，注册机构只增加了一个新的要求，即在首次进行登记的时候需要提供公司的章程。迄今为止，该国尚未明确规定如何向注册机构申报公司内部所发生的股东之间利益再分配的情况。很明显，这种不确定性会给公司造成一定的内部风险压力。

## 2、企业公账开户的风险

最近哈萨克斯坦政府推出新的《关于打击洗黑钱及恐怖融资活动》的法律，加大了银行公账开户的难度。开户过程中，银行要求公司提供一系列的补充文件，如法定地址证明以及其他公证或认证过的文件。企业表示，即便目前哈萨克斯坦境内有几家国际性银行，但是新出台的法律及银行本身严格的检查制度加大了公司开户的难度。可见，这将给走进哈萨克斯坦市场的中小型外资企业造成较多的资金障碍和风险，甚至使个别外企难以进一步扩大其经营范围。

## 3、征税制度和纳税会计风险

在哈萨克斯坦，新成立或注册的中国企业经常会面临对当地征税制度陌生、对如何提交报税表、进行会计核算手续不熟悉等难题。根据调研结果得知，位于哈萨克斯坦不同州和城市的企业在这方面所遇到的问题是截然不同的。比如，在进行纳税登记过程中，阿斯塔纳市的税务局会直接来到企业所在地，检查该企业是否在进行登记（或者重新登记）的时期确在该城市进行经营。而在阿拉木图市，税务局则会在完成登记（或重新登记）后两到三年内来公司检查。检查过程中若发现本企业不在其所登记的区域经营的话，税务局就会取消本企业增值税登记号或直接认定该企业为不法商人。

## 4、雇佣外国和高技术水平劳动力的风险

（1）雇佣外国劳动力的手续过于复杂。对于外国法人企业来说，公司登记之后获得哈萨克斯坦境内《雇佣外国劳动力许可证》是至关重要的任务之一。根据哈萨克斯坦《公司法》和《劳动法》相关的规定可知，所有具有外国法人身份的分公司和代表处的总经理，不需要为自己办理雇佣外国劳动力许可，即可以根据相关的规定办理商务签证来哈工作即可。但对这种企业里其他的外籍员工，则需要办理劳动力许可证，才能够根据本区域设定的配额，从国外直接引进来。而对具有外国法人身份的有限责任公司来说，则相反。这类企业总经理来哈之前，首先应当为自己办理劳动力许可证，才能入境为整个企业的其他员工办理相应的手续。也就是说，根据哈萨克斯坦法律



规定，若外资企业想要办理雇佣外国劳动力许可证的话，就必须让本公司总经理自己提交申请，办理相关的手续。而如果这家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本身是外国公民的话，那他首先应当为自己办理这种许可才行。根据多数企业的经验来看，这种过程往往伴随严重官僚主义，需要花很长的时间、花费较多的资金，才能办好这种许可。

(2) 高技术水平人才引进和留住的问题。迄今为止，哈萨克斯坦高技术熟练劳动力流失的问题比较严重。2010—2015年间，哈萨克斯坦劳动市场具有较明显的熟练劳动力净流出和非熟练劳动力净流入的特点。哈国移民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近四年来，从哈萨克斯坦移民到国外的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口已经超过移民到哈萨克斯坦具有高等学历的人口，差距高达65%。熟练劳动力净流出包括技术、科技、经济和教育等行业。<sup>①</sup>中国企业表示，即便当地提供招聘服务的机构（包括国际机构，如Head Hunter, Job Hunter等）能够加快搜寻熟练劳动力的过程，但总体来看相对较慢，无法满足企业对劳动力尤其是高技术水平劳动力的需求。

此外，若公司已经在当地找到较熟练、高水平的劳动力的话，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依然存在怎样留住人才的问题。因为在哈萨克斯坦，劳动者普遍有一种共同的特点，即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会换一个工作单位，甚至选择去本公司的竞争对手企业工作。因此，这不仅会造成本企业人才流失的风险，更重要的是，有可能导致有关公司的商业秘密被这种人传递或出卖给竞争对手，因而造成很严重的内部经营风险。

(3) 制造业和能源领域员工罢工频繁。尽管哈萨克斯坦罢工现象少见，范围也较小，但在罢工正式发生的时候，还是会给企业家带来一定的损失。2000年以来，制造业和能源领域的罢工依次发生在阿克托别州、阿特劳州、阿克陶市和铁米尔套市。个别罢工发生于外资企业，如荷兰安赛乐米塔尔钢铁公司（ArcelorMittal）在经营铁米尔套市的卡拉干达钢铁公司过程中，于2013年面临员工举行的短期罢工，这场罢工耽误了该企业将近一周的工作和经营时间。

---

<sup>①</sup> МИА Казинформ.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наблюдается отток квалифицированной рабочей силы. 12.11.2014. <http://www.inform.kz/rus/article/2715937>

## 5、复杂语言环境造成的风险

虽然哈萨克斯坦官方语言是哈萨克语，但是俄语仍然是生活和民族之间通用的语言。在商业活动中，如文牍处理、商业谈判、签订合同等，俄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共同的沟通渠道作用。对中国企业而言，语言的选择和使用一直是比较大的问题。现在的哈萨克斯坦公民在大部分情况下能够灵活使用三种语言：哈萨克语、俄语和英语。至于对每种语言的掌握程度，需要看具体的区域，比如在哈萨克斯坦的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俄语比哈语用得更多；在哈萨克斯坦的西部和南部地区，则是哈语比俄语用得更多。而如果企业想找个汉语水平较高的翻译或员工，则可能只能在阿斯塔纳、阿拉木图市或阿拉木图州以及哈萨克斯坦的西部地区找到。无论如何，中国企业走进哈萨克斯坦时，至少应当找到水平较高的汉俄、俄汉翻译（最好同时会汉、哈、俄三种语言的翻译），否则，在跟政府部门打交道以及与其他企业交往过程中会发生一些不必要的问题，甚至会由于翻译不准确或不到位，导致企业的资产、时间或资源的损失。

---

**【Abstract】** In March 28, 2015, China officially released the “Vision and Actions on Jointly Building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and clarified that the Xinjiang region is going to become a core area of the Silk Road economic zone. Therefore, in order to encourage more Chinese enterprises to "go global" in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there is a strong need to improve the understanding of investment environment in Kazakhstan, so that Chinese enterprises may choose investment fields more accurately, make more rational evas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risks, also make objective and rational investment decisions. At present, most of the research on the operation and investment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Kazakhstan have a lot of shortcomings, such as small number of samples, low data quality, macroscopic and so on. Therefore, by using a field research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s, this paper produced an interview and analytic research on the 69 Chinese enterprises which already have or planning to make investments in Kazakhstan. And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this paper has summarized main internal and external risk factors, which Chinese enterprises are facing in Kazakhstan. The external risks include political risks, law and policy risks, financial risks,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risks and market risks; the internal risks include company registration risks, corporate account risks, taxation system and taxation accounting risks, employment of foreign and high technical skills labor risks, and also the risk of the complicated language environment.

**【Key words】** Chinese enterprise Kazakhstan Investment environment Evaluation Risks

**【 Аннотация 】** 28 марта 2015 г. китай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издало «Концепцию и план действий по содействию совместному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у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пояса Шёлкового пути и Морского Шёлкового пути 21-го века», а также чётко обозначило Синьцзян в качестве ядр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пояса Шёлкового пути. С целью побуждения большего количества китайских предприятий к «выходу» в страны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необходимо улучшить понимание инвестиционного климата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В данной статье, используя метод полевых науч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и опросников, представлены результаты интервью 69 китайских компаний, занимающихся инвестицион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ю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проведён анализ оценки мягкой и твёрдой инвестиционной среды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а также подытожены серьёзные внутренние и внешние риски, с которыми сталкиваются китайские предприятия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Китайские предприятия, инвестиционная среда, Казахстан, оценка рисков

---

(责任编辑 阎德学)

**俄罗斯研究** (双月刊)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RUSSIAN STUDIES**

**2016年第4期**

(总第200期)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华东师范大学

主编：冯绍雷

出版：《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A403

邮编：200062

电话：021-62233816；021-62238113

传真：021-62232113

电子信箱：[russiastudies@163.net](mailto:russiastudies@163.net)

排版：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电脑室

印刷：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本刊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9-721X

网络电子版代理：中国知网

网址：[www.cnki.net](http://www.cnki.net)

• 公开发行 •

定价：30.00元